

目 录

• 俄苏历史研究专辑 •

苏联与冷战国际史

- 3 戴超武 / 斯大林、苏联外交与冷战的起源
- 88 赵玉明 / 文化冷战与冷战初期的苏联反美宣传——以中央宣传鼓动部解密档案为切入点

社会主义研究

- 107 杨奎松 /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的社会主义主张与实践

宗教史

- 147 赵小华 / 试论俄国历史上的禁欲派与约瑟夫派之争
- 165 贾付强 /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苏联公共外交（1943-1953年）

中俄关系史

- 184 刘振宇 / 清末民初中国人留学俄（苏）活动的历史考察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杨 成

刘 军

本期执编：杨 成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2013 年 2 月 28 日

俄罗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3 年第 1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Дай Чаоу

Сталин, совет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и истоки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3)

Чжао Юймин

Культурная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и советская анти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в нача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Основываясь на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х архивных документах Отдела пропаганды и агитации ЦК КПСС (88)

Ян Куэйсун

Ленинские понят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социализма до и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07)

Чжао Сяохуа

О борьбе Нестяжателей с Иосифлянами в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147)

Цзя Фуцян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и советская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1943-1953)..... (165)

Лю Чжэнью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о обучению китайцев в России (СССР) в конце династии Цин---начале периода Китай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184)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3 年第 1 期 (双月刊)

Contents

Dai Chaowu

Stalin, Soviet Diploma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3)

Zhao Yuming

The Cultural Cold War and Soviet Anti-US Propaganda---Based on the
Declassified Archives of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88)

Yang Kuisong

Lenin's Socialist Views and Practice Before and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107)

Zhao Xiaohua

On Controversy between Ascetic Faction and Joseph Faction in Russian
history..... (147)

Jia Fuqiang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nd Soviet Public Diplomacy (1943-
1953) (165)

Liu Zhenyu

A Historical Survey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ctivities in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184)

苏联与冷战国际史

斯大林、苏联外交与冷战的起源

戴超武*

【内容提要】对安全的追求，对于形成斯大林在战前、二战中以及战后不同时期的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国内政治看，这种政策不仅是动员苏联人民应对斯大林所认为的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同西方的对抗的手段，而且也是巩固他在苏联最高决策层内地位和权力的一个手段。斯大林是苏联在战后关键问题上，诸如东欧的前途、德国问题以及对日占领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的决策者。斯大林努力主导战后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其主要目标是要沿着苏联西部边界建立一个安全地带。斯大林认为，这一目标同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的需要并不矛盾。斯大林希望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可以被英美所承认，以换取苏联承认西方在欧洲其他地区的影响。斯大林对东欧的控制，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担心同英美的合作可能面临失败。然而，斯大林对东欧的控制最终还是被西方认为是挑战西方，从而产生了与他的愿望相反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苏联对自身安全与意识形态的追求，一方面同西方所坚持的所谓“民主、自决”原则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苏联的目标同美国日益扩张的在全球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从而使欧洲逐步分裂成为两个敌对的集团。在同西方盟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斯大林在较少重要性的问题上，如的里雅斯特问题、其卫星国的赔偿问题以及托管地等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也愿意作出妥协。而在主要问题上，斯大林则毫不妥协。苏联在战争

* 戴超武，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后期和战后初期对土耳其、伊朗的政策，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苏联的主要理由，成为导致冷战爆发的重要事件。就这样，苏联和美国这两个战时的盟友，领导着各自的阵营，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冷战。

【关键词】 斯大林 苏联外交 冷战起源

【中图分类号】 D83/87(51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 (2013) 01-0003-(85)

冷战起源的研究是冷战史研究中最为核心的课题之一。西方学术界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对冷战起源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学派，即“正统学派”（Traditionalism）、“修正学派”（Revisionism）和“后修正学派”（Post-Revisionism）。“正统学派”的观点主导着 20 世纪 40 年代至 50 年代末的冷战研究，“正统学派”学者强调冷战的起源在于苏联的扩张，迫使美国放弃大国合作的政策，转而采取遏制苏联扩张的合理行动。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开始，冷战研究中崭露头角的“修正学派”则坚持美国在冷战起源中的责任，指出美国以“贸易自由”为突出特点的经济帝国主义，使得苏联不得不采取防御性的措施，将东欧纳入其势力范围之中。而以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为代表的“后修正学派”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其基本的背景除美苏缓和的国际因素外，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外交档案的陆续解密，使得研究者可以从更为深入的决策层面探讨美国外交战略演变及其对美苏关系的影响。同上述两个学派不同的是，“后修正学派”学者特别关注的是地缘政治和均势的重要性，并未刻意研究冷战爆发的责任问题，他们的重点在于探讨以美国为首和以苏联为首所建立的不同类型的“帝国”及其对战后国际体系演变的意义。^①

冷战结束后，随着俄罗斯档案和东欧各国档案的陆续解密，国际学术界在新的一轮冷战研究的高潮中，出现了所谓的“新冷战史”的研究（the new

① 对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美国学术界研究的综述，参见 Melvyn P. Leffler, “The Cold War: What Do ‘We Now Know’?”,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04, no.2, April 1999, pp. 501-524.

Cold War history)。①在“新冷战史”的研究中，学者们依据多国档案，从多边视角出发，尝试利用新的理论，重新解释冷战的起源。在这一研究过程中，领导人的个性受到了更多的重视，特别是对斯大林在冷战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被重新考察。在以往有关斯大林与冷战起源之关系的研究中，既有以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为代表所提出的“偏执狂”因素，也有盖迪斯、祖波克（Vladislav Zubok）等提出的斯大林的“大战略”和“革命—帝国范式”的论点。②毫无疑问的是，作为苏联在战时和战后的最高领袖，斯大林在苏联政治体制中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事实表明，美国及西方国家对于冷战格局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和应承担的责任是再明显不过的。而从现有史料分析，斯大林的个人因素在冷战起源问题上的作用，也值得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和思考。③本文希望通过对一系列史料的梳理和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冷战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某些补充。

德国战败时的军事形势，决定了被解放的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就被非正式地分割为亲西方的和亲苏联的地区，而这两个地区中的国家最终都采取了反映其占领者制度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外交政策。法国、意大利、希腊以及比利时等国尽管存在着强大的共产党力量，并在抵抗德国占领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战后都重建了西方议会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以及亲英美的外交政策；而东欧国家最终则按斯大林模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斯大林是苏联在战后关键问题上，诸如东欧的前途、德国问题以及对日占领等问题，采取强硬政策的决策者。斯大林努力主导战后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其主要目标是要沿着苏联西部边界建立一个

① 国内学术界有关这一问题的综论，主要参见戴超武：“‘新冷战史’与当代美国外交史学思潮”，《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第38-51页；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3-22页。

② Arthur Schlesinger, Jr.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Foreign Affairs*, vol. 46(1967), pp.22-52;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John Lewis Gaddis, “Grand Strategies in the Cold War”, in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ume II: Crises and Deten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5.

③ 国内学术界的有关研究，主要参见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沈志华：《冷战的起源：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转变》，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

安全地带。而斯大林认为，这一目标同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的需要并不矛盾。斯大林希望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可以为英美所承认，以此换取苏联承认西方在欧洲其他地区的影响。斯大林对东欧的控制，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苏联担心同英美的合作可能面临失败。然而，斯大林对东欧的控制最终被西方认为是挑战西方，从而产生了与他的愿望相反的结果。尽管斯大林表现出有节制的意愿，但他所使用的手段，或者是他所允许东欧共产党人所使用的手段，不仅使美英决策者和公众舆论相信，同时也使西欧国家相信：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强硬的政权，将对欧洲国家的独立和民主体制构成根本性的威胁。^①而苏联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对土耳其、伊朗的政策，则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苏联的主要理由，成为导致冷战爆发的重要事件。

战后欧洲的政治分裂与斯大林的安全观

“冷战”，按照战后担任苏联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的说法，“就是指关系紧张。这一切都是他们造成的，还因为我们展开了攻势。他们当然要拼命反对我们，而我们则要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我们在德国部分国土上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德国，而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还处于不稳定状态，必须普遍整顿秩序，消除资本主义那一套东西。这就出现了所谓的冷战”。^②若想从苏联的角度认识冷战，那么理解俄国历史和俄国革命的遗产是必不可少的。苏联对待世界的观点的形成，同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包括沙皇俄国的历史、十月革命、内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等等；这种历史观使得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相信，俄罗斯人是世界文明的拯救者：13世纪抵抗蒙古人，19世纪对抗拿破仑，20世纪打败纳粹德国。因此，斯大林认为，盟国欠苏联很多很多，应接受和承认苏联的利益。^③

① Vesselin Dimitrov, *Stalin's Cold War: Soviet Foreign Policy, Democracy and Communism in Bulgaria, 1941-1948*,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194.

② 丘耶夫：《莫洛托夫访谈录：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2-103页。

③ Vladislav Zubok,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苏联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苏联在战争中起码死亡 2700 万人，6 个加盟共和国被德国占领，1700 座城镇和超过 3.1 万个工厂被夷为平地，四分之一的国民财富毁于战火。^①虽然苏联遭受如此损失，但它在战后仍然拥有巨大的优势和吸引力。苏联的中央指令性经济使其能提供充分的就业；同时，由于共产党在战时被占领的欧洲各国领导着抵抗运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战后欧洲受到广泛的尊敬，同民主资本主义一样代表着未来的潮流。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军事力量的发展。虽然战后大规模复员，但苏联在 1948 年初仍拥有一支 290 万人的军队；大量苏军驻扎在东欧地区。德日的战败在短时期内也有利于苏联的安全。与此同时，英国的衰落为苏联在南部边界地区扩大影响提供了机会。因此，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E. H. Carr）1944 年 3 月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如果不能接受苏联在东欧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的话，那么在欧洲就不会有行之有效的安全体系。^②

因此，在战后最初的几年里，在苏军占领下的东欧各国，非共产党组织依然被允许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并参加联合政府；与此同时，欧洲各国共产党力量日益壮大，法共、意共和比利时的共产党也在议会中占有席位。比利时的共产党员 1939 年有 9000 人，1945 年 11 月为 10 万人；希腊的共产党人 1935 年是 1.7 万，1945 年达到 7 万；意大利，1943 年仅有 5000 名共产党员，到 1945 年底发展到 170 万人；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 1945 年 3 月为 2.8 万，到 1945 年 9 月达到 75 万。因为“许多捷克斯洛伐克人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已经过时了。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按照黑白分明的观点来看待在战争废墟中显现出来的世界：这边是奥斯威辛，那厢是斯大林格勒。前者是三十年代资本主义欧洲危机的副产品，后者则代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法国、意大利、芬兰等国，共产党已获得 20% 的选票；在比利时、丹麦、挪威、荷兰以及瑞典则接近 10%，在东欧国家，20%—50% 的民众支持左翼政党。因此，斯大林对战后欧洲的左倾浪潮寄予极大的希望，他在

① Vladimir O. Pechatnov,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World, 1945-1953”, in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ume I: Origi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90.

② R. Gerald Hughes, *Britain, Germany and the Cold War: The Search for a European Détente, 1949-1967*,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8.

1945 年 4 月对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Josip Broz Tito）说，“今天，甚至在英国君主制下实行社会主义也是可能的，革命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是必需的”。他在 1946 年 8 月同英国工党代表团会谈时表示，英国有可能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以及对资产阶级的镇压等阶段，而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用民主社会主义的方法建成社会主义是有可能的。^①

因此，苏联在战争结束之时并未立即将东欧地区完全苏维埃化。在 1945 年至 1948 年之间，苏联是否要将整个东欧地区苏维埃化的意图，并不是那么的明显，前提是这些国家必须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起码在波兰，苏联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卡廷森林（Katyn）事件、苏联对待华沙起义的态度以及成立卢布林委员会等，都表明控制波兰以及东欧地区，是苏联重要的对外战略。苏联对东欧其他国家的行为，基本上同在波兰的所为大同小异。苏联控制着每个国家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对委员会的日常管理工作，特别是经济事务，严加控制。1946 年初，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已成立由共产党占统治地位的政府。虽然匈牙利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实行多元化，共产党在 1946 年举行的选举中也仅获得 17% 的选票，但共产党却控制着最为关键的内政部、商业部等，并掌握着警察部门和工会。捷克斯洛伐克也是类似的情况，非共产党人虽然在 1948 年以前占据政府的大多数位置，但内政部、警察部门和工会领袖都是共产党人。在这段时间，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是根据各个国家的情况逐步确立起来的；只要控制牢固，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与非共产党分享权力的现象，就可以得到苏联的容忍。

苏联在东欧的军事存在，对该地区的共产党得以占据统治地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关键的因素则是，战争对这些地区的冲击、纳粹的占领以及为争取解放所经历的磨难，这一切从根本上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为战后共产党的夺权创造了条件。苏共中央在 1948 年 5 月 4 日给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信函中指出：“尽管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远没有取得像南斯拉夫共产党那样的成就，但这并非是由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有何特别之处，主要是因为……苏联军队去援助南斯拉夫人民，解放了贝尔格莱德，并以这种方式创

^① Wilfried Loth, “Stalin’s Plan for Post-War Germany”, in Francesca Gori, Silvio Pons, 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1945-53*,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p.27.

造了一种对南斯拉夫共产党夺取政权必不可少的条件。令人遗憾的是，苏军没有也不可能向法共和意共提供这样的援助。”斯大林在 1951 年 1 月进一步表示，“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的军队具备同苏联军队抗衡的实力，人们甚至可以认为这些国家根本就不会进行抵抗。美国现有的军事力量还不够强大，因此苏联阵营在这一领域内具有暂时的优势，但这种优势也仅仅能够维持三四年，以后美国将借助快捷的交通手段把军队运送到欧洲，并充分利用其核优势。因此，我们有必要充分利用这几年的时间，动用我们所有的经济、政治和人力手段，帮助军队完成系统性的准备工作。在未来三四年内，我们所有的国内、国际政策都将服从于这个目标。我们只有动员全部的力量，才能抓住这个唯一的机会，让社会主义扩大到整个欧洲。”^①

决定斯大林和苏联领导层对苏联的安全环境以及对战后世界认识的思想因素，是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和“两个平行的市场”的理论。这是斯大林思想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战后初期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它直接影响到斯大林对战后国际体系的根本估计，决定着苏联对外战略，特别是对西方的政策。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极大的权威性，被说成是“直接以列宁所发现的和研究的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为出发点的”，“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列昂节夫（曾经参加过苏共党章的起草）指出：“在列宁生前，资本主义总危机只走过了它的第一个阶段。而最复杂最困难的理论的、实践的和政治的问题，却是由资本主义总危机以后诸发展阶段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在斯大林同志的著作中得到了尽善尽美的解决。斯大林同志建立了经过全面研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因而把帝国主义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合乎新的发展情况的阶段”。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是“马列主义天才的继续发展”，是行动的指南；“没有它，便不能在目前的世界历史时代的事件与现象的复杂的迷宫里，定出方向”；“它是一盏明灯，给无产阶级照亮了为推翻资本主义

^① Jacques Rupnik, *The Other Europe: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in East-Central Europe*,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Inc., 1989, p.127.

的斗争和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①在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以后，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依然被认为是能够继续适应新条件的、并不断被新的结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原理所丰富的理论，对苏联官方和学术界分析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处理国际问题仍有很大的影响。赫鲁晓夫在斯大林上述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总危机论的三个阶段论。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的时期，苏共“二十七大”依然提及总危机理论。^②

斯大林的总危机理论来源于列宁的论断，是建立在列宁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这些理论观点之上的，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资本主义发展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相对稳定时期提出的。斯大林认为，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已经过去，出现了局部稳定的时期，但他强调的是，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的总的和根本的危机，不仅没有过去，反而日益加深，使世界资本主义生存的基础本身发生了动摇。短暂的稳定不仅不能阻止这个总的和根本的危机的发展，反而成为这个危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根源。1929 年爆发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强化了斯大林的这种认识。在 1930 年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斯大林给资本主义总危机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

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帝国主义大战及其后果加深了资本主义的腐朽，破坏了资本主义的平衡；我们现在处于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唯一的和包罗万象的世界经济体系；除资本主义体系外，还存在着社会主义体系，它日益成长，日益繁荣，它同资本主义体系相对抗，动摇着资本主义的基础。其次，帝国主义战争和苏联革命的胜利，动摇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基石；帝国主义在这些地区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为所欲为了。第三，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以后，年轻的资本主义在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出现并成长起来，它们在市场上有效地和

① 列昂节夫：《资本主义总危机》，北京：三联书店，1951 年，第 6 页；列昂节夫：《斯大林论资本主义制度的两次危机与两次世界大战》，北京：中华书局，1951 年，第 8-9，595 页。

② 唐朱昌、肖红专、谈德勤：《寻求苏美力量均衡的努力：论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年，第 2 页。

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竞争，因而使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尖锐化和复杂化。最后，战争给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留下沉重的遗产，就是企业经常开工不足，和已经由失业后备军变为失业常备军的千百万失业大军，这些情况在这次经济危机爆发以前，就已经给资本主义造成许多困难，而危机期间还必然会使情况更加复杂。^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进一步阐述他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其中以《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最为全面和详尽。根据斯大林的论述，可以把其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概括为以下几点：首先，总危机的基础和实质。斯大林指出，总危机的基础是世界存在着两种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方面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瓦解日益加剧，另一方面是脱离资本主义的国家，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这两种制度的斗争，在世界历史上获得了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总危机并不是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有现象，也不只是资本主义某一次具体的经济危机或政治危机，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是“席卷全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深刻而不可克服的危机”。因此，斯大林的总危机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提到的普遍危机和总危机不同，马克思指的是经济危机，而在斯大林那里，经济危机只是总危机的一个方面。

其次，有关总危机的阶段形式，斯大林认为总危机本身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它不是暂时的现象，也不是周期性的重复出现的现象，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在苏联取得胜利以后开始的、一直持续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摧毁为止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包括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苏联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开始的”；第二阶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欧洲和亚洲的各人民民主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开始的。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第一次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第二次危机，不应看作是两次单独的、彼此隔离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发展的两个阶段”。

^①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6月27日，《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16-217页。

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强调了总危机进一步加深的原因。在斯大林看来，资本主义最基本的问题是市场问题，特别是国外市场问题。资本主义进入总危机以后，资本主义各国的国内外条件日益恶化，市场问题就更加尖锐，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从市场危机开始的。在战争期间，两个相互厮打的资本主义同盟都希望夺取国外市场，以取得世界霸权。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却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和苏联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由于两个平行市场的形成，“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将不会扩大而会缩小；世界销售市场的条件对于这些国家将会恶化，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工不足的现象将增大。”因此斯大林强调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进入总危机的第二个阶段后，资本主义再也不可能恢复它在总危机第一阶段曾经有过的稳定了，“资本主义稳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资本主义灭亡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因此，他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资本主义市场相对稳定的论点，以及列宁在 1916 年春天提出的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来说比以前发展得更迅速无比的论点，“都应该认为是已经失效了”。^①

一些苏联学者在解释斯大林的这个论点时指出，统一的世界市场瓦解的理论，“提供了了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展的最主要问题及其前途的钥匙”，苏联决策者依据这个理论观察战后世界，并得出如下的结论：第一，由于统一市场的瓦解，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规模将缩小，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破坏作用将更加明显，而资本主义内部的经济力量是难以摆脱危机的；第二，最大限度地追求资本主义利润和资本主义市场日益狭小之间的矛盾，使某些国家的帝国主义扩张只能靠从市场上排挤其他国家和破坏它们的经济来进行；第三，统一的世界市场的瓦解和资本主义市场相对稳定的终结，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文选》（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年，第 616，593-595 页。

表明现阶段帝国主义矛盾的尖锐化。帝国主义强盗争夺销售市场和势力范围的斗争，以及想消灭自己竞争者的企图，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①

同时，“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是斯大林认识战后西方阵营关系发展的基础。斯大林把苏联视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火炬”以及“和平的强大堡垒”。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其目的是“保卫苏联”，推进“世界革命”。斯大林说，“莫斯科同时还是全世界一切劳动人民、一切被压迫种族和民族争取从财阀和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的旗帜……莫斯科的功绩在于，它是争取各国人民之间的持久和平和友好的斗争的倡导者，是反对新战争挑拨者的斗争的倡导者”。^②斯大林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干涉和殖民地人民反对干涉引发战争的可能性，资本主义体系同苏联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他首先从世界基本矛盾的角度论述战争的不可避免。虽然斯大林关于世界基本矛盾的论述前后不完全一致，但其基本思想始终是一致的，即这一切矛盾的增长和发展，表明了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和战争的不可避免。关于世界基本矛盾，斯大林提出了五大矛盾、四大矛盾以及三大矛盾之说。

1925 年，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五大矛盾：第一类是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第二类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及附属国的解放运动之间的矛盾；第三类是帝国主义大战中的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正在发展而且不可能不发展的矛盾；第四类是各战胜国之间正在发展而且不能不发展的矛盾；第五类是苏维埃国家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正在发展的矛盾。^③

1928 年，斯大林在《时事问题简评》中提出四类基本矛盾：美英、日美、英法、意法等国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帝国主义世界

① 相关论述参见唐朱昌、肖红专、谈德勤：《寻求苏美力量均衡的努力》，第 5-6 页。

② 斯大林：“贺词”，《斯大林文集，1934-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536 页。

③ 斯大林：“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1925 年 12 月 18 日，《斯大林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年，第 217-218 页。

和附属国之间的矛盾，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①

1928年，斯大林在《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中又提出了三大矛盾：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世界同苏联之间的矛盾。^②

斯大林认为，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由于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的瓦解，资本主义以前多少带有顺利发展以及平稳扩张的特征，已被资本主义跳跃式的和灾难性的发展所代替，因此，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将集合在帝国主义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之上，而这就孕育了战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导致战争，斯大林在1946年2月强调，“如果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是偶然的，或者是由于某些国家领导人犯了错误，那就不正确了……其实战争的发生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世界各种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发展的必然结果”。斯大林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通常经过一段时期便要引起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均势的猛烈破坏，而那些自认为有足够的原料和销售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常都企图使用武力来改变现状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以利于自己，因而资本主义世界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并且在它们之间发生战争”。^③

战后，斯大林从分析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和历史经验的角度，进一步论述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斯大林指出，有些人认为，由于两大阵营的形成，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将比资本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内部矛盾更为激烈，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这一论点，只看到表面上的外部现象，而没有看到决定事变进程的潜在力量。在斯大林看来，实际上，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绝非平安无事。虽然西欧、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陷入了美国的铁爪之中，但这些国家决不会无休止地忍受美国的统治和压迫，他们会在夺取原料和销售市

① 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斯大林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91-292页。

② 斯大林：“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1928年7月13日，《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72-174页。

③ 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1946年2月9日，《斯大林文集》，第472-473页。

场、攫取高额利润、打破美国制度等方面同美国发生冲突，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斯大林承认，虽然从理论上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为激烈，但历史事实却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恰恰不是从对苏联作战开始的，而是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开始的。可见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他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比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激烈。斯大林断言，“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斯大林认为，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将会以社会主义苏联的胜利而结束，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所提出的问题，只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优势的问题。而对苏联作战所一定要提出的问题，却是资本主义本身存亡的问题”。因此，社会主义在这整个过程中不应只是消极的旁观者，而应抓住一切有利时机，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可能在各种情况的一定凑合下，争取和平的斗争会在某个地方发展成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但这将不再是现今的和平运动，而是推翻资本主义的运动了”。^①因此，莫洛托夫在1940年6月说，天才的列宁没有错，他相信我们，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我们夺取了俄国政权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使我们夺取全欧洲的政权”。

决定斯大林对战时盟友及其战后目标的估计是基于马列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那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斗争，苏联和西方将必然发生敌对。斯大林在1945年1月对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表示：“资本主义的危机表现在资本家们分化为两大派别——一个是法西斯派，另一个是民主派。目前出现了我们与资本家民主派间的联盟，因为后者不能接受希特勒的统治，而这种野蛮统治能导致工人阶级的极端困境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垮台。我们现在和这一派反对另一派，而将来也要反对资本家的这一派。”^②斯大林还坚信，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战后一定还会爆发，因此是资本家需要苏联而不是相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斯大林满怀信心地相信美国一定会给苏联巨额贷款。斯大林同样相信资本主义之间的战争不可避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文集》，第624-625页。

② 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31-332页。

免，他所要做的就是等待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再次发生争端，等待着愤慨的欧洲人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选择。^①斯大林认为，要确保社会主义的经济独立，不受资本主义的包围，这绝对是最为重要的任务，是同世界资本主义进行战斗的手段。斯大林在 1945 年 1 月对南斯拉夫代表团指出：资产阶级政治家都是非常敏感和富有敌意的，你们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如果你们为自己的情绪所左右，那么你们就会失败。斯大林在会谈中还强调，当你们软弱的时候，你们就必须处在守势；而当你们强大时，你们就应该进攻。^②

意识形态因素对战后苏联外交决策的影响，还突出体现在苏联领导层对西方领导人的认识上；他们对西方领导人从来没有好感，“斯大林更加不信任他们”。莫洛托夫认为“罗斯福是个帝国主义分子，而且是个爱掐人脖子的帝国主义分子”；杜鲁门“是个蠢货，十足的反苏分子”；而丘吉尔最强硬，最精明，“他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分子”。苏联领导人甚至对罗斯福作了如下评价：“一个瘫子，竟爬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并且连任三届，可见他是一个怎样的大骗子！”而莫洛托夫则认为这个评价“说得好”。斯大林则强调指出：“丘吉尔也好，罗斯福也好，纳赛尔也好，尼赫鲁也好，都是一丘之貉。他们谁也不会给工人发钱。”在苏联共产党的文件中一直坚持：“我党的政策现在和将来始终是争取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彻底胜利”。莫洛托夫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的收获是“国际社会主义体系”。^③

为保卫“国际社会主义体系”，苏联战后外交战略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尽量扩张苏联的领土。莫洛托夫说，好在“历代沙皇为我们征服了那么多的土地，现在我们同资本主义斗争就容易多了”。他还强调指出：“我认为，作为外交部长，我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扩展我们祖国的疆界。现在看来，这项任务我和斯大林完成得还不错。”^④苏联决策者认为，雅尔塔会议主要是苏联顺利地获取了战后在远东地区的利益，而波茨坦会议的结果，就等于西方

① Geoffrey Roberts, “Stalin and the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Melvyn P. Leffler, David S. Painter, eds.,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51.

② G. Murashko, A. Noskova, “Stalin and the National-Territorial Controversies in Eastern Europe, 1945-47,” *Cold War History*, Volume 1, Issue 3, 2001, pp.161-162.

③ 丘耶夫：《莫洛托夫访谈录》，第 76-77，64，94 页。

④ 同上，第 15 页。

盟国承认他们失去了东欧和巴尔干。

战后有人将一张标有新国界的苏联地图带到斯大林的别墅，那是一张只有小学生课本大小的地图。斯大林用图钉把它订到墙上，说道：“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情况吧。我们的北部地区现在一切正常，平安无事了。芬兰大大地得罪了我们，所以我们把边界线从列宁格勒向前延伸了。波罗的海沿岸自古以来就是俄国的领土！现在又回到我们手中。在我国，白俄罗斯人现在可以生活在一起了，乌克兰人、摩尔达维亚人也都可以生活在一起了。西部地区也已经平安无事。”他又指向苏联的东部边界说：“我国这边的情况怎么样呢？千岛群岛现在归属我们了，萨哈林岛全是我们的了，瞧，这有多好！旅顺和大连，都是我们的。”斯大林这时用烟斗扫了一下中国，说：“就连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都平安无事……只是我对我们这一段边界还不满意！”斯大林指的是南高加索地区。^①莫洛托夫甚至说：“要是收回阿拉斯加就好了。”苏联还试图占领意大利的殖民地，的黎波里塔尼亚和利比亚。斯大林说，“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但问题是难于找到合适的理由。于是莫洛托夫就说那里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苏联要给予支持，并要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军事基地。

因此，在有关战后安排等重大问题上，苏联坚持强硬的立场。斯大林拒绝在东欧问题上向西方作出让步，1945年8月，斯大林还对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表达自己对波茨坦会议的看法。他强调，会议的决定对苏联是有利的，因为西方承认保加利亚“在我们的势力范围之内”。他在1945年11月4日接见波兰工人党代表团时明确告诉哥穆尔卡，要拒绝美国人的“门户开放政策”；他警告说，英国和美国正试图拆散我们的同盟。^②在1945年9月举行的伦敦外长会议上，斯大林即采取了同西方毫不妥协的既定方针。斯大林在1945年12月还强调：“显而易见的是，在同诸如美国 and 英国这样的伙伴打交道的时候，假如我们开始屈从于恫吓，并暴露出没有把握的话，那么我们将一无所获。为了从这样的伙伴那里有所

① 丘耶夫：《莫洛托夫访谈录》，第1-2页。

② Andrzej Werblan,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Wladyslaw Gomulka and Josef Stalin on 14 November 1945”,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No.11, Winter 1998,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p.134.

获取，我们就必须用坚忍不拔和毫不动摇来武装自己”。^①更为重要的是，在同西方的谈判中坚持强硬政策立场的同时，苏联并不准备履行已达成的协议。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在《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上签字，莫洛托夫当时对斯大林说，这个文件未免太过分了，斯大林则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们去搞一搞。以后执行时我们可以自行其事。关键在于力量的对比。”对东欧那些民主势力，苏联领导人作出了这样的评论：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是一批亡命之徒。^②

斯大林的安全观还体现在其对战后苏联国内政治和外交决策权的控制。最为典型的，首先是斯大林利用国外有关斯大林健康状况的传言，制造“莫洛托夫事件”，整肃时任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由此进一步统一、加强和控制战后苏联的外交方针。1945年10月开始，由于斯大林好长时间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国外有关斯大林的健康出现了很多传闻。尽管《真理报》曾郑重其事地解释说斯大林正在度假，但似乎没有产生什么实际的效果，各种传闻仍在传播，甚至提到了苏联政府未来的领导人，主要说可能是莫洛托夫或朱可夫元帅接班。实际上，斯大林此时正在黑海边上的度假胜地索契休养，这是他九年来第一次离开莫斯科外出度假。在这里，斯大林精神和身体状态非常好，生活也有规律。他白天睡觉、散步，晚上工作到深夜。但他也十分关注莫斯科发生的一切。斯大林每天都读塔斯社送来的新闻简报，以及各部门呈送的相关文件。这时斯大林特别留心塔斯社的题目为《外国报刊有关斯大林同志健康状况的谣言》，这些报告每天都送，属于高度机密，只供斯大林本人和莫洛托夫两人传阅。

对于这些谣传，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恐怕大多会一笑了之，但斯大林并不这样看，他不是把这些传言视为简单的挑衅，而是看作是对苏联力量的亵渎和侮辱。在斯大林眼中，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是谁在莫斯科传播这些谣言？又是谁让这些谣言传播到了国外？他特别敏感的是有关外国新闻报道开始把莫洛托夫看成为“仅次于斯大林的苏联最有影响的人物”。于是，斯大林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在苏联高层批莫洛托夫。

① Vladislav Zubok, *The Failed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p.33.

② 丘耶夫：《莫洛托夫访谈录》，第81，64，94页。

首先是在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问题上。1945年9月、10月的时候，莫洛托夫同哈里曼就战后日本问题举行会谈。莫洛托夫在会谈中同意美国有关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投票程序的建议，这样美国可能会有2—3票的多数票；另外，莫洛托夫还同意麦克阿瑟在处理有关问题时具有最高的决定权。1945年11月4日，斯大林写信给政治局“四巨头”，特别是莫洛托夫，其中严厉地批评莫洛托夫“把自己同政府割裂开来的做法，把自己装扮成比政府更为开明的做法，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斯大林指责美国的建议是“骗人”的，旨在“造成我们的孤立”。对斯大林的批评，莫洛托夫检讨说，“我将尽最大的努力不再犯这样的错误”。

其次是斯大林对《真理报》发表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讲话的反应。1945年11月9日，按照莫洛托夫的指示，《真理报》发表了丘吉尔不久前在英国下院的一个讲话。丘吉尔在这篇讲话中高度赞扬了苏联人民和斯大林。丘吉尔说，“我们对高尚的苏联人民表示我们深深的谢意”，英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之间有着深厚的“同志情谊和友好的情感”。丘吉尔在讲话中特别称赞了斯大林，他说，“就个人而言，我情不自禁地要表达我对这个真正的伟人的最崇高的敬佩。他在和平时期，是主宰自己国家命运的领袖；他在战争时期，是自己国家胜利的守护者”。

发表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对苏联领导人的赞美，是战时苏联宣传的一贯做法。但斯大林此时却不这么认为。根据他对战后世界的认识，现在苏联的宣传应当开始逐步警告苏联人民所面临的敌人的包围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威胁，而不是它们的赞誉之辞。斯大林抓住这个机会，教育党内高层要认清战后新的形势和苏联新的任务（苏联正在实施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同美国进行核武器的竞赛），要跟上斯大林的思想。于是，他在11月10日打电报给政治局“四巨头”，其中明确指出：“我认为，发表丘吉尔赞扬俄国和斯大林的讲话是一个错误。丘吉尔这样做就是想掩饰自己邪恶的思想，掩饰他敌视苏联的态度，特别是考虑到丘吉尔及其工党的追随者正在组织一个反对苏联的英美法集团。”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在电报中强烈批评了苏联党内的某些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当然主要是指莫洛托夫。斯大林说：“现在政府中有许多人，他们一听到丘吉尔之流、杜鲁门之流以及贝尔纳斯

之流的赞美之词，就抑制不住自己幼稚的狂喜；相反地，当听到这些人反面的评论时，他们就灰心丧气。这些都是危险的态度。因为这会使我们在面对外国人时在自己的队伍中产生奴性。我们必须在外人面前全力以赴地反对这种奴性。假若我们继续发表这类的讲话，我们就不能摆脱这种奴性和谄媚。不用说，苏联领导人不需要外国领导人的赞誉。就我个人而言，这种赞誉只会使我感到不快。”

与此同时，由《真理报》发表丘吉尔的讲话，还引发了有关苏联报刊审查制度的问题，从而也导致了斯大林对莫洛托夫更加严厉的批评。莫洛托夫不仅主管外交，而且还分管新闻宣传工作。莫洛托夫也算是个老报人了，1912年就开始办《真理报》，是这个报纸的创刊人之一。当时对外国驻苏联的通讯社和新闻记者的稿件，主要是发回各自国家的文稿和电报稿，必须通过苏联政府的审查。莫洛托夫不久前收到来自外国记者团的一封充满感情的长信，其中详细抱怨了他们的稿件被毫无理由地胡乱删节，而且不能及时发回国内。莫洛托夫当时并没有对这封信件作出正式的答复，但他下令对新闻主管部门进行监督，因为“这个部门的审查经常从外国记者的电文中删去一些段落和词句，而不给任何的解释”。莫洛托夫这样做的本意可能是他想对西方新闻机构作出一个“善意”的姿态，因为战争已经结束，这种宽松看来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莫洛托夫在1945年11月7日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外交使团的酒会上，他举着一杯葡萄酒对一位美国记者说，“我知道你们这些记者想取消俄国的审查制度，如果我同意在互惠的基础上这样做，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路透社随后报道了莫洛托夫的这个说法。

斯大林知道这个消息后大发雷霆，他当即打电报给莫洛托夫说：“谁给你权力让你取消审查制度？”^①不仅如此，斯大林还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严厉惩罚莫洛托夫。他的第一个行动，是在12月6日将莫洛托夫的所谓错误通报政治局其他“三巨头”，即马林科夫（Georgy Malenkov）、贝利亚（Lavrenti

① Vladimir Pochatnov, *The Allies Are Pressing on You to Break Your Will: Foreign Policy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talin and Molotov and Other Politburo Members, September 1945-December 1946*,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26,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September 1999, pp.1-30.

Beriia) 和米高扬 (Anastas H. Mikoyan), 但却不告诉莫洛托夫本人。斯大林在电报中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莫洛托夫读过所有损害我们国家声誉的那些诽谤, 他为什么不去加以制止?” 斯大林说: “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有权采取单独行动去改变我们的政策方针, 但莫洛托夫却为自己盗用了这种权力。为什么? 又是什么原因? 也许是因为这些诽谤就是他的计划的一部分。” 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给莫洛托夫所下的结论: “我相信, 莫洛托夫实际上毫不关心我国的利益和我国的声誉, 他考虑更多的是在某些外国圈子里赢得好评。我认为, 这样的同志不能作为我的第一副手了。” 这体现了斯大林最为可怕的怀疑心态, “想象你做了什么, 比你实际上做了什么更加恐怖”。

斯大林采取的第二个行动, 是让马林科夫、贝利亚和米高扬召见莫洛托夫, 向他宣读斯大林的电报。俄罗斯学者对此描写道, 这绝对是莎士比亚笔下经典的一幕: 幸灾乐祸、恐惧和暗藏的同情交织在一起。在事后给斯大林的电报中, 他们汇报了当时的情景: 莫洛托夫承认他犯了许多错误, 但他说, 在政治上不信任他, 是不公平的; 莫洛托夫在谈话中流下了许多眼泪。马林科夫和米高扬后来回忆说, 当斯大林谴责自己的同志时, 他们“被迫保持沉默”。莫洛托夫在 12 月 7 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 “我一定要以行动来恢复你对我的信任。这不仅仅是个人的信任, 而是党的信任, 我把它看作比我的生命还重要。”

第三个行动, 是斯大林在 12 月 9 日给四巨头的一份电报, 这次莫洛托夫又回到了政治中心。斯大林在电报中指出, 从伦敦外长会议到即将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这段时间的国际事态的发展看,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 由于我们的坚持, 在莫斯科会议的组成上我们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因为排除了中国和法国就意味着美国 and 英国从伦敦会议立场上的退却。其二, 我们赢得了在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胜利, 这些国家的选举结果就是证明。如果我们在涉及这些国家的问题上裹足不前, 没有坚持住的话, 那么我们注定会在那里失败的。其三, 斯大林又专门批评了莫洛托夫, 他说: “在一些问题上, 由于你屈从于美国的压力和恫吓, 开始犯错误, 对外国记者采取了宽松的方针, 因为这些记者期望这种方针能够安抚英国和美国, 这就让你的国家当众受到羞辱。当然, 你的考虑是幼稚的。我担心, 由于你的这种宽松的方针,

你将破坏我们坚定不移的政策，使我们的国家丢脸。在那个时候，整个国外舆论都异口同声地吼叫说，俄国人正在屈服，将要作出让步。但是这一事件帮助你，你又及时回到坚定不移的政策上来了。”斯大林在电报中强调了同西方国家交往的最主要原则，并指出：“显然，在同英国和美国这样的搭档打交道的时候，如果我们屈从于恫吓，或显示多边性，那么我们就不能取得任何重要的东西。要从这样的搭档那里获得实质的东西，我们必须用不屈不挠和坚定不移的政策武装自己。”

通过上述一系列事件，斯大林完全控制了苏联的外交决策权，放手推行其既定的外交战略，同西方展开争夺战后欧洲政治主导权的斗争。

苏联对战后秩序的设计与东欧的“苏维埃化”进程

苏联在战争尚未结束之时，就开始对战后的战略目标进行详细的研究和规划。苏联在 1943 年下半年的时候成立了三个委员会，具体负责制定战后苏联外交的目标。1943 年 9 月成立了“和约与战后重建问题委员会”

（Commission of Question of the Peace Treaties and Post-war Construction，又称“李维诺夫委员会”）和“停战问题委员会”（Commission on Armistice Problems，又称“伏罗希洛夫委员会”），稍后又成立了“赔偿由希特勒德国及其仆从国给苏联造成损失的委员会”（Commission on Compensation for the Loses inflicted on the Soviet Union by Hitler's Germany and its Allies，又称“迈斯基委员会”或“赔偿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在外交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但同时又都是跨部门的机构。^①而苏联对战后外交政策的基本构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重要文献中：迈斯基备忘录、葛罗米柯报告以及李维诺夫委员会的报告等。

1944 年 1 月 11 日，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迈斯基（Ivan Maisky）向莫洛托夫呈送了题为《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原则》的备忘录。迈斯基备忘录

^① Alesei Filitov, “Problems of Post-War Construction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Conceptions during World War II”, in Gori and Pons, 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p. 4.

长达 40 页，勾画出 30 年到 50 年苏联外交战略的基本构想。^①这一构想包括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时间段内，要确保苏联成为一个强国，“不受欧洲或亚洲任何侵略的威胁”；欧洲，起码是欧洲大陆要社会主义化，“这就排除了这一地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迈斯基在备忘录中特别强调，苏联必须保持 1941 年的边界线，并得到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必须获得通过伊朗境内的权利，以及在芬兰和罗马尼亚获取军事基地。具体到主要的国家和地区，迈斯基提出了不同的政策目标。在迈斯基看来，“主要问题是德国”，要保证德国 30 年到 50 年不构成危害，必须通过肢解、为期 10 年的联合占领、军事上工业上以及思想上的改造、赔偿以及再教育等手段来实现。苏联第二个最重要的战略目标是，“防止在欧洲出现任何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一个强国或国家集团的形成。战后欧洲只能出现一个陆上强国苏联和一个海上强国英国，这样才最符合我们的利益”。因此，法国不能恢复战前的军事力量，意大利同西班牙一样也不再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苏联感兴趣的是，消除佛朗哥政权，恢复西班牙的共和制”。第三个必须关注的是东欧和东南欧地区。这里首先是波兰。迈斯基认为，波兰应恢复独立并使其生气勃勃，但它不能过于强大或领土过大，“因为没有人能够确定这个俄罗斯历史上的传统敌人在将来是否会成为真正的朋友”。因此，波兰的疆界必须重新划分。迈斯基还特别关注捷克斯洛伐克。他指出，一个强大的捷克斯洛伐克可成为扩展苏联在中欧和东南欧影响的主要渠道，“在欧洲地图最后安排的过程中，如能为捷克斯洛伐克争取些额外的好处，这一点是可做到的”。相反，一个强大的匈牙利并不符合苏联的利益。苏联在巴尔干地区主要是针对土耳其。迈斯基强调，苏联应通过同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等国缔结双边防卫条约，努力削弱以致最终清除土耳其在这一地区的影响。这对破坏土耳其作为海峡地区桥头堡的地位是必不可少的。至于伊朗，迈斯基认为，在可能排除美国的情况下，应保持和扩大英国、苏联以及伊朗三国的条约关系，以

^① “Maisy’s memo”, January 11, 1944, *Archive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VP RF)*, f.6, op.6, d.147, ll.14, 1-40, see Vladimir Pochatnov, *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II: New Documents on Soviet Thinking about Post 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13,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September 1995, pp.2-6.

保持和发展苏联连接海湾地区的交通线，同时“要在伊朗的北部建立、确立苏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存在”。

对于苏联战后在远东地区的目标，迈斯基主要考虑了日本和中国。迈斯基坚持认为，必须击败日本并最终解除其武装，使其非军国主义化，但要完全依靠英美的力量来达到这一目的。迈斯基认为，这样不仅可使苏联免受物资和人员方面的损失，以及对他们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的行为进行报复，而且也可迫使美国 and 英国付出更多的生命和财力的代价，从而“降低美国在战后的帝国主义狂热情绪”。至于千岛群岛和库页岛，迈斯基认为可依靠政治上和外交上的策略来获得。由于中国的局势尚不明确，苏联在保持和扩大其影响的同时，必须等待中国国内“民主进步道路”变得更为可能的时候才能大规模介入。

迈斯基建议苏联必须利用“新的机会”扩大在中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影响，但要谨慎行事，防止在这一地区同英美发生冲突。因为在迈斯基看来，殖民地地区是英国同美国发生竞争的重要领域，美国在这一过程中将通过经济手段取代英国的地位。尽管苏联在殖民地地区没有经济利益，但现在这已经变成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刻不容缓地为这个问题做准备”。

有关欧洲未来的政权问题，迈斯基认为，在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丹麦、挪威、荷兰和比利时会建立民主联合阵线类型的政府。有关战后或者至少是战后初期国际力量可能出现的组合，迈斯基指出，“德国和日本战败后，除了相对衰落的法国和意大利之外，世界上只有四个真正的强国，即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而中国在最近一代人的时间内，从各种材料来判断，将仅仅是名义上的大国。因此，世界政治的领导权将掌握在苏联、美国 and 英国手中，并且事态发展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三大国相互关系的性质”。

有关战后苏联外交战略设计的第二个重要文件报告，题为《论苏美关系问题》。报告长达 34 页，由时任驻美大使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撰写。这个报告的缘起还不十分清楚，在莫洛托夫的文件中标明是“政治信件”，由葛罗米柯 1944 年 7 月 14 日递交给莫洛托夫。

葛罗米柯的基本判断是：美国在战后将极有可能“对同苏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进行合作感兴趣”，而这种合作将“极大地决定着战后国际关系的实

质”。葛罗米柯提出五点理由来支持自己的上述判断：首先，美国已经摆脱了孤立主义，将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而这种参与对苏联而言是有好处的；因为美国公众大力支持罗斯福的政策，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即便是在1948年发生美国领导层可能出现的变化，美国“在合作中所得到的至关重要的利益”也会使得这种合作继续下去。其次，美国将继续关注在军事上击败德国以及随之而来的德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衰弱。在葛罗米柯看来，抛开安全方面的考虑，这种关注是由以下显而易见的事实所决定的：即“无论如何，美国工业和金融资产阶级对防止德国在欧洲战争结束后重新崛起为经济上的主要竞争者有着利害关系”。第三，更为根本的是，“美国在战后保持国际和平，以保障其已经得到较大提升的世界地位方面有着利害关系”。而和平的局面将允许美国最大限度地利用已经取得的优势，以及在战争结束前将要取得的优势。第四，葛罗米柯认为，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不仅将成为和平的力量，还会成为民主的力量，“美国将支持和促进在西欧建立资本主义民主政权，首先是在德国”。美国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反对建立法西斯类型的政府。最后，第五，美国和苏联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美国人要寻求新的市场和原料，俄国人要得到贷款、技术援助、技术转让和科技合作。作为经济学家的葛罗米柯认为，苏联首先可以利用高度发展的美国农业，以及美国工业的现代化经验。

同时，葛罗米柯也在报告中着重论述了美苏关系中“可能存在的困难”，这些困难首先是苏美两国可能在如何处置德国的问题上产生分歧。葛罗米柯认为，同苏联相比，美国可能会主张更为宽松地处置德国。第二个困难是，“体现美国统治阶级对苏联的根本的意识形态的敌视”，将以天主教会及反苏宣传的方式继续进行。第三个困难是“东欧的未来”的问题，主要是对东欧建立的亲苏的苏维埃式政权，美国政府和企业界所表示出来的关注。第四个困难是所谓的“巴尔干问题”。葛罗米柯认为，罗斯福由于国内政治的原因，将不支持巴尔干的有关国家作为苏联的组成部分。第五，美国渴望扩大其在近东以及中东地区、特别是伊朗的影响，将不符合苏联的利益。葛罗米柯特别强调，出于战略和政治方面的原因，“美国加强在苏联周边地区的存在显然不符合苏联的利益”。第六，苏美战后在宣传方面的竞争。最后，战

后重建的援助问题。尽管存在着上述的困难，葛罗米柯对苏美关系的发展持乐观的态度，他指出：“尽管存在着可能的困难，而且这些困难会不时出现在我们同美国的关系中，但战后两国合作的必要条件是充分而明显的。未来两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战争中业已形成以及正在形成的两国关系的实质。”^①

苏联在战时有关未来战略利益的第三个重要文件，就是所谓的“李维诺夫委员会”的报告。李维诺夫（Maxim M. Litvinov）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苏联外交部“战后秩序与和约准备特别委员会”主席。在李维诺夫的领导下，该委员会从1944年底到1945年初提出许多重要的报告，其中以下三个报告最为著名：《关于同美国的关系》（1945年1月10日）、《关于苏英合作的前景和基础》（1944年11月15日）以及《有关国家集团和势力范围的问题》（1945年1月11日）。^②

在《关于同美国的关系》中，李维诺夫首先关心的是，美国会不会承认1941年的苏联边界作为战后苏联的边界。李维诺夫认为，美国将承认苏联1941年的边界。但李维诺夫关心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美国人在什么地区和什么领域有着至关重要的利益（vital interests）。李维诺夫在报告中分析说，美国在战后的首要利益，就是要利用门户开放政策，打入原来属于大英帝国的贸易、市场和投资领域。第二个至关重要的利益就是要使欧洲国家的生活正常化。如何达到这一目的？李维诺夫认为，美国将通过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府，或者甚至是建立保守政府这样的手段，来实现全面的稳定，以消除对社会动乱的担忧。但李维诺夫强调，“我们同英美之间在如何在一些欧洲国家建立秩序和政府体制的方法上所存在的分歧，将可能产生误解和紧张关系”；但英美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将比同苏联的分歧更为严重。第三个利益冲突可能出现在远东地区。因为美国正在成为中国事实上的保护国。因

① “On the Question of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July 14, 1944, AVP RF, f.6, Op.6, d.603, p.45, ll.1-34, see Vladimir Pochatnov, *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II*, pp.6-9.

② “On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A”, January 10, 1945, AVP RF, f. 6, Op.7, d.173, p.17; “On the Prospects and Possible Basis of Soviet-British Cooperation”, November 15, 1944, AVPRF, f.6, op. 6, d.149, p.14; “On the Question of Blocs and Spheres of Influence”, January 11, 1945, AVP RF, f.6, op.7, d.173, p.17, see Vladimir Pochatnov, *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II*, pp.10-13.

此美国可能抵制苏联在远东地区扩展利益。

李维诺夫同样对美苏合作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美苏之间的合作有着深厚的经济基础。在李维诺夫看来，美国寻求市场的需要，加上苏联巨大的重建需要，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新的共同利益，也为美苏关系提供了合作的经济基础。其次是殖民地问题。苏联会支持美国在战后反对殖民主义的主张。李维诺夫还强调，“美国和英国的友好关系和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的经济竞争的加剧，使两国认识到有必要尽最大可能保持同苏联的友好关系，以保障苏联不加入一方去反对另外一方”。李维诺夫的结论是，没有理由相信美国 and 苏联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会发生严重和长期的冲突，但中国可能是一个例外。在保护世界和平的共同利益中，两国有着进行积极的政治合作的坚实基础。

在《关于苏英合作的前景和基础》中，李维诺夫强调，苏联同英国关系中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应该大力推动英国同我国达成一项协议，达成这个协议的基础只能是依据地理上紧密接壤的原则，友好地划分欧洲的安全范围”。什么是苏联“最大的安全范围”（maximum sphere of security）？在李维诺夫看来，芬兰、瑞典、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国家，以及土耳其，应作为苏联自己“最大的安全范围”，而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应纳入英国的安全范围。李维诺夫对此强调：“这种划分意味着，英国不可以同纳入我国安全范围的那些国家建立某种特别密切的关系，以及签订违反我们意愿的某种协定，自然也不能在那些国家内谋取军事基地，不论是海军基地还是空军基地。我们对除了法国以外的英国安全范围也应承担同样的责任，法国应当有权加入反德的英俄条约”。挪威、丹麦、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则组成一个中立区。在两个月后完成的《有关国家集团和势力范围的问题》中，李维诺夫的上述名单有所变化：挪威也属于苏联的安全范围，瑞典、丹麦和意大利属于英国的安全范围。李维诺夫认为，在安全范围问题上可以同英国进行讨价还价的有六个国家，即挪威、土耳其、南斯拉夫、丹麦、意大利和瑞典。^①

那么英国为什么会同苏联达成这样的协定呢？李维诺夫的解释还是英

^① Pochatnov, *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II*, pp.13-15.

美矛盾。他说，“当前的战争不仅导致欧洲均势的严重失衡，同时还将导致世界均势的严重失衡，这将对英国产生特殊的影响。同美国相比，英国毫无疑问已经丧失了空军、海军以及海上商队方面的优势。我们期望美国业已增长的力量将把英国的竞争力从西半球，甚至是从英国的自治领消除掉。从政治上说，这将迫使英国无法保留其在靠近美国大陆的据点，或使之不能在那里获得永久的基地。争夺石油和橡胶的斗争将会重新爆发，或许还会更加激烈。面对这种暗淡的前景，英国就不能不考虑通过与苏联达成协议的方法，在欧洲获得长期安宁的好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英苏两国在反对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中，经济合作给两国带来的共同利益。

因此，苏联的战后目标不是要恢复欧洲的均势，斯大林的战略观点就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控制欧洲。但这个观点的最大缺陷在于，它没有考虑美国逐步形成的战后目标。另外，战争临近结束时两个重要事件的发生，对斯大林的外交战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是罗斯福的去世，二是美国使用原子弹。斯大林说：“广岛已经震惊了全世界，均势已经被打破了。制造出原子弹来，这将为我们消除巨大的危险。”此时斯大林认为，美国 and 英国已经放弃了它们在雅尔塔会议上所作出的允许苏联在势力范围内自行其事的诺言，“他们想迫使我们在那些对欧洲和世界产生影响的问题上接受他们的计划，那好吧，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①

1945 年 4 月 25 日，当美国军队和苏联红军在德国的心脏地区易北河（Elbe River）会师之时，世界对胜利与和平的希望暂时压倒了盟国之间开始出现的分歧。莫斯科电台在 5 月 9 日宣布战胜纳粹德国的消息后，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涌上街头，走向红场庆贺胜利。人们还聚集在美国驻苏使馆门前，高呼“罗斯福万岁！”（Hurrah for Roosevelt）。而美国舆论在战时对苏联称赞有加。苏联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在西方享有崇高的威望。英美军队在 1943 年进攻意大利时仅面对德军的 4 个师，而苏联红军则在抗击着 200 个德国师。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在战争结束时对美国国会表示，指导苏联政策的愿望，就是保持同美国的友好关系。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美英和苏联就对德作战问题、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波兰边界和政府组成、战

^① Zubok and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pp.42-43.

后对德国和其他轴心国的处理、联合国的组成和程序等有关战后安排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基本的一致。以至于罗斯福在1945年2月8日雅尔塔会议最后一天举行的酒会上向斯大林和丘吉尔祝酒时说，他在这里感到了“家庭的气氛”；斯大林表示自己也坚信，“我们在和平时期的关系应同战时的关系一样牢固”。罗斯福的私人顾问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则写道：“我们从内心深处确实相信，这是我们一直为之祈祷的新的一天的到来”。^①

但是，美英和苏联在战时和战后初期业已存在和开始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分歧，成为冷战起源的直接原因。首先是美英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这成为苏联与美英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起因。尽管美英在开辟第二战场方面存在着实际困难，但在斯大林看来，美国参加欧洲战场的战斗“仅仅在战争的最后时刻，这就使它可以轻易地影响战争的结局，完全保证自己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战后初期，美国、英国和苏联不仅在波兰，而且在其他5个东欧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战后安排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不过，五国情况不同，盟国之间围绕着它们的矛盾和斗争也有差异。在波兰和东欧其他国家的边界划定和政府组成问题上的冲突，是盟国之间一系列问题的根源之一。事实上，盟国就东欧问题曾达成过一些协议。双方爆发冲突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对业已达成的协议的解释和实施存在着不同认识，另一方面则由于这些协议本身的性质问题。斯大林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就一再坚持西方必须承认苏联1939年的边界线，承认苏联占领的芬兰、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领土，这些也得到了西方国家的默许。但苏联在这一时期通过在东欧地区扶植亲苏政权来扩大自己安全范围的企图和行动，日益引起美国 and 英国的不满和反对。莫洛托夫在1945年6月曾向斯诺（Edgar Snow）抱怨说：美国应在三年前就反对苏联向巴尔干和东欧的扩张，“现在已经太晚了，你们的抱怨只能激起苏联的怀疑”。李维诺夫在1946年6月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霍特莱特（Richard Hottelet）采访时说：冷战的根源是苏联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安全等同于扩张和控制的

^① Robert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8, p.867.

领土；“你获取的越多，你就会越安全”。霍特莱特问：“假若西方突然作出让步，答应莫斯科的全部要求呢？”李维诺夫答道：“那西方就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面对一连串新的要求。”^①

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盟国在波兰问题上出现了激烈的矛盾并展开了斗争，这一矛盾和斗争突出体现在战后波兰边界的确定和波兰政府的组成上。1939年9月17日，苏军越过苏波边界，即1921年3月18日苏波签订的《里加条约》所划定的苏波边界，进军波兰东部；两天后，苏军和德军会师于布列斯特附近，在相当于1920年的“寇松线”（Curzon Line）停下，这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附加议定书》所划定的苏德两国分割波兰的界限。9月28日，苏联和德国签订了《苏德友好及边界条约》以及三个秘密附加议定书，正式瓜分波兰。随后，苏联将属于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并入苏联。这片领土占战前波兰领土的51.7%，人口占波兰人口的38.4%。200万居住在这里的波兰人被迁移到西伯利亚，2万名被俘的波兰军官遭到杀害。流亡在伦敦的波兰政府不承认苏德瓜分波兰，不承认寇松线作为波兰东部边界，并同苏联断交。苏德战争爆发后，波兰和苏联在1940年7月30日复交并签订了互助协定，协定写明苏联“承认1939年苏德关于变更波兰领土的条约已经失效”。但在苏联看来，虽然1939年的苏德条约不再有效，但1939年在苏占区将上述两块土地并入苏联的公民投票并未失效。因此，在有关波兰边界问题上，苏联坚持以1939年9月17日以后的现状作为进行相关问题谈判的基础。

美国和英国在波兰东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美国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坚持在战争期间不签订任何涉及领土变更的条约，不承担任何相关的义务，而英国的政策更为灵活。1941年12月英国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访问莫斯科时，苏联明确提出英苏订立一个秘密议定书，对东欧边界作出规定，坚持苏联1941年的国界线，即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对罗马尼亚领土的兼并以及以寇松线为苏波边界线，并提出以德国的领土补偿波兰。英国虽没有明确表示同意苏联的建议，但倾向于接受寇松线。

^① Dennis Dunn, *Caught between Roosevelt and Stalin: America's Ambassadors to Moscow*, Lexington, 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8, pp.260-261.

对此，罗斯福在 1943 年 5 月曾告诉艾登：三大国将决定波兰的命运，他自己“并不打算同波兰人讨价还价”。一方面，罗斯福并不愿意看到大同盟因为波兰领土问题而被削弱，另一方面，由于波兰流亡政府的压力，他也不能忽视这些问题。波兰总理西科尔斯基（Wladyslaw Sikorski）在 1943 年 12 月呈送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中，建议战后波兰边界的东部保持战前状况，而西部边界则并入德国部分领土，包括东普鲁士、西里西亚的一部分以及波美拉尼亚西部的一部分。罗斯福拒绝对具体的波兰边界表态，只是含糊地说，美国支持一个独立的波兰。到 1943 年春，罗斯福也倾向于接受寇松线，西部则包括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①在 1943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用三根火柴形象地表达了未来波兰边界的划定，他说，“这三根火柴，一根代表德国，另一根代表波兰，而第三根代表苏联，所有这三根火柴都应向西移动”。按此方案，波兰领土应在寇松线和奥得河之间。丘吉尔强调，波兰人不能指望比这更好的方案了。罗斯福在 12 月 1 日同斯大林的会谈中表示，他个人同意波兰边界的调整，西部可以达到奥德河；但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他不能公开表示自己的立场，因为国内有 600 万到 700 万波兰裔选民的选票。斯大林对此表示理解。在随后的会谈中，罗斯福默认了丘吉尔和斯大林就战后波兰边界达成的默契。^②

罗斯福表示，自己对苏联那些邻国是否共产主义化并不关心，他更为关注的是太平洋战争及联合国的问题。^③1945 年 2 月 6 日，雅尔塔会议第三次会议讨论波兰问题时，罗斯福说，他在德黑兰会议上就表示，自己同意波兰东部边界为寇松线，因此他建议苏联在利沃夫及其附近油田上对波兰人作出让步，以便换取波兰接受寇松线。丘吉尔在会上表示，英国也同意寇松线，鉴于苏联在战争中所承受的重任，有关寇松线的决定就不是一个力量的决定，而是一个“权利”的决定；丘吉尔指出，对英国来说，波兰问题是个荣誉问题，并表示自己同意罗斯福关于寇松线的建议。

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建议遭到斯大林的拒绝。斯大林表示，波兰问题对苏

① Debra Allen, *The Oder-Neisse Line: The United States, Poland, and Germany in the Cold War*,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Publishers, 2003, pp.11-12.

② Ibid, p.13.

③ Dunn, *Caught between Roosevelt and Stalin*, p.225.

联来说不仅仅是荣誉问题，而且还事关苏联的安全，因为波兰在历史上成为德国两次进攻苏联的通道。有关寇松线问题，斯大林强调，他要提请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注意的是，寇松线不是俄国人想出来的，而是寇松和克雷蒙梭划的线，俄国人并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这条线违背了俄国人的意愿。列宁反对把比亚韦斯托克省划给波兰人，但寇松线却把这个省划给了波兰。斯大林强调，在比亚韦斯托克省的问题上，“我们已经放弃了列宁的立场，难道想让我们成为连寇松和克雷蒙梭都不如的俄罗斯人吗？人们会说，同寇松和克雷孟梭相比，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更是靠不住的俄罗斯人的捍卫者”。那时，他斯大林有什么脸面回到莫斯科呢？因此，斯大林不仅反对修订寇松线，而且主张波兰的西部边界应在西尼斯河。^①雅尔塔协定规定波兰东部边界以寇松线为准，但作有利于波兰的适当调整，波兰西部边界留待和会划定。

盟国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就波兰西部边界以奥德河—西尼斯河为界达成了协议。斯大林解决了有关波兰边界划分的漫长和痛苦的争端，他将“军事上的既成事实”强加给西方盟国。波兰的领土向西移动了 150 英里，230 万德国人被迫从原属于德国的领土上迁移出去。但西方国家对领土安排的默认，并没有延伸到对斯大林有关波兰新政府组成计划的认同。

1943 年 4 月，苏波关系因卡廷事件而急剧恶化；波兰流亡政府要求国际红十字会调查此事，苏联以波兰流亡政府不信任苏联政府为由，于 4 月 23 日同波兰流亡政府断绝外交关系。与此同时，在苏联的支持下，波兰国内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壮大。1942 年 1 月，波兰前共产党的一些骨干成员重新建党，称为波兰工人党。1943 年 1 月，波兰工人党同波兰农民党及波兰社会党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成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波兰最高立法机构，并以代表大会的主席团为执行机关，由贝鲁特（Boleslav Bierut）担任主席。会议宣布不承认流亡政府代表波兰，并将国内人民近卫军和爱国者同盟的波兰军队合并为统一的波兰人民军。1944 年 7 月，苏军和波军越过寇松线；7 月 22 日，成立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7 月 26 日，苏联政府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在莫斯科签订互助合作协定，苏联承认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在波兰解

^① Third Plenary Meeting, February 6, 1945,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FRU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5, pp.667-669.

放区行使行政管理权，同时还同意苏波边界基本上按照寇松线划分。8月1日，苏联正式同意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交换代表。面对这种局势，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米克拉依奇克（Stanslaw Mickolajczyk）在英美的支持和苏联的同意下，于7月30日至8月10日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在8月3日同米克拉依奇克会谈时强调，波兰国内的基本问题是成立联合政府，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已是国内存在的政权，没有它就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斯大林还表示，流亡政府应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达成协议，今后苏联只想同一个而不是两个波兰政府打交道；而这个政府就是同苏联已缔结一系列条约，并且苏联给予帮助的那个政府。关于苏波边界，斯大林明确指出应是寇松线。在8月6日和7日米克拉依奇克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举行的会谈中，双方在内阁席位分配、宪法问题以及东部边界问题上均未取得一致意见。

1944年底到1945年初，苏联红军渡过维斯瓦河向西继续进攻的作战准备已经完成，解放整个波兰指日可待。在这种情况下，在波兰工人党的提议下，波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44年12月1日一致同意把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临时政府，卢布林为临时首都。1945年1月4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改组为临时政府；在临时政府的17名成员中，波兰工人党、波兰农民党和波兰社会党各有5名，民主党2名，没有流亡政府的代表。罗斯福在1944年12月16日和31日两次致函斯大林，要求他在三国首脑雅尔塔会议之前不要承认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为临时政府，遭到斯大林的拒绝。1945年1月6日，苏联承认波兰临时政府，并互派大使；1月17日，波兰人民军随同苏军解放了华沙，临时政府从卢布林迁到华沙。这样，波兰出现了两个政权，一个是得到英国和美国承认的伦敦流亡政府，一个是得到苏联承认的波兰临时政府。因此，波兰未来政府的组成以及承认的问题就成为苏联同英美之间矛盾和斗争的焦点。

在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和罗斯福都坚持认为，目前的波兰临时政府仅代表波兰人民的小部分，也未吸收所有的党派参加，因此不能承认这样的波兰政府。丘吉尔在1945年2月8日的三国首脑会议上指出，根据英国政府的情报，卢布林政权并不能代表大多数波兰人民，罗斯福则建议在波兰举

行自由选举。^①但以自由选举为核心的英美方案遭到苏联的强烈反对。雅尔塔会议就波兰政府改组问题达成了以下协议：组成一个新的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它是在吸收国内外民主人士参加的更为广泛的基础上对现在行使职权的波兰临时政府改组而成；改组的具体办法由美英苏三国以及来自波兰临时政府的代表、来自波兰国内外其他民主人士的代表共同磋商解决。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应保证尽快举行自由选举；一旦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成立，三国将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但苏联和英美对雅尔塔协定的相关规定的理解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关键是如何对待华沙临时政府，即是将华沙临时政府视为合法政府加以扩大或者改组，还是仅仅把华沙临时政府看作是波兰政治力量之一。苏联坚持认为，华沙临时政府是合法政府，所谓改组就是以华沙临时政府为核心，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大，改组后的波兰临时政府即全国统一临时政府，应是华沙临时政府的继续和发展。美英的观点则恰恰相反。它们认为华沙临时政府只是波兰三种政治力量之一，这三种政治力量就是华沙临时政府、伦敦流亡政府和波兰国内外的其他民主力量。在美英看来，重组后的临时政府和华沙现政府毫不相干，前者并非后者的继续和发展，而是一个新政府。丘吉尔和罗斯福在3月31日和4月1日分别致函斯大林，明确表达了美英的立场，强调“波兰问题公平合理以及迅速的解决对我们国际合作计划的有效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罗斯福在电报中承认波兰临时政府的成员在新政府中“将起到显著的作用”，但也表达了自己对波兰政府组成问题的不满。他说，虽然承认华沙临时政府在政府组成上的突出作用，但重组则意味着一个新的政府。斯大林在4月7日回电罗斯福说，华沙临时政府必须是任何新政府的核心，并建议在政府组成问题上采取南斯拉夫模式，即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按4:1的比例；允许邀请8名非共产党人士参加政府，其中5名来自国内，3名来自伦敦。“而受邀参加临时政府的波兰领导人必须承认寇松线，并真正致力于建立波苏友好关系”。斯大林强调，波兰问题走入死胡同的原因，在于莫斯科委员会中的英美代表“偏离了克里米亚会议

^① Fifth Plenary Meeting, February 8, 1945, *FRU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p.778-779.

的原则”，并将一些新的因素带到波兰问题的处理之中。^①

与此同时，苏联加大了对波兰国内亲流亡政府力量的打击。从 1945 年 3 月开始，波兰临时政府有关机构在苏联的协助下，先后逮捕了 16 名亲流亡政府的骨干人员，这些忠于伦敦流亡政府的波兰地下武装的军官，接到邀请同苏联军事当局进行谈判后便失踪了。这一事件更加激起了美国对苏联在波兰问题上所作所为的强烈不满。因此，在莫洛托夫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访问华盛顿的时候，杜鲁门同莫洛托夫专门就波兰问题进行了会谈。杜鲁门在 4 月 23 日同莫洛托夫的会谈中表示，美国不参与建立一个不能代表波兰人民民主力量的政府；如果苏联政府不考虑同已经运作的华沙临时政府之外的民主人士进行协商的话，美国政府对此将极为失望。杜鲁门强调说，他最关心的是，“如果三大国不能解决波兰问题，那人们就会对我们的团结以及我们在战后时期进行合作的决心表示怀疑”。莫洛托夫表示，一个或两国盟国政府绝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的盟国政府，为什么不能采取南斯拉夫的先例来解决波兰问题呢？杜鲁门回答说，不能这样做的原因是由于苏联政府不遵守有关波兰问题的决定；以类似南斯拉夫的方法解决波兰问题违背了雅尔塔协定。莫洛托夫对此坚持说，苏联政府的立场已在斯大林 4 月 7 日的电报中清楚地表明了，苏联政府比任何其他政府都关心波兰问题的解决。^②会谈不欢而散，而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不要让步，要立场坚定。斯大林说，“如果他们想提出关于波兰问题的一般原则问题，你可以回答说：这些原则在斯大林的信中已经提出过，如果他们不接受这些原则，那你就说看不到达成解决问题协议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听取了驻苏大使哈里曼和国务院苏联问题专家波伦（Charles Bohlen）的建议，任命当时卧病在床的霍普金斯作为总统特使飞往莫斯科，同斯大林商谈双边关系中出现的問題。霍普金斯从 5 月 25 日到 6 月 7 日同斯大林进行了 6 次会谈，波兰问题是其中的主要问题。霍普金

① Marshal Stalin to President Roosevelt, April 7, 1945, *FRU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p.993.

② Record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V. M. Molotov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USA, Harry Truman, V. M. Molotov Diary, 23 April, 1945, AVP RF F.06, Op.7b, Pap.60, D.1, LL.11-13, Geoffrey Roberts, “Sexing up the Cold War: New Evidence on the Molotov-Truman Talks of April 1945”, *Cold War History*, Vol.4, No.3, April 2004, pp.118-120.

斯向斯大林强调说，波兰问题“已成为我们是否有能力同苏联解决问题的一种象征”。他还表达了美国已出现的很普遍的观点，即“要是我们不能在波兰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的话，我们怎么还可能同苏联一起解决其他问题”，这远比波兰问题本身更为重要。霍普金斯指出，苏联政府和华沙政府采取单方面行动重建波兰，没有经过自由选举。对于单方面的问题，斯大林的解释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在谈到波兰政府改组问题时，斯大林明确指出，雅尔塔会议规定波兰现在的政府要予以重建或改组，任何有常识的人都会懂得这意味着现政府是新政府的基础，对雅尔塔协定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斯大林甚至说，尽管俄罗斯人质朴单纯，但不应把他们当成傻瓜，而这是西方常犯的错误。有关自由选举，斯大林表示，苏联绝不会听任反苏力量让波兰通过美国主张的西方式自由选举而出现一个敌视苏联的波兰政府。斯大林建议，对苏联和英美都友好的华沙临时政府以外的政治团体，可在波兰全国统一政府的 18 到 20 个席位中占有 4 到 5 个席位，而这个政府成立后一定会举行自由选举。霍普金斯立即将斯大林的这个提议电告杜鲁门，杜鲁门同意这样的安排。^①

霍普金斯访苏时，同斯大林初步拟订了一个邀请前来莫斯科磋商组建政府事宜的候选人名单，最后的名单在 1945 年 6 月初得到了杜鲁门和丘吉尔的认可。6 月 17 日，波兰三方政治力量在波兰驻莫斯科使馆举行会谈，21 日达成协议，28 日，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在华沙正式宣告成立。在 21 个政府职位中，原波兰临时政府成员占 16 个，流亡国外的 4 名活动家占据剩下的 5 个职位，米克拉依奇克担任副总理和农业部长。6 月 29 日，法国首先承认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7 月 5 日，美英两国也予以承认。1947 年 1 月 19 日，波兰举行战后第一次议会选举，以波兰工人党为首的“全国阵线”获得 80% 的选票，米克拉依奇克逃亡国外，新议会选举贝鲁特为总统，社会党人西伦凯维兹（Józef Cyrankiewicz）任总理。到 1948 年 12 月，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为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兰成为共产党统治的国家。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在战时是轴心国的盟国。1944 年 10 月初，

^① *FRUS: 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The Potsdam Conference)*, 1945, Vol.I,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0, pp.26-40.

苏军占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并进入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丘吉尔面对这种情况非常焦急，希望召开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讨论巴尔干局势，而罗斯福表示自己必须在 11 月总统大选后才能离开美国，丘吉尔只得决定先举行英苏两国谈判。10 月 9 日，丘吉尔同艾登飞抵莫斯科，当晚会见了斯大林，同苏联达成了划分两国在巴尔干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希腊，苏联占 10%，英国占 90%；罗马尼亚，苏联 90%，英国 10%；匈牙利，苏联 80%，英国 20%；保加利亚，苏联 80%，英国 20%；南斯拉夫苏英各占 50%。这个百分比并不像起初拟订的并经罗斯福同意的那样，是一种军事需要的临时安排，它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在丘吉尔看来，这个百分比的目的，就是要保持英国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利益。而斯大林的目的更为明确，他曾对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说，“这次战争和以往的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的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①对于英苏划分势力范围，美国国务院持反对意见，而罗斯福则同意丘吉尔所谓的三个月试验期的要求。

1944 年 8 月 20 日，苏军向罗马尼亚发起强大攻势；8 月 31 日，苏军进入布加勒斯特，9 月 21 日，在莫斯科签订了停战协定。10 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和农民党、自由党组成了全国民主阵线，政府中只有一名共产党员部长。而在 12 月建立的以拉迪斯库（Nicolae Radescu）为首的联合政府中，重要的部长都由共产党人担任。1945 年 1 月中旬，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在访问莫斯科时得到指示，要他们发动民众，以便上台执政。2 月 24 日，共产党在布加勒斯特组织 50 万民众游行示威，要求拉迪斯库政府下台，示威遭到警察的镇压。27 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抵达布加勒斯特，三次会见米哈伊尔国王（King Michael），以维持战线后方正常秩序为由，要求撤换拉迪斯库，并由全国民主阵线的农民阵线领导人格鲁查（Petru Groza）组织新政府。3 月 6 日，以格罗查为首的新政府组成，17 名部长中的 14 名来自共产党和社会自由党的部长组成了全国民主阵线。美英对格罗查政府不予承认，认为它不符合《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的规定。

^① 米洛凡·吉拉斯：《与斯大林的谈话》，赵洵、林英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89 页。

在 1945 年 7 月 17 日至 8 月 2 日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上，美英苏三国同意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James Byrnes）提出的一揽子方案，即把波兰西部边界问题、德国赔偿问题、缔结和约以及如何接纳有关国家进入联合国组织等有争议的问题放在一起处理，以避免盟国在罗、保、匈等问题上公开分裂。波茨坦会议公报并未提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现政府的改组，只是笼统提到“在与这些国家缔结和约之前，三国政府考虑同意在最近的将来根据局势在可能的范围内，分别考虑同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匈牙利建立外交关系”。但在波茨坦会议一周后，罗马尼亚再次发生政治危机。国王米哈伊尔和反对派领袖全国农民党的马努（Juliu Maniu）以及民族自由党的布拉迪亚诺（Constantin Bratianu）看到波茨坦公告后，以为这表明盟国决心贯彻执行《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于是国王在 8 月 19 日要求格罗查立即辞职，但格罗查拒不辞职。在此情况下，国王米哈伊尔向盟国管制委员会呼吁，要求支持他改组政府，但遭到美国的反对。贝尔纳斯在 1945 年 8 月表示，我们希望不采取任何行动，因为这种行动看来可能会导致苏联的怀疑，理由是英美的干涉将产生危机……我们认为，我们将不向国王提供任何建议或承诺。”美国虽然没有接受米哈伊尔的呼吁，但立场并没有改变，仍然不承认格罗查政府。在 1945 年 9 月的伦敦外长会议上，罗马尼亚问题上依然处于僵局。

1944 年 9 月 5 日，苏联对保加利亚宣战，9 月 8 日苏军进入保加利亚。9 月 9 日，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政府成立，共产党人担任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10 月 28 日，祖国阵线政府在莫斯科同苏联签署停战协定。此时，保加利亚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1945 年 6 月，保加利亚决定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祖国阵线提出了统一的候选人名单。对选举可能产生的政府部长人选的变动，斯大林在 7 月 10 日指示保加利亚共产党：在目前情况下将农民联盟的领袖、政府不管部部长佩特科夫（Nikola Petkov）和他的来自农民联盟的同事从内阁中排斥出去，这是不合时宜的，保共的这种做法有宗派性质，建议保共要保持更大的克制和耐心。7 月 26 日，佩特科夫致函盟国管制委员会、英美使馆和政府各机关，要求延期举行选举，并提出选举应在盟国监督下进行。8 月 13 日，美英以只有一个统一的候选人，名单不符合《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有关自由选举的规定为由，要求保加利亚政府延期举行国民议

会选举。与此同时，反对派声明拒绝参加选举。8月17日，反对派部长辞职。8月18日，美国政府公开声明，美国只同真正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保加利亚政府建立外交关系。面对来自英美的压力，保加利亚政府8月25日宣布，将选举日期从8月26日推迟到11月18日。对此，斯大林8月30日向季米特洛夫强调：保加利亚推迟选举是“实质性的让步”，不能再作任何让步，政府组成人员不能有任何变动。^①

苏联的态度导致盟国在1945年9月举行的伦敦外长会议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国和英国认为，这些政权应在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上进行重组，然后才能予以承认。美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巴内斯（Maynard Barnes）9月3日致电贝尔纳斯称，苏联正在干涉保加利亚的内政，只要苏军驻扎在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就不可能建立起民主政府。巴内斯强调，如果保加利亚的局势没有变化，那么将证明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告一文不值。而斯大林在9月12日则指示莫洛托夫，在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政府的承认问题上，坚持既定路线，特别是在罗马尼亚问题上“要立场坚定，不要对盟国作任何让步”。斯大林还认为莫洛托夫的态度不够强硬，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电报中指出：“应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和英国在罗马尼亚的代理人支持诸如拉德斯库及其朋友这样的反苏势力，这与我们的同盟关系是不一致的……如果盟国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问题上拒绝和解，你应该让贝尔纳斯和贝文明白，苏联政府就不能同意缔结对意大利的和约……”。9月13日，斯大林进一步指示莫洛托夫：“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盟国有可能抛开我们同意意大利缔结和约，那又能怎么样呢？那么我们将有一个先例。我们也会撇开盟国同我们的卫星国缔结和约。一旦真的发生这样的事，那就意味着目前的外长会议在主要问题上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就结束了。对于这种结果，我们用不着害怕。”斯大林甚至表示，“宁愿让第一次外长会议不欢而散，也比对贝尔纳斯作出让步好。美国人力图造成一切顺利的假象，我想现在是撕掉这种假象的时候了”。莫洛托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采取强硬的谈判态度，在会议上指责贝尔纳斯：当美苏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美国

^① 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346-347、353页。

不再执行罗斯福的路线。^①而美国商务部长华莱士(Henry A. Wallace)在1945年10月底通过苏联间谍机构在华盛顿的负责人,向斯大林递送的一封信函,似乎也使斯大林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华莱士在信中声称,杜鲁门是个心胸狭窄的人,是靠偶然的机会才坐到了现在的这个位置;他虽有良好的意愿,但太容易受周围人的影响。华莱士声称自己正在同一个包括贝尔纳斯在内的势力极其强大的集团进行着争夺杜鲁门的斗争,这个集团主张建立一个以英美为主“盎格鲁—撒克逊集团”,同苏联领导的“敌对的斯拉夫世界”进行对抗。华莱士在信中表示,他愿意在美国发挥苏联的“影响力的代理人”(agent of influence)的作用,因此希望斯大林帮助他和他的支持者。^②

伦敦外长会议的结果,对同盟关系的发展和冷战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英国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会后表示,“我们同俄国人在整个欧洲问题上的关系,正逐渐转向我们当年同希特勒打交道时一样的状况”。他还直截了当地对莫洛托夫说,“你们把脖子伸得太远了,总有一天会让人给砍掉。我们对你们的了解要比你们想象的多得多。我们知道你们再也经不起一场战争,但你们的行为方式却像是总有一天会要摊牌似的”。美国驻苏使馆临时代办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在1945年10月4日打电报给贝尔纳斯说,苏联可能会把伦敦会议的结果视为美国 and 英国政府已经被敌视苏联的反动分子控制了。如果苏联是这种思路的话,斯大林就会让苏联人相信,战时三大国的合作已经结束。凯南强调,苏联可能会利用“西方包围”的信念,来解释西方的政策。^③贝尔纳斯10月5日也公开表示,会议的失败在于苏联在程序问题不愿作出妥协;由于双方的分歧如此之大,即便是继续举行会谈也不会有任何结果。

为了解东欧局势以打破美苏之间的僵局,贝尔纳斯1945年10月10日任命《路易斯维尔信使报》(Louisville Courier Journal)的编辑埃斯里奇(Mark Ethridge)作为自己的特别代表,前往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了解两国政府

① Vladimir Pochatnov, *The Allies Are Pressing on You to Break Your Will*, pp.2-3.

② Vladislav Zubok, *The Failed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p.47.

③ The Charge in the Soviet Union (Kenn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4, 1945, *FRUS*, 1945, Vol.V: *Europe*,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7, p.888.

组成和未来选举的情况。埃斯里奇本人属于支持新政、支持华莱士的自由派民主党人，其报纸也主张与苏联友好，并赞成同苏联分享核技术，经常发表诸如《苏联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上》之类的文章。埃斯里奇从 10 月 18 日到 12 月 3 日在两国行程 13000 英里，在保加利亚调查了两个星期，在罗马尼亚逗留了 10 天，还有一个星期在莫斯科。埃斯里奇对 300 多名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进行了访谈。^①10 月 30 日，埃斯里奇递交了有关保加利亚的报告。埃斯里奇在报告中宣称，当前的保加利亚政府并不代表保加利亚人民，政府为共产党人所控制，这违反了《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的原则。因此，将于 11 月举行的选举并不能反映其人民的意愿。10 月 31 日，贝尔纳斯在纽约发表公开讲话时指出，不可否认，苏联在东欧地区有着合理的安全利益，但那里的人民应当享有自决的权利，那里的政府要对其人民负责。贝尔纳斯明确反对在东欧地区划分势力范围，并强调苏联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是美苏关系紧张的主要根源。对于美国关于推迟保加利亚选举、以便给反对派候选人更多的时间准备竞选的建议，苏联予以拒绝。

在匈牙利，1945 年 11 月 4 日举行了议会选举，小农党获得 246 席，共产党获得 70 席。保加利亚在 11 月 18 日举行议会选举，祖国阵线获得 88% 的选票。11 月 23 日，贝尔纳斯发电报给哈里曼，希望在莫斯科举行三国外长会议，商讨以及解决目前存在的分歧。他指示哈里曼征询莫洛托夫的意见。莫洛托夫 11 月 24 日对哈里曼说，“贝尔纳斯先生终于想到我们三国可以单独开会了”，对贝尔纳斯的建议表示同意。11 月 26 日，埃斯里奇提交了有关罗马尼亚的报告，报告认为罗马尼亚政府为苏联所支持，并不代表罗马尼亚人民。12 月 8 日，埃斯里奇向贝尔纳斯提交了有关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最后报告，其中特别强调，保、罗两国的经济都是服务于苏联的利益的。贝尔纳斯试图在即将举行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以埃斯里奇报告来影响苏联的态度。^②

① David Stone, “The 1945 Ethridge Mission to Bulgaria and Romani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Balkans”, *Diplomacy & Statecraft*, Volume 17, Number 1, March 2006, pp.97-98.

② Summary Report on Soviet Policy in Romania and Bulgaria, December 8, 1945, *FRUS*, 1945, Vol.V, pp.633-641.

莫斯科外长会议于 1945 年 12 月 15 日至 27 日举行。美英在会上同苏联商定，由苏联出面向保加利亚政府提出建议，吸收反对派代表参加政府。贝尔纳斯表示同意苏联的建议，只要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各增加 2 名反对派成员进入政府，美国就予以承认。贝尔纳斯在 12 月 19 日和 23 日同斯大林进行会谈。有关罗马尼亚政府的组成问题，斯大林同贝尔纳斯会晤时建议，可以向罗马尼亚议会提出劝告，吸收若干诚实的反对派人士加入政府，劝告罗马尼亚政府从国家自由党和国家农民党增加两名阁员。至于保加利亚，也可采取这种模式。^①斯大林在 12 月 23 日对季米特洛夫说：为保证保加利亚问题的解决，请考虑一下，能否吸纳反对派圈子里的一两个人作为政府部长，并使他们脱离反对派。可给他们某个无关紧要的部……可找出另外一个人，尽管不那么有名。^②12 月 27 日，三国外长达成协议，发表了会议公报；公报声称要同战败国缔结和约，成立占领朝鲜和日本的委员会，从中国撤出外国军队，采取步骤使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更具有代表性，支持联合国有关建立原子能委员会的决议，等等。贝尔纳斯相信自己取得了外交上的突破，重新同苏联建立起了像罗斯福那样的互信。

对斯大林而言，莫斯科外长会议显然是一场胜利。1946 年 1 月 7 日，斯大林告诉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说，“你们的那些反对派抵制选举，现在三大国都承认了这些选举。西方政府也许对保加利亚共产党政府逮捕反对派领导人表示愤怒，但他们绝不胆敢指责苏联”。这一时期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力量在苏联的支持下不断壮大，从 1944 年底的 25 万人，增加到 1948 年的 46 万人。斯大林在 6 月会见季米特洛夫时，批评保共领导人“行动不够坚决果断”，指示他采取更坚决的方针，不用考虑英国人、美国人以及他们在保加利亚的代言人的意见和情绪。^③9 月 15 日，保加利亚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人民共和国。美国到 1947 年 10 月才承认保加利亚政府。

①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Delegation at the Moscow Conference of Foreign Ministers, December 19, 1945, *FRUS*, 1945, Vol. II, Gene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atter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7, pp.680-69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Delegation at the Moscow Conference of Foreign Ministers, December 23, 1945, *FRUS*, 1945, Vol.II, pp.752-756.

② 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 370-371 页。

③ 同上，第 381 页。

贝尔纳斯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的所作所为，在美国国内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美国驻罗马尼亚使馆人员认为贝尔纳斯的行为是“出卖”，声称要全体辞职。《纽约时报》指责贝尔纳斯在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最为恼怒的还是杜鲁门，因为在重大的国际管制原子能问题上，贝尔纳斯擅作主张，既不事先向他请示，事后也不主动汇报。杜鲁门认为苏联仅仅作了一般性的承诺，美国在莫斯科会议上的“胜利是不真实的”。杜鲁门取消了贝尔纳斯事先安排好的有关莫斯科会议的广播讲话，并在 1946 年 1 月 5 日召见贝尔纳斯，当面向他宣读了一封信。杜鲁门在信中历数苏联在波茨坦会议时给西方造成既成事实、迫使美国同意它对波兰东部的占领等行为，强调指出：“除非俄国人面对着铁拳和强硬的语言，否则另外一场战争就会慢慢形成。它们唯一明白的语言就是，‘你有多少个师’？我认为我们不应再作任何妥协。我们一定要拒绝承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除非它们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应该明白无误地表明我们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应当继续坚持基尔运河、莱茵—多瑙河水道和黑海海峡的国际化。我们应当完全控制日本和太平洋地区。我们应当复兴中国，在那里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我们在朝鲜也要这样做。然后，我们应当坚持俄国归还我们的船只，迫使苏联解决租借法的债务问题。我已经厌倦笼络苏联人了。”^①

同一时期，斯大林 1946 年 2 月 9 日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发表的演讲，以及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对冷战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斯大林亲自撰写了他的演讲，并作了反复的修改，他甚至在草稿中的关键段落后插入听众要作出何种反应的措辞，诸如“暴风雨般的掌声”、“起立并热烈鼓掌”，等等。斯大林在演讲中突出强调：苏维埃制度比其他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更有优越性；资本主义的存在就等于战争。他指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藏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不可避免地将导致战争。苏联人民要作好应对战争的准备。与此同时，苏联国内还展开了反对西方的文化宣传活动，其中以戏剧《俄国问题》（The Russian Question）的影响尤为巨大。这部由作家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创作的戏剧深受斯大林的喜爱。西蒙诺夫在 1946 年初随同由苏联

^① Harry S Truman, *Memoirs: 1945: Year of Decision*, New York: Signet, 1955, pp.551-552.

作家和新闻记者组成的代表团访问美国，他回国后创作了《俄国问题》这部戏。在这部戏中，西蒙诺夫通过主角——一位“进步的”美国记者——的眼睛，描述美国的“帝国主义分子、政客以及报界的巨头试图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这部戏在苏联的杂志连载，在电台广播，在剧场反复上演。^①

苏联国内的反美情绪，特别是斯大林的讲话，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时代》杂志称之为“自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一个高级政治家所发出的最好战的声明”。民意调查也显示，斯大林的演讲充满了敌意，是一篇战争宣言书。国务院负责欧洲事务的官员普遍认为，“这是战后苏联政策最为重要和最为权威的指南”，“将成为全世界共产党人及其追随者的经典”。国务院东欧处处长德博鲁（Elbridge Durbrow）指出，斯大林的这篇讲话最为重要的是，苏联将保持其强大的军力，并进一步发展其军事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否还要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根据欧洲司司长马修斯（Herbert Matthews）的建议，贝尔纳斯打电报给凯南，要求他分析斯大林讲话的背景以及苏联对外政策的动机。凯南的电报是对斯大林讲话的反应。凯南的长电报就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对苏战略的基础。

凯南作为美国外交官职业化改革后的第一批苏联问题专家，对苏联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本人也极不喜欢俄国人。早在 1931 年凯南就认为，苏俄是一个坚定不移地反对美国传统制度的国家，“两国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妥协……两种制度不可能在世界上共存”。凯南鄙视雅尔塔协定，认为其“最卑鄙地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隐瞒其真面目”。凯南 1946 年 2 月 13 日接到国务院的电报时不仅身体有病，而且情绪低落，非常沮丧，正考虑再次提出辞职。凯南在 1945 年 8 月曾提出过辞呈，他当时对马修斯解释说：辞呈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考虑。关于前者，凯南说，自己有小孩，而在莫斯科没有办法将小孩培养大；而后者则在于“深深的挫折感”，这种挫折感就是“我们正在浪费我们通过近来的战争努力而获得的政治财富，我们没有在政治上充分利用自己的胜利，我们的职业外交在这个紧要关头显然没能有助于对美国外交施加任何有显著建设性的影响”。而这一次考虑辞职，还是那种“深深的挫折感”，因为他就斯大林以及苏联政策的实质和走向等问题

^① Zubok, *The Failed Empire*, pp.52, 60-61.

向国务院提出的报告和建议，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①此时来自华盛顿的要求，被凯南视为一个重要时机。

凯南在 1946 年 2 月 22 日向国务院发回了一份长达 5540 字的长电报，系统提出了遏制战略的基本思想。凯南指出，苏联认为自己生活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不可能同资本主义持久地和平共处；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矛盾，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战争，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苏联的外交政策源自马列主义的教条，是苏联国内统治的基本需要的产物，反映了苏联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凯南强调，苏联外交政策的目标是“破坏西方主要国家基本的政治和战略潜力，竭力削弱这些国家对本民族的信心，摧毁它们的国防，加剧社会动荡和工厂的骚乱，并制造各种形式的分裂”。苏联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力量的逻辑则高度敏感；由于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一点上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它可以轻易地退却，而且经常这样做。为有效地对付苏联，凯南建议，美国要有勇气和信心，只有“拥有足够的力量并清楚地表明准备使用力量的意愿”，如果正确处理形势，那就不必通过全面的军事冲突来解决美苏关系发展所面临的难题。^②

长电报使凯南在美国决策者中几乎一夜成名。国务院将这份长电报发至每个司，并发至驻外使团。贝尔纳斯在读后打电报给凯南，说他的分析十分精彩。哈里曼给凯南发了一份简短的私人电报，说“对你 2 月 22 日分析透彻的长篇电报谨致祝贺”。陆军部长帕特森（Robert Patterson）认为凯南的分析给自己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并建议将凯南报告中有关苏联试图制造英美分裂的论述，用在国会有关给予英国贷款的辩论中。海军部长福雷斯特（James Forrestal）不仅将长电报抄录在自己的日记中，还复制多份分发给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员。同时由于福雷斯特的极力推荐，凯南在 1946 年 4 月调回华盛顿，在国防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任教。国防学院是战后新组建的学校，主要是向高级军官和外交官讲授战略学方面的课程。凯南

① John Lewis Gaddis, *George F. Kennan: 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1, pp.203-204.

② The Charge in the Soviet Union (Kenn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22, 1946, *FRUS*, 1946, Vol.VI: *Eastern Europe; The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pp.696-709.

的课程备受欢迎，福雷斯特经常旁听凯南的讲课。1947年1月新上任的国务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又授权凯南组建国务院政策设计室（Policy Planning Staff）。该机构于5月成立，是战后初期美国政府最为重要的智囊机构之一，主要任务是制订较长期的对外战略，凯南担任首任主任。长电报使凯南跻身于决策层，成为“说话算话的人”。凯南后来写道，长电报如果在半年前发出，它会受到国务院的反对和责难；如在半年后发出，则会成为赘谈。它之所以受到厚遇，只是因为它所描述的事实完全是真实的，而且十多年来一直都是如此。^① 1947年7月，凯南以“X”为化名，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上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凯南在文章中强调，由于俄罗斯传统的不安全感和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苏联总是不断向边界以外的薄弱地区进行扩张；因此，对苏联采取坚定而富有耐心的遏制政策，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② 这篇文章将遏制战略的思想公诸于众。

从凯南的长电报开始，美国决策者逐步把正在形成中的对苏“强硬政策”付诸实施。贝尔纳斯1946年2月28日在纽约海外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首次公开表明杜鲁门政府新的“强硬”的外交政策方针。贝尔纳斯表示，美国虽然希望继续成为苏联的盟友和伙伴，但美国也将保卫联合国宪章，不允许“单方面地侵蚀现状”，也不允许“通过强制或压力或依靠诸如政治渗透这样的借口”来实现侵略。在提到苏联在伊朗、中国东北、德国以及土耳其的行为时，贝尔纳斯强调，任何国家都无权未经他国同意在该国领土上驻军，无权在赔偿协议达成之前攫取敌国财产，也无权发动“神经战”以达到战略目的。贝尔纳斯宣称，“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一个强国，我们就必须作为一个强国来行动，这不仅是为了保证美国的安全，也是为了保持世界的和平”。^③ 在随后处理伊朗危机的过程中，贝尔纳斯的态度都是美国这种新的强硬政策的反映。李海（William D. Leahy）海军上将说，贝尔纳斯最近“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态度是非常正确的，如果能更早地表明这种态度，那么其价值就会

① Gaddis, *George F. Kennan*, pp.218-219.

② Ibid, pp.259-262.

③ John Lewis Gaddis, *George F. Kennan: 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1, pp.225-226.

最大了”。哈里曼也承认，贝尔纳斯现在是“更为强硬的人了”。^①

丘吉尔 1946 年 3 月 5 日的富尔顿演说，被视为是号召西方团结起来对抗苏联扩张的重要信号，也是美国决策者以此试探公众对“强硬政策”的反应的步骤。丘吉尔在演说中声称，“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Trieste），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铁幕后面的国家“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而在铁幕外面，共产党的“第五纵队”遍布各国，“到处构成对基督文明日益严峻的挑衅和危险”。丘吉尔呼吁美国同英国建立特殊关系，推动西方民主国家团结一致。但丘吉尔的演说并没有在美国公众中产生预期的效果，还招致美国舆论的批评，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为此分别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自己同丘吉尔的演说没有任何关系，不过也没有对演说本身作任何评论。

但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在被苏联占领的整个东欧地区如同是进行战斗的号角”。斯大林亲自撰写并精心修改了抨击富尔顿演说的文章，发表在 1946 年 3 月 14 日的《真理报》上，斯大林在文章中称丘吉尔是“战争贩子”。美国新任驻苏大使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4 月 5 日拜会斯大林时，递交一份杜鲁门邀请斯大林访美的信函，但斯大林并未接受邀请。斯大林 5 月 1 日发布命令，宣称一些国际势力正在准备战争，他要求苏联红军严阵以待，保卫和平。与此同时，苏联很快就得到了凯南的长电报；莫洛托夫在 9 月中旬指示驻美大使诺维科夫（Nikolai Novikov）对美国的政策进行全面的分析，1946 年 9 月 27 日，“诺维科夫电报”发送到莫斯科。^②诺维科夫还在电报中系统分析了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和美国在全球的扩张行为。由于报告是按照莫洛托夫的指示完成的，莫洛托夫本人在阅读报告时，在上面画了许多着重线并作了眉批，因此这篇报告基本反映了苏联官方的观点。报告首先强调，“美国对外政策反映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倾向，其特征就是在战后谋求世界霸权”。报告以马列主义特

① C. L. Sulzberger, *A Long Row of Candles: Memoirs and Diaries (1934-1954)*, Toronto: Macmillan, 1969, p.311.

② Kenneth M. Jensen, ed.,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The Novikov, Kennan, and Roberts "Long Telegram" of 1946*,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1993, pp.3-16.

别是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论断作为分析的基础，对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国内政治、军事力量的发展、同西方盟国的关系、对苏政策、对德日等战败国的政策、对华政策等等，作了详细的分析。报告明确指出，“美国是把苏联作为战争的对象来准备未来战争的。在美帝国主义的眼里，苏联是其走向世界霸权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以下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美军为备战而进行的战术训练是把苏联作为其未来的对手；美国的战略基地设在有可能对苏联进行打击的出发点的地区之内；强化在极为靠近苏联的北极地区的军事训练和防务；力图使德国和日本成为对苏战争中可以利用的对象”。诺维科夫电报清楚地表明，苏联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已持全面抨击和彻底否定的态度；作为苏联战后首次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意图和目的进行较为全面分析的官方文件，诺维科夫电报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为指导，为苏联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国采取强硬政策作出了解释。

从土耳其危机、伊朗危机到希腊内战：苏联的行动和美英的反应

从1945年到1947年，沿着欧亚大陆南部边缘出现的一系列的政治发展，被西方视为苏联试图实现俄罗斯传统外交目标的努力，这种努力还扩展到了地中海东部和波斯湾地区。“杜鲁门及其多数主要顾问打算对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及其在该地区的支配地位作出让步，但决不在伊朗或希腊或土耳其或整个中东地区作出让步”。^①苏联在土耳其和伊朗的行动导致美英的强硬反应，成为冷战爆发的重要事件。

所谓土耳其危机，是指苏联向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并要求土耳其政府修改有关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蒙特勒公约》（Montreux Convention），由此引发了一场国际危机。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要控制黑海海峡，“让我们来施加压力，争取共同管理”；当莫洛托夫表示“他们不会给的”，斯大林说：“你向他们提出要求！”^②

^① Warren Cohe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ume IV, *America in the Age of Soviet Power, 1945-199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1.

^② 丘耶夫：《莫洛托夫访谈录》，第123-124页。

土耳其地跨欧亚两大洲，其欧洲部分位于巴尔干半岛的东南部，亚洲部分位于小亚细亚半岛，北边是黑海，西南方向是地中海，其境内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是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重要通道，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奥斯曼帝国衰落时，土耳其成为西方列强争夺的对象，所谓“东方问题”就是欧洲列强在土耳其进行角逐的结果。俄罗斯为了可以从黑海自由出入地中海，争夺不冻港出海口，从 19 世纪开始，沙皇俄国就同西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有关海峡问题主要是海峡的管理权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有关条约是 1936 年 7 月签署的《蒙特勒公约》，公约规定：各国商船无论平时和战时可以自由通过海峡。至于军舰，平时，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可自由通过，而非海峡沿岸国家通过海峡的军舰不能超过 11.5 万吨，停留期不能超过 21 天。战时，如果土耳其为中立国，交战国的军舰禁止通过海峡；如果土耳其是交战一方，是否准许通过由土耳其决定。该公约还规定，解散 1927 年 7 月《黑海海峡公约》所设立的“海峡委员会”，土耳其有权在海峡地区设防。从苏联的角度看，《蒙特勒公约》虽也对黑海和非黑海国家在平时通过海峡作了有利于前者的有区别的规定，但苏联对于在战时土耳其保持中立的情况下，交战国中的黑海和非黑海国家的军舰一概不许通过的规定，显然是不满的。因为它不能使苏联获得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自由通过海峡的权利，同时也没有限制其他大国在海峡地区的优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通过同德国的不断谈判，表示希望以租借的形式在海峡地区建立军事基地，这一要求得到了希特勒的支持。斯大林在 1940 年 11 月的时候就准备同保加利亚一起进攻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土耳其也一直谴责苏联试图煽动土耳其东部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运动。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又开始向盟国提出同样的要求。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提出需要修改《蒙特勒公约》，修改时应考虑到俄国人的利益，因为苏联不可能接受被土耳其扼住咽喉的局面。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再次提出了海峡问题。他说，“《蒙特勒公约》是决定用来对付俄国的”，“一个受到英国支持的小国，卡住了一个大国的咽喉，不给它出路”。斯大林要求苏联的船只能够自由进出黑海，并表示，“一旦发生复杂事件，由于土耳其无力保证自由通航的可

能性，苏联希望用武力包围海峡”。三大国都同意修改《蒙特勒公约》，但问题在于苏联提出的对土耳其的领土和在海峡地区驻军的要求，这不是一般性的修改所能满足的。

雅尔塔会议后不久，苏联便开始对土耳其发动所谓的“神经战”并炫耀武力。200 辆苏军坦克部署到苏土边界，苏军在保加利亚也进行大规模的调动。苏联的报纸和电台掀起攻击土耳其的宣传活动。从 1945 年 3 月开始，苏联广播每天对土耳其政府进行抨击，《真理报》不断发表攻击土耳其的文章。这一现象首先引起英国方面的关注。伦敦指示驻苏大使克尔（Clark Kerr）同苏方接触，说明苏联的行为有悖于雅尔塔会议达成的有关合理解决海峡问题的协议，但这并未对苏联产生任何作用。3 月 19 日，苏联单方面宣布废除 1925 年 12 月 7 日同土耳其达成的友好中立条约。莫洛托夫在向土耳其驻苏大使递交的一份声明中声称：这个条约不能适应新的局势，需作出“重大修改”，希望土耳其政府方面提出建议。^①为此英国告诉土耳其政府，如果苏联同土耳其就此问题进行接触的话，土耳其应提请苏联注意《蒙特勒公约》的国际性。^②苏土双方在 4 月至 6 月间举行多次会谈，土耳其政府也面临着国内亲苏势力的压力。6 月 7 日，土耳其驻苏大使夏帕尔（Selim Sarper）向莫洛托夫建议，土耳其考虑同苏联进行有关友好条约以及同盟问题的谈判。莫洛托夫的答复是，在新的条约谈判之前，必须解决三个主要的问题：土耳其割让卡尔斯（Kars）和阿尔达汗（Ardahan）给苏联；保证苏联在海峡地区拥有基地；土耳其和苏联就修改《蒙特勒公约》达成协议。莫洛托夫还暗示需要解决第四个问题。土耳其政府相信，这第四个问题很可能就是废除英国和土耳其的联盟，或是改变土耳其的政治结构。这些几乎是战胜国向战败国提出的条件了。

卡尔斯和阿尔达汗历史上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地，俄国曾于 1806 年、1828 年、1855 年和 1877 年四次侵入这一地区。前三次迫于西方的压力，将两地归还土耳其，1877 年入侵后又占为己有。1921 年的苏土条约规定苏联将这

① Jamil Hasanli, *Stalin and the Turkish Crisis of the Cold War, 1945-1953*, London: Lexington Books, 2011, pp.46-47.

② Suleyman Seydi, "Making a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 Turke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Diplomacy & Statecraft*, vol. 17, No.1, March 2006, pp.114-116.

两地归还土耳其。因此从历史上看，卡尔斯和阿尔达汗的归属是有争议的，苏联的要求并没有多少依据。而在海峡地区建立苏联的军事基地，这是对土耳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至于苏联想撇开西方国家单独与土耳其谈判修改海峡公约，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夏帕尔在 1945 年 6 月 18 日同莫洛托夫会谈时拒绝了苏联的建议，而莫洛托夫则提出了相对温和的两个问题：第一，苏联只要求在战时在海峡地区拥有基地；第二，这些问题只有海峡地区的国家才能考虑。莫洛托夫强调，如采纳这一建议，土耳其和苏联就没有理由不签订一项同盟及合作的条约。莫洛托夫在会谈中还反复提到波兰，这在土耳其政府看来则是苏联企图使土耳其像波兰那样，将其国内和外交事务置于苏联的直接控制之下。与此同时，苏联还一再强调，土耳其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地区应并入苏联的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斯大林曾在 1945 年 12 月告诉贝文，苏联在高加索地区的边界线应是 1921 年以前的。对此，土耳其政府认为，“苏联人太过分了，他们的梦想是统治世界……他们只要发现有软弱的地点，他们就会利用它”。而斯大林 1945 年 1 月 28 日同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库拉罗夫（Vasil Kolarov）会谈时则表示，“在巴尔干，不能让土耳其有立足之地”。^①

面对苏联的持续压力，土耳其只好求助于英国和美国的支持。英国认为，苏联对土耳其的要求，是对英国在中东地区地位的严重挑战。然而，受战争破坏的英国显然无力继续维持其在中东地区的传统地位，最佳的选择是说服美国支持英国的政策。考虑到苏联有可能采取颠覆手段，土耳其外长萨卡（Hasan Saka）1946 年 2 月 15 日致函贝文，请求英国公开重申 1939 年同土耳其的联盟条约。为此贝文 2 月 21 日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讲时指出：“我们同土耳其有条约……我们不想让土耳其变成一个卫星国，我们要使它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苏联立即表示，贝文的讲话使英国站到了反对苏联的立场上。同时苏联还威胁说，这是土耳其活动的后果，“对于土耳其这样一个一方面是西方的朋友和盟国，同时又要成为苏联的朋友和盟国的国家，苏联是不能接受其友谊的”。

^① Zubok, *The Failed Empire*, p.38.

美国虽认为苏联的行为同联合国的宗旨不符，但国务院此时认为，莫洛托夫同土耳其大使的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可继续进行此类探讨。对于苏联在土耳其边境地区的大量驻军，贝尔纳斯甚至在莫斯科会谈结束时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苏联有权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驻军，直到它满意这些政府的友好程度为止”。^①尽管如此，美国此时对土耳其的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驻土耳其大使威尔逊（Edwin Wilson）、哈里曼以及凯南的建议对美国的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哈里曼在 1945 年 10 月 24 日打电报给贝尔纳斯说：苏联外交政策具有侵略性，控制土耳其和黑海是苏联的首要目标；苏联正利用其邻国的民族分离运动，只要这些运动有利于苏联的利益。苏联驻土耳其大使维诺格拉多夫（Sergey Vinogradov）在 11 月 3 日同威尔逊会谈时明确表达了苏联的意图，他说，苏联要在达达尼尔海峡拥有军事基地。威尔逊告诉国务院，苏联是要控制土耳其，而不是要保护它。威尔逊强调，苏联对土耳其政策的目标是要改变土耳其的政权，因为从巴尔干到黑海沿岸同苏联相邻的国家中，只有土耳其没有被“友好”的政府所控制。而一个在苏联控制下的土耳其的“友好政权”，则意味着苏联对海峡地区的实际控制。更为重要的是，这将意味着西方对土耳其、甚至也许是对整个中东地区影响的终结。凯南则强调，苏联的意识形态或外交行为“都不能让我们相信，通过在海峡问题上的让步，就可以满足苏联对土耳其的野心”；而“西方在土耳其问题上的让步，都会让苏联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以消除西方在土耳其的影响，并建立对苏联“友好”的政府。^②美国遂决定采取行动显示美国对土耳其局势的高度关注。此时土耳其驻美大使厄尔特根（Mehmet Ertugun）的去世，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展示其支持土耳其的决心的机会。土耳其使馆询问华盛顿，能否提供船只将厄尔特根的遗体运回土耳其，美国表示同意，并决定派遣“密苏里号”护送。1946 年 4 月 5 日到 9 日，美国的“密苏里号”

① Seydi, “Making a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 Turke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119.

②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Harrim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24, 1945, *FRUS*, 1945, Vol.VIII, p.1258; The Ambassador in Turkey (Wil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3, 1945, *FRUS*, 1945, Vol.VIII, pp.1271-1272; The Charge in the Soviet Union (Kenn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27, 1945, *FRUS*, 1945, Vol.VIII, pp.1251.

战舰以及驱逐舰“格林诺”号和“科恩”号停泊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贝尔纳斯对土耳其人表示，“密苏里”号对伊斯坦布尔的访问不是孤立的，它是“已经决定了的政策的一部分”。^①这是美国向苏联发出的明确信号。

苏联此时继续向土耳其施加压力，在保加利亚驻扎了 20 万人，并在土耳其东部边界地区部署了 12 个师的兵力。与此同时，苏联通过实施亚美尼亚人的遣送计划向土耳其施加更大的压力。苏联在 1946 年 3 月开始实施的这一计划，旨在把分散在罗马尼亚、希腊、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以及伊拉克的亚美尼亚族人送到苏联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并以此作为向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的依据。苏联向土耳其指出，苏联政府依据宪法有义务保卫其加盟共和国的利益，因为亚美尼亚共和国代表已提出了对土耳其东部省份的领土要求。苏联甚至表示，“在同波兰达成我们想要的安排的问题上，我们等待了很长时间，终于如愿以偿，我们对土耳其也可以这样等待”。^②

1946 年 8 月 7 日，苏联向土耳其政府发出照会，同时抄送英国和美国政府。照会提出了修改公约的五项原则，主要包括：第一，海峡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国家的商船均予以开放；第二，海峡在任何时候对黑海国家的军舰予以开放；第三，在特别许可的情况下，允许非黑海国家的军舰通行；第四，“作为进出黑海的唯一海上通道的海峡，其制度的建立应是土耳其和其他黑海国家权限范围的事情”；第五，“作为最有利害关系、最能保障商船航行自由和海峡安全的国家，苏联和土耳其将通过联合手段来组建海峡的防御，以防止其他国家出于敌视黑海国家的目的利用海峡”。苏联在照会中正式提出共同防御黑海海峡的要求，要求建立新的海峡机制，其目的就是要将西方的势力赶出海峡地区，谋求建立苏联对海峡的垄断权。与此同时，萨卡向英美驻安卡拉大使通报了苏联的照会；他说，他自己认为苏联照会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苏联要求建立新的海峡机制，使苏联和土耳其共同防御海峡地区，从而达到苏联在海峡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的目的。^③

美国对苏联照会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苏联的目的是利用海峡问题控制土

① Fraser Harbutt, *The Iron Curtain: Churchill, Americ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70.

② Seydi, “Making a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 pp.127-129.

③ Hasanli, *Stalin and the Turkish Crisis of the Cold War*, pp.227-228.

耳其。斯大林在 1946 年 4 月曾告诉美国大使史密斯说，土耳其是软弱的，苏联非常担心会出现外国控制海峡的危险，而土耳其本身也没有强大到可以保卫海峡地区。“土耳其政府对我们是不友好的，这就是苏联为什么要求在达达尼尔海峡地区拥有一个基地的原因。这事关我们自身的安全”。^①为了商讨海峡的局势以及美国的对策，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与会者一致同意，必须阻止苏联的扩张，必须保持土耳其的独立，同时要让苏联明白，实施这样的政策将会导致同美国的战争。1946 年 8 月 15 日，代理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向在巴黎出席外长会议的贝尔纳斯汇报讨论的结果，并呈送了准备递交给土耳其和苏联的备忘录草稿。备忘录强调，苏联的首要目的是控制土耳其，一旦苏联实现这一目的，那么“要防止苏联控制希腊以及整个中近东地区”，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那也将是非常困难的。同时，苏联控制了中近东地区，又将使其在控制印度和中国方面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这就事关美国的“核心利益”，不应让苏联以武力或武力威胁使其在土耳其和海峡的计划得逞。备忘录强调，如果美国立场坚定，准备使用一切手段来支持土耳其，那么苏联的威胁行为就会停止，不能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同时，如果联合国不能阻止苏联的行动，美国将联合其他国家以武力对付。8 月 16 日，艾奇逊将备忘录呈送杜鲁门，杜鲁门予以批准。^②8 月 19 日，威尔逊大使向土耳其通报了美方的决定。在得知美国的立场后，彻夜未眠的伊诺努总统（İsmet İnönü）终于松了一口气。

1946 年 8 月 19 日，美国向苏联发出照会，重申美国 1945 年 11 月的四点主张。第一，海峡在任何时候都向所有国家的商船开放；第二，海峡在任何时候都对黑海国家的军舰开放；第三，除了和平时吨位有限的军舰外，海峡在任何时候都不对非黑海国家的军舰开放，除非获得海峡国家的特别许可或联合国的授权；第四，《蒙特勒公约》应作某些修改，比如以联合国制度代替国联制度，取消日本的公约签字国资格等等。同时强调，海峡权力机

① Hasanli, *Stalin and the Turkish Crisis of the Cold War*, p.228.

②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t Paris, August 15, 1946, *FRUS*, 1946, Vol.VII: *The Near East and Africa*,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pp.840-842; The Memorandum by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President Truman, August 16, 1946, *FRUS*, 1946, Vol.VII, p.843.

构除关系到黑海国家外，还是关系到其他国家的大事，因此不能同意苏联照会的第四项原则。至于第五项原则，美国认为土耳其仍应是海峡防御的主要负责者，并警告说，对海峡的攻击无疑将是联合国安理会要过问的事情。^①美国军方此时希望采取更为强硬政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海军上将（William D. Leahy）在 8 月 23 日给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的备忘录中强调，从战略上讲，土耳其是东地中海地区及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军事因素。苏联对土耳其进行“事实上的地理与政治控制”，这“将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产生最为严重的影响”。因此，李海建议采取以下三个步骤援助土耳其：其一，允许土耳其从美国购买非军事用途的物资，以此加强土耳其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其二，允许土耳其从美国购买军事装备和物资，以加强其防卫能力；其三，美国考虑向土耳其派遣技术人员和官员。^②

1946 年 8 月 21 日，英国也照会苏联，表达了与美国相同的立场。8 月 22 日，土耳其详细答复了苏联的照会，拒绝苏联所称的土耳其没有履行《蒙特勒公约》的指控。苏联在 9 月 24 日再次照会土耳其，重申苏联的立场和要求。苏联在照会中强调，经过详细研究土耳其政府 8 月 22 日对苏联 8 月 7 日照会的答复，苏联方面确信，《蒙特勒公约》同黑海国家的安全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这一条约没有提供防止某些国家利用海峡采取敌对行动的条款。苏联还指出，黑海海峡是个海上通道，其机制应具有“特殊的地位”，以满足土耳其、苏联和其他黑海国家的安全利益。^③相对于先前的照会，苏联这一次照会的措辞较为温和。

经过内部讨论，美国在 1946 年 9 月 30 日宣布，作为对苏联 8 月 7 日照会的反应，美国声称将在地中海东部永久部署一支舰队。对于苏联 9 月 24 日的照会，美英则在 10 月 8 日和 9 日给苏联的照会中声称：波茨坦会议所建议的有关苏土之间进行的直接会谈已达到了交换意见的目的，没有必要再

①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Soviet Charge, August 19, 1946, *FRUS*, 1946, Vol.VII, pp.847-848.

② Memorandum by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the Secretary of War (Patterson) and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Forrestal), August 23, 1946, *FRUS*, 1946, Vol.VII, pp.857-858.

③ 苏联 1946 年 9 月 24 日的照会，参见 The Charge in Turkey (Bursle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26, 1946, *FRUS*, 1946, Vol.VII, pp.860-866; Hasanli, *Stalin and the Turkish Crisis of the Cold War*, pp.240-241.

继续进行；美英依然准备参加《蒙特勒公约》缔约国的会议，以考虑公约的修订。土耳其 10 月 18 日复照苏联，不承认海峡问题仅仅是黑海国家的问题。苏联于 10 月 26 日复照英国，虽否认苏土直接对话已结束，但声称召开修订海峡制度的会议条件尚不成熟。^①

面对美英的强硬立场，苏联作了退让，土耳其危机也告结束。但这个事件的影响远未结束。苏联在土耳其问题上采取的行动，加深了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西方国家对苏联战后意图的猜疑和警觉，动摇了双方在战后继续合作的信心。它与苏联同期在伊朗问题上的行动一起，使苏联和西方国家迅速走向对立和对抗。其最为直接的结果是，不仅加快了美国中近东政策的调整，而且也加快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英联合的步伐，促进了美国战略政策的形成。同时，美国还向英国转达了美国政府在海峡问题上的决心。英国鉴于战后无力推动土耳其军队的现代化，希望美国政府接替这项工作。1946 年 9 月 10 日，英国元帅蒙哥马利 (Bernard Law Montgomery) 抵达美国，商讨美英两国应付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合作问题，并开始制订相应的计划。国务院此时也开始考虑一份总的援助希腊、土耳其和伊朗的计划。国务院近东司在 10 月 21 日准备的有关土耳其问题的备忘录中强调，土耳其是东地中海和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因素，而苏联政策的目的是将土耳其纳入其卫星国的范围。鉴于土耳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国应在外交、道义、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大力支持土耳其，特别是在经济和军事上。备忘录建议，通过进出口银行，先期提供 2500 万美元的贷款。在军事上，备忘录建议，美国应考虑向土耳其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尽管国务院认为英国有义务为提高土耳其的防卫能力提供必要的军事装备，但如果英国无力这么做，美国则要考虑提供军事援助。^②这些建议最终被采纳，其结果体现在“杜鲁门主义”之中。

① 美国 1946 年 10 月 8 日的照会，参见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Smith), October 8, 1946, *FRUS*, 1946, Vol.VII, pp.874-875; 英国 10 月 9 日的照会，参见 The British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Peterson) to the Assistant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of the Soviet Union (Dekanozov), *FRUS*, 1946, Vol.VII, p.876; 土耳其 1946 年 10 月 18 日的照会，参见 The Turkish Foreign Office to the Embassy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urkey, October 18, 1946, *FRUS*, 1946, Vol.VII, pp.879-893.

② Memorandum in Turkey Prepared in the Division of Near Eastern Affairs, October 21, 1946, *FRUS*, 1946, Vol.VII, pp.894-897.

与此同时爆发的伊朗危机，起因于苏联、美国和英国从伊朗撤军的问题。位于西亚的伊朗是苏联的南部邻国，伊朗南部的波斯湾是进入印度洋的重要门户。通过伊朗南下波斯湾并进入印度洋，一直是沙皇俄国的扩张目标。由于波斯湾的战略地位和伊朗丰富的石油资源，19世纪后期以来，沙俄同英国、德国在这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①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为清剿白军，曾出兵占领伊朗北部省份吉兰。1920年6月4日，库吉克汗（Mirza Kuchik Khan）领导开展亲苏反英运动，宣布成立吉兰苏维埃共和国（Gilan Soviet Republic）。1921年2月26日，苏联和波斯政府签订条约，波斯重新控制了吉兰，而苏联也成功地在条约中加入了对其极为有利的第五条，该条规定：一旦苏联认为在其南部边界存在威胁，苏联有权向波斯境内派驻军队。苏联正是依据这一条款，在1941年进占伊朗北部以及在其后屡次拒绝撤军。

1925年巴列维王朝（Pahlavi Dynasty）建立后，伊朗大力发展同德国和美国的关系，特别是同德国的关系。德国帮助伊朗发展经济，如建立纺织厂、改善基础设施、修建横贯伊朗全境的铁路等等。^②伊朗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宣布中立，但其亲德的立场是明显的。在伊朗境内有大量的德国人，盟国担心这些德国人是在搜集情报，为德国通过伊朗进攻苏联做准备。于是，英国和苏联在1941年7月和8月致函伊朗国王礼萨，要求他驱逐德国人，但遭到拒绝。8月25日，英国和苏联出兵，占领伊朗。9月15日，礼萨宣布逊位，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uhammad Reza-Pahlavi）继任王位。1942年1月29日，英国、苏联和伊朗签订条约，条约规定，盟国军队将有权在伊朗境内通行，使用其交通、通讯设施，其驻军不被视为占领；英国和苏联同意，两国军队将在对轴心国战争结束后的六个月内撤出伊朗。苏联和英国在1941年8月出兵占领了伊朗北部和南部，包括首都德黑兰在内的中部地区为中立区；而各自占领区的分界线，大致就是1907年英国和沙俄达成条约时的分界线。

① Kristen Blake, *The U.S.-Soviet Confrontation in Iran, 1945-1962: A Case in the Annals of the Cold War*, Lanham,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9, pp.10-13.

② Amin Banani, *The Modernization of Ira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131-137.

伊朗此时成为盟国向苏联运送租借物资的主要通道。为了保持通道的畅通，加上英军兵力有限，英国政府请求美国出兵帮助。美国顾问在 1942 年 8 月先行到达，由斯科瓦兹柯普夫（H. Norman Schwarzkopf）率领的“重组警察军事使团”（The Military Mission for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Gendarmerie）负责组建伊朗的警察，以维持农村地区的安全。紧接着粮食顾问、警察顾问、负责训练伊朗军队的使团、财政顾问团、负责发放租借物资的美国代表先后抵达。到 1942 年 12 月，约 2 万名美军抵达伊朗南部港口库拉姆沙哈尔，最多时达到 3 万人。美军接管原来由英军负责的港口和铁路业务，负责向苏联运送租借物资以及改善伊朗的交通运输系统。美国同时也加大了在伊朗的军事存在，美国在德黑兰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军营，并将波斯湾指挥部的司令部迁到德黑兰。在此期间，美国还成功地帮助伊朗政府解决了粮食短缺、通货膨胀等国内重大问题。^①

1943 年 9 月 9 日，伊朗向德国和其他轴心国宣战。雅尔塔会议期间，盟国讨论了伊朗问题。英国人提出了不同的撤军方案，如分期同时撤军，同期同比例撤军，或者分三个阶段撤军的计划，均被苏联拒绝。苏联以对日战争尚未结束为由，只同意从德黑兰撤军。在 1945 年 2 月 8 日的外长会议上，艾登强调，在战争结束之前，盟国不应在石油开采权问题上向伊朗施加压力。莫洛托夫表示：伊朗政府不转让石油开采权的决定，同先前的谈判是矛盾的，同时他表示，自己并不同意艾登关于从伊朗撤军的提议。雅尔塔会议并未解决盟国从伊朗撤军的问题，问题又被提上了波茨坦会议的议程。英国在会上建议，盟军先从德黑兰撤军，然后再撤出各自在其他地区的部队。斯大林只同意从德黑兰撤军，同时表示盟军应在对日战争结束后的 6 个月内完成撤军。波茨坦会议决定，将撤军的相关问题留待 1945 年 9 月召开的伦敦外长会议讨论。^②事实上，斯大林采取的是拖延战术，苏联当时正大力支持伊朗阿塞拜疆省的库尔德人的反叛活动。

1945 年 5 月 19 日，伊朗政府向英苏两国发出照会，并抄送美国，要求三国按照战时的协议，在对德战争结束后 6 个月内撤出驻扎在伊朗境内的军

① Blake, *The U.S.-Soviet Confrontation in Iran*, p.17.

② Ibid, pp.21-22.

队。^①9月6日，在日本投降后的第4天，伊朗再次要求6个月内外国军队撤退完毕；9月9日，伊朗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在1946年3月2日前完成撤军。贝文在9月19日的伦敦外长会议上提出了分阶段撤军的计划，建议撤军从12月15日开始，到1946年3月2日结束；但苏联坚持按1942年达成的三方协议撤军。11月24日美国照会苏联，提出同时撤军，而美国自己定于1946年1月1日撤军，并指出苏联军队不应阻拦伊朗军队进入叛乱地区。11月29日，苏联答复美国：不能让反动分子进入阿塞拜疆地区，苏军驻留期限只能根据1942年英苏伊三国条约和1921年英苏条约的规定：“苏联政府同意，一旦这种危险消除，即将其军队撤出伊朗”。盟国围绕着苏联撤军问题以及伊朗北部的民族分离主义的斗争，就演变成了1945—1946年的伊朗危机。

苏联拒不撤军，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分裂伊朗，试图将伊朗北部的阿塞拜疆地区和其他地区并入苏联。伊朗北部包括两个少数民族地区：库尔德斯坦地区和阿塞拜疆地区；伊朗境内的库尔德斯坦地区现为伊朗的库尔德省，首府是萨南达季。伊朗境内的阿塞拜疆地区现为伊朗的西阿塞拜疆省（首府雷扎耶）、东阿塞拜疆省（首府大不里士）和吉兰省（首府腊什特）。这两个地区存在着库尔德人和阿塞拜疆人的自治要求。苏军进驻伊朗北部后，开始大力支持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苏联开放苏伊边界，撤销伊朗关卡，代之以苏军哨所，阻止伊朗政府军进入这两个地区镇压民族分离主义运动。1942年5月，库尔德人的自治运动发展为武装叛乱。7月6日，斯大林指示苏联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巴加洛夫（Mir Jafar Bagirov）采取行动，把阿塞拜疆南部和伊朗北部其他省份的分离主义运动组织起来，推动吉兰省、马泽德兰（Mazenderan）、戈尔甘（Gorgan）以及呼罗珊省（Khorasan）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鼓励伊朗库尔德人要求自治。苏共中央的这一指示，要求向分离主义分子提供武器、宣传品和资金，行动由国防部长布尔加宁（Nikolai Bulganin）和巴加洛夫负责，并拨款100万卢布（约合19万美元）

^① Meeting of the Foreign Ministers, February 8, 1945, *FRU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5, pp.738-740.

作为特别经费。斯大林告诉巴加洛夫，现在是把阿塞拜疆同伊朗北部重新统一起来的时候了。^①

因此，从 1945 年 9 月到 12 月，伊朗北部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在苏联的支持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9 月，库尔德斯坦地区和阿塞拜疆地区成立了两个亲苏的政党：一个是由皮谢瓦里（Jafar Pishihvari）领导的阿塞拜疆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 of Azerbaijan），另一个是由库尔德人领袖卡齐（Qazi Muhammad）领导的库尔德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 of Kurdistan）。皮谢瓦里出生在大不里士，年轻时移居巴库，在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加入了苏联共产党。1930 年在德黑兰被捕入狱，1941 年获释。他在狱中曾参加过伊朗人民党（Tudeh Party of Iran），后因政见分歧而退出。皮谢瓦里参加 1943—1944 年的伊朗议会选举获胜，由于皮谢瓦里在议会中发表反政府言论，在 1945 年 7 月的议会选举中落败。其后他回到阿塞拜疆，于 1945 年 9 月 3 日成立阿塞拜疆民主党。该党的目标纲领是：争取阿塞拜疆自治，将阿塞拜疆语作为阿塞拜疆的官方语言，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在苏联的支持下，阿塞拜疆民主党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到 1945 年 11 月已发展到 3000 多人，拥有 1.15 万支步枪、1000 支手枪、400 挺机关枪、2000 枚手榴弹和 200 万发子弹。^②

苏联阻止伊朗政府军进入伊朗北部地区镇压叛乱，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1945 年 10 月，阿塞拜疆民主党举行了几次大规模的反对中央政府的游行示威，要求成立自治政府。在皮谢瓦里的领导下，11 月 12 日至 19 日，阿塞拜疆发生大规模暴乱，忠于阿塞拜疆民主党的军事武装控制了阿塞拜疆的广大地区。11 月 19 日，伊朗报纸和电台报道了上述消息；国王命令军队开往阿塞拜疆，但当政府军行进到距离德黑兰西北 90 英里的城市加兹温的时候，遭到苏军的阻拦。伊朗政府在 11 月 22 日和 23 日照会苏联，要求苏方解释为何阻止伊朗军队进入叛乱地区。伊朗驻华盛顿武官在 11 月 20 日前往国务院，向美国寻求对策。^③与此同时，阿塞拜疆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发给

① Fernande Scheid Raine, "Stali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zerbaijan Democratic Party in Iran, 1945", *Cold War History*, Vol.2, No.1, October 2001, pp.9-10.

② Raine, "Stali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zerbaijan Democratic Party in Iran, 1945", p.17.

③ Blake, *The U.S.-Soviet Confrontation in Iran*, p.32.

美国、英国和苏联领事馆一份声明，强调阿塞拜疆人民有权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将选派自己在伊朗议会的代表。12月10日，大不里士被反对德黑兰中央政府的叛乱势力占领，伊朗中央政府在阿塞拜疆的管理机构几乎全部瓦解。12月12日，阿塞拜疆民主党在大不里士举行了第一届阿塞拜疆国民大会（Azerbaijan National Congress），宣布成立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皮谢瓦里担任“阿塞拜疆民族政府”总理。卡齐虽然派5名代表参加阿塞拜疆民主党的第一届国民大会，但因政见不合，很快返回了马哈巴德。随后，库尔德民主党在马哈巴德和阿塞拜疆西部地区组织了暴乱。12月15日，库尔德自治运动领导人召开部落首领大会，宣布成立库尔德人民共和国，卡齐任总统。^①伊朗北部局势的发展，严重威胁着伊朗的国家统一。

苏联的第二个意图是力图控制伊朗石油的开采权。伊朗的石油开采问题很快就导致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苏联一直要求建立苏伊石油合营公司，并要求占有51%的股份。苏联在战时极为关注伊朗北部的石油开采问题，在1944年9月至10月同伊朗政府的谈判中，苏联要求完全控制伊朗北方省份的石油开采，遭到伊朗的拒绝。德黑兰当时的意图很明确，那就是利用美国来平衡英国和苏联在伊朗的势力扩展。出于此种考虑，1943年，伊朗政府开始同美国新泽西的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谈判石油开采权的问题，这立刻引起了苏联人的警觉。苏联立即派代表同伊朗政府商谈五年之内开采北部石油的问题，这一立场得到了伊朗人民党的大力支持。人民党当时已在伊朗议会获得了9个席位。面对这种情况，伊朗政府决定战争结束后再同各国谈判石油开采权的问题。^②1944年12月，伊朗颁布法令，禁止首相及其内阁同外国谈判有关石油开采权的问题。苏联把获得石油开采权同撤军和支持伊朗北部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等问题结合起来。因此，苏联驻伊朗大使在1945年5月25日给莫洛托夫报告中，列举了苏联不能撤军的理由，他指出，“苏军从伊朗撤出，肯定会导致这个国家反动势力的加强，并导致民主团体不可避免的挫败……反动势力和亲英力量将尽力并利用各

① Blake, *The U.S.-Soviet Confrontation in Iran*, p.33.

② Ibid, p.9.

种手段消除我们在伊朗的影响和工作的成果。我认为恰当的做法是，推迟我国军队撤出伊朗的日期，并保障在军队撤出之后可以实现我们的目标，这些目标首先是获得石油开采权，最坏的情况就是我们要在合营的公司中占有大部分股份”。^①

在英美看来，问题的关键是苏联撤军问题，只要苏联撤军，民族自治问题和石油合营问题都将迎刃而解。美国一直密切关注伊朗局势的发展。美国驻伊朗大使默里（Wallace Murray）不断打电报给国务院，分析苏联的政策目标以及可能对美国利益造成的威胁。默里在 1945 年 9 月 25 日给贝尔纳斯的电报中强调，“苏联的态度是问题的关键”；苏联的最终目标是进入波斯湾并渗入到中东的其他地区，但当前的目标有限，只是想在伊朗建立一个缓冲地带，以防来自南面的进攻。为实现这一目标，苏联决心要在伊朗北部拥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尽管苏联驻军暂时保证其在伊朗北部的控制地位，但苏联正在为撤军后可继续对伊朗施加影响寻求方法。默里认为，近来阿塞拜疆事态的发展表明，促进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鼓动对中央政府的不满，使之发展为分离主义运动并最终同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合并，是正在使用的策略之一。但默里指出，苏联在伊朗的首要目标是在德黑兰建立一个类似于罗马尼亚格罗查的“联合政府”。因此，“苏联控制伊朗政府将毫无疑问地危害美国的利益”。这主要体现在：将美国的航空公司排除在伊朗之外；使伊朗的贸易倒向苏联，由此危害美国的商业利益；使得美国没有可能获得伊朗的石油开采权；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局面将意味着，苏联的影响扩展到波斯湾海岸，将对美国在沙特阿拉伯、巴林和科威特所拥有的丰富的石油资源构成潜在的威胁。鉴于以上原因，默里建议：针对苏联当前行动采取积极步骤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当务之急就是让苏联人撤军，苏联拒不撤军的借口是“不能容忍的”。^②驻苏使馆临时代办凯南在 9 月 14 日向国务院报告说：苏联报刊对皮谢瓦里民主党的成立进行了不同寻常的报道。苏联政府赞同皮谢瓦里

① Natalia Yegorova, *The “Iran Crisis” of 1945-46: A View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15,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1996, p.8.

② The Ambassador in Iran (Murra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25, 1945, *FRUS*, 1945, Vol.VIII: *The Near East and Africa*,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pp.417-419.

有关在伊朗国王的统治下没有自由以及人民的生活不能得到改善的说法，同时也赞成阿塞拜疆人有权在自治问题上作出抉择。凯南相信，苏联正利用少数集团（指那些民族分离分子）和民族问题，以达到其分裂和征服世界的目的。^①

1945年11月17日、22日和23日，伊朗政府接连向苏联发出照会，抗议苏联干涉伊朗内政。苏联对此加以否认，并声称“苏联代表和苏联军事占领当局认为，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干涉伊朗北部省份的政治事务”。哈里曼在11月23日向莫洛托夫递交了美国政府的一份信函，其中提到伊朗政府向美方通报了北部地区的局势以及苏联的干预行为，提请苏联遵守《德黑兰宣言》，并宣布美军将从1946年1月1日起从伊朗撤军，建议英国和苏联也同时撤军。苏联在同一天对此照会的答复是，有关伊朗北部叛乱的消息是不准确的，阿塞拜疆民主党的声明证实阿塞拜疆人的目的是希望“实现阿塞拜疆人民的权利，在伊朗国内实现民族自治”；在目前的形势下，苏联军事占领当局认为，在这一地区进驻更多的伊朗军队，只能招致更大的危险，这也是苏联拒绝伊朗军队进入的原因。至于撤军问题，苏联认为伦敦外长会议已讨论过此事，无须再继续探讨；苏联政府将遵守《德黑兰宣言》的原则，但目前苏军不能在1946年1月1日开始从伊朗撤军，完全拒绝了美国的建议。^②苏联还把自己从伊朗撤军同英美从希腊和中国撤军联系起来。莫洛托夫在1945年12月13日说，“如果美国人和英国人不接受我们将有关英美军队从中国和希腊撤军的问题包括在日程之中的建议，我们就把从伊朗撤出盟国军队的问题从三国外长会议的议程中删掉；一旦讨论从伊朗撤出盟国军队的问题，我们将根据贝文和贝尔纳斯在英美军队撤出中国和希腊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或是在涉及苏军撤出伊朗的问题上承担新的责任，或是做出具体让步，同意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伊朗撤出苏军”。

① The Charge in the Soviet Union (Kenn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14, 1945, *FRUS*, 1945, Vol.VIII, p.407.

②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Harriman), November 23, 1945, *FRUS*, 1945, Vol.VIII, pp.448-450; Blake, *The U.S.-Soviet Confrontation in Iran*, pp.32-33.

伊朗政府对局势的发展无能为力，只好寄希望于 1945 年 12 月 16 日到 25 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贝尔纳斯拒绝把美国从中国撤军同苏联从伊朗撤军联系起来，贝文则直截了当地问莫洛托夫：“你们不同意把 3 月 2 日作为撤军的日期吗？”莫洛托夫作了肯定的回答，理由是那里的天气情况不适合撤军。同时莫洛托夫还辩称“伊朗人不在这里，没有伊朗人在，我们就不能作出任何决定”。贝尔纳斯在会议期间同斯大林进行了两次会谈，希望解决伊朗问题。12 月 19 日，贝尔纳斯同斯大林讨论阿塞拜疆地区的局势。贝尔纳斯提请斯大林注意：盟国曾许诺要尊重伊朗的主权，并警告说，伊朗政府将准备向联合国安理会控告苏联的行为。斯大林表示，苏联也极为关注事态的发展，因为伊朗人会越过边界涌入苏联的阿塞拜疆共和国，破坏巴库的油田，巴库容易遭到敌对行动的攻击，而伊朗对苏联怀有敌意。因此，苏联有权在伊朗保有驻军。斯大林坚持，苏军并没有干涉伊朗内政，因为 1921 年的俄国同波斯的条约赋予苏联这样做的权利，而且何时从伊朗撤军，则是由苏联自己来决定。斯大林还说，由于他的行动是正当合理的，所以他不担心安理会将要采取的行动，“如果这件事真的来了，没有人会为此感到脸红”。^①在苏联的坚持下，莫斯科外长会议公报没有提及伊朗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美国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逐步在外交上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开始支持伊朗将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1945 年 12 月 20 日，伊朗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议案，控告苏联干涉伊朗内政，并同时通报了美国、苏联和英国三国政府。随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提议：三大国成立一个委员会前往伊朗，实地调查阿塞拜疆地区的局势。这一建议得到了美国和苏联的同意。伊朗议会在讨论上述建议时认为，委员会的活动将会导致更多的外国势力干涉伊朗，因此拒绝了贝文的建议。1946 年 1 月 19 日，伊朗再次向安理会提交议案，希望采取措施解决危机。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拒绝了伊朗政府的指控，他强调：根据 1921 年和 1942 年的条约，

^① Raine, “Stali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zerbaijan Democratic Party in Iran, 1945”, p.27.

苏联有权在伊朗驻军，苏军并没有干涉伊朗内政，这些都是伊朗政府宣传的结果。安理会建议苏联和伊朗进行谈判，并向安理会通报谈判的结果。^①

与此同时，伊朗政府处理阿塞拜疆危机的政策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在盖瓦姆（Ahmad Qavam-el-Sultaneh）继任首相之后。盖瓦姆认为，解决阿塞拜疆危机最好的途径就是达成与苏联的谅解，同苏联进行面对面的谈判。他上台之后就解除了主张镇压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总参谋长哈桑（Hasan Arfa）和其他主张对苏强硬的政府官员的职务。然后盖瓦姆同斯大林直接联系，要求访问莫斯科以商讨解决危机的方法，这一建议得到了苏联的同意，盖瓦姆在 1946 年 2 月 19 日飞赴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了为期 3 个星期的谈判。在同斯大林的会谈中，盖瓦姆要求苏军从伊朗北部撤军；斯大林虽坚持根据条约苏联有权驻军，但也暗示，苏联对伊朗的石油开采以及建立苏伊石油联营公司很感兴趣。针对盖瓦姆有关伊朗议会禁止在外国军队驻扎伊朗的情况下讨论石油开采权的说法，斯大林表示，盖瓦姆可以修改伊朗宪法，解散议会进行统治。斯大林还强调，苏联军队可“保障”盖瓦姆的统治。盖瓦姆并没有接受斯大林的这个许诺，但他保证，在伊朗议会选举之后，他将为苏联争取到石油开采权。^②

盟国撤军的最后时限是 1946 年的 3 月 2 日。美军已在 1946 年 1 月 1 日如期撤军，英国也在 3 月 2 日撤军完毕，苏联再不撤军就没有更充分的借口了。苏联政府此时则宣布，苏联从 3 月 2 日起，只能从伊朗“局势相对稳定的地区”撤出部分军队。3 月 3 日，盖瓦姆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伊朗驻美大使埃拉（Hussein Ala）也及时向美国通报了局势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驻大不里士的副领事罗索（Robert Rossow）向国务院报告说：苏军正在向伊朗和土耳其边界开进，还向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以便控制黑海海峡。3 月 6 日，美国国务院照会苏联外交部，要求它遵守三方条约，从伊朗撤军。在

① Blake, *The U.S.-Soviet Confrontation in Iran*, p.34.

② Zubok, *The Failed Empire*, p.44.

接到罗索有关苏军在伊朗北部频繁调动兵力的电报后，国务院在3月8日再次照会苏联，要求苏联做出解释。苏联未予理睬。^①

面对苏联的强大压力，伊朗只好求助于美国，盖瓦姆在1946年3月多次会见默里，寻求美国的支持。3月15日，盖瓦姆的一位助手拜会默里时通报说：苏联代办在会见盖瓦姆时警告伊朗不要再将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否则将对伊朗产生严重的后果。默里在向国务院请示后告诉伊朗方面：盖瓦姆应继续向联合国提出申诉，美国也将继续支持伊朗。3月18日，伊朗驻美大使埃拉再次将伊朗问题提交联合国，要求安理会在3月25日的会议上加以讨论。与此同时，苏联也向伊朗施加压力，希望尽早达成一项协议。3月24日，苏联新任驻伊朗大使萨德契科夫（Ivan Sadchikov）向盖瓦姆递交了苏联政府的三份照会。第一份照会表示，苏军将在六周内从伊朗撤军；第二份照会建议成立一个将由苏联控股的苏伊石油公司；第三份照会则是强调莫斯科愿意提供帮助，以通过谈判解决德黑兰同皮谢瓦里之间的危机。^②盖瓦姆接受了苏联前两份照会的建议，拒绝了第三个照会；因为德黑兰坚持认为，阿塞拜疆危机是伊朗的内政，必须由伊朗政府自己解决。^③

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在1946年3月26日再次讨论伊朗问题。会前，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和贝尔纳斯都作了公开声明。葛罗米柯说，由于苏联已同伊朗就苏联撤军问题达成了一项协议，因此安理会没有必要讨论埃拉3月18日的请求。而贝尔纳斯则表示，他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协议，安理会议程应包括伊朗问题。葛罗米柯和贝尔纳斯在同一天共进午餐时进行了会谈，葛罗米柯建议将关于伊朗问题的讨论推迟到4月10日，不要纳入今天的讨论，否则他的政府将不参加有关这一问题的任何讨论。^④苏联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美国代表斯退丁纽斯（Edward Stettinius）在安理会发言时指出：

① The Vice Consul at Tabriz (Rossow)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ch 5, 1946, *FRUS*, 1946, Vol.VII, pp.340-342; 美国1946年3月8日的照会，参见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harge in the Soviet Union (Kennan), March 8, 1946, *FRUS*, 1946, Vol.VII, p.348.

② 苏联1946年3月24日致伊朗政府的三份照会，参见 The Ambassador in Iran (Murra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ch 25, 1946, *FRUS*, 1946, Vol.VII, pp.379-380.

③ Blake, *The U.S.-Soviet Confrontation in Iran*, p.34.

④ Statement by the Soviet Representative at the United Nations (Gromyko), March 26, 1946, *FRUS*, 1946, Vol.VII, pp.381-382; Statement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ch 26, 1946, *FRUS*, 1946, Vol.VII, pp.382-383.

他会将伊朗的请求放在安理会讨论的首要议程上，并期望可以得到苏伊双方会谈的结果。葛罗米柯在发言中强调，苏联已明确说明自己将不参加安理会讨论伊朗问题的理由，并宣布苏联今后将不参加有关伊朗控告苏联的任何辩论。随后，葛罗米柯及其三名助手退出会场，以示抗议。^①在联合国内解决伊朗问题由此陷入了僵局。

苏联和伊朗此时也重新开始了有关苏联撤军的谈判。1946年4月4日，双方达成协议：苏联答应在半个月內完成撤军；关于建立联合石油公司的协议，自3月24日起7个月內由伊朗议会批准生效。盖瓦姆在这一天向默里大使通报说：德黑兰已同莫斯科就以下三点达成了协议：苏军到1946年5月6日将从伊朗撤军；成立苏伊石油公司的建议将提交伊朗议会审议；阿塞拜疆危机是伊朗的内政，将由伊朗政府解决。盖瓦姆在同一天还照会苏联大使，同意调整同阿塞拜疆地区的关系，承诺用波斯文和阿塞拜疆文两种文字处理政府公文，给伊朗阿塞拜疆地区的工会和民主组织进行活动的自由，增加阿塞拜疆地区在伊朗议会中的席位等等。4月6日，葛罗米柯致函安理会，要求从议程中剔除伊朗问题，贝尔纳斯表示异议。此时，盖瓦姆和埃拉之间出现了矛盾。盖瓦姆希望同莫斯科和解，而埃拉则主张继续让安理会处理伊朗危机。5月20日，埃拉致函安理会说：伊朗政府不能证实苏军已全部撤出伊朗。而在第二天，盖瓦姆则让埃拉通知安理会，苏军已从阿塞拜疆撤军。埃拉和斯退汀纽斯都拒绝接受盖瓦姆的说法。斯退汀纽斯指出，尽管看起来伊朗和苏联已达成协定，但安理会没有确切的证据显示，苏军已从伊朗北部全部撤出。斯退汀纽斯在向国务院的汇报中说，他准备在5月22日的安理会上发表声明，要求在5月27日的安理会上继续讨论苏联从伊朗撤军的问题。这一建议得到国务院的同意。^②盖瓦姆在5月28日告诉默里，由于苏联的压力，伊朗打算撤回控告。默里建议德黑兰不要这样做，也不要向埃拉施加压力，因为这只会进一步削弱伊朗。安理会在同一天也宣布，希望得到德

①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March 27, 1946, *FRUS*, 1946, Vol.VII, pp.388-389.

② The Ambassador in Iran (Alle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21, 1946, *FRUS*, 1946, Vol.VII, p.469; The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ve at the United Nations (Stettiniu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21, 1946, *FRUS*, 1946, Vol.VII, pp.470-471.

黑兰方面有关苏联全部撤军的正式报告，并把6月4日定为提交报告的最后期限。但安理会的建议并未得到伊朗的回应，安理会此后再未就伊朗问题举行过会议。因为它后来得知苏军在1946年5月底从伊朗北部撤出了军队。^①

按照塔斯社1946年5月23日的声明，苏联已在5月9日撤军完毕，但苏联的撤军并不意味着伊朗危机的最终结束。盖瓦姆试图通过与皮谢瓦里的谈判来结束阿塞拜疆的政治危机。6月13日，伊朗政府同皮谢瓦里达成一项特殊的协议：德黑兰承认阿塞拜疆国民大会是省议会，省议会可以提名候选人竞选阿塞拜疆省的省长。伊朗政府将从名单中挑选省长。另外，阿塞拜疆税收的75%将留归该省支配。盖瓦姆随后宣布成立由自己领导的伊朗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 of Iran），其目的在于削弱皮谢瓦里，并阻止共产主义的影响在伊朗的扩展。^②盖瓦姆同时还改组了内阁，任命3名伊朗人民党成员为部长。但盖瓦姆当时最为关心的还是如何平定北部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他特别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盖瓦姆在8月13日同美国大使艾伦（George Allen）的会谈中，表达了对伊朗人民党的部长以及对阿塞拜疆政局毫无进展的不满，表示想使用武力重新将阿塞拜疆置于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因此盖瓦姆想知道，一旦苏联卷入，德黑兰能否指望得到美国的帮助。艾伦建议盖瓦姆不要使用武力，而是要继续同皮谢瓦里进行谈判。通过与盖瓦姆的一系列会谈，艾伦认为，盖瓦姆希望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也支持美国获取在伊朗南部的石油开采权。^③9月30日，盖瓦姆对艾伦表示，他的政府所采取的对阿塞拜疆地区和解的政策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他计划彻底改变政策，强调伊朗领土的完整，希望美国向伊朗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使伊朗可以维护主权和独立。^④当时美国军方和国务院都认为需要援助伊朗，副国务卿艾奇逊还主张制订一个协调一致的经济援助计划。参谋长联席会议10月12日的备忘录表示：美国在伊朗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利益，苏联控制伊朗危及美国及其盟国获取中东的石油，将会对美国的利益和军事能力造成不利的影响。

① Blake, *The U.S.-Soviet Confrontation in Iran*, p.38.

② Ibid, p.41.

③ The Ambassador in Iran (Alle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13, 1946, *FRUS*, 1946, Vol.VII, pp.511-512.

④ Ibid, pp.518-520.

同时伊朗是阻止苏联向中东扩张的缓冲区，也是为数不多的反击苏联的最为有利的地区之一。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强调，为防止伊朗国内动乱而招致苏联的干涉，从而危及美国在波斯湾的利益，美国应向伊朗提供“非侵略性的”军事装备。^①10月18日，美国国务院答复盖瓦姆：美国将大力援助伊朗。

与此同时，苏联继续向伊朗施加压力，要求伊朗举行新的议会选举，以便尽快批准苏伊石油协定。另外，苏联还要求成立一家苏伊航空公司，专营伊朗北部的航运。斯大林1946年4月初在同美国大使史密斯会谈时表示，盖瓦姆的前任对苏联非常不友好，所以就施加压力把他撤掉了；他对伊朗将问题提交到联合国非常不满，抱怨苏伊有关石油开采权问题的谈判进展缓慢。^②苏联驻伊朗使馆的人员曾直接询问伊朗人民党的一位部长：为什么伊朗政府推迟批准协议？^③艾伦同伊朗国王讨论这些情况时明确指出，盖瓦姆的内阁必须改组，否则会影响伊朗的政治稳定；艾伦建议国王命令盖瓦姆，要么清除内阁中的伊朗人民党部长，要么盖瓦姆自己辞职。国王给盖瓦姆两个选择。盖瓦姆解除了伊朗人民党的部长职务，组成了新的内阁。^④艾伦大使在接受伊朗报纸采访时明确表示，伊朗的决定是正确的，美国支持伊朗维护主权的行为。

1946年10月27日，盖瓦姆宣布伊朗将举行议会选举，时间待定。10月28日，贝尔纳斯决定向伊朗出售不超过10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并考虑为伊朗购买这批装备提供贷款。受此消息的鼓舞，盖瓦姆宣布议会选举将在1946年12月7日举行；盖瓦姆同时还宣布，为了在选举期间维持秩序，政府届时将向各省派驻军队。苏联驻德黑兰使馆立即询问盖瓦姆和伊朗国王：伊朗政府此举是否意味着要重新控制阿塞拜疆；苏联得到的答复是：这是为

① Memorandum by the 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 to Major General John H. Hillding, October 1, 1946, *FRUS*, 1946, Vol.VII, pp.529-532.

② 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 (Smit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pril 5, 1946, *FRUS*, 1946, Vol.VI: *Eastern Europe; The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pp.733-734.

③ Bruce Kuniholm,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 Great Power Conflict and Diplomacy in Iran, Turkey, and Gree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387.

④ Blake, *The U.S.-Soviet Confrontation in Iran*, p.41; Kuniholm,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 pp.388-391.

了维持选举时的秩序。莫斯科向盖瓦姆发出警告：德黑兰派遣军队到阿塞拜疆将被视为对苏联安全的威胁。盖瓦姆向艾伦通报该情报时，艾伦表示，派驻军队应按原计划进行，一旦苏联进行干预，伊朗可将问题再次提交安理会。1946 年 12 月 11 日，伊朗军队进驻大不里士，控制了整个阿塞拜疆。皮谢瓦里越过边界逃亡苏联，获得了苏联政府的庇护，而卡齐则在 1947 年 3 月 30 日被伊朗政府在马哈巴德市中心广场上公开处以绞刑。^①

伊朗的议会选举并没有如期在 1946 年 12 月 6 日举行，因为德黑兰旨在重新控制阿塞拜疆的目标业已实现。苏联没有立即对伊朗军队进驻阿塞拜疆做出反应，是因为它在等待伊朗议会批准苏伊石油协定。因此，苏联在整个 12 月都在向德黑兰施加压力，要求它尽快举行议会选举。第 15 届伊朗议会的选举虽在 1947 年 1 月 12 日举行，但并未立即召开会议，其理由是需要对代表的资格进行审查。10 月，新选举的伊朗国会否决了苏伊石油协定。

伊朗政府重新控制阿塞拜疆使得美国决策者认为，帮助伊朗进行全面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时机已经到来。德黑兰在 1946 年 12 月 17 日采取了重大步骤，同美国的“莫里森—克努德森国际工程公司”（Morrison-Knudsen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mpany）签订了一项合同，后者帮助伊朗政府研究伊朗的基础设施情况，准备有关伊朗的农业、水力、工业以及交通运输等方面情况的报告，以便向进出口银行和世界银行申请用于经济发展项目的贷款。^②

这一时期爆发的希腊内战，被美英决策者视为苏联实现其传统南下政策的第三个重大行动。

德军 1941 年夏占领希腊后，希腊共产党联合左翼政党建立了“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并组成了“全国人民解放军”（National Popular Liberation Army）。到 1944 年德军被迫撤出希腊时，民族解放阵线拥有 70 万成员，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兵力超过 5 万人，控制了希腊大部分地区。1944 年 9 月，在英国的召集下，流亡政府首相帕潘德里欧（M. Papandreou）、国内右翼武装力量和全国人民解放军达成协议，规定人民解

① Blake, *The U.S.-Soviet Confrontation in Iran*, pp.42-43.

② Ibid, p.43.

放军必须服从民族团结政府和英军司令斯科比（Ronald Scobie）的指挥。德军在 1944 年 10 月撤出希腊后，英国伞兵立即占领雅典，随后大批驻扎意大利的英军前来增援。11 月底，帕潘德里欧以民族团结政府中的民族解放阵线成员拒绝单方面削减全国人民解放军为由，宣布取缔全国人民解放军。12 月 1 日，斯科比下令全国人民解放军在 12 月 10 日前解散完毕。次日，民族解放阵线参加政府的 5 名部长辞职。随后，效忠于希腊王室的抵抗运动中的保守派力量同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在 1944 年底至 1945 年初，英国军队的介入使得两派力量在 1945 年 2 月达成了停火协议，并同意在盟国的监督下就保留王室以及全国选举等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希腊共产党和民族解放阵线决定走议会道路，全国人民解放军同意解散。

希腊共产党在 1946 年 2 月召开中央全会，批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决定立即组织新的武装斗争，“反对保皇法西斯暴政”。3 月 30 日，希共游击队向希腊政府军发动进攻，希腊内战爆发。10 月，希腊共产党领导下的希腊民主军成立，由前全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人之一的马科斯（Vafiades Markos）担任总司令。民主军的兵力到 1947 年春季时已达到 13000 人，并控制了希腊北部的大片山区和农村。希腊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得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以及阿尔巴尼亚的支持。1946 年 9 月，希腊举行公民投票，69% 的投票人支持保留王室；9 月 26 日，希腊国王乔治二世从伦敦返回雅典。

面对希腊全面内战的形势，英国在战后已无力继续维持其在希腊的传统地位。与此同时，由于苏联的否决，联合国安理会没有就介入希腊内战以恢复秩序达成协议。希腊政府在 1946 年多次向美国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设备。美国一直关注着希腊事态的发展。1946 年 8 月 23 日，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在内美国舰队访问雅典；9 月 30 日，福雷斯特宣布，美国海军将无限期地驻扎在地中海地区。与此同时，美国还向希腊政府提供了 3500 万美元的贷款。但当时美国的基本态度是，“不对希腊的内政采取积极的态度，因为希腊被视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①但由于希腊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国除了向它提供必要的援助之外别无选择。

① Deborah Larson, *Belief and Inference: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Leaders' Cold War Ideology*,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83, p.579.

1946 年 10 月 15 日，艾奇逊告诉美国驻希腊大使麦克弗（Lincoln MacVeagh），希腊日益恶化的国内局势和北部边界的紧张局势，已迫使国务院和陆军部不得不重新评估美国的政策。希腊的重大危机“可能成为构成中近东未来事态发展的决定因素”。美国准备采取适当的措施支持希腊的领土和政治完整，这些措施包括：通过外交、宣传等手段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支持希腊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政策；向希腊政府建议，应采取调和的政策处理国内政治问题；向希腊政府表明，依据“公平、和平及稳定”的原则，希腊北部边界应是 1939 年的边界线；当事态发展需要时，美国将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积极支持希腊；将充分考虑向希腊出售军火，用以维持国内秩序及领土完整；建议进出口银行向希腊提供经济援助；美国考虑向希腊派遣经济顾问团，等等。^①美国在 12 月宣布，任命波特（Paul Porter）为驻希腊经济使团团长。12 月 3 日，希腊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调查希腊同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三国交界的北部地区的游击队的情况，控告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对希腊游击队的支持。联合国随后组成联合国希腊边界调查委员会。埃斯里奇是美国方面的成员，他同麦克弗、波特不断向国内报告希腊的局势进展。12 月 18 日，贝尔纳斯在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的会议上表示，希腊是美国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我们要尽一切所能援助希腊”。12 月 19 日，贝尔纳斯打电报给伦敦，表示他想尽快知道英国能够满足希腊军事装备的程度，以便美国在局势变得“太晚”之前承担起责任，提供必要的装备。埃斯里奇在 1947 年 2 月 18 日警告说，游击队控制的地区在不断增加，“苏联感到希腊是一个熟透了的洋李，将会在几个星期之内落入他们的手中”。^②2 月 20 日，艾奇逊修改了由近东和非洲司司长亨德森（Loy Henderson）呈送的有关希腊局势的备忘录，准备把它递交国会，要求向希腊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备忘录强调，“如果不立即向希腊提供紧急援助，希腊政府有可能被推翻，极左派的专制政权就会掌权”。新上任的国务卿马歇尔在第二天去普林斯顿大学之前批准了这一建议，指示艾奇逊进行必要的准备。

①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Greece (MacVeagh), October 15, 1945, *FRUS*, 1946, Vol. VII, pp. 235-237.

② Mr. Mark F. Ethridg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18, 1947, *FRUS*, Vol. V: *The Near East and Africa*,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1, pp. 820-821.

1947年2月21日，英国外交部通知美国国务院，英国准备在3月31日停止对希腊和土耳其的一切经济援助，并从希腊撤出4万名士兵，英国希望美国可以接替英国。这样，由于英国的撤出，就在欧亚大陆南部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力量真空，这同德国战败后在东欧形成的真空一样重要。美国决定接受这个挑战，正如艾奇逊所言，“现在只剩下两个强国了，英国人完了”；“英国人正从各地撤出，如果我们不进去的话，俄国人就会这样做”。其结果是——“杜鲁门主义”的产生。

盟国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苏联的政策和德国的分裂

战后初期，影响盟国对德政策最为重要的因素是经济上的考虑。但战后三年之内的一系列重大的事态，破坏了波茨坦会议有关最终成立一个统一的德国政府的计划，这些事态同苏联从德国东部大量拆迁以获取赔偿有直接的关系。对苏联来说，从德国获取赔偿可以加快其战后的经济复兴；因此，苏联同西方国家在德国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首先是有关德国的战争赔偿问题。英国在1945年警告说，苏联目前的赔偿要求将推迟欧洲的经济复兴。^① 迈斯基在1943年11月10日向莫洛托夫提交了题为《工作计划的基本纲要》的备忘录，对战后赔偿问题提出了大致的构想。苏联赔偿政策的基本目标是：“获取德国及其盟国的一切可以获取的东西”，设备、物资以及服务行业的最大数额为750亿美元，其中80%从德国获取；在与盟国的谈判中，苏联必须坚持获取全部赔偿的50%—80%。170亿来自德国的国民财富，60亿从当年产品中获取，350亿—400亿来自使用德国的劳动力和专家，按一个德国劳动力年平均“产值”为750美元计算，期限为10年，这些劳动力包括具有“最高技能”的德国人。迈斯基有关德国赔偿的计划，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会导致在德国发生“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为前提的，“如果发生这样的革命，整个计划也就不能付诸实施了”。^② 因此，苏联在同西方盟国的谈

① C. J. Bartlett, *The Global Conflict: The International Rivalry of the Great Powers, 1880-1990*, London: Longman, 1994, pp.256-257.

② Alesei M. Filitov, “Problems of Post-War Construction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Conceptions during World War II”, pp.6-7, 17-18.

判中，坚持应获得 100 亿美元（最少是 80 亿）的赔偿，其中的 20 亿应来自鲁尔地区，西占区内所拆迁的 15% 的工业设备应该运往苏联，来换取粮食和其他原材料，10% 的拆迁作为给苏联的赔偿。但这些百分比的全部数额必须待德国工业水平确立后才能决定。这样的赔偿要求首先遭到英国的反对，以致斯大林在雅尔塔说，“丘吉尔同情德国人”。

对于德国的未来，斯大林在 1946 年曾经表示，“所有的德国人都必须是我们的，也就是苏维埃的、共产党的”。^①从 1944 年到 1946 年，有关德国“苏维埃化”的问题在苏联决策者内部引起激烈的争论。作为苏共政治局常委的马林科夫持有悲观的态度。在 1944 年，苏共政治局即便是对在西占区的苏占区成功地实施苏维埃化的可能性都没有把握，这也就解释了苏联在苏占区迅速进行大规模拆迁的原因。“如果我们不能把它们运出来，那最好就把它销毁掉，这样德国人就不能拥有它们了”。苏联占领当局把德国的机械、发电厂、火车车辆、其他运输工具以及煤等原料大量运往苏联。到 1947 年 3 月，苏联拆除了苏占区内 11800 公里的铁轨和 30% 的工业生产能力。同时，苏联还停止以苏占区的粮食换取西占区的工业设备。这些单方面的行动招致美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和批评，因为美国相信德国的经济复兴是整个欧洲经济复兴的关键。美国希望苏联把赔偿问题视为德国经济问题的一部分，但没有收到任何成效。另外，由于战后德国领土的变迁，大约 600 万居住在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的德国人迁往德国，带来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与此同时，苏联在苏占区进行经济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进一步削弱了盟国把德国作为一个经济整体的政策。到 1945 年秋，苏联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主张延长占领时间，在经济上对苏占区加以利用。1946 年 2 月，斯大林同德国统一社会党（Socialist Unity Party of Germany）领导人乌布里希（Walter Ulbricht）、皮特（Wilhelm Pieck）会谈时表示，德国可以探索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希望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建立为“西占区树立一个良好的先例”。

① Vladimir O. Pechatnov and C. Earl Edmondson, “The Russian Perspective,” in Ralph B. Levering, Vladimir O. Pechatnov, Verena Botzenhart-Viehe, and C. Earl Edmondson, eds., *Debating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merican and Russian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p.109.

而此时英国、美国对德国的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贝文在 1946 年 3 月时还坚持鲁尔地区应在一个由苏联参加的国际公司之下进行管制。但到了 5 月份，贝文认为，苏联的危险是巨大的，甚至比一个复苏了的德国的危险还要大，而最为糟糕局面就是一个复苏的德国同苏联站在一起或者由苏联所控制。因此，英国有必要考虑是否继续推行统一德国的政策，还是主张一个或若干个“对我们的影响更为负责的”西部德国。贝文强调，这一行动路线将“意味着同俄国人无可挽回的决裂，他们肯定会全力破坏我们在西部德国的政策，并动员德国人反对我们”，贝文所担心的是美国将会如何反应，因为“美国人可能还不准备这样做……即便是他们同意这样做，无论如何也不能指望得到他们持续的支持。但美国的全力支持则是至关重要的”。贝文主张，必须采取的行动是：把波茨坦会议有关德国的经济原则施用于西占区，哪怕是苏联拒绝进行合作；加强西占区之间的团结，全力获得美国的支持。如果决定放弃统一德国的政策，“最为重要的是要保证破裂的责任完全在俄国人那里”。^①

而美国一开始是把法国作为解决德国问题的主要障碍。但从 1946 年开始，美国逐步认识到，真正阻碍德国问题解决的是苏联，而不是法国，因为到这个时候，美国把法国的立场和苏联的意图联系起来了。美国驻德军政府政治顾问墨菲（Robert Murphy）在 1946 年 2 月 24 日打电报给贝尔纳斯，提请国务院决策者注意，苏联可能利用实现波茨坦协定上的耽搁，来巩固苏联在德国东部的地位，然后在苏联的支持下，苏占区要求一个统一的德国，法国坚持的立场只能使苏联获得好处。墨菲要求华盛顿向巴黎施加压力。^②国务院将墨菲的电报转给凯南，请他发表意见。凯南在 3 月 6 日给贝尔纳斯的回电中，强调德国问题的根源在于奥得—尼斯河边界线的形成而引起的经济混乱。既然美英在波茨坦同意这样的肢解，那么，一个“能和西欧生活方式积极配合的”统一的和拥有主权的德国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

① J. P. D. Dunbabin, *The Cold War: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ir Allies*, London: Longman House, 1994, pp.85-86.

②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al Adviser for Germany (Murph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24, 1946, *FRUS*, 1946, Vol.V: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We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pp.505-507.

凯南认为只有两种选择：让剩余的德国名义上统一，但其各方面都极易受到苏联的渗透和影响；或者，将已在东部开始的分裂进程贯彻到它的逻辑结局，依靠隔绝东部的渗透，依靠同国际化的西欧合为一体，而不是靠并入统一的德国，来抢救德国的西部占领区。两者相比较，凯南主张，宁愿要一个与西欧联合的西部德国，也不主张一个前途未卜的统一的德国。^①凯南进而强调，德国问题在波茨坦协定的框架内，不可能有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只要奥德—尼斯河边界线存在，它就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因此，美国不应受波茨坦协定的约束，为此当然要找出“许多正当的理由”。^②根据对德政策的新的战略考虑，美国采取了两个重大的步骤：停止美占区的拆迁赔偿和建立美英双占区。

为解决德国的经济问题，1946年3月，盟国管制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德国工业发展水平的计划，使德国的工业水平达到1936年的70%到75%之间。为此美国驻德军事长官克莱（Lucius Clay）要求合并四个占领区的进出口活动，遭到苏联方面的反对。4月8日，克莱向盟国管制委员会提出报告说，“工业水平是以进出口平衡计划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计划，赔偿计划就没有效果了”。克莱认为，苏联的目的就在于，不时地运走德国当年产品，直到满足100亿美元赔偿为止。实际上，克莱4月8日的报告是一个信号，意在警告苏联，如果它不同意统一的进出口计划，就拿不到100亿美元的赔偿。而4月到7月举行的巴黎外长会议，不仅是大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而且对德国问题的影响也是如此。会议期间和会议结束后，德国分裂的进程明显加快了。此次外长会议不但没有在五国和约（对意大利、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问题上达成协议，而且在德国问题上也陷入了僵局。贝尔纳斯在4月29日正式提出美苏英法四国条约草案，保证德国在正式缔结和约及结束占领后25年（甚至可延长至50年）内，解除武装和废除军备；如发现德国违反条约的规定，四国的多数就做出决定，以武力进行干涉。在

① The Charge in the Soviet Union (Kenn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ch 6, 1946, *FRUS*, 1946, Vol.V, pp.516-520.

② Memorandum by Mr. George F. Kennan to Mr. Carmel Offie, May 10, 1946, *FRUS*, 1946, Vol.V, pp.555-556.

讨论中，英法表示可接受这个草案，苏联最初表示同意，但在会议后期又提出一些重大问题，要求修改这个草案。

外长会议期间，由于对四国条约草案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贝尔纳斯在克莱 1946 年 5 月份到巴黎向他汇报工作时，对克莱有关暂停交付赔偿的建议表示支持。克莱建议停止拆迁的目的，在于使美占区的当年产品用于支付美占区的进口费，而不是用于赔偿，以此来减少美国纳税人的负担，实现美国陆军部曾经向国会许下的诺言，平衡美占区的进出口。5 月 3 日，克莱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公开宣布，为保护美占区的经济，除了 24 个列为先前赔偿的工厂外，所有美占区的赔偿支付都将停止。^①克莱声称，这是美国同苏联在对德政策上的第一次破裂，是美国采取的第一个公开的对抗行动。贝尔纳斯在巴黎外长会议上表示，如果不把德国视为一个经济整体，美国将不会再把工厂送给苏占区。

与此同时，美英为解决占领区的经济问题，积极磋商将美英占领区进行合并。贝尔纳斯在巴黎外长会议 1946 年 7 月 11 日的会议上公开表示，目前没有一个占领区完全能够做到自我维持，美国和英国已就双方占领区合并一事进行商谈。他强调，美占区愿意在经济事务方面同任何一国的占领区进行合并，如果其他占领区也愿意的话。贝尔纳斯指示克莱开始进行美英占领区合并的准备工作。7 月 10 日，莫洛托夫发表《关于德国命运与对德和约问题的声明》，强调苏联的目标并不是要消灭德国，而是要把它改造成为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国家；德国除农业外，还应拥有工业和外贸；同时德国应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执行对盟国的种种义务。这是苏联第一次提出复兴德国的主张。对此，克莱 7 月 19 日在给陆军部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出美国有必要确定对德政策的主要目标。克莱强调，应把德国视为一个经济体，美国不支持可能给德国经济带来进一步负担的其他形式的赔偿，因此反对当前产品（Current Production）赔偿，除非这些当前产品都属于超量的当前产品，而这些超量产品不再需要用来保持盟国一致同意的最低生活水平，以及这些超量的当前产品不再需要用来支付必要的进口物资。克莱指出，由于目前德国

^①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al Adviser for Germany (Murph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6, 1946, *FRUS*, 1946, Vol.V, pp.547-548.

的现状阻碍了工业水平计划的实现，因此只有消除当前占领区之间的界限，在德国全境范围内允许商品、人员的自由流动，这样才能实现最低程度的德国经济的重建。克莱还在财政政策、德国的政治结构、边界以及占领期限等方面提出建议。^①

克莱的建议引起美国决策者内部的意见分歧。国务院认为克莱的建议已超出军政府的职权范围，但此时国务院正在考虑新的对德政策，以便回应莫洛托夫 7 月 10 日的声明。贝尔纳斯向克莱承诺，他大概将在 9 月中旬发表一项有关对德政策的声明。同时贝尔纳斯对国务院的指示指出，克莱 7 月 19 日的建议基本符合美国对德政策的趋向。贝尔纳斯于 9 月 6 日来到斯图加特，会见美占区三个州的州总理以及不来梅的市市长，并在斯图加特的歌剧院发表演讲。贝尔纳斯的演说内容是事先同杜鲁门、国会领袖以及军事和外交顾问商量过的。贝尔纳斯指出，必须提高德国的工业水平，使德国的经济自给自足。德国是欧洲的一部分，如果德国虽然有丰富的煤铁，但却成为一个救济院，欧洲的恢复势必缓慢。贝尔纳斯阐述美国对成立统一的德国政府的观点，他强调说，波茨坦协定明确规定盟国要在德国建立民主制度，但这并非表明将不会有一个中央政府；波茨坦协定的目的，是“防止建立一个旨在控制德国人民、而不对德国人民的民主意愿负责的强大的中央政府”。最后，他表明了美国对德政策的方向。贝尔纳斯指出，美国人民想要将德国政府交还给德国人民，美国人民想要帮助德国人民努力回到自由和爱好和平的世界民族之林，占有一个光荣的地位。不仅如此，贝尔纳斯更加明确地强调：“我们不能让德国成为任何强国的卫星国。因此，只要德国有占领军，美国的武装部队就是占领军的一部分”。克莱认为，这是美国高级官员第一次明确表示美国要保持自己在欧洲的地位的坚定意愿，不会将德国放弃给苏联。^②

① Jean Smith, ed., *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 Clay: Germany, 1945-1949*,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236-243.

② John Gimbel, "Governing the American Zone of Germany," in Robert Wolfe, ed., *Americans as Proconsuls: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in Germany and Japan, 1944-1952*,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97-98.

在美国改变对德政策的同时，苏联的对德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苏联首先停止了苏占区的大规模拆迁，合并其占领区内 200 家最大的德国工厂，将其转为苏联公司，苏联政府拥有 51% 以上的股份。这些公司主要为苏联生产或者其产品出口到苏联。1946 年 10 月，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将 30 家对苏占区经济至关重要的公司归还德国，其余 170 家公司以及 400 家小公司为支付赔偿进行生产。由此可见，苏联和西方开始经营各自的占领区，而美英则加快进行双占区的合并工作。

贝文期望将西占区作为一个不受苏联影响的独立的地区。他将此视为把美国的力量留在欧洲帮助英国对抗苏联的唯一方法。贝文对贝尔纳斯施加了巨大的影响，鼓励他寻找重新统一德国的途径，打消他同斯大林进行合作的念头。^①1946 年 7 月，英国同意英占区与美占区合并；12 月 2 日，美国和英国签订《美占区和英占区经济合并协定》。1947 年 1 月 1 日，英美两国的占领区合并为双占区（Bizonia）。对于如何发展双占区的经济，前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在 1947 年 3 月建议，美国应停止拆迁德国的工业，并将鲁尔地区重新并入德国经济发展之中。这在美国决策者内部引起较大的争论。克莱认为，成立一个单独的西德国家可使之成为美国同苏联争夺欧洲控制权特别是对东欧的控制的一个跳板。华盛顿决策者的态度更为谨慎，他们相信一个分裂的德国将给欧洲带来动荡。凯南反对德国的分裂。凯南指出，“在现阶段，全面解决德国问题符合我国的利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至少从德国的主要地区撤出盟国军队、解散军政府以及成立具有真正权力和具有独立性的德国政府”。陆军部的观点也具有代表性，陆军部德国问题专家伯恩斯蒂尔（Charles Bonesteel）明确指出，“根本的问题是在有充分保障的情况下建立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德国……一个分裂的德国则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并对和平产生更为直接的威胁；但是，一个完全为苏联控制或同苏联结盟的统一的德国……将可能产生更大的威胁”。^②在 7 月 3 日举行的“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院部协调委员会”的会议上，马歇尔、陆军

① William R. Smyser, *From Yalta to Berlin: The Cold War Struggle over German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p.30.

② Melvyn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Palo Alt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52.

部长帕特森和海军部长福雷斯特一致同意：“德国必须同任何行之有效的欧洲复兴计划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欧洲的复兴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德国生产能力的复兴，即依赖于煤、食品、铁、肥料等等的生产，还要依赖于有效地利用诸如莱茵河这样的欧洲资源”。美国由此决定把马歇尔计划施用于双占区。9月，美英占领当局把双占区煤炭生产交给德国人管理。

1947年3月10日到4月24日的莫斯科外长会议，是美国确定新的对德政策后同苏联发生的第一次外交交锋，这次会议也成了决定德国命运的关键性的会议。马歇尔在前往莫斯科之前就认识到，“在那里并不可能为世界和平做出什么决定……我们迄今为止同他们打交道的经验显示，要么向他们屈服，要么就对他们说‘不’”。会议在未来德国的国体、制宪等重要问题上均未取得一致意见，会议转入经济统一问题和赔偿问题，成为会议上美苏争论的焦点。苏联的立场很明确：经济统一和赔偿应该同时解决，不应把两者对立起来。关于德国的工业化水平，莫洛托夫建议，盟国应商定德国的工业水平，使之既能满足德国的进口需要，又可保证德国执行赔款。最后苏联批评了在赔偿问题上波茨坦协定取代了雅尔塔协定的看法。美国坚持认为，德国经济统一是波茨坦协定规定的，不容谈判，美国不做这笔买卖。4月1日，马歇尔在外长会议上提出美方的最后方案：从当年产品中提取若干产品作为赔偿，以代替拆迁设备赔偿，但前提必须是苏联同意提高德国工业生产水平计划。这个方案自然遭到苏联的反对。马歇尔早先提出的有关建立德国临时政府的提议，苏联也没有接受。会议结束后，马歇尔在返美途中停留柏林机场时会见了克莱。他告诉克莱，要加紧进行英美两个占领区的建设工作。

双占区成立后，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相继出台，西部德国的三个占领区被列入欧洲复兴计划的名单，把欧洲复兴计划同德国最终的政治和经济前途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在马歇尔计划下，美国对德国有了新的政策，那就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779号文件。1947年7月17日，克莱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779号文件，新指令指出，要让德国的州享有更大程度的政治独立，要努力提高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要使德国经济自给自足。在这一新指令下，西占区开始讨论西占区的德国工业问题。8月，美国、英国和法国公布了经过修改的双占区工业发展水平计划，计划指标为德国生产水平应接

近 1936 年水平的 95%，钢产量为 1000 万吨。在马歇尔计划的第一阶段，德国的西占区得到 3 亿美元的贷款。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主席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在回忆录中写到：这是愿意帮助德国进行复兴的、第一次真正令人信服迹象；因为没有美国的援助，德国的复兴是不可能的。阿登纳强调，“马歇尔在解释他的建议时，把德国问题看作是欧洲问题的核心，我们对此表示极为欢迎”。^①

1947 年 11 月四国外长在伦敦开会，从德国当年产品中提取赔偿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12 月 15 日，马歇尔指出，由于苏联方面不提供从苏占区提取赔偿的情况，会议因此不能继续进行，提议休会。伦敦会议无限期休会。伦敦外长会议失败后，苏联从 1947 年 12 月到 1948 年 3 月底，没有向德国统一社会党发出任何指示。西方此时也加快了成立单独的西德国家的步伐。双占区建立以后，美国开始努力统一西占区。法国一开始态度坚决，拒绝加入双占区。美国一方面向法国提供 2.5 亿美元的贷款，另一方面，1945 年 5 月法共被赶出法国政府后，法国政府也改变了对德国的政策。1948 年 2 月 23 日，美国同英法两国代表在伦敦开会，几天后，邀请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参加，三国会议成为六国会议。会议在 1948 年 3 月 6 日发表公报，宣布德国各西占区有必要一起参加马歇尔计划，并称六国致力于“为一个民主的德国参加自由民族的共同体确立基础”。1948 年 6 月 7 日，西方国家在伦敦召开“标志着自波茨坦会议以来解决德国问题的第一个更为明确的、更具建设性的步骤”的会议，会议决定制定正式的德国宪法，邀请德国各州参加制宪会议；同时成立一个国际机构，以便在德国和欧洲国家之间分配鲁尔地区的煤钢生产。在“美国的经济扩张和苏联的政治扩张之间”，法国只能选择“法德经济和政治联盟”。6 月 18 日，法国加入双占区，西占区成为了三占区（Trizonia）。6 月 16 日，苏联退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6 月 20 日，西占区发行“D 记马克”（Deutsche Mark）；6 月 22 日，苏占区军事当局宣布，只有苏联发行的货币可以在柏林流通。6 月 23 日，美英法三国宣布在柏林开始使用 D 记马克。

^① 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1945-1953）》（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第 131 页。

面对西方的行动，苏联采取封锁柏林的方式进行反击。从 1948 年 1 月底开始，苏联就以技术故障、技术困难为由，开始封锁西占区和柏林之间的水陆交通。6 月 24 日，苏联切断柏林和西占区之间的铁路交通，8 月 4 日，公路、水路交通被彻底封锁，只留有空中走廊。斯大林此时挑起柏林危机还有政治上的深远考虑。他在 1948 年 3 月接见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皮克在会谈中表示，他的党可能会在计划于 10 月在柏林举行的选举中失利，但“如果能把盟国从柏林赶出去”，那么结果可能会不同；斯大林对此明确表示：“那就让我们试一试我们所有的力量，也许我们能把他们踢出去。”^①1948 年 5 月苏联占领当局向德国统一社会党发出新的指令：新的局势已经出现，“按照不同的法律将德国分裂为两个部分已形成了”。

从柏林危机爆发的过程来看，苏联强硬地封锁柏林的交通无疑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但令人百思不解的是，苏联采取如此重大的行动，提出的理由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所谓“技术原因”。这一说辞使得苏联在以后同西方国家的较量中处于下风。7 月 3 日，当美英法三国军事长官会见苏联军事长官索科洛夫斯基（Vasily Sokolovshy），向他建议由西方提供技术，帮助恢复柏林交通的时候，索科洛夫斯基当然拒绝这种提议，因为本来就不存在这种技术困难。但他也说出了苏联决定进行封锁的一些考虑，诸如对六国伦敦会议的召开和决定在西占区实行货币改革的不满。他还明确表示，他不能保证当现有的技术障碍排除以后，是不是还会出现新的这方面的障碍。

柏林西部当时有人口 250 万，食物储存仅够维持 24 天，煤炭仅有 45 天的储藏，柏林工厂所需要的一切原料都要从外地输入。在 6 月 24 日之前，柏林西部的电力基本上来自苏占区。面对封锁，西方盟国必须每天向柏林人提供以下物品：641 吨面粉，105 吨谷物食品，106 吨肉类和鱼，900 吨土豆，51 吨糖，10 吨咖啡，20 吨牛奶，32 吨油脂和 3 吨酵母。^②对于苏联的封锁，克莱认为是虚张声势，因为苏联实际上不可能干预西方武装护卫的陆上通行，但这一观点并没有说服其他人，美国决策者还是决定实施空中补给。美国的空运计划代号是“补给行动”（Operation Vittles），由参加过“驼峰空

① Michail M. Narinski,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Berlin Crisis, 1948-1949”, in Gori and Pons, 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p.65.

② Ann Tusa, John Tusa, *The Berlin Blockade*. London: Hodder Stoughton Ltd, 1988, p.144.

运”的特纳中将（William H. Turner）负责指挥。在 1948 年 7 月，空运量为每月 69000 吨，到 10 月份，每月达到了 147581 吨，而在 1949 年 4 月，每天可以达到 7845 吨，平均每 6.2 秒就有一架飞机在柏林机场降落。苏联则使用探照灯、干扰无线电频率以及防空高射炮演习等方法，阻挠美国对柏林的空运。斯大林在看到西方对苏联封锁柏林所作的评论时，曾经愤怒地说，“这些恶棍，全部都是谎言……那不是封锁，那是防御措施”。^①苏联到 1949 年 3 月 12 日才宣布恢复交通。

柏林危机强化了冷战的局面，加快了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形成的过程。危机加强了美国同欧洲国家的政治、军事联系与合作，巩固了美国在欧洲的地位和影响。正是在危机期间，美国以对付苏联挑战为由，使英国同意美国在其领土上部署 60 架 B—29 战略轰炸机。危机加快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过程。还在柏林封锁之前，贝文在 1948 年 4 月就向美国提出成立北大西洋安全体系的问题，成员国将包括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的成员和英国。但北欧国家反应冷淡，甚至公开宣称它们不会参加一个为俄国所谴责的计划。1948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事件使它们对苏联的恐惧开始加深；而苏联封锁柏林，更使它们感到苏联军事上的威胁。最后，除瑞典继续保持中立外，挪威、冰岛、丹麦都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结 论

斯大林在 1945 年 12 月曾对贝文抱怨说：“英国占有印度，并将印度洋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拥有中国和日本，而苏联则一无所有。”^②因此，对安全的追求，对斯大林在战前、二战中以及战后时期政策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国内政治看，这种强硬政策不仅是动员苏联人民应对斯大林所认为的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同西方的对抗的手段，而且也是巩固其在苏联最高决策层内地位和权力的一个手段。在这一过程中，苏联对自身安全的执着追求，一方面同西方坚持的所谓“民主、自决”原则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① Pechatnov and Edmondson, “The Russian Perspective”, p.139.

^② Geoffrey Roberts, “Moscow’s Cold War on the Periphery: Soviet Policy in Greece, Iran, and Turkey, 1943-8”,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46, No.1, 2011, p. 79.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苏联的目标同美国日益扩张的在全球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使得原本就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怀有敌意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更增加了对苏联的疑惧和对立，欧洲逐步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集团也就成了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

除此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演变以及东西方关系中的重要事件，特别是核武器的因素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组，同样对斯大林的外交战略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原子弹作为国际政治中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在苏联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互动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无论杜鲁门的动机如何，斯大林认为使用原子弹是反苏行为”，认为其目的就是防止苏联染指远东的战略利益，使之有利于美国的战后安排。于是，斯大林在处理战后问题时采取了他的“坚忍不拔”的政策（tenacity and steadfastness）。^①基于这一政策，在同西方盟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斯大林在较少重要性的问题上，如的里雅斯特问题、其卫星国的赔偿问题以及托管地等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也愿意作出妥协，但在主要问题上，斯大林出于意识形态和安全利益的考虑，则毫不妥协。因为斯大林的政策意在表明，苏联并不惧怕核武器，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并不能迫使苏联在关键的战后问题上作出让步。^②而美国决策者通过将苏联的行为理论化，宣称“主要由莫斯科所界定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共同信条”，是苏联及其集团“维持其团结并扩张其势力范围的动力”。^③这样，苏联和美国这两个战时的盟友，领导着各自的阵营，开始了长达四十年冷战。

【Abstract】 The pursuit of security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Stalin's policies either before, during or after the World War II. From the angle of domestic politics, this policy is not only a means for mobilizing the Soviet people to deal

① David Hololway, "Nuclear Weapons and the Escalation of the Cold War, 1945-1962", Leffler and Westa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ume I, pp.376-377.

② David Hololway, "Nuclear Weapons and the Escalation of the Cold War, 1945-1962", Leffler and Westa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ume I, p.379.

③ Douglas J. MacDonald, "Communist Bloc Expansion in the Early Cold War: Challenging Realism Refuting Revision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 No.3, Winter 1995/1996, p.185.

with what was considered by Stalin as the upcoming new round of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 but also a method to consolidate Stalin's personal status and power at the highest decision-making level in the Soviet Union. It was Stalin who decided on the Soviet Union's tough policies regarding post-war key issues such as the future of Eastern Europe, Germany and occupation of Japan. Stalin spared no efforts to dominate th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political development after World War II. His main goal was to establish a safe area along the western border of the Soviet Union, which was not contradictory with the needs to maintain good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according to Stalin. Stalin hoped that the Soviet Union's sphere of influence in Eastern Europe could be recognized by both the U.S. and Britain in exchange for the Soviet Union's recognition of the West impacts in the rest of Europe. Stalin's control of Eastern Europe also originated from Soviet's possible failure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U.S. and Britain. However, Stalin's control of Eastern Europe was ultimately considered as a challenge to the West, resulting in opposite results. In this process, Soviet's pursuit of its own security and ideology, on the one hand, was contradictory to West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and self-determination". More importantly, on the other hand, Soviet's goal is in sharp conflict with American ever-growing global interests. Under this background, Europe gradually split into two hostile groups. When dealing with western allies, Stalin showed flexibility and was also willing to make compromises on less important issues, such as the Trieste issue, the compensation issue of its satellites. Nevertheless, regarding major issues, Stalin adopted an uncompromising posture. In the late war and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Soviet's policies towards Turkey and Iran had been a main reason for U.S.-led Western countries to "contain" the Soviet Union, which became an important event for the outbreak of the Cold War. In this wa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two wartime allies, leading their respective camps, began a four-decade Cold War.

【Key Words】 Stalin, Soviet Diplomacy,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Аннотация】 Погоня з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сыграла решающую роль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политики Сталина до и во врем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а также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й период.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та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являлась не только средством мобилизац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для отпора в, по мнению Сталина, предстоящем новом раунд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с Западом, но и средством укрепления личного статуса и вла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самом высоком уровне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Сталин принял решение о проведени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жёст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таких ключевых послевоенных вопросах, как будущее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Германии и японской оккупации. Основной целью усилий Сталина по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ю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развитии стран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являлось создание зон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доль западной границ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эта цель не вступала в противоречие с мнением Сталина 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поддержания хорош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 Западом. Сталин надеялся, что сфера влия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получит англ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е признание, и в обмен на чт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ризнает влияние Запада в остальной части Европы. Контроль Сталина над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ой также основывался на возможном провал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ей и США.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контроль Сталина над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ой,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ёт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лся Западом как вызов Западу, вследствие чего, Сталин получил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ый тому, на что он надеялся, результат. В этом процессе стремл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гарантировать собственну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идеологию,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привело к острым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м в вопросах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принципов «демократии и самоопределения»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с Западом; а наиболее важным является то, что между целью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растущими глобальными интересами Соединённых Штатов возник серьёзный конфликт. Это привело к тому, что Европа постепенно разделилась на две враждебные группы. В процессе контактов с

западными союзниками Сталин в менее значимых вопросах, таких как Триест, вопросы компенсации своим сателлитам и вопросы подопеч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проявлял гибкость и был готов идти на компромисс. Однако в основных вопросах Сталин не шёл ни на какие компромиссы.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Турции и Ирану на поздней стадии войны и в начал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го периода стала главной причиной проведения западными странами во главе с США политики «сдержи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а также стало важным событием начала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два военных союзника, возглавляющи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лагеря, начали четыре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талин, совет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истоки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责任编辑 肖辉忠）

文化冷战与冷战初期的苏联反美宣传 ——以中央宣传鼓动部解密档案为切入点

赵玉明*

【内容提要】重视宣传与鼓动是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之一。苏美冷战开始后，苏联进行了宣传机制调整与改革。此后在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领导下，整个苏联持续进行了一场系统、连续性的反美宣传，藉此在苏联民众中塑造“美国是苏联人民的敌人”的形象。反美宣传持续、高强度地进行，使得对美国及西方的嫌恶与敌视成功地灌注到普通民众的意识当中，并将其凝聚到了苏维埃文化的内核中。探寻冷战初期的苏联反美宣传，对于了解此时的宣传机制与意识形态工作，观察冷战初期文化冷战的苏联因素等，都大有裨益。

【关键词】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 文化冷战 反美宣传

【中图分类号】D73/7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 (2013) 01-0088-(19)

引言

众所周知，1947年下半年苏美冷战爆发，时间转至1991年，因苏联解体，笼罩全球的冷战成为过去。但冷战史的研究并未随冷战一起走进历史，而是在后冷战时代的今天呈现出研究方法不断细化与视角日益多元之势。冷

* 赵玉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战文化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与发展起来的。^①

冷战文化史不同于冷战史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外交关系等传统视角，而是依托“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 Культурная Перемена)”这一范式转变，将视线落在了文化层面的分析，以此来阐释冷战及与之有关的问题。从这一层面理解，可以认为，冷战文化史研究发轫于苏美两大阵营之间长期的“文化冷战”(The Cultural Cold War, Культурная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而长期处于封存状态的苏联档案随苏联解体而解密流出，其中相当一部分相关档案为冷战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坚实可靠的论证依据。

对于苏联而言，它所进行的“文化冷战”，就是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塑造与宣传苏维埃文化(Совет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借此赢取民心，稳固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而其进行的“文化冷战”的载体之一就是反美宣传。学界早已

① 关于冷战文化史的概念及相关内容，国内外学术界进行了如下有益的研究与探讨。Чубарьян А.О. 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7. №.6)。在文中作者关于文化冷战史进行了相关探讨。英国人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在《谁承担后果——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曹大鹏翻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一书中明确提出了“文化冷战”的概念。2003年美国学者耶鲁·瑞奇蒙德出版了《文化交流与冷战：铁幕的降下》一书(Yale Richmond, *Cultural exchange & the Cold War: raising the iron curtain*,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3)对冷战背景下苏美两大阵营的文化交流进行了相关分析。拉纳·米特、帕特里克·梅杰在2004年编辑的《超越联盟：冷战社会文化史》一书(Rana Mitter, Patrick Major, *Across the blocs: Cold War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London; Portland, OR: Frank Cass, 2004)，对文化冷战的一些理论层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2006年美国著名外交史学者弗兰克·宁科维奇(Frank Ninkovich)发表了“范式失落：文化转向和美国外交史的全球化”(“Paradigms Lost: The Cultural Tur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U.S. Diplomatic History”)一文，《冷战国际史研究》，2006年第1期。在文中作者清楚地表述了文化冷战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这一范式转变。2011年出版的克里斯·汀罗斯：《莫斯科的鼎盛时代：苏联媒体帝国的建立及其文化冷战的失败》一书，(Kristin Roth-Ey, *Moscow prime time: how the Soviet Union built the media empire that lost the cultural Cold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对冷战时期的苏联电影工业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此外，日本学者也明确提出了文化冷战的概念并对此进行了相关阐释，参见小林刚：《国吉康雄与文化冷战——战后美国美术的政治学》，2002年《美国研究》第36号(小林刚：《国吉康雄と文化冷戦—戦後アメリカ美術の政治学》，《アメリカ研究》第36号，2002年)；贵志俊彦、土屋由香编：《文化冷战的时代：美国与亚洲》，东京国际书院2009年版(贵志俊彦、土屋由香编：《文化冷戦の時代：アメリカとアジア》東京国際書院2009年)。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文化冷战也有相关研究，参见陈兼、余伟民的：“‘冷战史研究’：缘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于群：《新冷战史研究：美国的心理宣战和情报战》，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熟知，自二战结束后，苏联便开始进行反美宣传，其特点是苏美关系关乎苏联反美宣传的烈度，即苏联反美宣传的烈度是苏美关系好坏的晴雨表。但是反美宣传的相关具体层面，如反美宣传机制的梳理、宣传效果的评判等问题，国内学术界目前尚缺乏专门的研究。因此，本文拟以 1949 年前后的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解密档案为切入点，通过解读其掌控下的国内外反美宣传，来探究其与文化冷战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冷战爆发与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调整

1946 年 3 月 5 日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震撼世界的“铁幕演说”，即题为《和平砥柱》的长篇讲话。对于丘吉尔的这篇演说，中国学者桂立认为：“如果他（丘吉尔）未能促使美国与之结盟的话，那么，他却能成功地在美国与苏联之间煽起猜疑和对抗。”^①同月 13 日，在回答《真理报》记者提出的“丘吉尔的言论是否会给和平和安全带来危害”这一问题时，斯大林说：“毫无疑问，这是肯定的。丘吉尔先生现在正站在战争煽动者的立场之上，并且丘吉尔先生并不是孤独的，他不仅在英国有朋友，而且在美国也有朋友。”^②这番话意味着，斯大林敏锐地捕捉到了从西方散发过来的要孤立苏联的气氛。

1947 年 3 月 12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明确提出将“冷战”作为国策。至此，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战略正式出台。这份《国情咨文》连同大名鼎鼎的“铁幕演说”以及乔治·凯南的电报一起，清晰地表达了战后英美遏制苏联的战略意图。同年 9 月 27 日，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就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从华盛顿给莫洛托夫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写道：“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是谋求世界霸权，苏联则是它谋求霸权的主要障碍”。引人注目的是，虽然该电报是诺维科夫发给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但是其内容却是诺维科夫在莫洛托夫的亲自授意下写成的，“因此电报基本

① 桂立：《苏美关系 70 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46 页。

② И.В. Сталин о речи У. Черчилля. Ответ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у// Правда. 14 марта 1946 г.

上反映了苏联政府的观点与政策”。^①诺维科夫的这封电报可视为苏联方面对英美冷战言论针锋相对的反应。

如上所述，英美苏领导人之间紧锣密鼓的言论交锋与此一时期苏美之间的诸多政治外交争执都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英美苏反法西斯同盟的大国合作，开始转向战后的苏美两大阵营的集团对抗。面对这一形势，尤为重视意识形态宣传的苏联掌舵者斯大林有如下考虑：需要对先前苏联的意识形态宣传口径与内容进行调整，以适应新形势下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对抗的需要。这是对二战结束后新的国际形势进行考量之后的结果。在斯大林的授意与直接指挥下，冷战爆发后，苏联掀起了多项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其中之一便是通过反美宣传活动直指美国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体制。可以说，战后苏联大规模、有系统地进行反美宣传帷幕的拉开，是与苏美冷战爆发直接相关的。

在梳理苏联的反美宣传活动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先简略了解苏联的宣传系统和机制。在苏联，统筹和掌管整个宣传工作的是党中央宣传鼓动部（Агитпроп）。^②中央宣传鼓动部并不承担具体的宣传事务，而是为整个苏联的宣传与意识形态工作掌舵和领航，是各项反美宣传活动的制定者、发起者与监督者。承担反美宣传具体工作的是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各级党政部门、通讯社及各种出版机构，这些部门和机构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如报刊、杂志、广播、文学艺术作品等，通过宣传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来构建主流政治文化，同时揭露和抨击美国的全球霸权政策与反苏宣传活动。这些受联共

① 刘金质：《冷战史（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98-101页。

② 关于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国内学术界尚未见到专题研究，仅在一些关于苏联文化体制的论述中零散地提及。《枫丹娜现代思潮词典》对宣传鼓动部有如下定义：Агитпроп，宣传鼓动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一个部门，建于1920年9月。以后经过历次改组，它的官方全称虽有变更，但基本职能未变，即对涉及人民思想状况的活动进行控制。宣传鼓动部的日常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其影响扩及所有的通讯媒介，如报刊、广播、电影、电视、文学和艺术。很早就把反宗教宣传补充到它的职责中去了。宣传鼓动部还围绕特定题目发起间歇的宣传活动。从内部来说，这种运动往往和新出现的背离党的路线问题有联系。从国际上来说，宣传鼓动部往往在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组织协助下发起运动——例如1947年斯德哥尔摩的和平呼吁，针对所谓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运动等等，但是由于共产党出现了多中心主义、以及各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使这些运动失去了其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参见布洛克、斯塔列布拉斯：《枫丹娜现代思潮辞典》，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3页。

(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领导的部门和机构,必须定期、如实地向其汇报工作,而中央宣传鼓动部作为党中央书记处的一个下属部门,则直接向党中央书记处与政治局负责。

二战后包括反美宣传在内的苏联宣传鼓动工作,是从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内部调整与全苏意识形态机关整顿开始的。1946年4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出台决议,决定创办隶属于中央宣传鼓动部的《文化与生活报》(Культура и жизнь)。给它设定的基本职能是“批判各个意识形态工作领域的不足”。^①正是这份通报宣传系统内部工作状况的报纸,在日后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月18日,掌管整个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日丹诺夫(А.А. Жданов)亲临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他在讲话中说道:“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着严重不足和巨大失败……要加强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领导地位……”,他同时要求宣传鼓部迅速改正错误并改善工作,加强宣传鼓动机关的人员配备。^②同年10月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出台了一份措词严厉的决议,批评苏联通讯社(совинформбюро)“未将注意力集中到反苏宣传的发源地(英国和美国),没有将力量用在战后英美反苏运动的反宣传上。”^③

研究这三份旨在促进与强化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工作的决议出台的动机,必须考虑到当时苏联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战争后期,广大军民冲出国门,转战欧洲,在与盟军的交往中,在与当地人民的接触中,耳濡目染,又了解了西方科技文化及其成就,在头脑中发生了东西方文化的猛烈撞击……这种思想情绪的特点,曾被一些评论家、历史学家称作‘新十二月党人’思潮”。^④从我国著名苏联文化体制研究者马龙闪的这段分析及相关论著中,我们不难了解,在二战期间迈出过国门的苏联公民中,对西方文化产生

① Из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 «вопросы оргбюро и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ЦК ВКП(б)»: об учреждении газеты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13.04.1946//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12.

② Из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выступления секретаря ЦК ВКП(б) А.А. Жданова на совещании в агитпропе ЦК по вопросам пропаганды, 18.04.1946//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13.

③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 «о работе совинформбюро», 09.10.1946//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28.

④ 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02页。

了一定程度的认同感，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较为浓重的向往西方式自由的倾向。在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思维模式下，既然苏联制度的优越性可以用文化与科学技术繁荣来证明，那么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与落后也是可以用各种道德败坏行径来进行暴露和揭发的。安排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掀起反美宣传，是这种思维模式的自然结果^①。因此，压制这股思潮，首当其冲成了战后苏联宣传工作的急务。而其具体方法，就是通过掀起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将自由化倾向扼杀在萌芽之中，以此从思想根基上巩固社会主义体制。而当时苏美之间时有龃龉，这就给掀起反美宣传提供了最好的理由与切入点。在这种情况下，挑选精妙的素材进行加工用以反美宣传，就成了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苏联的反美宣传措施

（一）反美宣传的开始

1947年9月25日，日丹诺夫在第一届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开幕式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明确指出“战后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②日丹诺夫同时严厉斥责了英美的“扩张主义”，并罗列了其大量反苏的“事实”。^③对此，著名冷战史专家沈志华教授认为：“日丹诺夫的报告可以被认为是莫斯科的冷战宣言”。^④宣言标志着苏联正式进入冷战总角逐。在文化方面，中央宣传鼓动部开始出台相关措施。

1948年1月24日，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向苏斯洛夫（М.А.Суслов）呈递了一份报告。报告中称，美国时事评论家斯基尔（И.Стил）《美元内幕》

① 关于以文化与科学技术的繁荣来证明苏联制度的优越及合理，以及此一时期斯大林对苏联意识形态宣传的掌控与干预，可见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ited by Ronald Grigor Su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549.

② 刘金质：《冷战史（上）》，第166页。

③ Из доклада А.А. Жданова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на первом совещании коминформа, 25.09.1947// 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52.

④ 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格局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Долларовый занавес）一书在美国得不到出版，是因为该书揭露并批判了美国当权集团的外交政策。其若能出版，对苏联所进行的反美宣传是极为有益的。但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与诽谤，最好先由法国或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步出版社出版，然后再翻译成俄文出版。^①由一个美国人来揭露美国的侵略政策，并且冠之以《美元内幕》的耸人标题，加上苏联宣传的大力配合，再联系到当时美苏之间因马歇尔计划和柏林问题的齟齬而引起的明争暗斗，这种宣传方式与技巧，无疑会增强苏联民众对于美国统治阶层正在进行金钱外交的印象。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中央宣传鼓动部所期望的印象的达成，并不是由偶然因素所造就的，而是穷尽各种方式、利用各种资源所进行的政治动员的结果。正如当代俄罗斯学者А·В·法捷耶夫（А.В.Фадеев）所总结的那样：“苏联为了建立便利的对信息的控制，宣传者拥有所有的先决条件：经验，国家对大众传媒以及信息本身的垄断，公民对当局和报刊报道的信任，低水平的公民政治文化和文化程度，对西方传统的不信任。”^②

1948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出台了关于文化活动家参加捍卫和平代表会的决议。在由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起草的这份决议中指出，文化活动家们参加由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法共中央发起的捍卫和平代表大会，是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保卫世界和平”，并特别强调要支持他国提出的抗议美国迫害进步文化活动家的倡议。该代表大会于8月25日到28日在波兰的弗罗茨拉夫（Вроцлав）市举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机关全力进行了宣传报道，尤其用浓重的笔墨揭露美国迫害进步文化活动家的行为，来为反美宣传升温与造势。但令人费解的是，8月27日塔斯社（ТАСС）记者在报道大会活动时引述了参会代表们之间流传的走廊传闻：“英美代表并不喜欢作家法捷耶夫（А.А. Фадеев）的报告，以及爱伦堡（И.Г.

①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М.А. Сулову по вопросу издания в СССР книги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радиокомментатора И. Стила, 24.01.1948//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155. 根据档案后附注可知，这本书最终由英语译成俄语后以《保卫和平》（В защиту мира）的书名出版，苏联外国文献出版社在为其撰写的序言中将它视作“揭露美国侵略政策的神圣经典”。

② Фадеев А. В. Образ врага в совет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е: 1945-1954 гг. Москва: Ин-т рос. истории РАН, 1999. С.221-222.

Эренбург)的讲话所表现出来的尖锐口气。”^①由于上下文的缺失,笔者无法断定该记者引用这番话的意图何在。但毫无疑问的是,苏联当局对法捷耶夫和爱伦堡在大会上针砭美国的发言是满意的,否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也不会于1950年5月30日再次通过决议委托法捷耶夫组建和平保卫者代表大会常委会,并任命爱伦堡为副主席。^②实际上,政治局的决议、文化活动家捍卫和平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事后的宣传报道,共同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美国是反动文化的化身,它迫害进步文化活动家,而苏联则是进步文化的代表与进步文化活动家的守护神。就文化冷战来讲,就是找出美国政治体制、内政外交及文化中腐朽、落后的一面,与积极正面的苏维埃文化形成鲜明对比,来达到让苏联及西方民众认同苏维埃文化,自觉抵制美国文化侵袭的意图。

(二) 反美宣传的高潮

1949年3月1日,是冷战初期苏联反美宣传活动中的一个战略节点。因为在这一天,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起草了名为“近期内加强反美宣传计划措施”的计划。该计划详细规定了苏联各大报刊杂志和广播电台的反美宣传内容,要求苏联作家协会、艺术事务委员会等机构创作文艺作品用于反美宣传,组织文艺界和科学界著名专家学者撰写揭露美国内政外交真相、特别是侧重暴露美国生活方式的文章。^③实际上这份文件不仅是全面的反美宣传的指导性总纲,还是各个宣传部门具体反美措施的细则。因为在这份文件中不仅详细列出了诸如“美国文化的腐朽性”、“教育危机”、“科学为垄断组织服务”等反美宣传题材,而且已经汇总了一大批揭露美国腐朽生活方式的作品选题,要求突击制作并出版。

3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出台决议,要求突击出版《美国外

① Из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 «об участии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конгрессе деятелей культуры в защиту мира», 14.08.1948//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77.该档案后附有塔斯社记者报道节录。

②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 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И.Г. Эренбурга в движении сторонников мира, 30.05.1950//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232.

③ «План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по усилению анти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на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01.03.1949//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128.

交官的真实故事》(правда об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дипломатах)一书的英文、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版。^①实际上,探寻这本揭露美国间谍与反苏阴谋的作品的问世历程,对我们了解这一时期苏联的反美宣传和苏联对文化冷战的重视程度是极为有益的。《美国外交官的真实故事》由文学报出版社根据英文译出后于2月12日出版。该书作者美国人比卡尔(А.Бюкар)的身份和经历颇值得注意:“一个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信息处工作的、有着斯拉夫血统的年轻女人,因爱上了莫斯科滑稽歌舞剧院的男高音演员而断然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斯大林阅读该书后在封面上写道:“英文版、法文版和西班牙文版什么时候问世?”与此同时,《真理报》就《美国外交官的真实故事》发表评论说:“书中所反映的事实再一次使我们明白,必须提高警惕,时刻牢记揭发反民主帝国主义阵营特务的必要性。”在斯大林的批示与《真理报》的宣传攻势配合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遂出台了3月19日决议,限令外国文献出版社在4月1日前用英文、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出版该书各一万本,并且俄文版要在2月11日出版一万本的基础上,加印二十万本。根据这份档案所附的解释,本书之所以要“揭露美国间谍与反苏阴谋”,正是要影射“遏制”战略的提出者、当时的美国驻苏联外交代表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从这一点来看,如此大张旗鼓地推广该书,就是要在苏联及西欧民众心中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名噪一时的凯南电报提出人、当时的美国驻苏联外交代表,是策划反苏阴谋的间谍,是苏联人民的敌人。相较于苏联对美国所进行的文化冷战的汹涌势头,对乔治·凯南的形象刻画只能算是一朵浪花。

4月1日,苏联作家协会也加入到反美宣传的阵营之中。根据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安排与部署,苏联作家协会拟定了加强反美宣传的草案。

^②该草案颇为详细,笔者仅略举如下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保证有关文艺

①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 о выпуске н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ах книги «правда об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дипломатах», 11.03.1949//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120. 虽然据档案附注该书有英文版与俄文版,但是笔者目前并没有搜索到相关出版信息。

② «Проект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о усилению анти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по союзу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Документ ССП СССР, 01.04.1949//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138.

作品的出版，创作剧本、电影脚本和小说来揭露美国生活方式。第二，从1949年到1950年，出版10到15本由相关人员所撰写的、旨在揭露美国生活方式与展现美国劳动人民贫穷状况的纪实著作。^①第三，准备出版一系列选集，包括《美国生活方式》（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образ жизни）、《国外美国人》（Американцы за рубежом）、《美国人眼中的美国》（Америка глазами американцев）、《俄罗斯进步活动家论美国》（Русские прогрессивные деятели об Америке）和《进步美国人反对战争贩子》（Прогрессивные американцы против поджигателей войны）等。第四，苏联作家出版社准备出版反美题材的剧本《注定要失败的阴谋》（Заговор обреченных）、《肤色》（Цвет кожи）、《冷战》（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和《广场上的狮子》（Лев на площади）。第五，准备再版如下书籍：《战后西方》（На Западе после войны），《在日美国人》（Американцы в Японии）等。从苏联作家协会这份冗长的草案内容看，这一时期的反美宣传是一场精心组织、持续进行、涵盖广泛的意识形态攻势。这份草案经中央宣传鼓动部审核后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通过并实施。

相较于之前的反美宣传，这一时期的急行军式的突击反美宣传活动的特点，是斯大林等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以及追求书稿的出版速度和反美作品的数量。有一个事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作家什巴诺夫（Н.Н. Шпанов）于1949年3月29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标题为《关于两个问题》的信。^②他在信中抱怨道，他的书稿《战争贩子们》（Поджигатели）早在1947年就交给了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但至今还未得到出版，该书的内容是揭露英美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且正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谋。4月20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向苏斯洛夫报告，说是已经调查清楚相关情况，《战争贩子们》将在近期内出版。作家什巴诺夫的书稿长期被青年近卫军出版社搁置，却因他的一份申诉信和中央宣传鼓动部的介入，得到了立即出版的待遇，个中原因恐怕还是其爆炸性的内容契合了此时反美宣传的基调。

① 根据该档案记载，相关人员是指苏联采购委员会、贸易代表处、塔斯社等涉外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到过西方国家的文化活动家和工程师等。

②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М.А. Сулову по поводу издания книги «поджигатели» Н.Н. Шпанова, 20.04.1949//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152.

5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艺术事务委员会呈送给马林科夫（Г.М. Маленков）一份秘密报告。^①该报告详细罗列了一系列正在创作的反美题材的剧本，以及近期内要上演的反美戏剧。6月17日，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在上呈马林科夫的报告记录中写道：艺术事务委员会的反美宣传计划已通过审核，并报中央批准实施。^②同年10月6日，应中央宣传鼓动部的要求，艺术事务委员会向其提交了关于反美宣传实施情况的报告。10月12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向马林科夫呈送了反美宣传的阶段性总结报告。报告中宣称：近期内在各大剧院上演的反美戏剧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目前艺术事务委员会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更多的剧目。^③这些措施的密集出台，给人的观感就是，联共（布）中央及斯大林本人，都极为重视通过文艺作品进行反美宣传。这种对美帝国主义“恶感”的刻意培养，犹如敏锐的传感器，深深烙印到这一时期的苏联文艺作品的字里行间，主导了苏联民众对美国的认知。

另外，“美国之音”（The Voice of America）等境外广播电台针对苏联的“恶毒”宣传报道，引起了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高度重视。^④1949年6月28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向马林科夫呈送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要

① Записка П.И. Лебедева Г.М. Маленкову о проведении анти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учреждениями комитета по делам искусств при Совете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11.05.1949//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156.

② Служеб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в секретариат Г.М. Маленкова о план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по порведению анти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учреждениями искусств комитета по делам искусств при Совете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17.06.1949//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169.

③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Г.М. Маленкову о мероприятиях по усилению анти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в области театр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2.10.1949//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206.

④ 刘金质所著的《冷战史》中，对“美国之音”有如下描述：“‘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进行反苏反共宣传和心理战的重要工具。‘美国之音’于1942年2月24日正式开播，当时是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的。1947年2月17日，‘美国之音’开始对苏联广播，每天1小时。‘美国之音’对苏广播采取了‘进攻’态势。美国政府规定‘美国之音’对苏广播的目标是‘将关于美国政策的真相’穿过铁幕和竹幕传达给苏联人民以及受苏联控制的其他国家的人民，表达对他们求得自由和解放愿望与斗争的支持，‘阻止苏联的进一步扩张’，‘缩小苏联的影响’，‘削弱在国外的苏联红军和官员的意志’。‘美国之音’先后播出了‘铁幕后面的生活’，‘共产主义伊甸园’等一系列专题节目，目的在于鼓励苏联国内的怠工和反抗：‘我们期待苏联听众放慢防务活动，放弃对五年计划的支持，这样就会停止农场和工厂的生产。’”刘金质：《冷战史（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50-51页。

加快无短波收音机的生产速度并增加其产量，1949 年生产 11 万台，1950 年要生产 40 万台，以作为与境外反苏广播斗争的工具。^①关于苏联广播电台宣传报道的大致方向与内容，可以从 1949 年 6 月 10 日中央宣传鼓动部上呈苏斯洛夫的“关于 1949 年 10 月境外宣传报告的选题计划”中了解到。^②在该计划中，10 月苏联在境外所进行的宣传报道应侧重六个方面，其中第三点是：就“帝国主义阵营从经济危机走上军事冒险之路的出口”进行宣传报道，重点揭露帝国主义正在经历经济危机和其准备发动新的战争的计划，尤其要刻画出杜鲁门（Harry S. Truman）、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及其走狗铁托（Иосип Броз Тито）等人的战争贩子形象。其实只要联想到苏美两国在西欧剑拔弩张的国际局势，以及此时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决裂与对峙，就不难理解苏联宣传机构为什么要开动全部火力来宣传杜鲁门、丘吉尔和铁托是战争贩子了。这种对英美等敌对国家领导人形象的丑化，与反美宣传的突击性一起，构成了苏联所进行的文化冷战的显著特征之一。

冷战初期，电视在苏联尚未普及，看电影还是当时广受民众喜爱的娱乐与消遣方式。利用电影的普及性和影响力，也是苏联进行文化冷战的重要工具与手段。因此，遴选优秀的电影题材来进行反美宣传并达到预期的效果，遂成了中央宣传鼓动部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1949 年 7 月 19 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呈送给斯大林关于“发行反美题材电影”的报告。^③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要将高尔基的小说《黄色恶魔之城》（Город Желтого Дьявола）和上文提到的《美国外交官的真实故事》改编成电影，并称已经安排好拍摄与上映的时间表。高尔基的这篇小说能被改编成电影的最大动机，恐怕是小说描述了他的美国之行的内容，以及在文中表达了对美国人生活方式的鄙夷与讽

①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Г.М. Маленкову по вопросу о выпуске в СССР радиоприемников без коротких волн как средства борьбы с антисовет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ой по зарубежному радио, 28.06.1949//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175.

②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М.А. Суслову о тематическом плане радиопередач на зарубежные страны на октябрь 1949 г., 06.10.1949//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204.

③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И.В. Сталину о создании кинофильмов на антиамериканскую тему, 19.07.1949//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204.

刺，极其适合作为此时进行反美宣传的素材。^①由此可见，对高尔基小说的改编与上映，已被视为中央宣传鼓动部实现其宣传效果的上佳途径。而已经用俄英法德西五种文字出版并在苏联和西欧大力推广的《美国外交官的真实故事》一书，此时又在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建议下改编成电影，其受到如此青睐和重视的原因，据分析，主要是如下两个方面：第一，该书内容是揭露美国驻苏联外交官是间谍且大搞反苏阴谋活动，具有煽动性与爆炸性，值得在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统一筹划下以纪实文学、电影乃至戏剧为载体来进行连续性的反美宣传。第二，《美国外交官的真实故事》一书达到了比较理想的宣传效果，在苏联乃至西欧民众的意识中成功塑造了美国外交人员的丑恶形象。此时将该书改编为剧本，对于苏联所进行的反美宣传会起到推波助澜的效果。

除了有组织地进行自上而下的宏大宣传活动以外，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还非常重视清除妨害这些反美活动的因素。例如，1949年12月12日，前《真理报》工作人员马吉德（А.С. Магид）写信给斯大林，强烈建议加强苏联公民的警惕性。^②马吉德在信中说，读了昨天真理报关于帕克所著（Р. Паркер）的《反对和平的阴谋》（Заговор против мира）一书的评论后了解到，“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各个地方都活动着下流卑鄙的英美间谍，他们正在窃取国防机密并传播反苏流言”。继而他表示要“对于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您，以及我们所有人大声呼吁：警惕性，警惕性，还是警惕性！在日常生活中，在党的路线中，在职业组织中都需要警惕性。”当然，义正词严地大声疾呼提高警惕性或反对美国的，并不只有马吉德一个人。1951年5月24日，马林科夫收到了自称是《美国画报》（Америка）杂志读者的来信。^③读者哈尼科夫斯基（А. Ханьковский）在信中认为，不久前发行的《美国画报》第46期所介绍的美国家庭的收入状况与日常生活，企图给苏

① 高尔基曾在1906年短期去过美国，并创作了一些关于美国的讽刺作品。

② Письмо бывшего работника «Правды» А.С. Магида И.В. Сталину с предложениями, как усилить бдительность советских граждан, 12.12.1949//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217.

③ Письмо читателя журнала «Америка» Г.М. Маленкову 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разоблачен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образа жизни», 24.05.1951//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246.

联读者描绘一幅虚假的美国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美好画面。作者说道：“……逼真的图表，虚构的数字与事实，将现在的美国描绘成天堂（рай）和理想中的黄金国（Эльдорадо）。……我坚信，美国画报的虚假宣传是我们进行反宣传（контрпропаганда）和揭露美国生活方式的绝佳材料……”。在此需要解释的是，根据我国学者赵丽杰的研究，《美国画报》在苏联民众中是极受欢迎的，发行量虽然只有五万份，但是影响却非常大，在黑市上它的价格经常达到发行价的三倍就是明证。^①实际上，这两封信虽然是写给最高领导人的，却是假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之手传递的，这两封信既是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反美宣传效果的体现，也是刺激斯大林、马林科夫以及整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将反美宣传持续下去的诱因。由此可见，宣传主导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对于此时中央宣传鼓动部控制和推动的反美宣传，是极合时宜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央宣传鼓动部一方面重视反美宣传，另一方面不忘将不利于这种宣传的因素彻底剔除。1949年7月26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向马林科夫报告，表示支持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Глав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СССР）提出的将杰博林（Г.А. Деборин）所著的《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国际关系》（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一书从苏联各图书馆中清除的提案。^②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在提案中指出，该书“含有大量的严重政治错误，千方百计地粉饰英美在二战期间的政策，掩饰英美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的真正原因，夸大英美在战胜德国法西斯中的作用，贬低苏联的贡献和作用……”。不难理解，提案中所指的《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国际关系》一书对英美在二战期间作为的描述，显然是不符合此时如火如荼进行的反美宣传的基调的。这表明，在苏联所进行的文化冷战背景之下，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所主导的这场宣传攻势，一方面要极力塑造美国的敌人形象以激起苏联民众

① 详见赵丽杰：“文化冷战、《苏维埃生活》和《美国画报》杂志”，《读书》，2008年第6期。

②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М.А. Суслову в поддержку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об изъятии из библиотек книг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26.07.1949//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187.

的警惕性与对美国的敌意，另一方面则要极力掩盖与清洗对反美宣传不利的信息。

除了上述反美宣传措施，在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策划与掌控下，从 1949 年到 1951 年，密集的反美宣传活动和措施一直在延续。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外，还有诸多具体措施。例如，1949 年 3 月 19 日苏联作家协会在给马林科夫的报告中称，正准备写作有利于揭露美国真面目的剧本《高尔基在美国》（Горький в Америке），要求相关机构给予支持和合作。^①5 月 17 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向苏斯洛夫报告，作家马克·威廉姆斯（Мак-Вильямс）的《哀伤之地》（Бедствующая земля）准备由外国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列入早就策划好的反美著作清单的。^②6 月 22 日，中央宣传鼓动部给马林科夫的报告称，经审查后认定，《美国的劳动与资本》（Труд и капитал в США）一书可以出版，可用来揭露美国工人阶级和黑人的现状，暴露美国关于“美国生活方式”宣传的虚伪性。^③中央宣传鼓动部同一天呈送给马林科夫的另一份报告称，经过审查和改正不足后，《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法西斯地缘政治学说》（Фашистская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на службе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一书可以出版。^④该书主要内容是批判“反动性质的法西斯地缘政治学说，并揭露美帝国主义者利用其作为意识形态基础来谋求全球霸权的扩张计划”。

在组织密集的反美宣传的同时，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对宣传品的质量也有着相对严厉的管控，即并不是所有的反美题材作品都能轻松获得其首肯的。如 1949 年 6 月 23 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在给苏斯洛夫的报告中称，经过审核，认为米纳耶夫（В.Н. Минаев）的“旨在揭露美国间谍机关犯罪活动”

① Записка писателя К.М. Симонова Г.М. Маленкову о готовности написать пьесу «Горький в Америке», 19.03.1949//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126.

②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М.А. Сулову по поводу издания книги К. Мак-Вильямса «Бедствующая земля», 17.05.1949//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160.

③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Г.М. Маленкову об издании книги «Труд и капитал в США», 22.06.1949//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170.

④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Г.М. Маленкову об издании книги Ю.Н. Семенова «Фашистская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на службе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22.06.1949//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171.

的《美国盖世太保》（Американское гестапо）一书充满了作者的“想象与杜撰”，因此不宜出版。^①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著名作家爱伦堡的作品上。1949年9月22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在给苏斯洛夫的报告中，同意作家出版社提出的爱伦堡创作的揭露美国生活方式的小说《美国之夜》（Ночь Америки）中的诸多缺点与不足，并支持作家出版社提出的该书稿只有在修改后方可出版的建议。^②在笔者所掌握的档案文献中，有不少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否定反美题材文艺作品的事例。以上两例说明，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领导下的反美文化宣传，不仅攻势凌厉，而且务求质量上乘，既要求数量庞大、方式多样，又对这些作品的内容与方向有着严格的管控，尽量避免充满杜撰与想象或者内容不够深刻具体的作品问世，以免带来反作用。

三、结论与思考

限于篇幅，笔者难以继续罗列在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操控下的苏联反美宣传活动。这种炽热的、有组织的反美宣传活动，在1949年达到顶峰后逐渐降温。

如今再来回顾与评判这段历史，首先可发现，此一时期苏联所进行的激烈的反美宣传，带有苏美两大阵营之间爆发冷战这一鲜明的时代特色。这种时代特色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苏联反美宣传的方向、内容与程度。就直观而言，冷战爆发后，美国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将苏联的意识形态乃至苏维埃制度描绘成“邪恶”的负面形象，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需要对此进行意识形态反制。企图借助大规模的反美宣传，以各种方式和载体来证明美国统治集团及其内政外交的腐朽与落后，这样便可以间接证明美国及其政治制度的对立面——苏联及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正确性。这是冷战爆发给苏联带来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

从本文的视角——文化冷战来看，这种以宣传和鼓动为方式的意识形态

①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М.А. Сулсову о рукописи книги «Американское гестапо», 23.06.1949//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172.

②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М.А. Суслову о рукописи книги И.Г. Эренбурга «Ночь Америки», 22.09.1949//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199.

对抗，有别于此时苏美围绕柏林问题以及朝鲜战争等问题所进行的激烈的政治角逐与强硬的军事对峙，是一种非直接接触的软较量和软竞争，即在文化层面上的对抗。它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进行选择性的宣传报道来影响民众心理，进而使其作出有利于本方的判断，并进而采取相关的举动。具体到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所推动的文化冷战，就是在大力进行苏联爱国主义宣传的同时，一再掀起反美宣传的高潮，通过强化宣传与鼓动，在苏联民众的心理与潜意识中造成美国是苏联人民的“敌人”这一思维定势，那就是像法捷耶夫所说的：“（美国）经济危机前的状态、垄断统治、法西斯主义、文化和社会风俗的腐化和堕落、劳动人民生活贫困、种族歧视、为军国主义服务的科学、媒体腐败、犯罪率增长、对外政策的侵略性以及为达成此目的而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盟友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必然导致的分裂。”^①。

引人注目的是，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主导下的以苏联普通民众为受众的反美宣传，是以整个苏联的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为前提的，而且发动了整个苏联的意识形态体制与文化体制，进行了一连串的、全面有序的宣传鼓动攻势来贯彻“反对美国”这一宗旨。在此起彼伏的宣传攻势下，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与普通苏联民众，从上至下，要么主动投身其中摇旗呐喊，要么通过不断表达政治立场的坚定与正确来被动唱和。从总体上说，得益于与外界高度隔绝的苏联政治环境，而且在“具有丰富经验和光荣传统”的中央宣传鼓动部领导下，借助于被垄断的大众传播媒介手段并充分利用行政资源，发动一波接一波的强势宣传攻势，一方面实现了以苏联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苏维埃文化的营造，一方面利用这种反美宣传在民众心理中完成了“敌人”形象的构建。^②笔者认为，这相辅相成的两面都达到了预期效果，对于此时的反美宣传而言是成功的。

进而言之，这种被宣传出来的“敌人”形象，在苏联民众心理中强化了对美国的负面印象，并由此导致对美国的普遍厌恶与憎恨心理，构成了这一时期苏维埃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而这一特征的实质，就是上文言及的美国

① Фатеев А. В. Образ врага в совет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е: 1945-1954 гг. С.5.

②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Редкол.: ...А. О. Чубарьян (отв. ред.) и др. М.: ИВИ РАН, 1997. С.169.

统治集团及其内政外交腐朽与落后的反面——苏联政治体制的合法及政治文化的合理。从这一点来看，文化冷战的勃发与兴盛，足以印证苏美之间所进行的是一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的全方位的总体对抗，双方不仅采取各种措施对抗，而且都试图在文化层面与意识形态上为这种对抗寻找合理性与合法性。从这一层面可以如此理解苏美文化冷战爆发的逻辑：双方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政治、经济对抗的同时，还在进行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的输出与对抗。围绕这种输出与对抗，各方不仅要积极论证本方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而且要极力否认对方的合法与正当，由此产生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上的冲突，这就是文化冷战。

再回到这一时期苏联的反美宣传，可以看到，相对于以后苏联的反美宣传活动，此时高潮迭起的宣传浪潮不仅具有鲜明的突击性，而且深深烙印了斯大林、日丹诺夫等人的个人特征与时代烙印。对反美宣传以及整个意识形态宣传的高度重视，可以从这一时期斯大林与日丹诺夫的多次演说中发现。而意识形态宣传高潮退去之后的后斯大林时代，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再也没有掀起如此高度和烈度的反美宣传活动。同时，电视等新兴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也迅速改变了以报刊杂志为主的宣传方式。苏联普通民众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接触机会的增多，也使得这种封闭式的宣传活动所能达到的效果再也无法和以往相比。

【Abstract】 Propaganda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Soviet ideology control system. The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branches adapted themselves to the new situation when the Cold War began and initiated a systematic and continuing anti-US propaganda for the sake of shaping an image that “US is the enemy of the Soviet Union” among the mass. This strategy was quite successful and the propaganda itself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Cultural Cold War as well. Thu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Soviet ideology control, the propaganda system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it is very imperative to study the anti-US propagand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Key Words】 Soviet Central Propaganda Department, Cultural Cold War,

Anti-US Propaganda

【Аннотация】 Одной из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ы СССР является придание больш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проведению пропаганды и агитации. После начала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между СССР и США СССР провёл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и реформу механизма пропаганды. После этого Агитпроп ЦК ВКП(б) провёл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ую и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ую антиамериканскую пропаганду во всём СССР с целью создания образа «Америки — врага народа СССР». Эта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ая и прочная анти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прошла очень успешно,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тому, что отвращение и враждебность к США и Западу успешно проникли в сознание простых граждан, и это впоследствии стало ядром сове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Изуч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анти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в нача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имеет важ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понимания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механизма пропаганды и идеологии того периода, наблюдения за фактором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культурной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е начального периода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и т.д.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Агитпроп ЦК ВКП(б), культурная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анти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责任编辑 孙超)

社会主义研究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的社会主义主张与实践*

杨奎松**

【内容提要】1917 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俄国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显示，作为落后国家的共产党人，他相信可以人为地创造先进的生产关系，进而改造提升落后的生产力，以实现社会主义。基于这一认识，列宁不可避免地过分强调了革命和暴力的作用，并且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列宁生前虽然没有能够成功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和主张，却影响了以后几乎所有落后国家的共产党人。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虽然与马克思、恩格斯原先的设想有所不同，却还是在相当程度上依然继承了马克思的某些思想和主张。

【关键词】十月革命 列宁 社会主义 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B03(51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 (2013) 01-0107-(40)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主张有着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即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所以相信人类必然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他们认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仅不能适应，而且已经在严重阻碍生产力高速发展这一事实判断的基础上的。但几乎就在马克思去

* 本文得到了上海市重点学科项目 B405 的支持。

** 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世之时，资本主义第二次工业革命就超乎马克思的想象再度迅速展开，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分化。一方面，晚年恩格斯不能不对此前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有所修正，另一方面，恩格斯参与组织的国际社会主义大会，即第二国际的各国党，在恩格斯去世后很快即公开分裂成为改良和激进尖锐对立的两部分。越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欧洲落后国家的激进社会主义者，越会坚定地拥护马克思去世前提出的那些革命主张。^①

俄国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欧洲最落后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经历了这样一种分裂。坚信马克思革命社会主义主张的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领导下，于1917年发动十月革命，一举夺取了政权，似乎为验证马克思革命的社会主义观点没有过时提供了有力的证明。但是，第一，马克思从来不相信可以在一国单独实行社会主义；第二，马克思更不相信可以在落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因此，夺权成功的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后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过的那样，让俄国革命成为整个欧洲革命的导火索，引燃资本主义这个火药桶，在世界范围彻底摧毁资本主义，从而开辟人类通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②

从今天已经大量解密的俄国档案当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等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当年曾经多么相信这种世界革命的理念。他们不仅确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在一国内单独成功，必须是“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的观点，而且为了巩固俄国革命的成果，不惜身体力行，向外输出革命。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俄国国内问题成堆，绝大多数俄国人连肚子都填不饱，布尔什维克却倾其所能地向各国大批派出宣传鼓动人员，把没收来的沙皇、贵族、教会的金银财宝拿到欧洲黑市上去变卖，换成大笔现金，不是为了俄国，而是无偿提供给欧洲各国有意追随俄国布尔什维克打倒资本主义的革命党人，帮助他们建立组织和发动起

① 参见唐纳德·萨松著：《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上），姜辉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9-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1882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19-220页。

义。^①像马克思曾经相信过的一样，列宁最初也认为，俄国革命的火星足够引燃欧洲资本主义这个即将爆炸的火药桶了。

很显然，即使相信世界革命必定会成功，列宁也不可能把全部赌注压在欧洲革命的前景上。在对外输出革命的同时，列宁也不能不全力以赴地为巩固得来不易的政权而战。而要切实巩固取得的政权，又非得按照其能够想到的理想模式来根本改造俄国不可。换言之，不管俄国有多么落后，作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列宁，也只有把俄国引上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这一条道路可走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前提所以会变成俄国革命争取的一种奋斗目标，实在无可避免。

一、列宁的革命社会主义观

关于列宁主义是否即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后人常常有非常不同的看法。一个最容易给出的批评，即如考茨基所再三指出过的那样，列宁混淆了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无限夸大了阶级斗争在社会进化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不过，说列宁背离或曲解了马克思主义，那是不正确的。

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十九世纪中叶，特别是他们开始断言资本主义正在灭亡，号召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的时候，其实资本主义正处于其生产力发展的初级阶段，亦即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又称之为蒸汽机时代。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也并非毫无认识。就在 1848 年他们发表《共产党宣言》，宣判资本主义死刑的时候，就不能不承认：当时即使在资本主义最发达、革命“最快最容易”的英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还达不到马上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因为还“不能一下子就把现在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建立公有经济所必要的程度”。无产阶级革命即使成功，也还只能“逐步地改造现社会，并且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的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②至于在其他资本主义尚未发展起来的欧洲国家，“在资产

^① П·А·舍沃楚科夫：“国内战争与世界革命”，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90 年代国外学者论十月革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年，第 296-330 页；John Gooding, *Socialism in Russia: Lenin and his Legacy, 1890-1991*, Palgrave, New York, 2002, p.64.

^②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 年 11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39 页。

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①

他们认为，在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新的生产关系还没有条件诞生出来，因而还不应也不能人为地去制造或加速革命，破坏仍旧拥有生产力发展巨大空间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他们主张，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尚未发展到会直接引发社会革命程度的那些国家，还必须要高度重视革命的阶段性，不能过早地把斗争矛头对准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

比如，对法国，马克思固然欢呼和鼓动法国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却十分清楚法国的无产阶级还远不足以独树一帜，去争取自己阶级革命的胜利。他主张：无论是为了法国无产阶级自身的利益，还是基于现实的力量对比，法国工人眼下都“需要联合资产阶级”一同奋斗。^②

对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远比法国落后的德国，他们就更不指望无产阶级直接革命了。恩格斯明确讲，在德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要把不同阶级联合起来反对专制政权，“运动的直接要求和环境不允许把无产阶级党的任何特殊要求提到首位。事实上，当工人进行独立行动的场地尚未扫清，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尚未实现，36 个大小邦照旧把德国分成无数小块的时候，无产阶级党除了注视对自己具有极重要意义的巴黎运动，以及和小商人一起共同争取那些使他们日后能够为自身的事业进行斗争的权利以外，别的还能做些什么呢？”^③

不难看出，1848 年《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还仅仅是认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前景，他们只是因为相信阶级斗争的效力和作用，因而不顾一切地到处推动各种可能的阶级斗争，试图以此来加速无产阶级的成熟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不管当时多数欧洲国家的革命离所谓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评述”，1850 年 11 月 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513-514 页。

② 马克思：“1948 年至 19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 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99-341 页。

③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951-1852 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511-512，516-517 页。

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有多远，他们的想法是：“社会党人总是积极参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经历的每个发展阶段，而且，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这些阶段只不过是导致首要的伟大目的的阶梯。这个目的就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他们的位置是在为每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益而斗争的战士的行列中；但是，他们只是把所有这些政治的或经济的利益看作**分期偿付的债款**。”哪怕这些斗争所促成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因为，任何一种“当前革命运动的胜利都只能使我们更加强大，并且给我们创造出一种更为有利的**环境**。”^①

列宁正是按照马克思的上述观点来实践俄国革命的，只是生活在高度发达的英国的马克思、恩格斯，无论如何还十分重视革命的阶段论；而生活在落后的俄国的列宁，却更多地把这种重视看成是一种斗争策略了。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对欧洲革命的阶段性有较清楚的了解，因此，在最初提出通往未来理想社会的《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两文里，他们就非常明确地把革命的当前任务限定在了民主革命的步骤上。列宁也高度重视两文，但他对马、恩提出的革命步骤却未予以重视。

马克思、恩格斯明白地提出：无产阶级在革命之初，政治上必须把争取普选权和实现民主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经济上必须依据现有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里的“一步一步”，就是要避免不加区别地实施暴力剥夺，而应首先着眼于“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

这种“强制性的干涉”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马、恩写道：

1. 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 征收高额累进税。
3. 废除继承权。
4. 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

^① 恩格斯：“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1894年1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4-455页。

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

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①

类似的主张还可见于马克思、恩格斯等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即第一国际）1848年拟定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以及恩格斯1891年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批判等文件。针对德国还处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情况，他们明确主张，共产党的政策必须着眼于满足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几方面的利益，政治上要实现民主，经济上不能很快提出消灭私有制一类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②

从上述可知，即使在公开宣告资本主义即将寿终正寝，号召无产阶级起来革命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完全丧失他们对冲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前提的理性判断。他们不仅在政治上相信必须要用民主和普选的方式来实现统治，而且认为多数国家还没有达到可以一步剥夺资产阶级、全面实行公有制的程度。因此，他们一方面固然坚决主张用国家所有制替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另一方面却反对夺权后不加区别地剥夺包括所有地主、资本家的所有财产，而且主张要继续延用资本主义现存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诸如在农业方面可以像资产阶级在工业方面所做过的那样，把农民组织成像军队那样有着严格纪律和巨大效力的“产业军”等。^③

在这方面，恩格斯对革命后应该采取的措施比马克思还要谨慎。他提出：即使上述措施也“不能一下子都实行起来”，国有化的实现过程需要“一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等：“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1848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5页，等。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9，294页。

一步地”和“一个跟着一个”地进行。强力“没收”只能针对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社会贫富悬殊的现状暂时也还需要通过税收的办法来平衡。重要的是要把土地、银行、运输等生产利赢事业设法集中到国家手里来，尽快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但废除财产继承权应先着眼于“旁系亲属”，然后再考虑直系亲属；对土地所有者、工厂主等等的私人财产，也应着眼于“限制”，“逐步剥夺”之。就是“剥夺”，也应采取非暴力的办法，即“一部分用国家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当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还达不到足够实行公有制的水平的情况下，绝不能轻易废除私有制。^①

恩格斯对此解释说：所以要逐步地和分阶段地将全部资本集中到国家的手中，是因为先要为这一转变准备好足够的生产资料。即使资本主义出现严重危机局面，无产阶级革命时机到来、革命的成功，也只能取决于国家的生产力能否极大增长。因为，只有生产力极大增长，生产资料迅速增多，国有化措施实现的可能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集中化程度才会相应地增长。也只有到那时，私有制才能“自行灭亡”。^②

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的切身体验，和一心想要把俄国变成世界革命出发点的渴望，使列宁更多地考虑的是如何迅速巩固政权和改造俄国，使之适应革命所需。因此，他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必须要经过一个暴力和专政的过渡时期的观点高度重视，却明显地不重视马克思的生产力观点。在他看来：落后国家完全可以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速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他声称：只要我们策略得当，我们就不难把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工作，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掉。^③

也正因为如此，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的政治民主和普选制度的建设也很少重视。他只是在革命前和革命成功之初一度相信无产阶级因为占人口的大多数，因此镇压极少数人不需要复杂的国家机器，只要有最简单

①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09-210页。

② 同上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0页。

③ 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11月7日，《列宁全集》第42卷，第172页。

的国家机器就足够了。但不久以后他的看法就发生了改变。他几乎是一遍一遍地告诫全党说：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的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是非用尽一切手段不可，包括必须用于社会生产、分配等各个方面的。^①比如，必须要维持铁的“‘工厂’纪律”，将全体公民置于“极严格的监督”下，“在正确遵守劳动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劳动，同等地领取报酬。”^②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理智上很清楚：作为一个90%左右是农业人口、70%以上的国民还是文盲的国家，“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原因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社会主义必须要从资本主义，而不可能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中生长起来。^③

但是，和所有理想主义的革命者一样，列宁相信新社会是可以靠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出来的。因此，尽管他不可能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但他仍然坚信，扫除一切剥夺压迫，达成共产主义的天经地义，就是“消灭私有制”。^④在他看来，既然新社会的要件就是“消灭私有制”，那么，只要能够通过强力剥夺富人，使“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和全部产业”，“成为全部住宅、工厂和劳动工具的集体所有者”，社会主义社会又有什么不可能实现的呢？^⑤

即使是在实践中碰了壁，回过头来改行新经济政策之后，他的这一基本认识逻辑仍未改变。列宁去世前提出的一段人所共知的关于落后国家建立社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9月，《列宁全集》第31卷，第22，24，27，33，40，41，46-47，55，82，84，86-87页。

②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9月，《列宁全集》第31卷，第16，46，59-60，89，91，94，95，96-97页。

③ 列宁：“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1917年3月，《列宁全集》第29卷，第90页；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全集》第11卷，第3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也认为“消灭私有制”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即所谓“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2页。

⑤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21年4月10日；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1921年4月24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6-167，355页。

会主义需要首先创造“政治前提”的名言，即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他针对第二国际坚持生产力观点的所谓“金科玉律”尖锐地反驳说：你们说：“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自己：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马克思 1856 年就提出过普鲁士农民革命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有争取社会主义的可能前途，半个多世纪之后，已经处在革命边缘的俄国，又被卷入到帝国主义战争的特殊环境下，谁能说“正在卷入和已经卷入世界历史总进程的每个国家的各基本阶级的基本相互关系”不会因此改变呢？他并且据此强调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按指文明程度——引者）……，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的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①

二、全力实施国有化的措施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逻辑，1917年4月上旬，即刚一得到推翻沙皇政权的二月革命成功的消息，列宁就已经在明确主张要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了。他丝毫没有考虑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任何剥夺性措施都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结合、逐步实行的主张。4月16日，他从流放地苏黎世回到彼得格勒，就明确提出：要“立刻有系统地、逐步地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立刻把全国所有银行合并成一个全国性的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把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建立在公有基础上的农场”。他宣称：这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但我们要促其实现。因为，“没有社会主义，就不能使人类摆脱

^① 列宁：“论我国革命”，1923年1月16日，《列宁全集》第43卷，1957年，第370-371页。

战争和饥饿，就免不了还会有千千万万人的死亡。”^① 9月，眼看夺取政权的斗争迫在眉睫，列宁进一步告诫党人称：“在二十世纪的俄国，在用革命手段取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俄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采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要想前进是不可能的。”一个月后，他又解释说：我们不知道西欧革命是不是会很快到来，因此我们现在还不能放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最低纲领，但是，我们必须同时开始奋不顾身地向社会主义前进。^②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伊始，领导起义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即通过告俄国公民书和各项决议，宣告关闭反动报纸，征用公寓和私人汽车，并采取了“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等项措施。^③列宁随即宣布说：十月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大踏步地向社会主义前进”，“我们的任务就是向社会主义前进”，我们就是要把一切土地、粮食、工厂、工具、产品和运输设备，变成全民的财产。“消灭土地私有制、实行工人监督和银行国有化，这一切都是导向社会主义的措施。”^④11月，列宁已开始具体设想如何通过只占全国人口不过百分之几的少数工人的监督来达成“银行国有化”、“工业国有化”、“强迫参加消费合作社”、“国家垄断对外贸易”，以及把工业品掌握在国家手里，以供应农村、换取粮食等一系列强制性经济措施了。^⑤而为了贯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则，列宁紧接着又提出：“凡

① 列宁：“远方来信（第五封）”，1917年4月8日；列宁：“四月提纲初稿”，1917年4月16日；列宁：“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1917年4月17日；列宁：“路易·勃朗主义”，1917年4月21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53-54，98-99，108-109，130页。

② 列宁：“大难当头，出路何在？”，1917年，《列宁选集》第3卷，第162-163页；列宁：“论修改党纲”，1917年10月19-21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365-366页。

③ “告俄国公民书”，1917年11月7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决议”，1917年11月8日；“没收出租住房法令的提纲”，1917年11月20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1，105页。

④ 列宁：“关于出版问题的讲话”，1917年11月17日；列宁：“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前线代表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917年11月17日；列宁：“告人民书”，1917年11月18日；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总结发言”，1917年12月1日；列宁：“关于党的任务的提纲+目前形势”，1917年11月，《列宁全集》第33卷，第50，59，62-63，95，128页。

⑤ 列宁：“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1917年11月17日；列宁：“经济措施纲要草案”，1917年12月12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52，121页。

属富有阶级者（即每月收入在 500 卢布以上者，拥有城市不动产、股票或 1000 卢布以上现款者），以及银行、股份企业、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职员”，一律要参加“义务劳动”或从事苏维埃机关指定的工作。凡不遵守相关规定者，“每次罚 5000 卢布以下现金，处一年以下徒刑或押送前线”。^①

对于列宁来说，所谓社会主义，主要就是实现大机器生产条件下的生产社会化。因此，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他看来最具决定意义的事情有两件：一是实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二是取消商品经济，“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②很显然，列宁认为前一条不难做到。

继土地社会化的法令颁布之后，1917 年底 1918 年初，苏维埃政府又先后颁布了将银行、铁路、商船、外贸以及大工业企业等收归国有的法令；明令全国公民都必须加入某个消费合作社，由政府配给粮食和其他必需品；宣布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凡 16 岁至 55 岁的男女公民都必须做苏维埃机关指定的工作；规定农民不分贫富一概平均使用土地、农具和牲畜，其他多余的物品都要没收。

除了有关粮食专卖、武装征粮和余粮征收一类法令直接和当时的粮荒及军需相关联外，苏维埃政府这时发布了许多法令。严格地说，这些法令和政策并不是像后来俄共历史所说的，是为了应对战争环境，被迫实行的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措施”。恰恰相反，它们更多的其实是旨在利用革命及战争条件，加速实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像 1918 年 6 月 28 日发布的将一切企业资本及财产收归国有的法令、11 月发布的对国内私营商业实行国有化政策和征用政策的相关法令、12 月发布的对有机动力而雇工 5 人以上或无机动力雇工 10 人以上的小企业收归国有的法令等，都是为了这一目的。

到 1920 年，苏俄工业实际上就已经全面“国有化”了。即使是占比例很小的非国有小作坊，也都受到政府部门的监督，而且不接受国家的加工定货任务，就没有生存的可能了。

① 列宁：“给费·埃·捷尔任斯基的便条并附法令草案”，1917 年 12 月 17 日，《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158-159 页。

② 列宁：“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1914 年 3 月；列宁：“左派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914 年 6 月 19 日，《列宁全集》第 25 卷，第 53，313 页；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 年 4 月，《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158 页。

对此，考茨基当时就明确地提出过批评。他指出，列宁领导的俄共（布）在剥夺、没收各种银行、企业和生产部门的时候，完全没有依据马克思唯物史观所要求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原则，科学地研究过，是否有可能按照主观计划来组织生产与分配。布尔什维克甚至没有认真地考虑过马克思、恩格斯所担心的国有体制变相资本化、官僚化的严重危险性。考茨基指出，俄国的革命党人只是满足于国有化的进程，并在国有化逐渐实现的过程中依照主观想象，在创造一个没有市场和货币作用，纯粹在国家计划内的产品生产与分配的乌托邦的生产方式。^①现实与列宁过去所估计的只要有简单的计算就可以完成的预想相距甚远。土地以及工矿企业的国有化，不仅没有带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言的“使国家的生产力大大增长”的情况，还因为大批职员抵制、工人怠工，生产出现了严重下降的局面。彼得格勒当局因此不惜将所有被认为公开拒绝服从革命政府的旧职员定性为“人民的敌人”，把他们的姓名公布在政府的报纸上。^②列宁激烈地指责那些掌握着生产和管理技能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多半是反革命分子”，坚称：“没有知识分子，没有资本家，他们（指工人——引者）也能组织工业”。但现实是，工业化的管理、经营和生产，都需要专门的知识技术，因此他在痛恨这些不驯服的“人民的敌人”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要走向社会主义，“没有知识分子、专家这些有学问的人的建议和指导性的意见是不行的。”结果，事实上新政权面对客观现实还是要用高薪赎买来换取这些“旧人物”的妥协与服从。用列宁的话来说，这只是一种过渡时期的让步措施，是为了暂时利用他们来帮助工人学会生产和分配的计算、监督和尽可能提高劳动效率。^③

① 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马清槐译，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第125-126页。

② 转见 George Leggett, *The Cheka: Lenin's Political Pol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13-15.

③ 列宁：“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的人们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人们”，1918年1月6-9日；列宁：“怎样组织竞赛？”，1918年1月6-9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198，203-210页；列宁：“在全俄国际主义者教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6月5日；列宁：“在西蒙诺沃分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6月29日；列宁：“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莫斯科工会整理会庆祝会上的讲话”，1918年11月6日；列宁：“在中部各省分期农民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18年11月8日，《列宁全集》第34卷，第392，423，440页；第35卷，第138-139页。

因为相信经济生产上的种种复杂情况多半是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经济所导致的，这种市场经济，尤其是建立在金融投机和金钱交易基础上的经济生产不可能促成社会主义，因此，苏维埃新政权很快就在全国范围设立了管理总局，全面掌管企业产、供、销的各个环节，进而开始实施取缔市场并取消货币的措施，意图由中央机关统一计划和安排各地的工农业生产。为此，1919年3月，全俄人民委员会首先颁布了全国食品及日用品实行统一消费配给的法令。将近一年后，即1920年1月，新政权即发布了撤销银行、废除货币的法令。同时，为满足社会人们的生活所需，各地开始按照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有过的尝试，开始广泛建立公共食堂，并为儿童、工人、职员、红军及家属提供免费膳食及水、电、住房等。邮电、铁路等免费使用的政策也相继出台。^①所有这些，都是按照社会主义理想的统一生产和统一分配的思路，靠政治强力创造出来的。

在列宁的主观想象中，“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只要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不复存在，社会一切产品完全按照国家统一的计划生产和分配，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确立起来了。他明确说：“既然实行了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的经济制度，我们也就直接进入了一种与以前不同的生产和分配制度”，也“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②

苏维埃革命成功后，俄国面临着社会动荡、国家破碎、内外战争、经济危机、粮食恐慌……等种种严峻形势，任何正常的执政者都知道，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大规模的全面改革，与民争利，而是要与民更始，休养生息，以便恢复经济。列宁为何反其道而行之，不顾如此恶劣的环境和条件，甚至不惜通过所谓“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来全面夺占社会财富呢？这其实和马克

① 参见列宁：“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1917年12月；“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1918年1月，《列宁全集》第33卷，第176-178，224，227页；列宁：“关于粮食专卖法令的要点”，1918年5月8日，《列宁全集》第34卷，第295页；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5-56，62-63，73-75页。

② 参见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23日，《列宁全集》第37卷，第263-272页；俄共（布）八大：“俄国共产党（布）党纲”，1919年12月，《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8，610，773页；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1921年10月17日，《列宁全集》第42卷，第182，221页，等。

思的一些革命主张也是有关系的。

还在 1850 年，马克思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宣言中就曾提出过，即使是在法国这样还不能直接提出共产主义（按即社会主义）任务的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的革命一旦发生，无论革命的工人自身力量如何，都应当发起“对私有制度的直接攻击”。比如，应“迫使民主派尽可能多方面地触动现存的社会制度，干扰现在社会制度的正常进展，使他们自己丧失威信，并尽量把生产力、交通工具、工厂、铁路等等由国家集中掌握。”而且工人应该不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合作者的意志，要求“施行累进率极大而使大资本必遭覆灭的累进税”，要求把铁路和工厂“作为反动派财产由国家加以没收，不予任何补偿”，等等。^①虽然马克思并没有设想在这个阶段即全面取消市场和货币，实施共产主义分配方式的极端措施，但这类在民主革命阶段即应着手对私有制度进行直接攻击的思想，无疑对列宁的革命理念产生了影响。

俄国革命成功后，新政权几乎每一步剥夺富人财富、消灭私有制的措施都顺利地实现了，这就更加让列宁产生了社会主义很快就能成功的幻想。1918 年 4 月，即十月革命半年之际，他还谨慎地告诫党内干部说：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要求顽强持久地工作和具备我们所缺乏的相应知识。即使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更加成熟一些，也未必能完全过渡到社会主义。”^②两年多以后，即到 1920 年 10 月的时候，他已经不这样看问题了。他公开宣告说：俄国实现共产主义（按指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已经为期不远了，也许用不到 10-20 年的时间，年轻人“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至少，“现在 15 岁的这一代人，就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手建设这个社会”了。^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 年 3 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71-373 页。

②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1918 年 4 月 29 日，《列宁全集》第 34 卷，第 243 页。

③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 年 10 月 2 日，《列宁全集》第 39 卷，第 311 页。

三、全面实行政治集权的经过

其实，列宁上台伊始就全力推行所谓战时共产主义的一个核心目的，正如有的俄国学者所说，根本上也是为了牢固地控制国家的最高权力。^①布尔什维克激进的剥夺、改造措施，从一开始就受到各种力量，包括苏维埃政权内其他工人、农民代表及其党派团体的质疑、抵制，甚至反对。但是，因为信奉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念，习惯于把任何政治上的不同利益冲突及其意见分歧看成是不同阶级间阶级斗争的表现，因此，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动辄就会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办法来对待这些质疑或反对者。更有甚者，由于布尔什维克是运用革命暴力取得的政权，并且相信马克思关于国家即暴力机器，无产阶级必须掌握国家，运用暴力，实行革命专政的学说，因此，它常常会毫不含糊地用暴力与专政的办法来对待一切异己的力量。列宁即声称：如果发生强力镇压的情况，“概由反抗者负责”。^②至于反抗者是否真的属于剥削阶级，列宁其实并不看重。因为，新政权及其新政策的反对者，并不都是社会富裕阶层的分子，一切只能以政治态度和政策观点来划线。故列宁所要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并不是简单地建立在俄国产业工人群体的拥护和参与之上的。像列宁每每所谴责的所谓“资产阶级”，其实多半只是指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即使他们同样出身于工人、农民和士兵，只要站在了反对力量一边，就是革命的敌人。

十月革命的核心口号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所以还必须要提出这样的口号，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当时还没有独立掌权的资本，但它在苏维埃中占据着较有利的地位。那个时候的全俄苏维埃是由同为社会民主工党的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左、右派等组织的代表，连同其他工农士兵组织的代表共同组成的。要取得执政的地位，就必须要赢得多数席位或多数代表的支持。当时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革命党两个政党，一个主要在工人当中活动，一个主要在农民当中活动，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革命爆发前夕，

① 转见张广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副博士B·Л·捷利钦访谈录”，《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② 列宁：“在全俄海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7年12月5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110页。

布尔什维克约有党员 24 万人，孟什维克约有党员 20 万人，社会革命党约有党员 50 万人。在社会革命党内，“左派组织局”即其左翼，约有党员 8 万人。在二月革命后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两党加起来就占了 700-800 名代表的席位，而布尔什维克只得到了 100 多名代表的席位。因此，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自然也就成了新的临时政府的主导力量。

列宁很清楚，这几个党实际上都是工农政党，都赞成社会主义，只是各党内部都有派系存在，大家对何时搞社会主义有意见分歧。^①要取得执政地位，布尔什维克必须要有更能够迎合国内民众需要的，进而争取各地苏维埃代表支持的独立政策。列宁清楚地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和社会贫富分化的尖锐矛盾，因此，在他领导下，布尔什维克高举了反战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与出于民族主义立场坚持战争政策，且不赞成马上推行社会主义措施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不过几个月时间，临时政权因坚持战争政策，不能解决此前的种种危机，迅速失掉了民心，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威望很快就提升起来。在新一轮地区苏维埃代表选举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的票数从 11% 猛增到 55%，在彼得格勒从 20% 增加到 33%。^②同时，社会革命党自身也发生了分裂。结果当 11 月 7 日列宁领导发动武装起义时，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都有代表参与其中。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最初就是由 53 名布尔什维克、21 名社会革命党人、4 名无政府主义者和 1 名孟什维克组成的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还是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担任的。而彼得格勒起义成功后当晚召开的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共有 649 名代表参加，其中布尔什维克占了半数以上，达到 390 人，社会革命党仅 193 人，孟什维克约 80 人，另外还有波兰社会党、乌克兰社会党人的零星代表等。^③权衡形势，列宁主

① 列宁：“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917 年 4 月上旬，《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191 页。

② 列宁：“给同志们的信”，1917 年 10 月 30 日，《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390-391 页。

③ 参见 Г.Н. Голиков, М.И. Кузнецов. Великая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1977. С.113; 并见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苏共野史》，晨曦等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91 页。

动修改了布尔什维克的“土地国有化”纲领，宣布实行“土地社会化”，^①从而得到了代表劳动农民群体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得以组建由它单独执政的新政府——全俄人民委员会，列宁担任了最高领导职务——人民委员会主席。

布尔什维克能够单独执政，根本上还是由于作为少数派的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对布尔什维克的一系列主张持有严重异议，由于其代表人数不足以推翻布尔什维克的提案，在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他们即当场发表声明后退出了大会。因此，次日会议选举出的由 101 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变成了一个主要只是由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左派代表组成的苏维埃中央权力机构。其中，布尔什维克占 62 名，左派社会革命党占 29 名，还余下一些名额留给农民苏维埃代表和军队组织的代表来补充。又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希望等待整个社会革命党取得一致意见，所以暂时决定不派代表参加临时政府，即新的人民委员会，如此人民委员会才得以由布尔什维克一党来组成了。^②

这样的政府和权力构成，严格说来并没有推翻和否定此前苏维埃体制下的民主选举制度。因此，持反对立场的各个社会主义政党组织和各行业工农苏维埃依旧在民主秩序内发声和抗议。围绕着如何改组新的政府机构，使各个社会主义政党都能参与其中，布尔什维克也曾派代表与各党进行协商。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右翼坚持要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排除在政府之外，并坚持要限制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权力，因而遭到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等人的坚决抵制。围绕着要不要继续在民主体制内与各党派进一步沟通妥协的问题，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自身也发生了意见分歧。最终，中央执行委员会否定了谈判代表提出的继续谈判以求达成团结“大量无产阶级组织”，“组成社会主义政府”的意见。这一情况也造成了布尔什维克中央领导机构的严重分裂，5

① 列宁后来解释说，十月革命后公布的土地纲领“完全是按照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书照抄的”，这是一个让步，“当时他们拒绝参加政权”。但布尔什维克在实际上实行的办法是土地国有化，继续使用“‘社会化’一词不过是表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倾向、愿望和准备而已”。参见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1918 年 7 月 5 日；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 年 10-11 月，《列宁全集》第 34 卷，第 478 页；第 35 卷，第 314-315 页。

② 郑异凡：“有关十月革命的几个问题”，《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 年第 3 期。

名中央委员宣布退出中央执行委员会，10名人民委员宣布退出人民委员会。但是，12月10日，经由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推举出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意加入人民委员会，双方的代表人数足以选举组成新政府，故这一危机尚没有根本改变此前的民主体制。^①

不难看出，虽然十月革命和二月革命一样，都是靠武装起义取得的政权，由于苏维埃这种需要各党派代表共同发声的民主体制始终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布尔什维克也是靠民主选举机制取得政权的，故列宁最初也不能不十分重视对这种民主形式的利用。特别是在革命之初，布尔什维克只控制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座城市，它要想号令全国各级苏维埃，还非得借助于建立在民主选举基础上的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不可。故列宁最初并没有设想过要根本否定将俄国引向宪政民主的可能性。实际上，布尔什维克自二月革命以来抨击临时政府，包括十月革命推翻它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它拖延召开立宪会议，而布尔什维克一直在呼吁人民“把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②因此，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不仅公开承诺“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也公开承诺现政府即人民委员会以及各级苏维埃都只是“临时政府”，是立宪会议召开以前的各级最高权力机关，只负责“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管理国家”。他甚至宣布说：人民委员会现时所发布的一切法令和措施，最终都需要交由合法的立宪会议认可和批准才能正式具有法律效力。^③

主张高度集权的布尔什维克所以会容忍不同政党的存在，并努力维持多党政治的局面，不仅仅是因为当时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太小，需要公众支持，而且是因为它开始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想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经验的一种表现。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只能由无产阶级中的一派或一党来代表

① 郑异凡：“有关十月革命的几个问题”，《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3期。

② 列宁：“怎样保证立宪会议的成功”，1917年9月12日，《列宁全集》第32卷，第226页。

③ 列宁：“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1917年11月7日；列宁：“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决定”，1917年11月8日；列宁：“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的总结发言”，1917年11月8日；列宁：“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17年11月11日；列宁：“答复农民的问题”，1917年11月18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5-6，15，22，30-31，64页。

和实行。无论在《共产党宣言》中，还是在支持巴黎公社起义等革命实践中，他们都再三强调过：“共产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因此，他们不仅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且告诉人们，只要是工人们共同创立自己的政治统治，不论他们是否赞同马克思的主张，都是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伟大尝试，是通过普选制来实现多数人的统治的行动。^①

长期以来，列宁不仅清楚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存在不同党派、共产党应该与其他工人政党联合起来的观点，而且也一直在公开批评“少数人专政”的说法——无论是对布朗基主义的这种主张，还是对内外舆论的各种批评指责。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列宁也不止一次地公开讲过：新型苏维埃制度优越于过去旧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权已经掌握在工农政党的手里，人们再也不必通过起义的办法去夺权了。经过工农苏维埃代表会议，“政权从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只要通过和平的方法，简单改选的办法就行了。”^②

但是，这仅仅是列宁夺权之初的一种理想的想象罢了。事情很清楚，列宁虽然公开表示愿意同其他工农政党“分掌政权”，他同时却相信：第一，这种民主是以阶级分野为前提的，只有工农政党才有资格享受这种选举和竞争。第二，只有自己所代表的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主张和行动才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因此也只有拥护、接受布尔什维克政策、主张的政党，才可能是工农政党。基于此，他事实上早已开始相信，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本质上已沦为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了。也就是说，在俄国除了布尔什维克以外，并不存在有资格同布尔什维克竞争的其他工农政党。

① 马克思所高度评价和恩格斯所欢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榜样——巴黎公社，就是由许多工人派别的代表共同组成的权力机构。巴黎公社64名委员中，既有普鲁东分子，也有布朗基分子，也有新雅各宾主义者或无党派人士，只有一人算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称：“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1891年3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1-112页。

②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罢免权的报告”，1917年12月4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106-107页。

不仅如此，列宁同时还坚称：民主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的党占了多数，依据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原则，当然也只能由我们的党组织这个政府，“强迫我党放弃政权的任何企图都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背叛”。在我们掌权的条件下，我们同意与苏维埃中的少数分掌政权，那是我们的权利，而我们的条件也是这个少数必须忠实地服从布尔什维克的多数。没有人能够改变这种情况，除非少数派通过选举取得了苏维埃代表中的多数。^①

问题是，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原本就不是通过正常的民主选举程序取得多数获取权力的。它首先是靠强力推翻临时政府才取得重组政权的条件的；其次是在近半数苏维埃代表退出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并且是在构成选举有效性的不可缺少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主动放弃参加人民委员会的情况，才取得单独掌权的地位的。一旦重新回到所有代表参加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或其他民主选举形式中去，依靠民主选举再来获得其执政的合法性，显而易见可能性是很小的。因此，即使列宁真的想要恢复旧的法律架构内的民主选举方式，他也绝不会听任那种可能导致改变现状的危险出现。保持布尔什维克在全俄苏维埃代表中继续占多数，保持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资格，实际上是列宁愿否继续利用旧的民主制度的一条基本底线。

列宁在 1918 年 1 月初就曾专门引述过普列汉诺夫 1903 年讲过的一段话，以说明党在权力问题上的最高原则是什么。他介绍说：当年党内围绕着党的利益应该服从民主原则，还是民主原则应该服从我们党的利益，产生了严重的争论。普列汉诺夫表示：“对每一个民主原则都不应该孤立地、抽象地去看，而应该把它同可以称为基本民主原则的那个原则联系起来看。这个原则就是，人民的利益是最高法律。用革命者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胜利是最高法律。因此，如果为了革命的胜利需要暂时限制某一个民主原则的作用，那么，不作这种限制就是犯罪……这种措施是否适宜，只有根据革

^①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宣言”，1917 年 11 月 18-19 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1917 年 11 月 15 日；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多次派给少数派的最后通牒”，1917 年 11 月 16 日，《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67-68，41，43 页。

命的利益是最高法律这个原则才能判断。”^①基于同样的逻辑，曾经依靠民主选举取得了多数地位，并借机发动起义成功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虽然仍旧对在旧的民主架构和程序中取得政权的合法地位抱以相当的期待，但一旦新的民主选举形式，如立宪会议及其选举产生的结果不符合布尔什维克所认定的“人民的利益”，亦或“革命的利益”，结果就不难想见了。

1917年11月，选举在全俄展开。11月28日，注意到彼得格勒12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占了7席，列宁还非常高调地肯定立宪会议的作用和意义。几天后就不然了。选票统计的结果，在立法会议703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只得到175席，远低于社会革命党所获得的404席。加上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等，布尔什维克在整个选举中只得到了四分之一的席位。

面对立法会议的召开势必会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否定掉布尔什维克政权及其各项政策的合法性，列宁被迫全面改变了对立宪会议的原有态度。他随即开始采取种种措施来迫使立宪会议“服从于苏维埃政权”。^②

他首先下令逮捕被视为资产阶级政党的立宪民主党的全体领导成员，罪名是他们“同……反革命内战有联系”。^③接着，他以选举程序和代表数量不足为由，反对按时于12月11日召开立宪会议。他并通过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命令，要求地方苏维埃召回那些不符合其意愿的代表，重新改选。同时，他还发出警告说：“人民利益高于民主机关利益”，立宪会议当选代表的比例不符合人民真正的意志。按照人民的意志，“苏维埃高于任何会议、任何立宪会议。”因此，“任何人和任何机关攫取国家政权某种职能的任何尝试，都应视为反革命行动。任何这类尝试，苏维埃政权都将使用所拥有的一切手段予以镇压，直至使用武力。”^④

① 列宁：“普列汉诺夫论恐怖”，1918年1月4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188-189页。

② 列宁：“同美联社记者格·雅罗斯的谈话”，1917年12月28日；列宁“关于党的任务的提纲+目前形势”，1917年11月，《列宁全集》第33卷，第97，128页。

③ 列宁：“关于逮捕反革命内战祸首的法令”，1917年12月11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123页。

④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关于立宪会议问题的讲话”，1917年12月14日；列宁：“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7年12月15日；列宁：“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1917年12月24-25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132-134，137-139，163-167页。

考虑到选举的结果已难改变，坚持不召开立宪会议，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以及党的民主形象会严重受损，列宁最终还是勉强同意了于 1918 年 1 月 17 日在彼得格勒正式召开立宪会议。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代表决定作最后的努力。他们不仅参加了会议，而且尝试推动立宪会议通过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有利的决议。

布尔什维克党团在会场上向会议提交了要求与会代表承认苏维埃政府及其通过的各项措施的议案与声明，但多数会议代表投票反对。不仅如此，支持立宪会议召开的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群众在社会革命党人的领导下，还发动了游行和示威，反对苏维埃政府采取的可能破坏立宪会议顺利举行的种种举措。

次日，眼看无法与立宪会议多数代表取得妥协，早就做好准备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先是发表声明，宣布退出立宪会议。接着，政府动用军队镇压示威群众，^①进而用武力强行封闭了召开会议的塔夫利达宫，驱散了坚持在会场不肯离去的代表们。^②

19 日，列宁公开宣布废除旧的民主体制。他说：“立宪会议和全民投票都是按照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旧模式搞起来的”，它或许可以“统一整个民族的意志，创造狼同羊、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和睦共处的条件”，但它“不会带来劳动群众的代表机构”。苏维埃政权“既不要议会，也不要全民投票。它比这些都高，它使劳动者在不满意自己的政党的时候，可以改选自己的代表，把政权交给另一个政党，不必进行任何革命就可以改组政府。”^③

不难了解，列宁的这一宣告实际上仍然只是一种虚幻的画饼。所谓劳动者不满意就能够改选自己的代表，和平地把政权交给另一个政党的可能，根

① “致工人和全体公民的传单-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联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劳动人民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会共同的传单”，不早于 1918 年 1 月 5 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1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182 页。

② 列宁：“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1918 年 1 月 19 日；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党团声明”，1918 年 1 月 18 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1918 年 1 月 19 日，《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234-235，239-240，245 页，第 491-492 页注 111。

③ 列宁：“在全俄铁路员工非常代表大会上回答问题”，1918 年 1 月 19 日，《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305-306 页。

本就不存在。

1918年2月8日，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布尔什维克与左翼社会革命党结成统一战线，占据了94%的席位。大会批准了所有人民委员会颁布过的法令及政策措施，再度赋予了人民委员会作为苏维埃政府的合法地位。苏维埃政府取得合法地位后，马上就针对反对党展开了一系列镇压行动。4月中旬，它集中打击了一批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十月革命后，俄国无政府主义组织曾一度与布尔什维克合作，但这时它们已开始对布尔什维克的专政表现出强烈不满了。此次行动中仅莫斯科就有20处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地点受到清理，数百人被捕。

6月13日，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布恢复二月革命后曾经被公开废除的死刑。接着，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宣布将孟什维克、右派和中派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全数开除出执委会，并建议所有苏维埃将这些党派的代表开除出去。^①据此，各地数百家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被查封，所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占多数的苏维埃均被解散。

7月上旬，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团对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提出不信任案，遭到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否决。一名社会革命党人愤于政府与德国当局签订割让大片领土的“布列斯特条约”，在会议期间炸死了德国大使。列宁当即下令逮捕了与会的社会革命党代表数百人，13名被认为与这一刺杀有关系者被执行了死刑。^②列宁并且开始公开宣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已成为白卫分子、地主和资本家的帮凶”了。^③

8月30日，一名有民粹党倾向的青年学生刺杀了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音译为契卡）主席乌里茨基，另一个有社会革命党倾向的女人刺伤了列宁。苏维埃政府马上宣布用“群众性的红色恐怖”对一切反对派予以打击。据报，

① 见《列宁全集》第34卷，第574页注160。

② 列宁：“给约·维·斯大林的电报”，1918年7月7日，《列宁全集》第48卷，第227-228页；《列宁全集》第48卷，第808页注198。

③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和政府声明”，1918年7月15日，《列宁全集》第34卷，第494-495页。

几天之内，仅彼得格勒地方肃反委员会就处决了数百人。^①

从此，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里再没有竞争对手了。用列宁的话来说：“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没有什么条件可讲。要么他们毫无条件地服从我们，要么他们将遭到逮捕。”因为，布尔什维克和立宪党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以及非党人士，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列宁声称：是把他们“一律逮捕，关进牢狱，甚至枪毙呢，还是让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把几万工人和农民斩尽杀绝……，作出抉择并不困难。”^②

左派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闹翻后，整个苏维埃政权完全转移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手中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三套机构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班子，全都在列宁的主持之下。党的干部开始被委派到各级权力岗位上去，军队、司法、地方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乃至众多地方苏维埃会议，基本上都被党控制起来了。就连党内原来形式上具有的书记处、组织局向中央全会负责、中央全会向代表大会负责的权力关系，也转变成了列宁主导书记处（1919年俄共八大后又增加了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组织局领导中央全会，而中央全会领导代表大会的逆向结构。布尔什维克凌驾于国家和政府之上，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的政治局面逐渐形成。^③

由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分别影响着不同行业的工人和不同地区的贫苦农民，他们之间走向对立，也就使工人、农民，乃至士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阵营区别。因为要压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就必须压制直接支持他们的工人和农民，故苏维埃政府及其军队和身为秘密警察的契卡组织，不得不在工人、农民和士兵，即人民的名义下，实施了种种镇压工人、农民和士兵，即人民的行动。仅在1918年五、六月间，在布尔什维克占据绝对优势的彼得格勒就发生了数十起罢工、示威等工人的抗议活

① 《列宁全集》第48卷，第804页注173。

② 列宁：“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1919年7月4-7日，《列宁全集》第37卷，第56页；列宁：“给伊·尼·斯米尔诺夫的电报”，1920年3月9日，《列宁全集》第39卷，第296页。

③ 刘伟：《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官制研究》，吉林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第32-33页。

动，随之而来的就是针对工人聚居区的大搜捕，众多工人基层组织遭到解散，数百人被捕。

四、为夺取粮食向农民开战

为了取得内外战争的胜利和巩固城市政权，苏维埃政府还不得不在反对富农的旗号下发动了剥夺农民的斗争。这一行动引发了无数的抵抗和暴动，也促成了极其残酷的镇压行动。尽管，列宁非常清楚，打出反对富农的旗号只是一种策略，它实际上是在同曾经和布尔什维克一道反对地主、资本家的农民群众进行斗争。但是，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是建立在城市和军队的稳固之上的，为了确保城市和军队的粮食供应，它非展开这场斗争不可。因为正如列宁所说，这实际上是阶级斗争的继续，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私有制度的必由之路。

为了确保紧缺的粮食供应，十月革命刚一胜利，苏维埃政府就成立了粮食委员会。但当时的征没目标指的还是富人，它公开宣布：“现在是征收富人的余粮和其所有物资的时候了”。它为此派出了大批由士兵和失业工人组成的武装力量，专门前往生产谷物的省份去向那里的“富人”征收彼得格勒和前线所需的粮食。

但是，俄国能够囤积粮食的“富人”到底只是少数，单纯征收富人的余粮远远不足以解决粮食供应危机。1918年1月，长年战争，加上进入冬季缺粮季节，全国性的粮食危机出现了。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发布了直接针对全体农民的“余粮”征集办法，命令俄国农民必须交出所存的一切余粮，任何隐匿存粮者均将被枪决。^①为便利取得农民手中的粮食，它很快宣布解散了受到社会革命党影响的各地农村苏维埃组织，另立由新政府支持的“贫农委员会”，来控制农村权力，以便通过原本就缺吃少穿的贫苦农户，配合下乡的武装征粮队进行征粮，并揭发检举有余粮的农户。由于征粮中困难过多，列宁甚至提出建议，主张每乡要抓25-30个“富裕农民”做人质，征收达不

^① 列宁：“对人民委员会法令‘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补充”，1918年3月8或9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371页。

到预定数量，就拿这些人质抵命。^①

对于任何农民的反抗，列宁的态度都是一以贯之地坚决，即坚持：“必须最坚决、最迅速、最无情地镇压富农的暴动”；“采取无情的群众性恐怖手段对付富农、神父和白卫分子，把可疑者关进城外集中营”；“对富农中的首恶分子处以绞刑”；“要用最坚决的手段对付富农和他们狼狈为奸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匪帮”；“必须无情镇压富农吸血鬼”。凡参加暴动的农民的全部粮食都要彻底没收。^②

列宁声称：我们已经体验到了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好处，我们不能迁就农民。在他看来，农民说到底是小私有者，小私有者的个性就是自私、贪婪，只顾自己，不顾国家。凡不肯交净“余粮”者，就等同富农。在非常时期只能使用非常手段，“难道能用旧的方式，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解决，让农民趁机靠粮食大赚其钱”吗？^③

用强力手段解决政权问题，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成功；但是，用强力手段推进社会经济发展，乃至改变人民的生存状态，就不那么容易达成目的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存在决定意识。工人、农民也是人，是人就有物质需求。当政者能够提供给他们比旧的统治者多的物质条件的时候，当政者的理想鼓动、精神激励就能发挥作用；当政者给予他们的物质条件让他们连生存都感到困难的时候，无论用何种方式进行镇压，或用何种手段进行宣传，民众最终还是会反感、抵触，甚至起来造反的。

列宁异常大胆的社会主义尝试效果如何呢？

1920年，俄国的工业生产只相当于战前的七分之一，7万多公里的铁路和全国将近一半的机车车辆不能使用。最重要的煤炭基地顿巴斯矿设备大部损坏，矿井大量被水淹，产量还不足战前的十分之二。乌克兰冶金工业产量只有战前的4%，石油产量为战前的40%。全国215家国营棉纺厂中只有97

① 列宁：“致亚·德·瞿鲁巴”，1917年8月10日，《列宁全集》第48卷，第279页。

② 列宁：“给奔萨省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18年8月9日；列宁：“给博尔德列夫的电报”，1918年8月17日；列宁：“给奥廖尔省兹多罗韦茨执行地的电报”，1918年8月19日；列宁：“给利夫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18年8月20日，《列宁全集》第48卷，第277-278，297，301，311页。

③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1918年7月5日，《列宁全集》第34卷，第471页。

家还在维持生产，主要棉花生产基地土耳其斯坦的棉花加工业基本停产。1920 年全国产业工人总人数比战前竟然减少了 45%，许多工人因工厂停工而失业，大批工人因生活无着而不得不倒流回农村。由于货币严重贬值，以至于当时一个莫斯科工人的工资收入，只相当于他实际消费标准的 8%-20%，有工作的工人靠工资收入也无法维持生存。农村的情况自然更加糟糕。除了农民生活异常困苦，饥荒不断，牲畜大量减少外，大量经济作物较战前缩减了好几倍，粮食产量也只有战前的一半左右，却还要被政府组织的贫农委员会和武装征粮队强征而去，致使 1921-1922 年间数千万人陷入严重饥荒，饿病而死数百万人。^①

从 1920 年下半年开始，到 1921 年初，各地农民暴动就已经开始迅速蔓延起来。包括整个伏尔加河下游，乃至西伯利亚，30 几个省到处都掀起了农民反抗的浪潮。坦波夫、沃罗涅日和萨拉托夫等省的暴动武装多达 30 多个团，较大的暴动武装就有 160 余支，有的多达数万人，许多村子 50% 以上的男人都参加了暴动。政府军队仅 1921 年为镇压各地农民暴动，死伤逃亡就超过 17 万人，因为难以靠枪炮取胜，它甚至不得不使用毒气弹来对付这些农民了。^②

更为严重的是，这股浪潮不可避免地要波及到军队中来，各地陆续有军队哗变，加入农民起义。为了对付军队中的种种叛变行为，光是在彼得格勒喀琅施塔得基地，当局就秘密招募了 176 名情报人员，立案侦查了 2554 人。^③但即便如此，2 月 28 日，十月革命及革命后最初两年一直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当年作为十月革命主力的喀琅施塔得基地的 1 万多名官兵，还是集体发动了兵变，公开要求把列宁领导的共产党人从苏维埃政权机关中驱逐出

① 参见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70, том.17.С.463; Трифонова И. Я. Классы и классовая борьба в СССР в начале НЭПа (1921-1923 гг.).Л.,1969. С.26-28; Афанасьева Ю.Н.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развит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финал. М.,1997. С.58-60; Дэвис Р.У., Дмитренко В.П. Нэп: 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и потери, и др. М.,1994. С.31.

② 参见 Трифонова И. Я. Классы и классовая борьба в СССР в начале НЭПа (1921-1923 гг.).Л.,1969. С. 93-94, 44-245; 徐元宫：“苏联三次大饥荒真相”，《凤凰周刊》，2009 年第 14 期。

③ “芬兰国境警卫特别处 2 分部情报科科长报告摘要”，1921 年 2 月 24 日，纳乌莫夫·科萨科夫斯基编：《20 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1921 年的喀琅施塔得》，任建华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6-17 页。

去，从根本上改变现行政策。苏维埃政府虽然调集了六、七倍的兵力，围攻了十多天，最后平息了这场兵变，但工农群众与苏维埃政权日渐离心离德的趋势已难以逆转了。^①

喀琅施塔得基地红军官兵大规模武装反对共产党，和各省农民暴动的此伏彼起，终于使一心想要借助强力人为推进社会主义进程的列宁，多少冷静了下来。他被迫开始反思，不得不重新重视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供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来制订过渡政策。

列宁并不是不了解俄国农民自俄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走投无路的惨状。十月革命前，列宁动员民众起来革命的宣传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人民处于饥饿和破产的前夕”。^②新政府成立后不久，有关农民生存状态极端恶劣的信息更是铺天盖地。列宁自己就再三讲过：“大多数农民属于最贫苦的和贫苦的农民，他们不可能买卖余粮”；许多地方“有几万几十万几个月得不到一粒粮食的饥饿的农民”。^③列宁之所以一直坚决反对“向后退”，坚持大胆冒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过高地估计了俄国革命的发展阶段。

列宁最早认定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认定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只能是社会革命，只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只能“立刻坚决地、彻底地使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分子同小资产阶级分子分离”。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世界革命上”，相信俄国革命必将成为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革命的第一声炮响，只要欧洲革命群起响应，取得成功，一切困难都将得到克服。^④因此，不管俄国有多落后，在他看来，俄国布尔什维克理应尽最大努

① 周尚文等前引书，第94-98页。

② 列宁：“危机日益逼近，经济破坏日益严重”，1917年7月12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370，418页。

③ 列宁：“告工人农民书草案”，1918年5月29日；列宁：“在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1918年6月，《列宁全集》第34卷，第362页。

④ 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11月6日，《列宁全集》第40卷，第2页。

力，不让落后的俄国成为整个欧洲社会主义进程的累赘。^①这就是他为什么始终坚持，无论如何都要强制推行国有化措施，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前进，再多困难也不迁就农民及小私有者的根本原因。

然而，情况的发展完全出乎列宁的预料。几年时间过去了，欧洲革命还遥遥无期。苏俄的“社会主义”真正成了“处在帝国主义强盗势力的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个孤岛”，现在列宁不得不承认：欧洲革命不会很快爆发，俄国人只能“单独干”了。“单独干”的列宁没有别的选择，最现实的已经不是所有制的问题，而是没有面包了。国有化的措施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继续采用强力措施向农村征粮已经不可能，俄国开始出现大面积的饥荒。不仅农民没有粮食吃，工业原料乃至燃料也开始全面匮乏，许多工厂被迫关门，大批复员士兵无从安置，工人大量失业……，列宁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正摇摇欲坠。

1921年春夏，列宁终于不得不承认革命遭到了“最严重的失败”。为了避免走到各地政权全面瓦解的地步，他下决心停止一切国有化措施，提出必须从共产主义的措施上“退却”。他指出：不这样做，“在国际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要在俄国保住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而所谓退却，最主要的就是要在经济政策上“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向农民妥协，恢复自由贸易，否则将无拯救之策。^②

五、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

列宁从来就不是一个僵化的教条主义者，他能够不惜割让大片俄国领土

① 列宁：“四月提纲初稿”，1917年4月16日；列宁：“论策略书”，1917年4月8-13日；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4月23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101，145，150，167页；列宁：“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1918年1月24日，《列宁全集》第33卷，第279页；“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1918年5月14日；列宁：“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1918年3月7日，《列宁全集》第34卷，第307，12，13页。

② 列宁：“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1921年3月15日，《列宁全集》第41卷，第50-51页；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1921年10月17日，《列宁全集》第42卷，第184页。

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自然也就能够急流勇退，从进攻资本主义，转而迁就资本主义并与其保持某种妥协。^①列宁对此说得非常明白：“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利用资本家对利润的贪婪和托拉斯与托拉斯之间的敌对关系，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创造条件。”只要能够保住并巩固住革命政权，有助于改善俄国工人的生活状况使之恢复对政权的信任，今天“即使他们赚 150% 的利润，我们也在所不惜。”^②

1921 年 3 月 21 日，苏维埃政府通过法令，以低税额的实物税代替粮食和原料征集制，进而鼓励农民回到个体经营的生产方式上去。7 月，它接连发布法令，允许将已经倒闭和无法经营的国营企业租让给合作社及公民个人经营；允许个人可以自由从事手工业和开办雇工不超过 20 人的企业。8 月，它进一步发出指令，决定全面恢复货币流通、自由贸易和商品生产。10 月，它宣布重建已经被解散的国家银行，以适应商品经济和货币流通的需要。这一年 12 月，苏维埃政府甚至下令将已经收归国有的、雇工在 20 人以内的小企业，以出租的名义发还给了原业主。同时，政府还决定向外国资本出租俄国的工矿企业，以加快生产的恢复和经济状况的改善。^③这一系列列宁称之为“新经济政策”的措施，虽然没有使苏俄重新退回到 1918 年国有化措施之前的情况去，但却全面复辟了商品经济，再度远离了列宁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为了说明如此退让的合理性，列宁又重新回到了唯物史观的认识方法上来。他解释说：我们能不能从今天这种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和半野蛮状态占优势的俄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呢？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必须有一个条件，现在我们就有了……电气化。”而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使俄国布满了由电站和强大的技术设备组成的密网，必须使建成的每一座电站都成为教育的据点，必须扫除文盲，必须使大多数农民都有文化、有

① 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1922 年 11 月 21 日，《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297-298 页。

② 同文中列宁最后甚至提到就是让资本家赚 2000% 也行的话。列宁：“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关于租让的报告”，1921 年 4 月 11 日，《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164, 167 页。

③ 周尚文等前引书，第 100-106 页。

学识……。①

坦率地说，列宁不是真的不重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进入到 1920 年之后，他就已经在强调必须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生产上来了。他清楚地意识到再先进的生产关系如果没有先进的生产力为基础，终究是站不脚的。因为，“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必须记住。”他据此想到的解决方法自然也是要在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前提下，从生产力的发展上来了下功夫。比如，他就公开宣布说：所谓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他宣称：国内敌人的基础就是小农经济，这是资本主义的老根。

“要铲除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我国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只有电力才能成为这样的基础。”②为此，俄共中央还专门制定了一个国家电气化初步计划，计划用大量金卢布，花一二十年的时间，逐步让劳动人民掌握知识文化，进而分阶段实现这一建设共产主义的宏大计划。

为什么过去几年不能这样做呢？列宁解释说，我们不是不清楚“我们的文明程度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首先必须考虑的是，“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极小农的生产条件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我们当时以为，我们可以不用理会我国经济落后的实际状况，“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用政权的力量先行建立起一整套共产主义的制度体制来。“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我们就在经济战线上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

① 参见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1920 年 12 月 22 日，《列宁全集》第 40 卷，第 156 页；列宁：“论粮食税”，1921 年 4 月，《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217 页。

②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1920 年 12 月 22 日，《列宁全集》第 40 卷，第 141-142，143-157 页。

严重得多，危险得多。”^①

据此，列宁提出了迂回前行的观点。他说：“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②

“在我们和资本主义（暂时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并存的条件下，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③必须退回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生产方法上去，“而且要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的商业道路上去，要“恢复正常的经济关系体系，恢复小农经济”，非如此不能摆脱眼前的危机。他把这样的后退称之为“新经济政策”。^④

但是，像几乎所有充满着理想憧憬的革命领导人一样，列宁很清楚革命的共产党人别无他路可寻，只能千方百计追寻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实现方法。因此，他强调称：“不论有多大的困难，也要拉着车子前进、上山，而不让车子后退滚下来”，回到旧的道路上去。^⑤他固然承认过去的做法确有“错误”，承认俄国需要资本主义，却决不允许持异议者否定布尔什维克的既定的行进路线。他的政治逻辑依旧十分强硬：“谁不跟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对这个政权的任何微小的反抗都将被粉碎。”为此，俄共（布）中央甚至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以杜绝任何党内派别活动为口实，禁止党内不同意见。它进而不惜放弃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念，开始公开宣扬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党专政，说“无产阶级应该由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共产主义的少数来领导”，“这样的少数实质上就是政党”。甚至说：名义上是占人口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的专政，只能是“无产

① 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10月14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1921年10月17日，《列宁全集》第42卷，第184页；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2日，《列宁全集》第43卷，第390-391页。

② 列宁：“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1921年3月15日，《列宁全集》第41卷，第50页。

③ 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1921年10月，《列宁全集》第42卷，第176页。

④ 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1921年10月29日；“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1922年1月4日，《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8，229，365-366页。

⑤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1918年7月5日，《列宁全集》第34卷，第472页。

阶级中有组织和有觉悟的少数人的专政”。^①

为巩固到手的政权，面对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各种不同人群的敌视、怀疑和歧见，列宁不能不把苏联推上了一条依靠集权和强力统治的道路。即使在实行新政策，在经济上向资本主义让步的条件下，他不仅大力强化国家的镇压职能，而且为防患于未然，不惜大力发展曾经被马克思、恩格斯和他自己愤怒谴责的秘密警察系统，只是为了全面侦察并严密监视社会上一切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可能构成威胁的可疑动向和人物。^②

在阶级观点下，用极权的办法来防患于未然，直接的后果就是怀疑一切。这不仅容易反应过度，而且常常会导致打击面过宽，甚或严重的斗争“扩大化”。特别是在被迫进行经济政策调整、适度后退的情况下，列宁对国内各种中间或异己力量的动向变得更加敏感，尤其担心那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势力会与国际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再行造反。由此造成的一个最典型的因杯弓蛇影而盲目打击的例子，就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政府强制驱逐大批知识分子出国的所谓“哲学船事件”。

事情的发生是 1921 年俄国严重饥荒引起的。由于新政府政策失误，自革命成功以来就存在的粮食恐慌愈演愈烈，终于引发了全国大饥荒。到 1921 年春已是哀鸿遍野，死人无数了。在高尔基的提议下，部分著名知识分子决定组织非政府组织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组织及红十字会求援。早就无力应付危机的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允许这些知识分子出面活动。然而，此举不仅对一直高调宣传自身政绩的苏维埃政权的威信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而且，让这些对布尔什维克政策颇多批评的知识分子有机会直接面对国际舆论和接触外国人士，尤其令列宁等人高度敏感。

明明这件事是为救援自己国家的灾民，列宁却从一开始就抱着强烈的戒备和抵触心理。1921 年 6 月 28 日，他勉强同意了高尔基关于组织俄国知识分子集体向国际求援的提议。半个月后，俄共（布）中央也通过决定，批准

① 列宁：“在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共产党的作用的发言”，1920 年 7 月 23 日，《列宁全集》第 39 卷，第 224-225 页。

② 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0 年 3 月 13 日；列宁：“在全俄矿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0 年 4 月 4-6 日之间，《列宁全集》第 30 卷，第 232，324 页。

成立包括有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和谢尔盖·普罗科多维奇，以及名记者叶卡捷琳娜·库斯科娃等“社会活动家”参加的“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但就在决定通过当天，列宁就直白地告诫党的其他领导人说：对这些人“一定要严加防范，我们需要的是库斯科娃的名字、签字，并且从支持她（以及像她这类人）的人那里弄几车皮吃的来。仅此而已。”^①

8月下旬，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刚来苏俄进行灾情考察，只因得到消息说普罗科多维奇在一次集会上“发表了反政府的言论”，列宁问也不问具体内容，马上就作出了激烈的反应：下令“逮捕普罗科多维奇”，“解散”赈济饥民委员会，并要求“给各报社下个指示：明天就开始对‘库基什分子’^②进行百般嘲讽。”他的理由是，“外国人就要开始来了，必须把莫斯科的‘库基什分子’‘清除干净’，制止他们的表演（玩火）。”^③马上，政府控制的各种舆论迅速展开了一场对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成员的口诛笔伐，许多人被捕或被限制了行动自由。

1922年3月，考虑到大批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并无直接反对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具体行动，不能用判刑或其他刑事手段将他们治罪，但将他们留在俄国又无论如何不能放心，列宁首次提出：应考虑把这类知识分子“客客气气地送到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去”，说“那里才是这类农奴主最适合的地方”。^④

5月中旬，列宁明确指示肃反委员会全面审查一切非共产主义思想的出版物和教授、作家的政治历史、教学与创作信息，以便挑选出必须要全面监视的知识分子、作家、教授的名单，同时周密部署将他们驱逐出境的问题。他毫不含糊地宣称：“这些人全都是明目张胆的反革命分子，协约国的帮凶，协约国的一伙仆从、间谍和毒害青年学生的教唆犯。”“要不断地和有计划地

① 列宁：“致尼·亚·谢马什柯”，1921年7月12日，《列宁全集》第51卷，第48页。

② “库基什分子”，这是列宁对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委员的蔑称。“库基什”原意是表示嘲弄或轻蔑的一种手势，这里是将该委员会主要成员库斯科娃和基什金的姓氏缀合起来的读音。

③ 列宁：“致约·维·斯大林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1921年8月26日，《列宁全集》第51卷，第238-239页。

④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3月，《列宁全集》第43卷，第32页。

抓，并把他们驱逐出境。”^①他同时还主张：“应把枪决（也可代之以驱逐出境）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之类的一切活动。”^②

5月2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为此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6月3日，特别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向政治局提交了“关于知识分子中的反苏团体”的报告。经过特别委员会的周密审定和准备后，契卡和内务部联合行动，于8月16、17日在彼得格勒和乌克兰地区分头逮捕了普罗科多维奇和库斯科娃等160位著名知识分子、作家、编辑、历史学家和大学教授。^③

列宁趁热打铁地提出，凡属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及旧军校学生，特别是那些仍然同情他们的记者、编辑、作家等等，都“可以算是布尔什维最凶恶的敌人”，应考虑对各个城市中这类人“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洗”，并“立即放逐数百名这类人”。^④托洛茨基随后也对外国记者公开解释了这一驱逐政策的必要性。他宣称，与其把这些不肯改正的分子留在国内，将来成为敌人的军事和政治间谍而被我们处以极刑，不如现在就把他们驱逐出境。

就在来自美国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的援助行动刚刚开展起来的时候，苏维埃政府却将推动这一救援行动的大批知识分子或驱逐出境，或流放到边远地区去了。8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行政驱逐的法令。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在1922年9月23、29日，11月16日，以及年底，就有四批知识分子及其家属，在具结不许回国的文书后，被武装押上德国轮船，逐出了境外。被迫自费出境者和被流放国内边远地区者，还不包括在内。^⑤

① 列宁：“致费·埃·捷尔任斯基”，1922年5月19日，《列宁全集》第52卷，第449-450页。

② “对刑法典实施草案的补充和给库尔斯基的信”，1922年5月15日，《列宁全集》第43卷，第186页。

③ 林贤治：“一代知识分子的启程与回归”，《南方都市报》，2010年1月24日，GB20版。

④ 转见杜华：“1922年苏俄‘哲学船事件’始末”，《看历史》，2010年第3期；Russian center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study of historic documents, 2/2/1338, 转见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edited by Stéphane Courtois, et al.,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30-131.

⑤ 按照1923年1月20日政治保卫局给出的关于驱逐人数的报告和其他相关资料，据称正式被驱逐出境者67人，流放国内偏远地区者49人，另有46人下落不明。别尔嘉耶夫：《哲学船事件》，伍宇星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第20页，并转见徐元宫：“1922年苏俄知识精英被逐出国门”，《同舟共济》，2011年第2期。

不难想见，出于维护革命政权和实现革命理想的强烈欲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给了列宁以极大的思想理论支持。无论他在经济策略上如何退让、迂回，他对贯彻自己的理想目标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动摇。越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向资本主义妥协，他就越是高度重视阶级斗争和越强调谁战胜谁的问题。因此，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之日，也是列宁越来越强化阶级斗争和打击压制异己力量之时。他毫不含糊地宣称：必须“加紧惩治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敌人和资产阶级代理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凡是公开宣传孟什维克主义者，我们革命法庭应一律予以枪决。”“暴力和强制是必须的”，“对那些把俄国出卖给‘盟国’的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地主、资本家及其走狗不实行恐怖和镇压，是荒唐可笑的。企图‘说服’他们，‘感化’他们，是十分滑稽的。”即使是对小资产阶级，只要他们反对我们，我们也必须使用恐怖手段来对付他们。^①

1922年3月，继第十次代表大会禁止党内一切派别活动^②之后，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更进一步通过决议宣布：“剥夺一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集团的自由”，“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政党”。^③

列宁对此理直气壮。原因很简单，他认定资本主义是恶，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意在除恶，任何妨碍、阻挠苏维埃政权解放被压迫、被剥削者，追求至善的共产主义目标的言行，统统都是为虎作伥，是助纣为虐。在他看来，只要共产党能够牢牢地掌握住政权，就不怕内外任何障碍，一定能够最终实现社会主义。^④

① 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1921年10月17日；列宁：“关于司法部人民委员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1922年2月20日，《列宁全集》第42卷，第186，424-425页；列宁：“在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22年3月，《列宁全集》第43卷，第88页。

② 列宁：“俄国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决议草案初稿”，1921年3月14日，《列宁全集》第41卷，第78-79页。

③ 转见《苏联和苏俄刑事诉讼及法院和检察院组织立法史料汇编》（上），北京：法律出版社，1958年，第68页。

④ 列宁：“论我国革命”，1923年1月16日，《列宁全集》第43卷，第370-371页。

余 论

从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出发，列宁一直相信落后国家单独革命不会成功，因而寄希望于欧洲先进国家爆发革命。即使这种希望日渐渺茫，他也始终抱定这样的观念，即这个革命正在迅速成熟，苏俄需要的是“随机应变、退却和等待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最后成熟”。^①一直到1922年2月，即被迫退回到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列宁还是强调说：“我们向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②

但是，如果几个先进国家始终革命不起来，俄国就永远保持这样一种过渡状态吗？列宁其实并不甘心。1922年3月，他就已经告诉全党说：“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要重新部署力量，提出另一个目标了。俄国迈向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存在着的。因为，国家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主要经济力量操在我们手里。一切具有决定意义的大企业、铁路等等都操在我们手里……。俄国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的经济力量完全足以保证向共产主义过渡。”^③

1922年11月，新经济政策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列宁的信心进一步提升起来。他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再度向全国民众许愿，说：“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或者什么抽象图景，或者什么圣像的问题了。”“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任务。”“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之中，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④

① 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提纲”，1918年4月29日-5月3日之间，《列宁全集》第34卷，第257页。

② 列宁：“关于〈政论家札记〉一文的几点设想”，1922年2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640页。

③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1922年3月26日，《列宁全集》第43卷，第85，93页。

④ 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1922年11月，《列宁全集》第42卷，第302页。

在 1921 年新经济政策提出的时候，列宁还在强调说：“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他当时只注意到了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物质基础”问题，认为“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电气化，才能解决小农这个问题，才能像人们所说的使他们的整个心理健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根本地和非常迅速地改造小农。”而这无疑必须要先“实现一个大国家的电气化，无论如何要有几十年的时间才行”。^①

然而，1923 年 1 月，躺在病床上的列宁却注意到，未必完全要等到电气化实现才能够改造小农了。他指出，通过民众自愿合作的办法，充分照顾到国家、集体和农民的个人利益，就足以有效地联合与改造广大城乡小私有者，从而也就能把俄国一步引上社会主义道路了。据此，他明确表示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整个看法改变了。”即他不仅相信完全可以采取并非简单“消灭”的办法来走向社会主义，而且相信社会主义未必一定要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必须全部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化或国有化之后才算合格。^②他解释说：“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站稳了脚跟。”因为，“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这种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极小农结成了联盟，这种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得到了保证，如此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换言之，由于过去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看成是一种高度工业化的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此在列宁的观念中，俄国落后的农民就成了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的最为严重的障碍。而相信社会主义不必一步达成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现在在他看来，国家支配一切并且通过合作社的方式把工人、农民结合起来的方法，足以改造传统的小农经济，消灭私有制，造就社会主义了。据此，列宁宣布说，合作社运动必定会在文化提升和物质生产方面奠定

① 列宁：“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1921 年 3 月 15 日，《列宁全集》第 41 卷，第 53 页。

② 见恩格斯：“致奥托·伯尼尔”，1890 年 8 月 2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443 页。

社会主义的基础。“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①

没有人确切知道列宁的上述说法，是否包含一个重要思想，即俄国可以不等欧洲革命成功，一国成就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但可以肯定的是，列宁依旧相信先进的生产关系是可以超越生产力的发展先行用革命的手段创造和建立起来的，落后的生产力是完全可以借助于革命政权加速发展满足先进的生产关系的需要的。这也意味着，列宁在事实上仍旧是把生产关系及其政治社会制度的改变，而不是把生产力的改变，视为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是否社会主义的本质和重要标志。由此一来，列宁的这种主张与实践自然也就为其继任者提供了足以修正马克思社会主义理想主张所需要的一切。

一年之后，列宁去世了。面对同样难题的继任者斯大林，在这方面没有丝毫的犹豫，他很快就选择了“单独干”的更明确的实用主义的做法——“一国社会主义”。

【Abstract】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1917, Lenin's socialist practice in Russia showed that for communists of a backward country, he believed, could artificially create advance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en transform and elevate backward productivity in order to achieve socialism. Based on this understanding, Lenin inevitably overemphasized the roles of revolution and violence, and further elaborated the class struggle and the doctrine of dictatorship of proletariat. Lenin, during his lifetime, failed to successfully build a "socialist society", nevertheless, his understanding and ideas on the nature of socialism affected almost all communists in backward countries. It is noteworthy that Lenin's basic understanding of socialism, although different from original visions of Marx and Engels, to a certain extent, inherited some of Marx's ideas and propositions.

【Key Words】 October Revolution, Lenin, Socialism, a Historical

^① 列宁：“论合作社”，1923年1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768，780，781页。

Materialistic Perspective

【 Аннотация 】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17 года в Росси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практика Ленина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он как коммунист отсталой страны полагал, что можно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 создать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а затем преобразовать и повысить отсталые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ьные силы в целях достижения социализма. Исходя из эт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Ленин неизбежно переоценил роль революции и насилия, и дальше развил доктрины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ы и диктатуры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Хотя Ленин при жизни не был в состоянии успешно построить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но его понимание природы и идей социализма оказали влияние на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сех отсталых стран. Следует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общи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Ленина о социализме хотя и отличаются от изначальных идей Маркса и Энгельса, но, всё же, они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степени унаследовали некоторые идеи Маркс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Ленин, социализ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责任编辑 陈大维)

宗教史

试论俄国历史上的禁欲派与约瑟夫派之争

赵小华^{*}

【内容提要】禁欲派与约瑟夫派的论战发生于15-16世纪之交。最初只是教会内部关于不同修行世界观的争论,其后由于触及如何处置宗教异端分子以及修道院是否应该拥有众多地产等关乎教会统一和政教关系的重要问题,在世俗政权的干涉和参与下,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两派长达半个世纪的论战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在俄罗斯国家、东正教教会以及整个俄罗斯文化的发展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关键词】禁欲派 约瑟夫派 异端分子 修道院地产 莫斯科政权

【中图分类号】D73/7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 (2013) 01-0147-(18)

在中世纪的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在国家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然而,教会内部并不完全是一片和谐的声音,也存在着不同思想主张的对峙与碰撞。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发生的禁欲派与约瑟夫派之间的论战便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代表。以索尔的圣尼尔(Нил Сорский,1433-1508)长老为首的禁欲派(Нестяжатели),继承了早期基督教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传统,具有精神和先验的特点。他们主张远离尘世的诱惑,不与世俗政权交往和干涉世俗社会的生活,放弃教会地产,自力更生,追求个人的精神苦修和宗教凝思,以期通过修士自我道德和心灵的不断完善来为世俗社会树立良好的榜样,最终实现用基督教原则改变世俗世界的

^{*} 赵小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理想。而以沃洛科拉姆斯克的圣约瑟夫（Иосиф Волоцкий, 1439/1440–1515）为代表的约瑟夫派（Иосифляне），则追求国家的神圣和强大，主张教会应与世俗政权保持密切的联系，应全力支持国家，为社会服务。而国家则应给予教会以物质保障，允许教会拥有地产，从事经济活动，并巩固教会在社会生活中的精神领袖地位。两派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论战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在俄罗斯国家和东正教教会的发展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本文试从两派论战的历史时代背景、修行观基础、主要内容等三个方面来论述这场“斗争”的实质，并以此来说明其对俄罗斯国家和教会，以及整个俄罗斯文化历史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一、禁欲派与约瑟夫派论战的历史时代背景

禁欲派与约瑟夫派的论战发生在 15–16 世纪之交，是俄罗斯统一中央集权国家逐渐建立、“神圣罗斯”和“第三罗马”等国家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的时期。对内，莫斯科公国力战群雄，战胜了各敌对的分封公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对外，在库利科沃战役结束一百年后，俄罗斯最终摆脱了蒙古鞑靼的桎梏，彻底实现了民族的解放与独立；而在宗教领域，先是 1448 年，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在莫斯科大公的支持下，推翻了拜占庭与罗马 1438–1439 年签署的佛罗伦萨教会合并协议，正式摆脱了拜占庭教会的束缚，成为自主教会。而到 1453 年，拜占庭的沦陷则让俄罗斯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以信仰东正教的君主为统治者的独立国家。莫斯科于是也顺理成章地接过了拜占庭的使命，成为东正教信仰最后的堡垒和捍卫者。

拜占庭的沦陷在罗斯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一方面，人们将这一事件看做是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先兆，但是另一方面，又觉得这是上帝对拜占庭同意接受东西方基督教会统一的惩罚^①。为了成为拜占庭“名副其实”的接班人，1472 年，伊凡三世（1462–1505）迎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娅·帕列奥洛格为妻，并以拜占庭国徽为莫斯科国徽，俨然成为拜占庭帝国的继承

^① Геллер М. 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Том I.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ИК, 1997. С. 150.

者。在俄罗斯国内开始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俄罗斯君主的使命就是来接替拜占庭皇帝的职位，而俄罗斯人民则将取代希腊人，成为东正教人民的领袖，他们自己才是最好的基督徒^①。通过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意识形态建设，到 16 世纪上半叶，莫斯科最终成为代替“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的“第三罗马”，而俄罗斯国家和东正教教会则成为保护信仰纯洁和东正教信徒生活安康这一神圣使命的完成者。

这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和宗教事件使俄罗斯人的宗教意识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的世界观主要是围绕着宗教信仰展开的。所有事件，无论是教会的还是国家的，都相互交织在一起，都是从宗教的视角来考察和衡量的^②。人们力求到宗教中寻找各种问题的答案。而那时因为修道院是重要的知识来源和国家精神生活的创造者，所以俄罗斯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百姓，通常都习惯将修士作为自己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导师，从他们的修道生活中汲取精神的养料，而在遇到困难时，也会首先想到去他们那里寻求帮助和祝福。所以修士，特别是著名修道院的创始人或是某一修道流派的领袖，在俄罗斯社会以及教会内部都具有较高的威望，其观点和价值取向有时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国家和教会的历史发展命运。例如，1380 年，在去参加对俄罗斯国家历史命运具有转折意义的库里科沃战役之前，莫斯科德米特里大公曾亲自前往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请求当时在俄罗斯享有崇高精神和道德威望的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长老的祝福。长老的祝福和预言赋予了库里科沃战役以神圣的宗教性质，所有参战军人不仅是罗斯大地的保卫者，也是为信仰而献身的受难者。这使得罗斯全体将士，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士兵，都备受鼓舞。他们浴血奋战，最终赢得了战役的胜利。诚然，谢尔吉的祝福和预言并不是罗斯人获得库里科沃战役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但不得不承认，他在这场战役里功不可没。因此，禁欲派与约瑟夫派之间有关修道观、神圣观以及犹太派异端分子和修道院地产这些重要问题的论战，很快便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然而这只是两派论战影响逐渐扩大化的一个原因。而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便是世俗政权的参与。正是由于

① Голубинский Е.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Т. 2. ч. 2. М., 1880–1916. С. 464.

② Смолич И. К. Русское монашество (988–1917) / Иосиф Волоцкий и Нил Сорский. Спор между двумя аскетическими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и. <http://www.sedmitza.ru/text/436468.html>

莫斯科世俗政权的干涉，本是教会内部的思想对决、两种不同神圣观的对立，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政治与宗教运动。

二、禁欲派与约瑟夫派论战的修行观基础

作为禁欲派与约瑟夫派的思想领袖，索尔的圣尼尔与沃洛科拉姆斯克的圣约瑟夫的修道观为两派的思想立场定下了基调。然而，虽同属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修行流派，也都属于静修主义传统^①的分支，圣尼尔与圣约瑟夫的修行观却十分不同，甚至可以说是相互对立的。

（一）圣尼尔的修行观

圣尼尔的修行观是以东方教会的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传说为基础的，这也决定了他所选择的修行道路。圣尼尔最初在基里尔·别洛泽尔斯基修道院（Кирилло-Белозер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修行，后来由于对该修道院较为死板的气氛不满，便去了圣山阿索斯（Афон）继续修行。在那里，圣尼尔深受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学说的影响，成了虔诚的静修主义者^②。静修主义要求修炼者保持心灵的清醒，通过内心的祈祷（умная молитва）与上帝直接进行交流，从而最终实现道德自我完善的目的。正是因为对静修主义的推崇，从阿索斯回国后，圣尼尔选择了比较适合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修行的塞提斯式修行方式（скитничество）^③，并与弟子因诺肯季一起在离基里尔修道院

① 圣尼尔与圣约瑟夫都属于静修主义传统的分支，是因为他们都可以被看作是圣徒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修行思想的追随者。而圣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则是 14-15 世纪静修主义在俄国繁荣时期的主要代表。正是由于他的精神影响，静修主义此后在俄国获得了非常广泛的传播。С·С·霍鲁日，张百春：“拜占庭与俄国的静修主义”，《世界哲学》2010 年第 2 期，第 90 页。

② 14-15 世纪是静修主义在圣山阿索斯繁荣发展的时期。

③ 在索尔的圣尼尔之前，北部罗斯主要存在两种修道模式——个人独修模式和集体修道模式，它们分别是由圣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引进和复兴，而尼尔则是将塞提斯式修道方式带入北部罗斯的第一人。4-5 世纪，塞提斯式修道方式起源于古埃及塞提斯荒漠（Скитская пустынь），后传播至拜占庭。尼尔正是在圣山阿索斯修行时才接触到这种修行方式的。该修行模式可以说是集体与个人隐修相混合的一种修行模式。通常是三两个人一同修行，大家居住独立，只有在周六和周日才会聚到同一个教堂，参加共同的礼拜仪式。

不远的索尔（Сол）河畔的沼泽林地驻扎下来，开始了自己的修炼。因此他也被认为是北部罗斯进行塞提斯式修行的首创者^①。尼尔的修行事迹很快就被传播开来。于是，有很多人表示愿意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精神修炼。历史上将尼尔修行思想的追随者们称为禁欲派。

作为一名静修主义者，尼尔主张进行精神苦修和宗教凝思，倡导修士生活的内省性。他认为，对于远离尘世的修士而言，他的一生应该走心灵不断自我完善的道路，只有通过“内心的祈祷”和“心灵的清醒”等神秘主义禁欲方式，修炼者才能够克服人类的各种欲望，获得精神的成长，完善自我的心灵，最终获得拯救。在《塞提斯式修道生活章程》（《Устав о скитской жизни》）第五章中，尼尔专门论述了毒害人类心灵的八种欲望，它们是贪吃、淫乱、贪财、愤怒、悲伤、忧郁、虚荣和高傲。只有战胜这些欲望，基督徒才能够获得内在道德和精神的成长。但是最主要的罪恶，在尼尔看来是搜刮他人的劳动成果。在反驳“修道院拥有财产是为了进行施舍”的捍卫者时，他指出，这只不过是人们想出的托词罢了，真正的施舍在于给予他人以道德支持。此外，尼尔认为致力于道德自我完善的修士不应该高傲地对待俗人，也不应该妄自尊大。无论是于何种目的，就算是为了拯救他们，修士也不应该辱骂或是惩罚俗人，因为神的事业就是要帮助他们改过自新^②。正是因为注重内心的状态，外在的行为对于圣尼尔而言就是第二位的。禁欲只不过是一种手段，重要的是禁欲的精神含义，因为禁欲本身只是基督徒内心生活的外在表现。他曾写道：“身体的行动、外在的祈祷，最多不过是叶子罢了，而内在的修行，也就是内心的祈祷，则是果实”^③。

赤贫是修行的理想，也是尼尔最喜欢的禁欲方式。在宗教生活中，赤贫不仅是一种极端禁欲的方式，也是对基督饥饿形象的忠诚^④。但在尼尔那里，

① Новикова Л. Сиземская И.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истории/возвышение Москвы: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нового типа духовности. http://www.gumer.info/bibliotek_Buks/History/Novikova/_02.php

② Устав о скитской жизни(новый русский перевод).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Ново-тихвинский жен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2002. С.39-60.

③ Главное сочинение Нила: «Преподобного отца нашего Нила Сорского предание учеником своим о жительстве скитском». 1849. С.22.

④ Федотов Г. П. Святы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Преподобный Нил Сорский. http://www.krotov.info/library/21_f/fed/otov_16.html

赤贫并不是与《福音书》直接相联系的，而是根植于其内心：清扫你的隐修室，物品的缺乏会让你变得节制……爱上赤贫、禁欲和恭顺^①。尼尔认为，修士应该凭借自己的双手劳动来生活，出售或是用自己所做的物品来交换其他生活所需。修道院和修士不应该接受世俗人士的捐献，而与此正相反的是，他们应该和世俗人士分享自己双手的劳动所得。援引圣金口约翰（347-407）的观点，他建议将世俗人士的捐赠分发给乞丐^②。正是因为对赤贫理想的追求，尼尔反对修道院拥有地产，也反对过分奢侈地装饰教堂。他认为，过分奢侈的装饰、贵重的金属器皿等，对于举行祈祷仪式完全没有必要。重要的是祈祷者内心的状态，而不是祭衣与器皿的丰富与否。在这一点上，尼尔和圣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十分相像。谢尔吉多年都坚持用普通木制器皿来举行圣餐仪式，而在祈祷仪式上也总是身穿破旧的麻布祭衣^③。

（二）圣约瑟夫的修行观

沃洛科拉姆斯克的圣约瑟夫与索尔的圣尼尔的修行观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在修行方式的选择上，圣约瑟夫所选的是严格的集体式修道模式^④，这主要与其个人的成长和修行经历有关。入道初期，约瑟夫师从博罗夫斯克修道院（Боров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的院长巴夫尼提（Пафнутий, 1394-1477），而巴夫尼提因曾接受过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的弟子尼基塔的精神领导，在同时代人中享有特别的权威^⑤。他管理博罗夫斯克修道院近 30 年，特别注意修道院生活的外在形式，要求修士们要严格遵守修道院的章程和各种仪式，不允许有任何的偏差。此外，巴夫尼提与莫斯科王宫也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的两个弟子佩列亚斯拉夫的圣丹尼尔（св. Даниил Переяславский）和赤脚的卡西昂（Кассиан Босой）都是伊凡四世的教父。由于修道院拥有很多

① Федотов Г. П. Святы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Преподобный Нил Сорский.

② Там же.

③ 赵小华：《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在俄罗斯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1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8-9 页。

④ 集体式修道模式（общежитое житие）是指修道院的所有财产和生产设施归所有修士共有，每个修士所得到的衣服和食物也都一样。“任何东西都不是修士自己的，所有的一切都属于大家共有”。这是集体式修道模式的主要原则。赵小华：《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在俄罗斯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1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10 页。

⑤ Иосиф Волоцкий. Сказание о св. Отцах. 1847. С. 7.

的地产，许多修士每天的主要任务便是管理修道院的经济事务。因此，在这个修道院里，禁欲更多地被理解为某种外在的形式。而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年轻的约瑟夫获得了自己最初的修道教育和经验。巴夫尼提去世后，约瑟夫成为其接班人，继承了他所创立的修道院传统。后因引进十分严格的集体式修道模式^①，约瑟夫与修士们发生摩擦，被迫离开修道院，开始了一年的云游生活。云游期间，基里尔·别洛泽尔斯基修道院的集体式修道模式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1479年，约瑟夫在莫斯科近郊沃洛科拉姆斯克（Волоколамск）创建了自己的修道院，即约瑟夫·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Иосифо-Волоколам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并仿效基里尔·别洛泽尔斯基修道院，实行极为严格的集体式修道模式。该修道院后来迅速成长起来，并在下一个世纪的教会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圣尼尔重视个体修行的内省性不同，约瑟夫认为，修士进行精神修行的基础不是心灵和意志，而是其无可指摘的外在行为，坚持“从外到内”的修行原则。外在行为应该是任何一个想成为好修士之人的主要着力之处^②。因此在约瑟夫·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里，规则和仪式被摆在第一位。这一点在其后来所著的修道院章程——《灵修章程》（《Духовная грамота》）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该章程是约瑟夫宗教道德观和禁欲观的核心体现。章程一共包含14章，而前9章主要涉及的都是修道院的外在生活领域，对各种细节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几乎涵盖了修士在隐修室、食堂、工作和祈祷时的所有行为。作为例证，约瑟夫还从圣父们的传记中援引事例来说明遵守规则和外在行为的重要性。

约瑟夫之所以对修道院生活进行严格的规定，主要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方面，他认为，对于修士而言，排在第一位的是恭顺。他曾说过：个人的想法是欲望之母，想法是第二罪恶，而精确的规定则是实现恭顺的最好手段。所以修道院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将修士们的个性差异消灭。因此在

① 因为之前在巴夫尼提担任院长时，虽然实行的也是严格的集体式修行方式，但它更多的只是形式上的严格，而对于修士们个人修道水平的要求并不高，因此修士们能够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管理经济事务。

② Смолич И. К. Русское монашество(988-1917)/ Иосиф Волоцкий и Нил Сорский. Спор между двумя аскетическими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и. <http://www.sedmitza.ru/text/436459.html>

《灵修章程》的第一章中，约瑟夫重点强调了修士对上帝敬畏的重要性。在这一问题上，尼尔则持有相反的立场，他主张捍卫人的个性，坚持修行者在精神修行事业中的内心独立与自由，并力求在进行精神教导时考虑到每个弟子的个性特点，避免精神教导的程式化。另一方面，与圣尼尔“为了信仰而信仰”不同的是，在约瑟夫看来，修道院作为教会的机构，具有自己独特的任务。但是这些任务绝不是只具有禁欲的性质，修道院应该成为培养未来主教等高级神职人员的学校。而统一的修士培养方式、一致的祈祷仪式，以及标准化的修士行为，则是提升未来主教们在信徒心目中威望的重要手段。

与禁欲派将赤贫看做是修行理想、追求在真正禁欲的氛围中实现自己内心的完善不同，约瑟夫认为，修道院可以、甚至是应该拥有村庄、土地和其他财产等等，而且这些财产是修道院维持日常开支、完成培养高级神职人员的任务和开展慈善活动所必需的。

三、两派论战的主要问题

可以说正是因为索尔的圣尼尔与沃洛科拉姆斯克的圣约瑟夫修行世界观的不同，才使得两派在对待“犹太派”异端分子和修道院的地产等问题上持有不同甚至是对立的观点。然而就论战本身而言，它最初只是两种不同精神流派，两种不同修行观与神圣观之间的对阵，并不具有斗争的性质。但是后来由于世俗政权和国家利益的介入，禁欲派与约瑟夫派之间的精神对决便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了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

（一）犹太派异端分子问题

首先是在对待“犹太派”异端分子的态度上，虽然两派都支持教会学说的完整和统一，反对异端思想的发展与蔓延，但就如何惩罚异端分子，两派却存在很大的分歧。

犹太派异端运动兴起于 15 世纪末的诺夫哥罗德，后蔓延至莫斯科。该运动具有反教会的性质，主张反对修道制度和宗教等级体系，拒绝崇拜圣像，反对圣餐仪式，不承认神的三位一体性以及耶稣基督的神性等等。圣约瑟夫将犹太派异端看做是俄罗斯社会道德根基最大的敌人，认为道德根基一旦坍

塌，社会也必将灭亡，因此他不遗余力地跟异端分子作斗争^①。以旧约为依据，约瑟夫坚决要求教会和政府采取严厉措施彻底根除异端思想和异端分子，实行残酷的死刑；而尼尔则认为世俗政权和教会应拥有各自的管辖领域，具有各自的管理办法，原则上互不干涉。世俗政权负责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领域，教会则负责国家的精神领域，而精神领域的问题不应该用暴力手段来解决。因此，在关乎教会思想统一、惩治犹太派异端分子的问题上，尼尔本着新约精神，主张对异端分子实行教化，让其改过自新，反对对基督徒实行死刑。“如果他们还继续执迷不悟，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应该将他们与其他基督徒隔离开，关进修道院，通过在那里的学习让他们最终认识真理。”^②由此，在俄罗斯政治思想史上，尼尔首次直接提出了不允许对持有异己信念或思想的人进行迫害的问题^③。

1490 年，东正教召开宗教会议来审判异端分子，圣尼尔与圣约瑟夫都出席了这次会议。最终由于圣尼尔和雅罗斯拉夫尔的帕伊西（Паисий Ярославов）^④等人的积极争取，受审的异端分子逃过了死刑，只是被革除教籍。然而，圣约瑟夫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对这次的审判结果十分不满，在写给苏兹达里主教尼丰特（Нифонт Суздальский）的信中，他曾将主持这次会议的都主教佐西玛（Зосима, ?-1496）称为“恶狼”，指责他“玷污了神圣的职位”，“践踏神之子”，“侮辱了所有圣徒”^⑤。

此后，约瑟夫一方面积极发动主教们起来保卫东正教，并为此写下了由十六“言”组成的号召信——《启蒙者》（《Просветитель》）。在《启蒙者》中，圣约瑟夫严厉谴责了犹太派异端分子，号召大家不要相信他们会忏悔和改过，要对他们实施死刑，以便将其彻底根除^⑥。另一方面，约瑟夫又积极

① Лейста О Э. Истор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 правовых учений: учебник для вузов/ Политико-правовое учение Иосифа Волоцкого. <http://www.bibliotekar.ru/istoria-politicheskikh-i-pravovykh-ucheniy-1/41.htm>

② Ответ нестяжателей---«Послание старцев вологодских», в: ДРВ, 1792. С.424-428.

③ Нерсисянц В С. Истор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 правовых учений: учебник для вузов. М:НОРМА, 2003. С.192.

④ 15 世纪的宗教作家、顿河左岸长老，深受同时代人的尊敬和爱戴。

⑤ Послание игумена Иосифа Волоцкого епископу Нифонту Суздальскому. <http://www.sedmitza.ru/text/433607.html>

⑥ Иосиф Волоцкий. Просветитель, Спасо-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http://www.wco.u/biblio/books/iosifv1/Main.htm>

寻求世俗政权的支持。他多次亲自去说服伊凡三世^①和瓦西里大公，号召他们不要对异端分子心慈手软。“沙皇、王公和法官应该将异端分子关进监狱，处以死刑^②。”最终，在1504年召开的宗教会议上，在瓦西里大公的积极干预下，异端分子的几个头目被判处了火刑，其他人则被关进监狱或是修道院幽禁。可以说约瑟夫派最终在世俗政权的支持下获得了胜利。但是这种对异端分子的胜利却是东正教社会本身宗教意识痛苦分裂的开端^③。由于世俗政权的参与，教会与异端分子的斗争演变成为俄罗斯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政治争论之一。在争论过程中，莫斯科大公的权力理念被制定出来，对待异己思想的基本原则也得以确定^④。这场斗争同时也表明，16世纪初的莫斯科公国，皇权已经开始高于神权，东正教信仰和教会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俗政权的態度。

（二）修道院地产问题

修道院地产问题是两派争论的另一个问题，也是争论的焦点所在。14-15世纪，在圣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的带领下，俄罗斯修道事业迅速发展，大大小小的修道院在北部罗斯如雨后春笋地建立起来，这些修道院可以说是俄罗斯北部疆土开发的先行者。因为正是从圣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起，北部罗斯的修道院开始大规模地建立在远离人烟的荒野或丛林中。这些修道院一般只是在最初时期远离尘世，随后大量的农民便被吸引而来。他们自己清理树林、开垦土地，围绕着修道院建立起自己的房屋。这样，逐渐形成的一个个居民点将修道院再次包围起来。从这种意义上讲，北部罗斯修道院建设发展的历史就是罗斯北部边疆不断被开发的历史。历史上把十四、十五世纪发生在罗斯北部的这种现象称为修道院的移民拓荒运动（монастырская

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圣约瑟夫残酷镇压异端分子的活动，最初并没有得到伊凡三世的支持。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伊凡三世对犹太派的一些追随者具有好感，比如他曾从诺夫哥罗德将两个参加犹太派运动的神甫带回莫斯科为自己服务，另外他的宠臣费多尔·库里岑（Федор Курицын, ? -1504）也是犹太派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另一方面，15世纪是莫斯科公国和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实力迅速发展的时期，因此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伊凡三世或许是想借犹太派运动之力来削弱教会的势力。

② Иосиф Волоцкий. Просветитель, Спасо-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③ Федотов.Г.П.Святы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http://www.krotov.info/library/21_f/fed/otov_16.html

④ Геллер М 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М].Том I. С.157.

колонизация) ①。由此,修道院掌握了大量土地,加上世俗政权所赏赐的地产以及信徒为超度灵魂而捐献的土地,到 15 世纪末,有数据记载,近三分之一的国家土地是属于修道院的 ②。

修道院掌握如此巨大规模的地产难免会导致教会内部出现贪污腐败、营私舞弊等问题,极大地影响和削弱了整个教会的权威,因此遭到以圣尼尔为首的禁欲派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修行功绩的基础不是肉体,而是思想和心灵,积敛大量财富只会毒害心灵,成为修行的障碍。另一方面,随着莫斯科公国的不断发展壮大,国家需要越来越多的土地分封给贵族服役阶层,因此修道院庞大的地产也引起了莫斯科王公们的注意。如果能够实现这些地产的世俗化,那么土地资源紧张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1477 年 12 月,在攻下诺夫哥罗德后,莫斯科大公将本属于大主教和修道院的土地收归国有,并分封给了自己的服役贵族。而当土地不够用的时候,莫斯科大公又打起了自己公国修道院地产的主意,这引起了部分神职人员的坚决抵抗。最终,伊凡三世不得不暂时搁置这个想法。

1503 年,在讨论见习修士税和神甫再婚等有关教会内部秩序问题的宗教会议上,尼尔突然提出修道院应不应该拥有地产的问题,引发了禁欲派与约瑟夫派之间的直接对战 ③。尼尔严厉谴责了那些为了“敛财”而使曾经纯洁的修道生活变得污浊和龌龊的人,并请求伊凡三世收回修道院的地产,说修士们可以住到荒野,靠做手工活来维持生存。对此,约瑟夫表示坚决反对。作为反驳,他提出了以下主要论点:第一,地产是修道院生存所必需的,修道院的建设、日常开销以及修士们的衣食住都需要钱来维持。第二,修道院地产并不会阻碍修士实现永恒的救赎。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拥有地产的修道院院长都实现了自己的修行理想。例如(阿索斯山的)阿法纳西(925/930-1000),基辅洞穴修道院的安东尼(983-1073)和费奥多西(1008-1074)等。的确,有一些修士过于沉迷于金钱,滥用修道院的财产,

① 赵小华:《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在俄罗斯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1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25 页。

② Геллер М. 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М]. Том I. С. 152.

③ 在此之前,尼尔在自己的一些论著中不止一次提出反对修道院拥有地产和修士拥有个人财产。

但这只是少数。他们应该遭受审判，但决不能因为部分修道院不能正确使用自己的财产，而将所有修道院的地产都予以剥夺。第三，修道院不是只为自身，也不是只为一些修士，而是为整个教会而建立的。修道院是培养未来高级神职人员的地方，如果修道院什么都没有了，那些诚实高尚的人谁又会愿意去当修士呢？……如果谁都不愿意当修士，我们的信仰也将动摇。第四，修道院的建立者向修道院捐献时，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它能够开展慈善活动，扶弱济贫，如果修道院没有地产了，这些目的也将无法实现^①。雅罗斯拉夫尔的帕伊西和伏尔加河左岸的一些长老支持圣尼尔，伊凡三世本人也十分赞同，因为这正好可以帮助他解决土地的难题，实现教会地产的世俗化。但是主教们以及教会大多数上层人士则站在约瑟夫一方，因此宗教会议的最终结果是赞同约瑟夫的立场，而给予大公的答复则是：“根据历代圣父和君主们的传统，以及希腊和俄罗斯所举办的历届宗教会议的决议，高级神职人员和修道院可以拥有土地……”^②。这使得伊凡三世不得不再次妥协，但是关于教会财产问题的争论并没有因此而彻底平息。

1503 年会议的决议表明，约瑟夫派的观点获得了胜利。从那时起，约瑟夫派在莫斯科公国教会生活中开始扮演领导者的角色^③。然而，禁欲派也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对于他们而言，也正是从那次次会议起，其关于“拥有地产对修道院生活有害”的观点开始得到广泛的传播。此后，禁欲派与约瑟夫派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斗争。帕伊西和圣尼尔两位长老并没有参加这场斗争，他们分别已于 1503 年会议结束后不久和 1508 年相继去世。在圣尼尔去世后，斜眼的瓦西里昂（Вассиан Косой, 1470–1531）成为禁欲派的领袖。他曾撰写三篇论文来论述修道院应放弃地产的问题。瓦西里昂认为，修道生活应该完全远离尘世，修士拥有地产则是违反了《福音书》中关于禁欲的圣训。拥有地产会让修士们染上贪财的欲望，而按照使徒的教诲，贪财是万恶之源，

① Макарий.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Том 6. Отдел 3/глава II. Митрополия восточнорусская, или московская: ее первосвятители и ход главнейших в ней событий. http://www.rus-sky.com/church_his/mak3202.htm

② Макарий.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Том 3. Отдел 2/ Глава VII. Церковное право. <http://www.magister.msk.ru/library/history/makary/mak3207.htm>

③ Смолич И. К. Русское монашество(988-1917)/Вопрос о земельных владениях монастырей в полемических сочинениях и в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е XVI–XVII вв. <http://www.sedmitza.ru/text/436483.html>

这一点在敛财修士的身上可以看到。他们奔走于各个城市，目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从富人那里弄到田地和村庄。他们还剥削和压榨农民兄弟，甚至还放高利贷^①。瓦西里昂的观点吸引了不少追随者，其中也包括来自希腊的马克西姆·格雷克（Максим Грек, 1470–1556）。马克西姆·格雷克是著名的政治和宗教思想家，曾撰写多篇文章揭露和批判神职人员腐化的生活，以及修道院对农民的沉重剥削等等^②。在赞同瓦西里昂观点的同时，马克西姆·格雷克认为，除了依靠自身的劳动来生活外，修士可以祈求他人的施舍。然而，瓦西里昂和马克西姆的活动并没有持续太久。1522年，在约瑟夫的弟子丹尼尔（1492–1547）成为莫斯科都主教后，教会便开始了对禁欲派的残酷镇压。最终，斜眼的瓦西里昂和马克西姆·格雷克都被指责为异端分子。1531年，瓦西里昂被幽禁到约瑟夫·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并死在那里；而马克西姆·格雷克在经过几次审判之后也最终于1556年死于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

四、两派论战的历史文化影响

禁欲派与约瑟夫派之间论战展开的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上半叶，恰是古罗斯精神文化生活汹涌澎湃的时期，是俄罗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逐渐建立、“神圣罗斯”和“第三罗马”等国家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的时期。两派长达半个世纪的斗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对俄罗斯国家、东正教会以及整个俄罗斯文化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在这场斗争中，莫斯科公国的世俗政权得以将教会神权逐渐控制到自己手中，使其成为自己的附庸，并部分解决了修道院财产的世俗化问题，成为这场斗争的真正赢家。第一，在镇压犹太派异端分子的事件中，在世俗政权的帮助下，约瑟夫虽然最终达到了严厉镇压思想异己的目的，将异端分子的头目处以死刑，然而他却因此失去了自己的精神独立，并最终成为世俗政权意识形态的积极建设者和鼓吹者。约瑟夫对待世俗政权的立场伴随着整

① Павлов-Сильванский Н. П. Государевы служилые люди. СПб, 1909. С.211.

② Громов М. Н. Максим Грек. М: Мысль, 1983. С.124.

个事件的发展，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一点在其著作《启蒙者》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在活动初期，由于思想独立，约瑟夫在前七“言”中曾写道，君主有好坏之分，能够关心和爱护臣民、诚实和公正的君主才是上帝的奴仆，反之，不能够做到这些，反而用贪财、愤怒、高傲等欲望来对付自己臣民的，则是恶魔，这样的君主必然不会被人民臣服^①。然而，镇压异端分子的斗争却使得约瑟夫深深感受到世俗政权对于教会事务的影响力，因为正是莫斯科大公的立场才决定了他最终的胜利。于是，在《启蒙者》最后一“言”中，约瑟夫对世俗政权的看法发生了质的变化。他说，“君主在本质上与其他人一样，但是在权力上则与上帝相似”^②。至此，约瑟夫对皇权的看法基本形成。与此同时，他也走上了传统的拜占庭主义^③模式道路，将尘世的皇权等同于上帝的神权，将公民律法与君主的命令等同于宗教会议的决议。而在社会政治领域有意识地信奉拜占庭主义，驱使约瑟夫为与君主有关的一切都罩上神圣的光环，承认君主具有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的绝对权力。后来，伊凡四世正是以约瑟夫关于君主同时具有神权和皇权的学说为依据，提出了沙皇具有拯救臣民灵魂的使命的观点。正是约瑟夫的宗教政治观，使得俄罗斯宗教历史学家和神学家约翰（科洛格里沃夫）认为，俄罗斯东正教的缔造者是约瑟夫，而非彼得大帝^④。第二，在有关修道院地产的争论中，虽然在约瑟夫派的强烈坚持下，修道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旧掌握着大量地产，但这场论战的重要意义在于，莫斯科政府得以借此机会将修道院地产这一问题从单纯的教会生活领域转向了国家的经济领域。修道院地产的世俗化趋势已不可逆转。从1503年到1649年，由于教会上层人士对世俗政权的影响力以及当时人们宗教世界观的局限性等原因，莫斯科政府没有下定决心对教会事务，特别是修道院的领地问题进行彻底的改革，但莫斯科始终认为有必要了解教

① Иосиф Волоцкий. Просветитель, Спасо-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② Там же.

③ 在俄罗斯宗教社会史上，拜占庭主义起源于拜占庭，通常是指宗教的、国家政治的、道德哲学和艺术美学思想的历史文化综合，使得俄罗斯文明区别于西欧文明的社会实践形式，请参看文章 Бачинин В. А. Нил Сорский и Иосиф Волоцкий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8. N. 10. С. 3.

④ Иоанн (Кологривов).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святости. Брюссель: Жизнь с Богом, 1961. С. 204.

会和修道院的地产状况，对其进行监督，并从修道院的产业中捞取一定的利益。为此，莫斯科政府设立了大宫廷衙门（Приказ Большого двorca）来对修道院的地产进行监督，并于 1551 年、1572 年和 1580 年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来限制教会和修道院经济实力的膨胀^①。1649 年，在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颁布的法典中，又进一步禁止教会扩张地产，并将其地产的一部分直接划归国库。1701 年，彼得一世政府下令将部分教会财产收归国有，主张由世俗官员来管理修道院的地产。最终，1764 年 2 月，叶卡捷琳娜二世签署了《修道院土地世俗化宣言》，将宗教委员会名下的所有教会领地转交给经济院管理。至此，俄罗斯教会和修道院地产的世俗化进程也彻底完成了。

其次，对于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禁欲派和约瑟夫派之争是其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古老统一的神圣罗斯思想自此分裂为两种对立的观念和立场——世俗神圣性与宗教神圣性之间的对立。在俄罗斯人的宗教意识中，内在的、精神的、宗教的和道德的因素开始被外在的、社会的、世俗和政治的因素所排挤。禁欲派的失败，使得俄罗斯宗教社会生活中长期以来存在的福音书静修主义思潮没有带来实际的社会成果。而约瑟夫派所代表的亲近政权、为政权服务的宗教社会思想，则因其更能够满足时代的要求，满足不断崛起的俄罗斯国家政权形成的需要，成了俄罗斯宗教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主流。但这对于教会本身而言，却不能不说是其神圣观的悲剧。“悲剧”不在于失去了神圣性的精神潜力，而在于教会的历史坐标发生了转换^②，在于对世俗神圣性和宗教神圣性认识的分裂。作为国家的精神中心、尘世的天国、东正教信仰和学说的全权代表，本应保持精神独立的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原则上从 16 世纪（瓦西里三世统治早期）起，就变成了国家实施内外政策的一件工具。而修道院——古罗斯重要知识来源的圣所和精神文化中心，则变成了制造意识形态的“作坊”。最终在 18 世纪初，彼得一世进行了彻底的教会改革，使其完全置于国家的管辖之下，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而自己则成为东正教的“最高牧首”。此外，通过对犹太派以及禁欲派等异己思想

① Павлов-Сильванский Н. П. Государевы служилые люди. СПб, 1909. С.211.

② Клибанов А. И. 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й Руси. М:Аспект Пресс, 1996. С.98.

和运动的残酷镇压，宗教排他性和对一切宗教异己思想的否定态度也逐渐成为俄国人东正教意识中的稳定性特征。

最后，约瑟夫派的最终胜利，对于古罗斯文化的发展而言也是一种不幸。因为这意味着在俄罗斯文化中神化的世俗政权开始高于宗教政权，集体高于个体，而社会及为其服务的各种普通文化现象则高于哲学、宗教、科学、艺术等各种专门的文化形式。这可以说是拜占庭主义的胜利。在俄罗斯，各种文化形式仍旧以混合不分化的形式继续发展着，是为教会和国家生活服务的工具，而不像在中世纪的西方，是为了独立的精神价值而存在和发展的。此外，在这次论战中，对思想与创作的不信任也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只有严格地遵守章程和丝毫不差地完成仪式才能够获得拯救。但是，由于人们理解力和文化水平的局限，宗教仪式本身往往会成为目的本身，而其精神内涵则被完全忽略。因此，古代文本中出现的错误，即使是最为明显的错误，也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而纠正它们，对于心灵而言则是十分危险的。从这个意义上看，禁欲派与约瑟夫派之争可以说是 17 世纪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分裂的前奏。这种毫无希望的保守主义和对于鲜活的东正教文化的脱离也是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化的悲剧性所在。

结 语

从本质上讲，禁欲派与约瑟夫派所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修行理想，是对基督教理想的两种不同理解。实际上，两派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只不过是选择了不同的实现途径：一方选择了拜占庭主义道路，而另一方则选择了福音书主义^①道路。关于这一点，教会历史学家和神学家约翰（科洛格里沃夫）曾写道：“除了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之间所有的一切——宗教性的性质和取向、行为和行动的方法都是不同的。”^②弗洛罗夫斯基在其所著的

① 福音书主义是一种宗教运动，运动依据的是早期基督教的思想与原则，明显表现出宗教探索和社会道德探索的精神。

② Иоанн (Кологривов).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святости. С.168.

《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中也写道，这是两种真理的对峙。^①禁欲派继承了东正教福音书静修主义的传统，他们所追求的是在精神上有所作为，是希望通过修士自我欲念的节制和道德的完善，通过新的个性的形成来达到最终影响社会和改造社会的目的。而约瑟夫派则是将为社会服务作为自己最终的修行理想。无论是对宗教仪式的严格遵守还是对外在行为的苛求，他们的目的都是希望通过这些外在的途径来改造和培养新人，并最终实现为社会、为国家服务的目的。“约瑟夫的整个世界观是由服务社会和对教会的承认构成的。他认为修道生活本身是一种社会徭役，是一种特殊的宗教—世俗服务。”^②可以说，约瑟夫所代表的这种社会宗教思想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精神，符合年轻的俄罗斯文明发展的需要。因此，他的理念不仅得到了宫廷人士的追捧，也得到大多数教会人士的支持。19 世纪的历史学家瓦·日马京对约瑟夫的地位进行评价时曾写道：“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文化人都加入了他的队伍。”“他的独特之处在于，在时代精神的影响下，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缺点，在他这个具有罕见的才能和天赋的人的身上得到了单向发展，并以更为强烈和突出的方式映射了出来。他只不过是当时大多数文化人所支持的观点联合在了一起。”^③然而，这场争论的可悲之处就在于，本可以相互进行补充的两个流派最终走向了对立，甚至无法容忍对方的存在。这一点可以说是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极端性演绎得淋漓尽致。他们如果能够像其精神导师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一样，即重视精神的内修，保持自己道德和精神的高度，而与此同时又不完全遁世绝俗，从事一定的社会活动，将精神的内修和外在的社会服务和改造活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那么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历史命运可能会是另一番图景，而不会过早地就走向了世俗化，成为国家的工具与附庸。

【Abstract】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ascetic faction and Joseph faction occurred at the turn of 16th century. Initially the debate was within the church

① [俄]弗洛罗夫斯基：《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吴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32 页。

② 同上。

③ Жмакин В. Митрополит Даниил и его сочинения. М., 1881. С.24.

about different worldviews in practice, then due to important issues, which were related with the unity of church and church-state relations, including how to dispose religious heretics and whether monastery should have a number of real estate, it eventually evolved into a cruel political struggle with interference and involvement of secular regime. The argument between these two factions lasted for half a century and aroused strong social repercussions, branding deeply the state of Russia, the Orthodox Church and even the entire history of Russian culture.

【Key words】 Ascetic Faction, Joseph Faction, Heretics, Monastery Real Estate, Moscow Regime

【Аннотация】 Споры между Нестяжателями и Иосифлянами стали проходить на рубеже 15-го и 16-го веков.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 это были споры внутри церкви о различных практиках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затем стали затрагиваться вопросы, касающиеся того, как избавиться от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еретиков и того, должны ли монастыри иметь ряд объектов недвижимости, а также другие важные вопросы, касающиеся единства церкви и церков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а в условиях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а и участия свет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эти споры превратилась в жестокую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борьбу. Полувековые споры этих дву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повлекли за собой серьёзные социальны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оставили глубокий след в истории развития рус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целом.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Нестяжатели, Иосифляне, еретики, недвижимость монастырей, режим Москвы

(责任编辑 阎德学)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苏联公共外交 (1943-1953年)*

贾付强**

【内容提要】学者们对公共外交及其功能有着不同的认知。1943年至1953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苏联政府支持下开展了一系列实为“公共外交”的对外交流活动。苏联的历史经验表明,利用宗教开展公共外交,能为公共外交发起国提供合法性来源;跨国宗教与世俗国家之间并非是必然对抗的关系,跨国宗教能与世俗国家进行紧密的合作;宗教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及宗教界人士在对外交往中可起到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俄罗斯东正教会 苏联 公共外交 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D83/8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 (2013) 01-0165-(19)

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不但给国际关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也给国际关系研究带来了两个“新”的研究领域:第一,“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成为当前国内外学界研究的“显学”。布鲁斯·格里高利(Bruce Gregory)认为,“公共外交有着非常美好的前景,将有可能创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宗教与冷战时期的苏联公共外交研究(项目批准号:12CZJ022)”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徐以骅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悉心指导,感谢李少军研究员、苏长和教授、陈志瑞主编、邹磊博士、李因才博士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俄罗斯研究》编辑部及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诸多修改建议。文中的错误与不妥之处由笔者负责。

** 贾付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

造一个学术新领域。”^①第二，宗教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边疆”^②，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宗教的转向（religious turn）”。^③有学者认为，近几十年来的全球宗教复兴，特别是“9·11”事件的发生，表明宗教已从“威斯特伐利亚的放逐”回归“国际关系的中心”^④。令人遗憾的是，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回归”以及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新边疆”地位，与当前的公共外交研究互无交集，鲜见从宗教视角研究公共外交的著述，而历史上却不乏利用宗教开展公共外交的案例。有学者指出，早在1943年至冷战初期，“莫斯科牧首区（the Moscow Patriarchate）就被苏联领导层视为国家外交政策的一种工具”，而“俄罗斯东正教会（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在1943年以后的主要角色是执行斯大林的帝国主义抱负”。^⑤因此研究由苏联政府支持的公共外交行为体——俄罗斯东正教会——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不但可以拓展研究公共外交的视角，弥补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研究中的“短板”^⑥，亦能为中国有效地开展公共外交、增强国家“软实力（soft power）”提供历史智慧和启迪。

一、公共外交及其功能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出现，注重政府间外交的“第一轨道外交（track-one diplomacy）”呈现出了很大的局限性，于是，

① B. Gregory, “Public Diplomacy: Sunrise of an Academic Field”, in Geoffrey Cowan, Nicholas J. Cull, *Public Diplomacy in a Changing World*,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616, March, 2008, pp.315-317.

② 徐以骅：《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论丛》（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页。

③ John A. Rees, *Relig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and Faith Institution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11, p.10.

④ 徐以骅：“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回归’”，《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四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第1页。

⑤ Anna Dickinson,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Considerations and the Origins of Post-war Soviet Church--State Relations, 1941-6”, in Dianne Kirby (ed.), *Religion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Ltd, 2003, p.27.

⑥ 徐以骅：“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9期，第19页。

注重公众作用的“第二轨道外交(track-two diplomacy)”或“公共外交”逐渐兴起。^①由于公共外交被视为一个国家未来的一项重要投资^②，因而成为世界各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有学者认为，21 世纪的外交将是公共外交。^③

（一）公共外交

1965 年，美国塔夫兹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at Tufts University)教授埃蒙德·古里恩(Edmund Gullion)创造了公共外交一词，认为“公共外交……涉及公众态度对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执行的影响，它包含超越传统外交以外的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一国政府在其他国家境内培植公众舆论；一国国内的私人群体和利益集团与他国利益群体的互动；对外交事务及其对政策影响的报道；以通讯报道为职业的人如外交官和驻外记者之间的交流；文化之间的交流。”^④古里恩对公共外交的界定表达了以下几层意思：第一，外交分为传统外交与公共外交两种外交方式，而一国采取的除传统外交方式以外的任何外交方式，都属于公共外交的范畴；第二，由于公众的态度既会影响到一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也会影响到一国已定外交政策的执行，因此公共外交的目的是影响国外公众的态度，形成有利于本国的舆论；第三，一国可采取的公共外交方式有两种：官方对公众，即一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影响目标国公众，以培养其对该国的好感，目的是影响目标国制定有利于该国的外交政策；民间对民间，即通过加强本国的非政府组织和机构及公众与公共外交目标国的非政府组织和机构及公众之间的各种交流活动，培养国外的“知己派”、“亲己派”。

虽然古里恩创造的“公共外交”一词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被普遍接受，但公共外交的含义却一直在不断演化，至今也没有一个能被广泛接受的定

① 贾付强：“公共外交研究：理论、实践及不足”，《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2 年第 2 期，第 151 页。

② Standing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Defense and Trade, *Australia's Public Diplomacy: Building Our Image*, Canberra: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07, p.17.

③ Shaun Riordan, “Dialogue-based Public Diplomacy: A New Foreign Policy ‘Paradigm’?”, in Jan Melissen (ed.),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87.

④ Nicholas J. Cull, “‘Public Diplomacy’ Before Gullion: The Evolution of a Phrase, USC Center on Public Diplomacy”, <http://www.uscpublicdiplomacy.com/pdfs/gullion.pdf>

义。^①学者们关于公共外交概念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关于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一些学者认为公共外交的主体是各国政府^②，或者是有政府背景的非政府行为体及个人^③；而另外一些学者则持不同的观点，认为非政府行为体及个人有无政府背景不甚重要，只要它们在对外交往过程中能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即可^④。第二，关于公共外交的对象。多数学者认为公共外交的对象是外国公众，而不包括国内公众^⑤；但也有学者认为公共外交的最终对象不是外国公众，而是通过影响外国公众进而影响某国政府的外交决策^⑥。第三，关于公共外交的目的。在这方面学者们的意见较为一致，认为公共外交或是为了实现公共外交发起国的国家利益^⑦，或是为了提升该国在外国政府及公众心目中的国家形象^⑧。

笔者认为，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或由政府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及公众开展的、针对外国非政府组织及公众的、旨在促进本国国家利益或提升国家形象的外交活动。其核心要素有三：第一，公共外交的主体可以是一国政府，也可以是由政府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及公众，但无政府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及公众不能算作公共外交的行为体，由其开展的对外交流活动也不能算是公共外交活动；第二，公共外交的对象必须是外国非政府组织及公众；第三，公共

① Bruce Gregory, "Public Diplomacy: Sunrise of an Academic Field", In Groffery Cowan, Nicholas J. Cull, "Public Diplomacy in a Changing World",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616, March, 2008, p.274.

② Gifford D. Malone, *Political Advocacy and Culture Communication: Organizing the Nation's Public Diplomacy*,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8, pp.2-3; Hans N. Tuch, *Communicating with the World: US Public Diplomacy Oversea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p.3.

③ 赵可金：《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④ Groffery Cowan, Nicholas J. Cull, "Public Diplomacy in a Changing World",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616, March, 2008, p.6; Michael B. Goodman, "The Role of Business in Public Diplomacy", *Journal of Business Strategy* Vol.27, No.3, 2006, p.5; 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⑤ Bloomgarden Kathy, et al., *Finding America's Voice: A Strategy for Reinvigorating U.S. Public Diplomac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dependent Task Force, Jun. 2003, p.1.

⑥ Howard H. Friederick,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p.229.

⑦ Kathy R. Fitzpatrick, *The Future of U.S. Public Diplomacy: An Uncertain Fate*,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10, p.96.

⑧ 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8页。

外交的目的是促进公共外交发起国的国家利益或者是提升其国家形象。

（二）公共外交之功能

综观国内外有关公共外交的著述可以发现，虽然学者们界定公共外交的概念多达 150 多种，对公共外交的功能也有不同的表述，但总的来说，都倾向于公共外交有以下五种主要功能^①：

第一是影响功能。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公共外交的功能是影响外国公众的态度、观点及行为。英国驻欧盟常驻代表迈克尔·巴特勒爵士（Sir Michael Butler）认为，公共外交的作用是影响目标国的意见以使公共外交发起国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②吉福德·麦隆（Gifford D. Malone）也指出，公共外交是通过与外国公众的直接信息交流，“以影响他们的思想，最终影响他们政府的思想。”^③

第二是沟通功能或解释功能。这类学者把公共外交视为一国同他国民众沟通的活动，目的是向他国民众介绍本国国情及本国的政策、理念和价值。例如，克里斯托弗·罗斯（Christopher Ross）认为，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的公共外交执行者向外国公众清楚地阐释本国官方政策的形成过程。^④赵启正认为，公共外交是要“向外国公众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解释外国对本国的不解之处，并同时在国际交流中了解对方的有关观点。”^⑤

第三是关系功能。即认为公共外交的功能是建立及维持与其他国家公众的良好关系。凯斯·费兹帕特里克（Kathy R. Fitzpatrick）指出，传统的公共外交模式是基于权力的公共外交模式（a power-based model），这种模式存在的问题是未能充分意识到相互关系（mutuality）的重要性。因此她提出应建立一种基于公共关系原则和相互关系概念基础上的关系模式（a relational

① Kathy R. Fitzpatrick, *The Future of U.S. Public Diplomacy: An Uncertain Fate*, pp.89-90.

② Mark Leonard, *Public Diplomacy*,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2, p.1.

③ Gifford D. Malone, "Managing Public Diplomac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8, Issue 3, 1985, pp.199-213.

④ Christopher Ross, "Public Diplomacy Comes of Ag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5, Issue 2, Spring 2002), pp.75-83.

⑤ 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4 页。

model based on public relations principles and concepts of mutuality)。^①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则指出，公共外交就是建立与他者之间的关系。^②

第四是促销功能。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公共外交的功能是向外国公众“兜售”本国的商品、价值观、文化及各种政策等。吉奥尔基·宋迪（Gyorgy Szondi）认为，开展公共外交类似于进行“国家品牌”建设，向国外公众推销自己的国家。^③美国学者南希·斯诺（Nancy Snow）把美国在“9·11”事件后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描述为一种“向世界销售美国正面形象”^④的努力。

第五是政治功能。即把公共外交视为政治的一种工具。卡尼斯·罗德（Carnes Lord）把公共外交视为一种“心理战或政治战”^⑤。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也认为，公共外交可提升一国的“软实力”，现在应该把公共外交作为“巧实力（smart power）”武器库中的一种重要工具^⑥。

二、苏联利用俄罗斯东正教会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

“十月革命”以后，对于“人民的鸦片”^⑦的宗教，苏维埃政权颁布了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试图铲除滋生宗教的土壤，以最终消灭宗教。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苏联境内势力最大、教徒最多的宗教组织——俄罗斯东正教会——成为苏维埃政权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虽然俄罗斯

① Kathy R. Fitzpatrick, *The Future of U.S. Public Diplomacy: An Uncertain Fate*, pp.101-110.

② Mark Leonard, “Diplomacy by Other Means”, *Foreign Policy*, No.132, Sep.-Oct., 2002, pp.48-56.

③ Gyorgy Szondi, “The role and challenges of country branding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experience”, *Place Branding and Public Diplomacy*, Vol.3, No.1, 2007, pp.8-20.

④ Nancy Snow, *The Arrogance of American Power: What U.S. Leader Are Doing Wrong and Why It's Our Duty to Dissent*, Lanham, MD: 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7, p.209.

⑤ Carnes Lord, *Losing hearts and Minds?: Public Diplomacy and Strategy in the Age of Terror*, Westport C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2006, p.8.

⑥ Joseph S. Nye Jr.,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In Groffery Cowan, Nicholas J. Cull, *Public Diplomacy in a Changing World*,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616, March, 2008, pp. 300-301.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东正教会大牧首(Patriarch)^①吉洪(Tikhon)在1923年6月16日致俄联邦最高法院的声明中表示“我从现在起不再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②，俄罗斯东正教会临时代理谢尔吉(Sergi)也于1927年8月向苏联政府发表了“忠诚”宣言，表示“我们渴望成为东正教徒，同时我们也认可苏联是我们的国家”^③，但苏联政府并没有停止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打压。根据苏联官方的数据，“1917年俄国有46,457座东正教堂，50,960位神甫，130位主教。相比之下，在1941年只剩下4,225座东正教堂，5,665位神甫和28位主教。”^④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虽有部分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及教徒，如乌克兰(Ukraine)的波利卡普(Polycarp)、里加(Riga)的沃斯克列辛斯基(Voskresensky)等，与德国法西斯为伍，但大部分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及教徒并没有对苏联政府“落井下石”，而是“以德报怨”，坚决谴责并反对德国法西斯，站在了苏联政府一边。在国内，临时代理谢尔吉谴责“所有在德占区同敌人积极合作的、像犹太(Judas)一样的神甫”，号召所有俄东正教会的“神职人员和教徒起来建立功勋，与国家一起承受考验”^⑤，并在苏联政府的允许下在银行开设了一个账户，以接收来自全国各地教会的国防捐款。在国外，俄罗斯东正教会除了出版名为“俄国宗教真相(The Truth about Religion in Russia)”的系列出版物以向国外读者表明苏联“和谐”的政教关系外^⑥，还向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希腊等国的人民和教会发表演讲，呼吁人们坚决抵抗德国法西斯的侵略。^⑦

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苏德战争中作出的贡献促使苏联政府领导人意识到，

① 指东正教中最高级的主教，又称“宗主教”。参见卓新平编：《基督教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第586页。

② 《大牧首吉洪致俄联邦最高法院的声明》，1923年6月16日，载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50页。

③ Jean Meyendorff, *Orthodox Church: Its Past and Its Role in the World Today*, New York: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1996, p.123.

④ Philip Walters, "The Living Church 1922-1946", *Religion in Communist Lands*, Vol.6, Issue 4, 1978, pp.235-243.

⑤ Dimitry Pospelovsky, *The Russian Church Under the Soviet Regime 1917-1982*, New York: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1984, pp.194-195.

⑥ Michael Bourdeaux, *Opium of the People: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n the U.S.S.R.*, London&Oxford: Mowbrays, 1977, p.59.

⑦ Dimitry Pospelovsky, *The Russian Church Under the Soviet Regime 1917-1982*, p.208.

宗教及宗教组织可以成为国家的一种“正资产^①”。因此，斯大林决定接见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领导人。在接见俄罗斯东正教会领导人之前，斯大林向卡尔波夫（Georgii G. Karpov）询问了以下几个问题：（1）俄罗斯东正教会领导人的个人情况，如政治态度、在教内外的威信等。在国家政策中是否可以指望谢尔吉这个人。（2）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两大牧首区的情况及在东正教中的地位。（3）巴尔干、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东正教的情况及在整个东正教中的地位，等等。^②1943年9月4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见了临时代理谢尔吉、都主教（Metropolitan）^③尼古拉（Nikolai）和阿列克谢一世（Aleksii）。在会谈中，斯大林表示准许俄罗斯东正教会选举继任牧首、开办神学院和圣经学校、出版宗教刊物，允许教会修建教堂，扩大东正教教区及同国外教会进行往来。^④在会见结束时，斯大林强调俄罗斯东正教会将会得到政府的充分支持（full support），并要求以“布尔什维克的速度（at a Bolshevik tempo）”举办全俄主教会议（sobor）。^⑤1945年3月15日，卡尔波夫向斯大林提交了关于加强东正教在国外影响力措施的报告。报告明确提出要派遣俄罗斯东正教会代表团前往中东欧、中东、西欧、美国等地，加强与当地东正教会的联系，以增强莫斯科牧首区的声望。^⑥此后不久，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就再次接见了俄罗斯东正教会领导人，包括新任牧首阿列克谢一世^⑦、都主教尼古拉和神甫科尔奇茨基（Kolchitskii）。虽然苏联政府与俄罗斯东正教会之间关于外交事务的协议未见记载，但从俄罗斯东正教会这个与政府有关的宗教

① 复旦大学徐以骅教授认为，虽然宗教具有正反两面性，但应更多地视宗教为“正资产”，而非“负资产”。

② 转引自雷丽平：《斯大林与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宗教政策与政教关系》，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72页。

③ 基督教高级主教的职称，在东正教会中指重要城市教会的主教。参见卓新平编：《基督教小辞典》，第588页。

④ 乐峰：《俄国宗教史》（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48页。

⑤ Jordan Hupka,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as a Soviet Political Tool”, *Constellations*, Vol.2, No.2, Winter 2011, pp.31-40.

⑥ ГАРФ. ф.6991.оп.1.д.29.л.101-109. DA0720.

⑦ 在前任牧首谢尔吉因病于1944年逝世后，俄罗斯东正教会于1945年1月31日至2月2日举行了全俄宗教会议，会议选举来自列宁格勒的都主教阿列克谢为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会大牧首。

行为体 (stated-related religious actors)^①开展的一系列与苏联外交政策目标紧密相关的对外活动来看,苏联政府意在通过增强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他国的影响力,来扩大苏联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俄罗斯东正教会也“积极履行国家赋予的外交义务,以表达对国家宽容政策的感谢。”^②

(一) 霸权之锚: 俄罗斯东正教会与二战后苏联霸权的护持

约翰·米尔斯海默 (John J. Mearsheimer) 指出,“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苏联领导人都会错过二战结束时称霸欧洲的机会。”^③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58 号文件也曾指出苏联影响“他者”的基本因素之一是东正教会。^④因为,在历史上东正教会曾使俄国与某些周边国家在宗教上保持着松散的联系。这种历史的记忆与联系对于苏联在战后维护其在周边国家的利益提供了一种“合法”的管道。于是,俄罗斯东正教会承载着苏联的“秘密”外交使命,在二战结束之初开展了一系列对外活动。

第一,在东正教会占主导地位的苏联势力范围内,俄罗斯东正教会加强了与当地东正教会的联系,使之接受莫斯科牧首区的管辖,以确保苏联的利益不受当地其他教会的反对。在保加利亚,俄罗斯东正教会派遣了来自列宁格勒的都主教格里高利 (Gregoriy) 前往索菲亚 (Sofia),以修复因布尔什维克革命而中断的莫斯科牧首区与保加利亚东正教会 (the Bulgarian Orthodox Church) 之间的宗教联系。在 1945 年 6 月底保加利亚东正教会的领导人督主教^⑤斯蒂芬 (Stefan) 访问莫斯科后,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阿列克谢一世又于 1946 年 5 月对保加利亚东正教会进行了回访,并在里拉修道院 (The Monastery of Saint Ivan of Rila) 参加了保加利亚最受人尊敬的圣伊

① Jeffrey Haynes 认为,在国际关系中有两类宗教行为体,一类是与政府有关的宗教行为体,另一类是非政府宗教行为体 (Non-state religious actors), 参见 Jeffrey Hayne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ligion*, Edinburgh Gate: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7, p.34.

② 乐峰:《俄国宗教史》(上),第 477 页。

③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p.198.

④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件选编(1945-1972)》(第一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35 页。

⑤ 在东正教会中主要指牧首派驻国外教区的代理者,对之起管辖或监督作用。参见卓新平编:《基督教小辞典》,第 588 页。

凡·利尔斯基 (St. Ivan Rilski) 的千年纪念仪式。^①在罗马尼亚，牧首阿列克谢一世于 1947 年访问了布加勒斯特 (Bucharest)，并在罗马尼亚牧首区直辖教堂 (Patriarchal cathedral) 举行了礼拜仪式。而在接下来的五年里，罗马尼亚东正教会 (the Romanian Orthodox Church) 的牧首及其继任者也五次访问了莫斯科。在南斯拉夫，基洛夫格勒 (Kirovgrad) 的主教 (bishop) 谢尔吉 (Sergii) 被委任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代表，以加强与塞尔维亚东正教会 (the Serbian Orthodox church) 的合作。他访问了铁托元帅 (Marshal Tito)，并从南斯拉夫政府那里获得了赠送给他和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阿列克谢一世的奖章。^②

第二，在东正教不占优势的苏联势力范围地区，俄罗斯东正教会也积极活动，以使当地的东正教会接受莫斯科牧首区的管辖。在波兰，俄罗斯东正教会与波兰境内东正教少数群体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在 1948 年 6 月 22 日赋予其自治教会地位，一位拥有苏联国籍的乌克兰人马卡里 (Makary) 成为其领导人。^③在捷克斯洛伐克，莫斯科牧首区在 1946 年给捷克斯洛伐克东正教会 (the Czechoslovak Orthodox Church) 任命了一位俄罗斯主教，并于 1951 年给予其自治地位。在东德，此前一直高呼反对共产主义并热情支持希特勒的俄罗斯东正教移民群体迅速屈从莫斯科的管辖 (Muscovite jurisdiction)，尽管在西德的俄罗斯东正教移民群体拒绝隶属于莫斯科牧首区。^④

第三，在东正教不占优势的苏联周边地区，俄罗斯东正教会通过影响他国境内的东正教少数群体，为增强苏联的影响力提供帮助。在中国，牧首阿列克谢一世决定于 1946 年 1 月成立“东亚都主教区”，并于 6 月改“东亚都主教区”为“莫斯科牧首区东亚牧首代表处”，管辖中国东北三省以及朝鲜境内的俄罗斯东正教会。1950 年 8 月，莫斯科牧首区又将在中国境内的所有东正教堂划归中国东正教会 (北京总会) 大主教托克维尔管辖，并正式成

① Lucian N. Leustean, *Eastern Christianity and the Cold War, 1945-91*,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81-82.

② William C. Fletcher, *Religion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45-197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8.

③ Dimitry Pospelovsky, *The Russian Church Under the Soviet Regime 1917-1982*, p.305.

④ William C. Fletcher, *Religion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45-1970*, p.18.

立隶属于莫斯科牧首区管辖的“中国东正教会”。^①在中东朝觐 (pilgrimage) 之旅中,以牧首阿列克谢一世为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代表团访问了圣地 (the Holy land) 耶路撒冷以及埃及、黎巴嫩、叙利亚、伊朗、伊拉克等国,分别与耶路撒冷牧首区牧首 (the Patriarch of Jerusalem)、亚历山大里亚牧首区牧首 (the Patriarch of Alexandria) 进行了会晤,并拜访了所到国家的东正教会及其领导人。此行使莫斯科牧首区在耶路撒冷重新建立了常驻使节团,把埃及东正教移民教会纳入到莫斯科牧首区的管辖范围之内,使叙利亚东正教会 (the Syrian Orthodox Church) 成为莫斯科牧首区在中东地区最值得信赖的支持者之一。^②

第四,即使在“敌对”的英、法、美三国,俄罗斯东正教会也试图培养“亲己者”,以降低这些国家民众对苏联的敌意。1945年6月,都主教尼古拉在牧首阿列克谢一世中东朝觐之旅中,被抽调出来率团出使英国。在为期十天的访问中,俄罗斯东正教会代表团先后拜访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约克大主教、多佛尔主教等众多英国宗教界领导人,在白金汉宫拜见了英王乔治六世,还与克莱门蒂娜·丘吉尔进行了交流。^③此外,尼古拉还特别在菲利普俄罗斯东正教堂向伦敦的俄罗斯移民群体发表了长篇演说,劝说当地东正教会接受莫斯科牧首区的管辖。其结果是,以修士大司祭尼古拉·格里布斯为首的至圣的瓦尔福洛梅教堂接受了莫斯科牧首区的管辖,并促使英国国教会改变了对卡罗维茨东正教教派的态度,明确表示:“现在我们只承认俄罗斯牧首的教会”。^④在法国,尼古拉于1945年8月24日抵达巴黎,与法国东正教会都主教叶甫洛基 (Evlogii) 谈判,通过描绘苏联境内教会的发展盛况,劝说教区居民回归母教会,并最终使法国的俄罗斯侨民教会回归到莫斯科牧首区的怀抱。在美国,大主教格里高利在与当地的东正教会谈判时,虽同意给予美国东正教会“自主教会”地位,但却坚持必须由莫斯科牧首区选定的主教来担任美国东正教会的领导人,这导致双方谈判无果而终。直到1970

① 张绥:《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年,第278-279页。

② William C. Fletcher, *Religion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45-1970*, p.20.

③ 《尼古拉都主教关于英国之行的报告》,1945年6月,载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54-758页。

④ 同上,第756-760页。

年4月10日，牧首阿列克谢一世才签署宗教谕令（*Synodal Tomos*），给予美国东正教会自主教会地位。^①

（二）和平使者：俄罗斯东正教会与苏联的和平运动

在为苏联外交提供“宗教合法性”外衣的同时，俄罗斯东正教会还开辟了另一个领域，即通过参与宣传，支持苏联开展的和平运动。早在1946年，斯大林就指出，在一个被战争的创伤耗尽的世界里，对和平的渴望可以成为反西方的工具。^②从1948年开始，苏联组织发起了世界和平运动。在波兰城市弗罗茨瓦夫（Wroclaw）举行的会议上，苏联发出了和平倡议，并于1949年初成立了世界和平委员会（the World Peace Council），以动员民众支持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即禁止西方重整军备和挫败西方建立军事同盟的企图。苏联开展和平运动伊始，俄罗斯东正教会及其领导人就成了这一运动的理想代言人。

第一，俄罗斯东正教会及其领导人积极参与其中并吸引西方教会人士参加和平运动。在1949年，都主教尼古拉作为俄罗斯东正教的主要发言人，成为世界和平委员会的一名常任委员（permanent member）。他在1949年8月举行的第一次苏联和平会议（the First USSR Conference for Peace）上发言时将矛头直指美国：“在我们的国家忙于和平建设，致力于把所有决心和努力用于和平目的时，资本主义的美国正在试图把世界人民推向战争。”^③1952年5月，来自世界各宗教和教派的宗教领导人，以和平的名义在莫斯科牧首区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会议。^④会议的结果是，一致支持苏联的和平宣传，谴责西方的侵略。由于整个会议进程以多种语言向西方国家广播，这次会议引起了国内外公众的极大关注。

第二，为使和平运动取得实效，俄罗斯东正教会将和平运动的议题主要集中在裁军和反战两个方面。针对核武器，都主教尼古拉指出，“核武器的试验激起的不是恐惧而是抗议……，抗议的浪潮席卷全球，要求立即禁止核

① Dmitry Grigorieff, “The Orthodox Church in America an Historical Survey”, *Russian Review*, Vol.31, No.2, Apr., 1972, pp.138-152.

② William C. Fletcher, *Religion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45-1970*, p.30.

③ Ibid, p.31.

④ Philip Walters,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1945-1959”, *Religion in Communist Lands*, Vol.8, Issue 3, 1980, pp.218-224.

武器和氢弹，而这正是俄罗斯东正教会近些年来一直高声呼吁的。”朝鲜战争爆发后，都主教尼古拉对美国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germ warfare）进行了猛烈批评，指出“法西斯主义的精神还没有消失，世界上仍然存在一些继续从事狂热的希特勒梦想的人”^①，“资本主义的美国不但准备消灭两亿苏联人民，而且准备消灭所有人。”^②这些宣传不但有效地引导了公众舆论，更导致了反战情绪的高涨，让驶往朝鲜运送战争物质的船只偶受干扰。

第三，俄罗斯东正教会积极推销苏联政府关于“和平”的定义，以服务于苏联政府战后的特别目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68 号文件认为，“苏联所寻求的和平是与苏联政策保持绝对一致的和平。”^③在和平宣传中，俄罗斯东正教会声称，一个基督徒，即使是一种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他不支持某种特别的和平形式，即苏联宣传的和平形式，他就不是和平主义者。通过联系抵制细菌战运动，尼古拉向西方的基督徒发表了一个声明：“所有信仰宗教的人民毫无例外必须支持世界和平委员会事务局（the Bureau of the World Peace Council）的呼吁……因为在我们中间不存在对邪恶和愚蠢的崇拜者，就对和平的共同需要而言，我们不能有不同意见，同样在就实现和平的手段上也不能有任何争吵。”^④尼古拉意在表明，只有苏联发起的探寻解决战争问题的尝试才是正确的，而其他尝试是对西方侵略的不道德支持。

自 1948 年始，苏联政府积极支持俄罗斯东正教会参与世界和平委员会的活动，以影响西方公众舆论，推动苏联主导的和平运动。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这一运动逐渐式微。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政府虽然开展了反宗教运动，但并未放弃利用宗教开展和平运动这一有效途径，积极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东正教会举办布拉格基督教和平会议（the Prague Christian Peace Conference），支持俄罗斯东正教会于 1961 年加入世界基督教联合会（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并派东正教会人士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积极利用各种宗教资源宣传、阐释苏联的“和

① William C. Fletcher, *Religion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45-1970*, p.32.

② “Nikolai: Portrait of a Dilemma by William C. Fletcher”, Review by: Mary Grace Swift, *Church History*, Vol.39, No.1, Mar., 1970, pp.128-129.

③ “NSC 68: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pril 14, 195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ume I, pp.234-292.

④ William C. Fletcher, *Religion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45-1970*, p.34.

平共存 (peaceful coexistence)” 外交政策，以塑造苏联和平的国际形象。^①

三、苏联利用俄罗斯东正教会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的历史启示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宗教的作用越来越从隐性转为显性，并且日益成为跨地区和跨国界现象。由于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导致宗教成为国际舞台上各方争抢的资源。^②因此，在运用传统外交手段开展外交活动的同时，重视包括宗教行为体在内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在对外交往中的积极作用，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重要战略。路易丝·戴蒙德 (Louise Diamond) 和约翰·麦克唐纳 (John McDonald) 将宗教视为缔造和平与解决冲突的“多轨外交”体系中的“第七轨”。^③根据学者们对“公共外交”概念及其功能的认知，笔者认为，俄罗斯东正教会于 1943 年至 1953 年间开展的一系列对外交往活动就是一种“公共外交”活动。其中，苏联政府在幕后支持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及其领导人是苏联公共外交活动的主体；国外的教会及教徒，特别是国外的东正教会及教徒是苏联公共外交活动的客体；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提升苏联的国际形象是苏联利用俄罗斯东正教会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的目标；而俄罗斯东正教会开展的一系列公共外交活动，对于影响外国东正教徒的态度、解释苏联的宗教政策、建立与外国东正教会的良好关系、形塑苏联的良好形象、提升苏联的“软实力”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它可以给予我们以下启示：

(一) 利用宗教开展公共外交能为公共外交发起国提供合法性来源。伊恩·赫德 (Ian Hurd) 认为，合法性是“一个行为体所持的关于某一规则或制度应被遵从的规范性信念”。^④合法性不但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政策制定者最有效的资产。因此，利用各种资源以增强自身行为的合法性，成为各种国际行为体惯用的策略。在这方面，宗教就成为一种有效的资

① 关于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政府利用东正教会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作者将另文撰述。

② 徐以骅等：《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10 页。

③ Louise Diamond and John McDonald, *Multi-Track Diplomacy: A Systems Approach to Peace*, West Hartford, CT: Kumarian Press, 1996.

④ Ian Hurd,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53, No.2, Spring 1999, pp.379-408.

源，因为“没有谁会否认宗教是合法性的一种极好来源”。^①美国国际政治学者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持相似的观点，认为在国内层面上，宗教虽能“削弱政府的权威”，但也“有助于使政府权威合法化”；在国际层面上，“宗教及宗教组织不但能有效引起跨越边界的他国信众对本国的认同与忠诚，而且能直接或间接对他国政府施压。”^②乔纳森·福克斯（Jonathan Fox）也认为，“宗教是合法性的一种来源”，“能使外交政策合法化”。^③这凸显了宗教的巨大外交功能，特别是具有使外交政策“合法性”的功能。自1943年苏联政府实施宗教宽容政策后，俄罗斯东正教会就积极参与苏联的外交活动，通过巩固其在周边国家东正教会的影响，帮助苏联政府巩固其在势力范围内的统治合法性，扩大苏联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南斯拉夫的一位东正教会主教曾公开支持莫斯科牧首区成为所有东正教会的领导，认为“在公开表明信奉东正教的国家中，只有俄罗斯能成为东正教会的领导。”^④

（二）跨国宗教与世俗国家之间并非必然对抗的关系，跨国宗教能与世俗政权进行紧密的合作。在当前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学者们更多的是强调跨国宗教与世俗国家之间的对抗，特别是前者对后者权威的挑战^⑤。例如，马克·杰根斯迈尔（Mark Juergensmeyer）指出，伊斯兰极端势力对美国纽约世贸中心的恐怖袭击、以色列与穆斯林极端主义者对巴以和平协定的愤怒反应等即是例证。同时，世界上不少国家为防范宗教行为体对政府权威的挑战，都视“宗教问题”为“政权维护”和“国土安全”问题，把宗教安全提上国家安全甚至是军事反恐的议事日程。^⑥但学者们夸大了跨国宗教与

① Jonathan Fox and Shmuel Sandler, *Bring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35.

② Jack Snyder,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4

③ Jonathan Fox, “Religion as an overlooked ele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3, No.3, Autumn 2001, pp.53-73.

④ William C. Fletcher, *Religion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45-1970*, p.18.

⑤ Mark Juergensmeyer, *The New Cold War? Religion Nationalism Confronts the Secular Stat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Mark Juergensmeyer, *Global Rebellion: Religious Challenges to the Secular State, from Christian Militias to al Qaed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Touchstone, 1997.

⑥ 徐以骅等：《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第10页。

世俗国家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忽略了跨国宗教与世俗政权之间的“合作潜质”。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少世俗政权常利用宗教证明其对外政策的合法性，颂扬为神圣的事业而战斗和牺牲^①，跨国宗教也常借助国家或政府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目标。从1096年持续到1291年的“十字军东征”即是跨国宗教与世俗政权之间合作，以实现各自目标的绝佳典范；而1943年至1953年间的苏联政府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合作亦是如此。苏联政府利用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道德权威、动员能力、中立地位及国际联系，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既凝聚了国内民众，亦争取了大量国际援助；在冷战初期与和平运动中，使之成为苏联的外交行为提供了“宗教合法性”外衣，并使之成为苏联外交政策的非正式执行者。与此同时，俄罗斯东正教会也借助苏联政府的力量，扩张了莫斯科牧首区的势力范围。因此，学者与政策制定者应改变视宗教为“动乱的根源”、“宗教与世俗政权为必然对抗关系”的思维，而将其转换为视宗教为对外交往过程中的“和平使者”、“宗教能与世俗政权进行密切合作”的思维。

（三）宗教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及宗教界人士在对外交往中可起到积极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在一个社会中，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并且上层建筑也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宗教自然也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必然会随着其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与观念也会发生变革，这就是说，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②而且，宗教也遵循着“适者生存”的法则：与一定社会的发展变化相适应的宗教就生存、延续了下来，而不能与一定社会的发展变化相适应的宗教则成为“历史的记忆”。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宗教必然而且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苏联的案例中，苏联政府对宗教的打压导致宗教及宗教界人士成为苏联政府的“负资产”，而采取宗教宽容政策后，宗教及宗教界人士成为

① John L. Esposito, Dalia Mogahed, “Battle for Muslims’ Hearts and Minds: The Road Not Taken”, *Middle East Policy*, Vol.14, No.1, Spring 2007, pp.27-41.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上发表的书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40页。

苏联政府的“正资产”。他们在对外交往中利用发布牧函、公开演讲、出版宗教书刊等机会，向国外民众特别是宗教信徒阐述苏联政府对宗教的“善意”，这对改善苏联的国际形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俄罗斯东正教会于1943年9月底邀请由约克大主教赛瑞尔·加尔贝（Dr. Cyril F. Garbet）领导的英国教会代表团访苏。这次访问的结果是，加尔贝归国后不但向西方国家讲述了苏联政府给予信仰者自由^①，甚至还指出，“基督教和共产主义之间不存在根本上不可调和的东西。”^②因此，虽然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与宗教价值观之间存在冲突，但并不意味着宗教不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反，宗教能与社会主义社会互相协调与合作。

四、结语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一直主张同宗教的斗争要服从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考虑，这一观点也导致了苏联政府对待宗教的实用主义态度：即在不需要利用宗教时，政府就对宗教采取迫害政策；而在需要利用宗教以实现国家利益时，就对宗教采取宽容政策。由此导致宗教在苏联国家中的地位与作用常随着政府目的、领导人的更替而发生急剧变化。

从俄国“十月革命”至苏德战争爆发期间，苏联“政”“教”双方的关系总体上处于一种紧张、相互对立的状态，而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双方处于一直“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之中：“十月革命”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宗教的态度与立场使俄罗斯东正教会担忧布尔什维克革命后自己的“安全生存”问题，因此对布尔什维克革命持敌视与反对的态度；俄罗斯东正教会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敌视与反对也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一直担心其“安全生存”问题，因此对俄罗斯东正教会采取了敌视与迫害的政策；苏维埃政权对俄罗斯东正教会采取的敌视与迫害政策使后者“知觉”曾经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因此后者更加敌视苏维埃政权，并努力为自己的“安

① Ann Shukman, “Metropolitan Sergi Stragorodsky: The Case of the Representative Individual”, *Religion, State and Society*, Vol.34, Issue1, 2006, pp.51-61.

② 段琦：《梵蒂冈的乱世抉择（1922-1945）》，北京：金城出版社，2009年，第217页。

全生存”而斗争，这又加深了苏维埃政权关于俄罗斯东正教会“负资产”的“感知”，并试图消灭之，两者处于一种“恶性螺旋”之中。虽然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领导人曾表达了对苏维埃政权的“忠诚”，但并未消除政府对其的“担忧”，结果俄罗斯东正教会处于一种濒临“灭绝”的边缘。

在苏联政府领导人接见俄罗斯东正教会领导人并实施了宗教宽容政策后，苏联“政”“教”双方的关系总体上处于一种较为“和谐”的状态，而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双方实现了“互利共赢”：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与教会建立“和谐”的政教关系而获得的收益比从社会中消除宗教获得的收益要大。政教关系的“和谐”既平息了宗教徒对政府的不满，维持了国内稳定的大局，又能改善国家形象，还能借教会的势力为自己的外交政策提供“合法性”。从教会的角度来说，俄罗斯东正教会由反抗苏维埃政权，转而与苏联政府“合作”，既维护了自己的“安全生存”问题，又借政府的支持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与势力范围，可谓“一箭双雕”。苏联政教关系的历史昭示：“政”“教”双方和则两利，斗则两伤。

虽然宗教既可能是“和平的使者”，也可能是“动乱根源”^①，但更应重视开展宗教对外交流活动，对于改善甚至提升一国国际形象、促进一国国家利益可能产生的积极意义。有学者就认为，“在政府的指导和组织下，发挥宗教组织和宗教领袖的作用，适度开展宗教文化交流是中国未来文化外交不可或缺的内容。”^②在“扎实推进公共和人文外交”^③的过程中，中国也应借助丰富的国内外宗教资源，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对外交往中的积极作用，以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与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① 徐以骅等：《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第10页。

② 胡文涛：“美国文化外交的思想与实践特征及其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年第2期，第30页。

③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9日第4版。

【Abstract】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cognition of public diplomacy and its functions. From 1943 till 1953,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ROC), with the support of Soviet government, carried on a series of foreign exchanges activities, which actually were public diplomacy.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Soviet Union shows that making use of religions to launch public diplomacy can offer a source of legitimacy for sponsors; it is not necessarily confronta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national religions and secular states, and transnational religions can cooperate closely with secular states; Religions can adapt to socialist society, religions and religious figures can play an active role during foreign exchanges.

【Key words】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the Soviet Union, Public Diplomacy, Legitimacy

【 Аннотация 】 Учёные по-разному воспринимают общественную дипломатию и её функции. В период 1943-1953 гг.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при поддержк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ровела ряд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о внешним связям и обменов, по сути являющийс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дипломатие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оказал, что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религии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может служить источником легитимности для страны, проводящей общественную дипломатию; 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религия и свет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не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находятся в конфронтацио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религия может находиться в тесн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со свет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религия может адаптироваться к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му обществу, религия и религиозные деятели могут играть активную роль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связях.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легитимность

(责任编辑 阎德学)

中俄关系史

清末民初中国人留学俄（苏）活动的历史考察

刘振宇*

【内容提要】清末民初中国人留学俄国的活动，是百年中国人留学史上最富有特色的篇章之一。自19世纪下半叶起，受其时国际国内形势等因素影响，在清政府的推动下，中国人留俄活动渐次兴起，陆续有中央、地方派遣的各类型官费、自费留学生赴俄国求学深造，而相关留学管理体制也随之建立与完善。这一留学活动不仅首开中国学子赴俄求学之先河，培养出一批精通俄文的外交、外语人才，而且开辟了近代中俄教育交流乃至文化交流的新渠道，并为后续中国人留苏活动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清末民初 留学教育 留俄

【中图分类号】K254.3/G526.9(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3) 01-0184-(25)

选派留学生赴海外求学深造，既是人类社会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也是一个国家造就人才的必要途径。对近代中国而言，派遣留学生更是育才于域外、“挽大厦之将倾”的求存之道。因此，自19世纪中叶以降，在“师夷长技”命题的引领下，为求“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①，大批学子负笈千里，奔赴东西洋诸国，由是揭开了百年中国人留学大潮的序幕。正因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故长期以来学界有关中国人留学史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在既有成果之中，就国别而论，以研究留学美、日、英、德等国为多，而对清末民初中国人留学俄国活动的专

* 刘振宇，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页。

题考察尚为稀见。有前苏联学者甚至认为,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还未有中国青年赴俄留学。^①为还原史实,以资借鉴,笔者以档案史料等第一手资料为依据,力图对此段留学活动之缘起、发展脉络及影响等进行述论,以求展现其完整风貌与历史意义。

一、留学之基筑于历史

对于处在时刻变化发展中的人类世界而言,每一历史事件的产生、演化乃至结局,都是与一定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紧密相连的,有特定孕育条件与深刻内在动因。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②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历史问题之时,必先对引致其发生、演进的内外因素作客观深入的探求。诚如列宁所言,研究社会科学问题的最可靠方法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③

中国人留学俄国的活动在清末民初时期的兴起,若追根溯源而论,则肇始于中俄国家关系的确立,并在两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领域交往不断深入的基础之上,伴随着中俄教育交流活动的开启而获得了产生发展的历史机遇。

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最早可追溯到公元 9 至 10 世纪。这一时期,罗斯与中国之间在商业贸易方面发生间接联系,中国的丝织品等各种制品开

① Ефимов Г. В. Из истор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трудящихся Китая//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77. № 2.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697 页。

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6 页。

始传入罗斯。^①但这种间接的贸易活动并未能真正促进中俄两大民族的沟通交流，直至成吉思汗麾下的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之时，中国与俄罗斯方才产生直接接触。公元 1223 年，蒙古大将速不台奉命进军俄罗斯南部，此后俄罗斯之名遂为中国人所知晓。在中国历史典籍的记述中，俄罗斯有多种称谓：“其名作斡罗思部，又作阿罗斯，又作兀鲁思，又作乌鲁斯。《元朝秘史》作斡鲁斯，盖皆蒙语Oros者也。”^②由蒙古人建立的钦察汗国控制了绝大部分罗斯领土之后，即有部分俄罗斯人被送至中国北部，组建起“宣忠扈卫亲军”，为蒙古贵族服役。^③而蒙古人则通过挟携中国内地的工匠技师、歌伎艺人、书吏等专门人才，在罗斯传播了中华文化。此外，蒙古人还将茶叶带到了罗斯诸公国，俄罗斯上层人士由是喜欢饮用中国茶，而且他们对精美的中国器物和服饰也颇为喜爱，“不但争相使用穿戴，还用东方语言来称呼”，“甚至学会了使用算盘来记账”。^④蒙古人在罗斯的统治大约持续了近两个半世纪。15 世纪下半叶到 16 世纪初，由大公伊凡三世统治的莫斯科公国基本完成了对罗斯各公国的兼并，并摆脱了蒙古的桎梏。^⑤而在中国，朱元璋于 1368 年率军攻占元大都，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起明王朝。随着盛极一时的蒙古帝国的崩溃，中俄之间的联系出现了历史断层，自公元 14 世纪下半叶起，彼此之间无论官方抑或民间往来皆难觅踪迹。

1547 年，伊凡四世在加冕典礼上正式采用古罗马皇帝凯撒的称号，自称“沙皇”。这标志着军事封建专制的沙皇制度在俄罗斯的确立。沙皇俄国自此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使得“俄国的历史”成为“一部国家殖民的历史”。^⑥在此进程中，中国与俄罗斯于 17 世纪开始建立起国家间的政治、经

① [苏]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 年以前）》，宿丰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40 页。

② 张星娘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60 页。

③ 详见[明]宋濂等：《元史》“本纪”三十五，“文宗”四；“本纪”三十六，“文宗”五。

④ 黄定天：《中俄关系通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2 页。

⑤ [苏]马夫罗金：《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余大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年，第 195 页。

⑥ 复旦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编写组：《沙俄侵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2 页。

济和文化联系。沙俄不仅通过武装侵略对中国领土进行殖民占领，更着意于借助商业攫取利益。有学者对此评价道：“俄国从最初与中国发生关系时起，就让人家看出它想从与它的邻邦的接近中捞取些什么……而这个目的就是商业。俄国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未来的市场。”“彼得大帝时期的中俄关系史，实际就是俄国在远东的商业史以及中国政策对这种经济关系所发生的影响的历史。”^①这就导致冲突与贸易成为其时中俄国家关系的主题，清王朝与沙俄政府围绕着领土争端、商贸往来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斗争与谈判。在此期间，两国分别于1689年和1727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及《恰克图条约》，对涉及的矛盾与争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予以规定和解决。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中俄关系的演进促成了中俄教育交流活动的产生。在清王朝与沙俄政府交涉日繁的过程中，两国都感受到语言隔阂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尤其是进行尼布楚谈判之时，因中俄均缺乏通晓对方语言的专业翻译，只能启用熟谙拉丁语而又掌握汉语的在华耶稣会士作为沟通媒介。有鉴于耶稣会士的独立“第三方”身份，故其难以成为沟通中俄关系的长久倚重力量。由此，中国与沙俄都开始着手培养外交、翻译人才。俄国政府充分意识到此问题的重要性，因而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既在国内兴办满、蒙文学校，又向北京派遣东正教驻京布道团和留华学生，以此培养通晓中国语言的外交、翻译及汉学人才，并配合沙俄对华外交政策开展搜集情报、研读资料等活动，对中国进行全面研究。^②相对于俄罗斯的积极态度，其时尚处于鼎盛时期的清王朝则囿于传统的“天朝上国”政治文化与朝贡体制，不肯“纡尊降贵”派遣留学生赴俄实地学习，仅于1708年在北京创设了俄罗斯文馆，以及于1792年在伊犁建立了“伊犁俄罗斯学”，培养俄语人才。^③

尽管清王朝对于培养外交、翻译人才的重视程度较之沙俄相去甚远，但中俄教育交流毕竟得以发轫。随着中国与俄罗斯国家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在

① [法]加斯东·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7页。

② 参见余子侠、刘振宇、张纯：《中俄“苏”教育交流的演变》，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2-27页。

③ 故宫博物院：《文献专刊（故宫博物院十九周年纪念）》，北京：和记印书馆，1944年，第49页。[清]松筠修：《钦定新疆识略》（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第639页。

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此种教育交流活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而为中国人赴俄留学创造了历史契机。

二、官派留俄始于外交

伴随着中俄国家关系的逐步演进，中国人留学俄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亦日益显现。对于派遣中国学子赴俄留学一事，早在 18 世纪上半叶已有清朝官员提出动议。1735 年，镶蓝蒙古旗副都统多尔济，针对俄罗斯文馆教学成效并不显著的问题向清廷奏议：“由俄罗斯学校少年内，拣选学习略懂者四名，与今来之俄罗斯使臣同遣，勤习伊等语文三年而回。如此，翻译由俄罗斯国来文，不致遗谬。”^①此项派遣留俄学生的建议虽是学习外语之良策，但基于其时清王朝对俄外交政策的局限而并未被采纳。当历史的时针转到 19 世纪中叶时，中国人留学俄国的契机似乎再度出现。1859 年 1 月 24 日，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②在致黑龙江副都统吉拉明阿的咨文中表示：“所有二年后差学生前来之处，我甚欢悦，且与两国有益。其学生前来学艺，务于起身之一月或半月以前致信，我闻信后，即饬属员尽心教诲。”^③接此咨文后，清廷却颇感莫名其妙。于是，清中央政府在同年 1 月 27 日密寄给黑龙江将军奕山、吉林将军景淳的上谕中指出：“其木哩斐岳幅来文内，有二年后差学生到俄国学艺之语，更不知从何而来。”^④由于缺乏更多资料旁证，此事成为一桩无从考证的历史悬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咸丰帝在位时期并未有中国学子以官派留学生的身份赴俄学习。

直至清同治年间，中国人留学俄国的帷幕才徐徐拉开。此时，历经两次鸦片战争的满清王朝被迫选择兴办洋务作为“自救”措施，派遣留学生即是其中教育革新的重要环节，这就再次为中国人赴俄留学提供了机遇。由是，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合肥：黄山书社，1998 年，第 2492 页。

② 在清朝汉文俄罗斯档中被称为木哩斐岳幅。

③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 3 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611 页。

④ 同上，第 609-610 页。

从“随使游历”与“住馆肄业”起步，官派留俄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所谓“随使游历”，是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派遣使团出国考察时，随团均携有京师同文馆学生若干名，这些学生要在领队官员的指导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了解各国国情，掌握外交礼仪，熟悉中外交涉有关事项等。“随使游历”前往的国家很多，俄国便是其中最主要国度之一。此时的中俄关系已经与清代前期大有不同，俄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充当英法与中国之间的调停者，从中捞取到大量在华利益和特权，沙俄势力得以渗入中国并全面扩张。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不得不改变以往“天朝上国”不肯轻易遣使出访的态度，开始陆续向俄国派遣使团参观考察。第一个赴俄考察团于 1866 年派出。是年 2 月 20 日，恭亲王奕奏请清廷批准斌椿携若干同文馆学生随赫德出洋考察。同年 3 月 6 日，斌椿考察团从北京启程。该团共有 5 人，包括斌椿与其子广英，以及同文馆的 3 名学生。^①访俄期间，斌椿一行收获颇丰，尤其对沙俄国情有直观的了解。继斌椿考察团之后，清政府于 1868 年 1 月 5 日又派遣蒲安臣使团前往日、美、英、俄等国“办理中外交涉事务”^②。此次随团出访成员中亦有京师同文馆英、法、俄馆学生共 6 名。^③斌椿考察团和蒲安臣使团对俄国的出访，使随团同文馆学生得到多方历练，增长了对俄国的认识，也对俄语更为熟谙，这就为此后中国使团专访俄国铺平了道路。1878 年 12 月 31 日，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崇厚率领的访俄使团抵达圣彼得堡。使团中有京师同文馆学生 6 人，主要任务是担任翻译及实地学习。这些学生分别隶属于英、法、俄三馆。^④学生们除担任翻译外，还协助官员襄办馆务，并借参加外事活动之机与俄国社会广泛接触，这对培养其语言文字能力、外交技能及增进对俄国的深入了解均大有裨益。

随着中外交涉日益增多，单靠“随使游历”已无法满足清政府对外交、外语人才的需求。为改变此种状况，1890 年 3 月 16 日詹事志锐上奏称，由于随使出访机会太少，导致同文馆学生欠缺口语锻炼，无法同外国人流畅交

① 张德彝：《航海述奇》，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1 页。

② 张德彝：《欧美环游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26 页。

③ 同上，第 25 页。

④ 张德彝：《随使英俄记》，长沙：岳麓书社，1986 年，第 640 页。

谈，遑论快速准确地完成翻译工作，由是提出应给予学生更多出国机会。^①此建议获清廷肯定，继而以“住馆肄业”取代“随使游历”，以加强培养同文馆学生的外语能力。1896年2月7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报《奏派学生出洋片》，拟于英、法、德、俄使馆各拨学生4名，分往学习语言、文字、算法，以3年为期，责成出使大臣严为稽核。^②其中赴俄学生共两批：第一批是邵恒浚、桂芳、陈嘉驹、李鸿谟，第二批为张庆桐、傅仰贤、陈瀚、郝树基。与“随使游历”的同文馆学生相比，“住馆肄业”学生可长期在俄学习，但同时由于“学生均以襄赞使署公牍为务，无暇求学”，所以有学者认为其“实不能谓为留学生也”。^③虽然如此，“住馆肄业”学生还是获得了进入俄国学校攻读专业课程的机会，比“随使游历”已是不小的进步。如郝树基在俄所学专业为矿务，于1905年10月学成回国；陈瀚、范其光所学专业为铁路，毕业后为获得高等文凭自愿继续留俄。^④部分“住馆肄业”学生还因学业优良获清政府褒奖。如在1905年，出使俄国大臣胡惟德上奏清廷，称张庆桐、郝树基、范其光、陈瀚“在俄已届满六年”，且“积年刻苦，讲求科学”、“立志既远，植品尤佳”，请求清廷“按异常劳绩续行请奖所有”。此议获准，张庆桐等人因此均升至更高官阶。^⑤

“随使游历”与“住馆肄业”开创了中国官派留俄学生之先河，尽管其首要目的是配合外交官员完成出使使命，但也确实负有学习语言文字及其他专业的任务，而其积累的外语知识、外交技能都成为后辈留俄学生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9-70页。

② 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51-52页。

③ 张星娘：《欧化东渐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5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总第92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63页。

⑤ “奏为前同文馆选派洋学习俄文学生张庆桐等毕业请鼓励事”，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军机处录副（光绪朝）缩微号538-2554。

三、官费留俄随势而兴

历经“随使游历”与“住馆肄业”阶段后，真正意义上的官费留俄学生终于在 20 世纪之初登场亮相，而这又与清政府对留学教育的更高要求及其时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为提高留学生的质量和数量，光绪皇帝于 1899 年和 1902 年先后两次下旨，要求留学生从专门学习语言文字向学习其他专业转换，并诏令各省给予一定经费支持。因此，从中央政府机构到地方各省纷纷加大派遣留学生力度。其时，鉴于各省所派出洋学生多以日本为主，而往泰西各国咨送者甚少，故清廷谕令各省督抚，为“广开风气”，“选择明通端正之学生，筹给经费，派往西洋各国”^①，这就为官费留俄生的出现提供了契机。加上此时俄国已步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高等教育获得极大发展。到 20 世纪初，俄国大学里的自由气氛和学术生活多元化已经可以与西方国家的大学相媲美^②。虽仍存有“法政不如工艺，文学不如武备”的弊端，但军事、工业技术、农林冶矿等专业的教育水平位居世界前列，这与清政府着意培养科技人才的目的不谋而合。^③由此，留俄学生人数呈渐增之势。

1903 年，署理湖广总督端方从湖北各学堂中选拔出萧焕烈、严式超、夏维松、刘文彬派往俄国留学。1904 年，经总理学务大臣奉旨批准，京师大学堂译学馆选派柏山、魏渤前往俄国圣彼得堡皇家大学堂学习法政专业。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对派遣留俄学生同样十分重视。他在 1906 年的一份奏折中指出：“查各省咨送外洋肄业学生，若日若美，若英法德，为数约以万计，独于俄则寥寥无几……江省界连壤接，密迩周旋，将来两国铁轨大通，界务、商务以及一切交涉事宜，接踵而起。若以彼都政事俗尚不加深究，何以收安

① 朱寿朋、张静庐：《光绪朝东华录》（卷 176），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第 4932 页。

② [美]梁赞诺夫斯基、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七版），杨烨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413 页。

③ 王焕琛：《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 年，第 654 页。

内辑外之效？”^①正是基于为东北培养外交人才的考虑，程德全于 1906 和 1907 年先后派遣王忠相、车席珍、朱绍阳、王佐文、车仁恭、刘雯、朱世昌、唐宝书、李毓华、钟镐等人前往俄国圣彼得堡学习勘探、矿物、理化、法政、商务、军事等专业。此外，1906 年有原自费留学的江苏学生魏立功转为官费生，并于 1908 年入圣彼得堡商学院学习商务专业。1907 年，吉林官费生、肄业于京师同文馆的李垣入圣彼得堡大学。同年 8 月，江苏自费生李宝堂入圣彼得堡铁道学院学习铁路建设专业，后转为邮传部官费生。

为便于了解清末新政时期官费留俄生的大致情形，现将资料较全者列表如下表：

表 1 清末民初部分官费留俄生情况一览表

姓名	籍贯	到俄时间	何处咨送	到学年月	所在院校	专业	毕业时间	毕业去向
柏 山	广州驻防镶白旗	光绪三十年五月	京师大学堂译学馆	光绪三十年八月	森堡大学堂	法政科	宣统二年	回国
魏 渤	江苏海门厅	光绪三十年五月	京师大学堂译学馆	光绪三十年八月	森堡大学堂	法政科	宣统二年	回国
萧焕烈	湖南衡州府清泉县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	湖北	光绪三十年七月	森堡大学堂	法政科	预计宣统三年	回国
严式超	湖北黄州府黄冈县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	湖北	光绪三十年七月	森堡大学堂	政法专科	拟于宣统元年	光绪三十四年暑假护送病重同学夏维松回国
魏立功	江苏海门厅	光绪三十年四月	江苏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	森堡中等实业学堂	/	宣统二年	商务学堂毕业后入军医大学堂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	森堡商业学堂	商务普通科		
朱世昌	安徽安庆府桐城县	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	黑龙江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	森堡矿务学堂	勘苗科	民国初年	/
车席珍	黑龙江省海伦厅	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	黑龙江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	森堡矿务学堂	矿务专科	民国初年	回国
唐宝书	广东香山縣	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	黑龙江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	森堡大学堂	格致科	民国初年	/
车仁恭	黑龙江省	光绪三十二年	黑龙江	光绪三十三年	森堡大学	法政科	民国初年	/

① “奏为黑龙江省选派学生赴俄游学以储人才事”，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宫中朱批奏折缩微号 01-38-009-1609。

	巴彦州	年闰四月		年八月	堂			
王佐文	黑龙江省呼兰府	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	黑龙江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	森堡大学堂	法政科	民国初年	/
王忠相	黑龙江省海伦厅	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	黑龙江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	森堡实业学堂	商务法律	民国初年	回国
朱绍阳	湖北武昌府兴国州	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	黑龙江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	森堡商业学堂	商务专科	民国初年	/
李毓华	吉林省吉林府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	黑龙江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	森堡大学堂	法政科	民国初年	回国
刘雯	吉林省吉林府	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	黑龙江	光緒三十四年八月	森堡矿务学堂	矿务专科	民国初年	回国
钟镐	吉林满洲镶黄旗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	黑龙江	/	陆军马队学堂	/	照章四年毕业	回国
李宝堂	江苏上海县	宣统元年三月	邮传部	光緒三十三年八月	森堡铁路大学堂	铁路专门科	民国初年	回国
陈瀚	江苏江宁府江浦县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	外务部	光緒二十八年	俄京道路学堂	道路工程	/	光绪三十一年商部札调，三十二年伊犁将军奏调
范其光	江苏江宁府上元县	光绪二十五年五月	外务部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	俄京道路学堂	桥工、铁路，等等	/	光绪三十一年商部札调，三十二年分通艺司行走
李垣	顺天府大兴县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	吉林	光緒三十四年	森堡大学堂	/	照章四年毕业	回吉林省

资料来源：王煥琛：《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年，第659-668页资料整理而成。表格中所说的“森堡大学堂”即“圣彼得堡皇家大学堂”。

表1中所列官费留俄生共计19名。此外，尚有部分官费留俄生因资料不全等原因无法列入表内，现对其情形概述如次：湖北选送的夏维松因病于1907年提前回国，后再度赴圣彼得堡完成学业，刘文彬则转入欧洲其他国家就学。^①1903年8月自费留俄生陈颇抵达俄国^②，1904年6月5日转为外

① 杨树人：《俄国事务专家夏维松先生的回忆》，台北《传记文学》，1962年第1卷第3期，第24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总第95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2页。

学部官费生^①，同年7月入“(俄国)户部所设之学堂内”学习商务、实业^②。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俄文科甲级学生陈大岩、陈浦等3人，于1903年受派赴俄留学。^③1911年，管学大臣命京师大学堂提调从学堂内选派留俄官费生，最终只有从未学过外语的体操教员刘光谦应征。赴圣彼得堡后，因其未习好俄文而无法入校听讲，后申请改派法国。^④

除了上述由清中央政府主导派遣的官费留俄生外，来源于东北、西北地区的地方自主官费留俄生亦不乏其人。在新疆，1902年锡伯营领队大臣、副都统色布西贤为培养锡伯族人才，经与索伦营领队大臣协商并报请伊犁将军马亮批准，从锡伯、索伦两营和新老满营中选拔关清廉、春保、伊力善、殷德山、崇纳等11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于当年保送至俄国阿拉木图学习俄语。^⑤1903年，伊犁将军马亮为培养通晓俄语的满蒙外交人才，挑选留俄幼童10名，由索伦营领队大臣志锐带领赴俄国阿拉木图当地学堂留学，另派新满营佐领伊勒噶春随带大学生2名驻俄照料。^⑥1907年，马亮以“该学生等材堪造就”为由，派索伦营副领队总管福善带领他们继续在俄学习。1908年，署理伊犁将军广福增派大学生2名同赴阿拉木图留学。^⑦

东三省派遣留俄生的方式较之于新疆更为独特，即由地方政府选派学生赴俄国控制下的中国城市学习，而这又是源于沙俄对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自1896年起，沙俄先后利用多项不平等条约取得修筑中东铁路及支线的特

① “奏为赴俄学习期满官学学生陈颇勤苦耐学请奖励事”，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军机处录副（光绪朝）缩微号538-2587。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总第95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8-49页。

③ 参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40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198页；陈初辑：《京师译学馆校友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

④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765页。

⑤ 政协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伊犁文史资料》（第6辑），1990年，第169页。

⑥ “伊犁将军马奏出洋学生考选拔学并养正学堂改添教习限定学额片”，《东方杂志》，1905年第2卷第6期，第101页。

⑦ “奏为伊犁满蒙幼童赴俄学堂游学期满继续留俄学生经费开支等事”，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军机处录副（光绪朝）缩微号538-2148。

权，其势力由此深入到东北全境。日俄战争后，沙俄更加着力控制所占中国领土，迁入东北的俄人数量与日俱增。1906 年时哈尔滨已“有俄人 6 万余名”，“一切要政商务均归俄人把握，自东三省交涉局总办以及其余中国官商皆俯首帖耳毫无主见。”以至时人讽曰：“黑龙江省有一俄人独立地在名曰哈尔滨，盖至言矣。”^①这一时期，沙俄在哈尔滨等地建立大量俄国学校，其中一些也吸纳中国学生，这就为东北地方政府派遣学生赴哈学习创造了条件。1911 年 9 月，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与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达成协议，由奉天选派 30 名官费留学生（男生 20 名，女生 10 名），进入哈尔滨男子、女子商业学校攻读 8 年制商业经济专业。到哈后，他们寄宿于俄人家庭，饮食起居均按俄人习惯，日常生活皆用俄语对话，因而学业进步极快。^②在 1913 年 6 月举行的合班考试中，5 名男生和 3 名女生被评为最优等，并获书籍等奖品，其余诸人成绩亦为优异，均可进入高级班与俄国学生一同学习。^③这些学生毕业后多从事外交工作，如曾任中东铁路理事会俄文秘书、《哈尔滨公报》社长、哈尔滨副市长的关鸿翼，就是其中一员。^④

至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也曾选派学生到俄国圣彼得堡大学、炮兵学校等校留学。^⑤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选派官费留俄生活动因政治原因终止。

四、自费留俄风起青萍

相对于官派留俄生的起步迟缓，同为留俄生重要组成部分的自费生则出现较早，且初期多为少数民族人士。1866 年，新疆锡伯族人福善随父母前往俄国，直到 1880 年回国，此后一直在塔城从事汉、满、维、俄等多种文字的翻译工作。^⑥1883 年，在新疆阿图什县伊克莎克乡出现了一所既授宗教

① “哈尔滨中俄近状”，《盛京时报》1906 年 9 月 10 日。

② 黑龙江省文史研究馆编：《黑土金沙录》，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 56-57 页。

③ “留哈俄商务学堂学生之进步”，《盛京时报》1913 年 6 月 20 日。

④ 张福山编著：《哈尔滨文史人物录》，1997 年，第 71 页。

⑤ 王焕琛：《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 年，第 1683 页。

⑥ 政协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史资料委员会：《伊犁文史资料》第 18 辑，2002 年，第 74 页。

课程又讲科学知识的新式教育机构，至 1885 年时，该校创办人胡赛英·木沙巴耶夫兄弟即派出 7 名学子赴俄喀山师范学校留学。到 1892 年，该地方派往国外求学者的队伍有所扩大。自此至清末，先后派出 50 余名学子分往俄国、土耳其等国留学。由此可见，该地不仅为新疆地区近代出国留学之率先垂范，而且为后来新疆的留学教育事业打下了深远的历史基础。^①有的早期自费留俄学生还进入清朝地方政府工作，为中国对俄外交提供了极大帮助。如程德全主政黑龙江时期，其麾下便有一位名为阜海的哈喇沁蒙古族人，早年曾赴俄国学习语言文字。程德全称赞此人“于彼都政教风尚颇能识其大略”，因而向清廷申请将阜海列入巴尔虎旗当差。^②进入 20 世纪后，新疆自费留俄生借助与俄为邻的地理优势，多前往“较为近便”的“与伊交界之俄国地方就学”。^③如在 1913 年，锡伯营三牛录阿昌阿、觉洛、德全、文合尔图自费到俄国阿拉木图上中学。^④此外，塔塔尔族也曾派出留俄学生。如在 1910 年，塔塔尔族的吾玛尔阿杰在塔城地区建立了第一所新式学校。为解决师资问题，吾玛尔阿杰派其子阿不都热合曼等一批学生到俄国喀山留学。这批学生学成归来后，充实到学校的教学第一线，极大地推动了这所新式学校的发展。^⑤

与此同时，清末民初来自东北及内地的自费留俄生亦不乏其人，且情况各异。自 1858 和 1860 年沙俄先后通过不平等的《璦琿条约》、《北京条约》割占了中国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 10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后，在黑龙江与俄国远东地区之间便形成了长达 64 年的“开交通”时期（1858—1922）。在此期间，黑龙江沿岸的两国人民，不分国界，不用证

① 政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 13 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80-81 页。

② “奏为查明哈喇沁蒙古人阜海能识俄国语言文字请准列入巴尔虎旗当差事”，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缩微号 04—01—38—008—2827。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 95 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36 页。

④ 政协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史资料委员会：《伊犁文史资料》（第 18 辑），2002 年，第 75 页。

⑤ 政协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史资料委员会：《伊犁文史资料》（第 3 辑），1987 年，第 22 页。

件，可以自由往来。^①于是，黑龙江地区赴俄国者日增。^②据 1909 年的统计，黑龙江省前往外国者以赴俄为最多，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2 1909 年黑龙江省赴俄及定居人数表

	赴俄国人数	寄居俄国人数
龙江府	2644	75
呼兰府	2	/
兰西县	8	18
瑗珲县	19	18
呼伦厅	242	/
合计	2915	111

资料来源：引自柳成栋整理：《清代黑龙江孤本方志四种》，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168 页。

在此趋势之下，该地自费留俄人数日趋增多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据《黑龙江志稿·学校志》载：“出洋留学之人数，亦逐渐增加。最近留学俄、日之学生，其数超过晋、豫各省。”^③

此外，比较典型的自费留俄个案有：曾长期从事外交及外语教育工作的李家整，于 1886 年（光绪十二年）自费出洋学习，先到英国学习英文，后到俄国学习俄文，并于 1887 年 11 月担任驻俄使馆翻译。1903 年，自费留俄生吴文璐、陈渤于 8 月间先后抵达俄国。^④曾作为张作霖部下充任东北辽吉黑热四省经略公署交际处长的杨卓，少年时期被人带到俄国接受过良好教育，对俄文俄语颇为精通，在后来东北与苏俄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曾参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受到列宁接见的张永奎，因少孤被俄国医生收养并带回俄国，后于 1906 年和 1915 年分别考入彼得洛夫斯克第一中学和圣

① 政协黑龙江省黑河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黑河文史资料》（第 8 辑），1991 年，第 72 页。

② 参见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П. Изучение Китайцев В России. 1858-1884 гг. Россия и АТР. 2005. № 3; Мерк В.В. Китайская Община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В 1920-е годы// Вестник Новосибир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История, филология. 2007. Т.6. №4.

③ 张伯英：《黑龙江志稿》，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1104 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 95 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32 页。

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学习。^①而著名的国民党左翼人士、进步社会活动家张西曼教授，则于 1911 年前往俄属海参崴留学，以京师大学堂肄业生身份转入俄帝国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后改为东方大学）研究政治经济。^②

除上述自费留俄者外，当时还有一些在俄国远东地区及中国东北地区经营边贸生意的商人，也将下一代送往圣彼得堡等地留学。如 1904 年 8 月 17 日，驻俄公使胡惟德在致外务部的电报中提出：“崴部粤商关、旅顺粤商冯，各遣子弟一人来森留学，已历三年。近因战事，信阻资绝。学堂中向使馆商办。德思出洋留学系遵旨事件，自备资斧尤宜加奖劝设。因资绝废学，功辍丰途，诚非国家本意，可否暂由部拨官款支給，每年每人以千金为限，不过一年，战定信通，仍由该商本家续给，在国家所费不多，而可得劝商奖学之效。”这封电报既表达了胡惟德对自费留俄生的关爱，亦透露出其时部分自费留俄生求学的艰辛。然而胡惟德请求资助自费留俄生的建议最终未被采纳，这两名中国学子不久之后便因学费断绝而被资遣回国。^③当然，也有自费生因学业成绩优良、综合素质突出而获得驻俄使馆的肯定与聘用。如在 1904 年 9 月 12 日，胡惟德在致外务部的电报中提出：“自费学生吴文泰、舒英材极可造，亟应起给薪水，留襄公事，以资造就。”^④字里行间充分表达了对自费留俄生才华的高度评价与认可。

因有关其时自费留俄学生的材料有限，现仅将资料较详细者列表如下表 3。需要说明的是，表 3 所列名单中的胡世泽、乌铭濬、乌益泰、毕文彝、毕文鼎、程世模虽名为自费，但均有明确的官方背景。胡世泽是出使俄国大臣胡惟德之子，乌铭濬、乌益泰、毕文彝、毕文鼎均为清政府官员下属，程世模是黑龙江将军程德全之长子，留俄之前已“略通俄国语言文字”。而同样积极派遣留俄学生的伊犁将军马亮，则于 1903 年将时年 22 岁的长子、试

① 参见张福山编著：《哈尔滨文史人物录》，1997 年，第 94、97、127 页。关于杨卓的生平考证，详见张福山、欣然：“杨卓生前身后事”，《世纪桥》，2005 年第 4 期。

② 张小曼：“我的父亲张西曼”，《海内与海外》，2009 年第 7 期，第 13 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 92 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第 122-123 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 95 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51 页。

用通判广荣从伊犁派往俄国自费留学。^①

十月革命后，北洋政府仇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停止了官费留俄学生选派，于是有留俄者悉为自费。是时，苏维埃联邦的远东共和国在北京设有远东通讯社及外交使团，少数中国青年即通过远东共和国驻北京外交使团获得签证而赴苏俄留学。^②

表 3 晚清部分自费留俄生情况一览表

姓名	籍贯	到俄时间	何处 寄送	到学年月	所在院校	专业	毕业 时间	毕业去向
程世模	四川夔州府云阳县	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	黑龙江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	森堡实业学堂	商务法政科	民国初年	回国
牛文炳	山西汾州府汾阳县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	学部	宣统元年八月	森堡大学堂	物理专科	民国初年	回国
胡世泽	浙江归安县	光绪二十六年	/	光绪三十一年	森堡中学堂	普通科	民国初年	毕业后入专门大学堂
乌铭潜	镶黄旗蒙古霍隆武佐领	光绪三十三年	/	宣统元年三月	森堡商务高等学堂	商务专科	/	/
乌益泰	镶黄旗蒙古霍隆武佐领	光绪三十三年	/	宣统元年三月	森堡商务高等学堂	物理科	/	/
刘泽荣	广东肇庆府高要县	/	/	光绪三十一年	俄南省白通府城中学堂	普通科	预计宣统三年	毕业后入森堡大学堂
毕文彝	汉军镶蓝旗春奎佐领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	/	/	俄国普通中学毕业并兼习俄、法文	/	/	赴比利时留学
毕文鼎	汉军镶蓝旗春奎佐领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	/	/	俄国普通中学毕业并兼习俄、法文	/	/	赴比利时留学
关鹤朋	广东广州府南海县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	/	光绪三十三年	森堡实业学堂	/	/	回国

资料来源：王焕琛：《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年，第659-668页资料整理而成。表中所说的“森堡大学堂”，即“圣彼得堡皇家大学堂”。

① “奏为遣长子广荣自费赴俄游学请俟学有成就考验差委事”，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军机处录副（光绪朝）缩微号538-244。

② 参见黄平：《往事回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页。

五、管理体制几经更迭

清末民初的留俄教育管理体制历经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发展过程。基于国家管理留欧教育策略的演变，无论规章制度、机构设置抑或人员选用，均有明显变化。

晚清时期，中央政府对留俄生的选派与管理最初并无既定方针与常设机构和人员，对留俄学生的直接管理主要依托驻俄使馆这个平台。从“随使游历”和“住馆肄业”开始，出使俄国的外交官员即负有管理留俄学生之职责。由于其时留俄学生极少，因而尚有余暇对留学生的经费、生活、课业、奖惩等事项进行处理。例如，驻俄使节应总理衙门的要求，会对同文馆学生进行课业考核、评定成绩，以督促他们努力学习。曾纪泽兼使俄钦差大臣时，即曾多次对同文馆学生的课卷进行审评，并排定甲乙名次。^①又如胡惟德担任驻俄公使期间，对官费、自费留俄生的学业、生活等有关事项无不面面俱到、呵护有加。除此之外，胡惟德还组织留俄学生开展邮寄译报工作，每月二次，由留俄生自译自缮。此项工作“一以鼓励译材，一以考察勤惰”，因此“与培植学生之道不无裨益”，对于培养留俄生的翻译能力与综合素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②

而当官费、自费留俄生日渐增加之后，出使大臣在处理种种公务之外，显然已无暇负起全面管理留学生事务的职责，这就迫使清政府必须设立专人承担包括留俄生在内的留欧学生管理工作。最早提议并设置留欧游学监督的是一些积极派遣留学生的地方大员。早在 1896 年，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在派遣赴英、法、德等国的留欧学生时，便选派昔日曾充任出洋委员的江苏候補知县沈翊清担任“照料委员”，配合出使法国大臣庆常管理留学生的诸项事宜。^③1903 年，署理湖广总督端方鉴于江鄂两省留德学生逐渐增多的情况，

① 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6 年，第 357-414 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 95 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36 页。

③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 2 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141-1142 页。

选派曾担任出使大臣随员的户部候补员外郎阎海明担任留德学生监督。^①然而，阎海明在任职不久后即因个人原因自动请辞。^②此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周馥又任用候选道员吴宗濂充任江鄂两省留学生监督，“凡在英法德比四国学生悉归该员管理”。^③

当然，此时的留俄生仍未有专设的留学监督，依然归驻俄公使管理。这种情况直至 1907 年才发生改变。是年 5 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端方合奏清廷，因原留欧学生监督吴宗濂“已由比国参赞奉命兼权使”，亟需遴选人员接替其责，所以请求批准由江苏淮扬海道蒯光典接充江鄂两省留学生监督，此议获准。^④1907 年 12 月 9 日，学部奏请《派欧洲游学生监督并陈开办要端折》，提出鉴于江鄂及直隶等省的留欧学生人数渐增，为能切实考察学生的学业等情况，严格约束学生的行为，请求由蒯光典充任欧洲游学生监督，负责全国各省留欧学生之事务，此议再获批准。^⑤蒯光典到任之后，清政府向其刊发了一颗满汉合篆文的木质关防，作为监督所行文牒之用。^⑥

上任之初，蒯光典即着手对留欧学生事务进行整顿，并以书面形式向学部汇报。其后，学部根据蒯光典的汇报，电令各省务须切实严格管理留欧学生，“官费生不准为旁听生；校外预备与各项预备科均不准给全费；留学生不许改国、改校、改科；学费不许预支。”而自费生除学习农、工、医、格致四科外，其余为各大学旁听生及各项预备科者均不得补官费。^⑦在任期间，蒯光典作为留欧学生监督，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其在整顿学务、管理学生等方面的努力，使得晚清留欧教育管理得以加强。有鉴于蒯光典的工作业绩，

① 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第 345-346 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14 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340-341 页。

③ 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第 971-972 页。

④ “奏请蒯光典接充欧洲留学生监督事”，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军机处录副（光绪朝）缩微号 414-1230。

⑤ “学部奏派欧洲游学生监督并陈开办要端折”，《政治官报》，1907 年第 54 期，第 237-239 页。

⑥ “又奏刊发欧洲游学生监督木质关防片”，《政治官报》，1909 年第 136 期，第 200 页。

⑦ 《大清法规大全》，台北：考正出版社，1972 年，第 1613-1615 页。

清政府于 1909 年批准其由淮扬海道擢升为四品京堂候补，以示嘉奖。^①然而好景不长，蒯光典因与留欧学生发生矛盾而致引发风潮，各国留学生联名呈请学部查办此事，因而学部不得不电飭蒯光典回国，其留学监督的职责则由驻各国使节代为行使。^②此后不久，清政府以蒯光典独自管理留欧学生事务力有不逮，且“游学监督不归使臣节制，交涉时未免扞格”为由，决定撤销游学监督一职，改在驻欧各国使署中设立游学监督处，并由翰林院庶吉士章祖申出任留俄学生监督，主要负责管理留学生的各类具体事项，另每年拨给经费白银 7600 两。^③当然，留俄学生监督仍要受出使俄国大臣辖制，在申领学费、对俄交涉、安排留学生等很多事务上需出使大臣的支持乃至亲力亲为。

除了管理机构及管理人員的变更外，管理留俄学生的规章制度也在逐步建立并日益完善。在留俄教育开展之初，并无专门规程对留学生的经费、课业等作以框定，清政府只是按情况发给留俄生一定数额的费用。例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 1896 年派遣邵恒浚、桂芳、陈嘉驹、李鸿谟赴俄之时，在临行前给每人整装银 150 两。到俄后他们按清廷要求寓居于使馆，并可每月领取薪水银 50 两。^④1906 年学部颁布《通行京外议定游学欧美学费数目文》，其中首次对留俄学生的学费作出明确规定，即每月发给 135 卢布，每年总计 1620 卢布，在预科学习者则每月学费被削减五分之一。^⑤在设立专员负责留欧学生事务后，清政府于 1910 年 4 月 24 日颁布《管理欧洲游学生章程》，对学生管理、留学经费等予以明确框定。其中规定，留学欧洲的期限为 3 至 7 年，超过 7 年则取消公费资格，而已大学毕业再加特别研究者则不受此限；留俄学生从国内启程时能得到治装费 300 银圆，川资 500 银圆，毕业回国时亦可获得川资 500 银圆；留俄官费生在留学期间每月有 135 卢布的学费补贴，自费生如果能够考入大学学习农、工、格致、医科等专业，并管理游学生

① “直隶总督端方奏欧洲游学监督蒯光典卓著劳绩恳优加擢用折”，《政治官报》，1909 年第 719 期，第 255 页。

② “欧洲留学总监督行将裁撤”，《教育杂志》，1909 年第 1 卷第 6 期，第 42-43 页。

③ “学部奏欧洲游学监督改归使署办理并遴派各监督折”，《政治官报》，1909 年第 733 期，第 487 页。

④ 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1 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年，第 144 页。

⑤ 《大清法规大全》，台北：考正出版社，1972 年，第 1592 页。

监督处查明确实勤奋好学、成绩优异，也可获得部分学费补助。^①

至民国初期，其时中国政府对留俄教育的管理似乎作另类看待。据其时报载，1913年时民国教育部拟将留欧学生监督实行裁撤，“由部委派留学经理一人，经理留学各国学生费用事宜”，即“各国留学学费一律归经理发给”，但留俄学费“仍由使署兼管”。同时经理得负责“调查学生成绩、学校情形及学术事项，以报告于教育部”，“学生抵国及离国均由经理员于教育部所发证书上批明进出年月以资考核”，而留俄学生则是任其自为。^②另据当时主管黑龙江教育事务的林传甲所著《黑龙江教育日记》载，驻俄公使刘镜人及留俄生车席珍、王佐文等人曾多次来电来函催求留学费，而教育部则有不准留俄学生经费的批示，这些内容也可从一个侧面印证其时留俄教育被打入“另册”的凄凉境遇。至十月革命以后，尽管北洋政府驻俄使馆仍然存在，但在留学监理方面已是无能为力，故而原来规定的“留俄学生事务仍由驻俄使馆经理”，已成为一句实在的空话。

六、结 论

就历史价值而言，清末民初中国人留学俄国的活动虽在规模、作用等方面尚无法与同时代留学欧美、日本潮流等同而论，也缺乏20世纪20年代留苏热潮和五六十年代“苏东波”现象等后续留苏运动对近现代中国所产生的广泛深远影响，但作为中俄国家关系发展演变的产物与中国学子赴俄留学的起点，其具有特殊的开创性贡献：

一是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精通俄文俄语的各级政府官员。清末民初留俄生群体中，借留学之便而获得仕途发展之人为数不少，且官费、自费生均有。当然，较之普通自费生，官费生及具有官方背景的自费生供职于政府部门的人数更多。例如，享有学部官费的柏山、魏渤于1909年回国后，在清政府举行的归国留学生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287名同届法政科游学毕业生

① “学部奏拟管理欧洲游学生监督章程折”，《教育杂志》，1910年第5期，第41-44页。

② “留学欧洲之经理员”，《申报》1913年9月2日。

中，柏山、魏渤等 47 人名列优等，其中魏渤位列第 13，柏山排名第 20，均被授予法政科举人。^①至民国初年，留俄生在北洋政府各部门也占有一席之地。其中，郝树基任农商部佥事，范其光任蒙藏院参事，柏山任外交部佥事，程世模任公府外交顾问，魏渤任外交部主事。^②朱绍阳、夏维松、关清廉等则有后来出任驻苏俄使馆参赞或领事的经历。^③此外，朱绍阳还于 1928 年由南京国民政府委派出任驻芬代办，并曾受冯玉祥委托与苏联交涉释放国民革命军留苏生事宜。^④

二是众多留俄生从事俄语教育、文化译介等方面的工作，促进了 20 世纪中俄文化教育交流的发展。如早期“随使游历”的同文馆学生庆全、桂荣分别对吉林珲春俄文书院、新疆俄文馆的建立与发展颇有贡献。邵恒浚和桂芳则曾在圣彼得堡大学教授汉语，对推动俄国汉语教学的发展功绩突出。^⑤曾受清廷褒奖的“住馆肄业”学生张庆桐，在俄期间将自己翻译的梁启超著作寄给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教正，而托尔斯泰在复信中表达了对中国人民与中华文化的敬佩之情。^⑥夏维松、李家鳌、魏立功等回国后均曾任职于外交部俄文专修馆。其中，夏维松于 1921 年署理校长，李家鳌任督办，魏立功担任校医。^⑦刘泽荣回国后，于 1933 至 1940 年间先后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和西南联合大学任俄语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兼任外交及俄语辞书编译工作，其编写的《俄文文法》、《俄汉大辞典》等书，对中国俄语教育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⑧作为中苏关系与文化交流的大力推动者，张西曼不仅编写了《中等俄文典》、《新俄罗斯（大学适用读本）》等俄文辞书，还

① “呈学部咨送游学毕业生履历等第请单”，宣统元年九月初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光绪朝）缩微号 562-3074。

② 《北京东西洋留学会会员录》，1916 年 7 月编订。

③ 政协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伊犁文史资料》（第 6 辑），1990 年，第 169 页；郭寿华：《苏俄通鉴》，台北：大亚洲出版社，1971 年，第 672 页。

④ “第二集团军留俄学生回国”，《申报》，1928 年 12 月 27 日。

⑤ 肖玉秋：“试论清代中俄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史学集刊》，2008 年第 4 期，第 41 页。

⑥ 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554-555 页。

⑦ 《外交部俄文专修馆第二编同学录》，1921 年 8 月刊印。

⑧ 王乃庄、王德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物辞典（1949-1989）》，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 年，第 137 页。

在抗战时期积极促成中苏文化协会（Sino-Soviet Cultural Association）的建立，对促进中苏两国战时文学的发展与结成共同对日阵线起了积极作用。^①

三是部分留俄学生积极投身于侨务与革命事业，在维护华侨华工利益、促进中苏外交关系建立及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等方面贡献突出。1917年4月18日，刘泽荣与留学生刘雯、张永奎、伊里春、音德善、朱绍阳、李宝堂、刘娟等人共同组建了中华旅俄联合会（Союз Кита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В России）。^②设立该组织的目的就在于“洵为我旅俄人渡迷之津梁，输通两洋知识之枢纽，藉以研究该国各种实业及金融之问题。”因此刘泽荣等人将中华旅俄联合会的宗旨定为：（一）联络旅俄华人；（二）对于旅俄华人之行动，凡在法律范围内者，当竭力以辅助之。^③借助中华旅俄联合会的发展与苏俄政府的大力支持，刘泽荣等留俄学生不仅将广大华侨华工团结在一起，而且直接促成了北京政府派出张斯麟代表团与苏俄进行非正式谈判，为中苏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创造了契机。此外，在刘泽荣等人领导下，该组织在推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开展方面也有重要作用。^④

不仅如此，清末民初中国人留学俄国的活动，对于当代中国留俄教育乃至中俄教育交流的发展，也颇具启示与借鉴价值。自上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解冻以来，中国人赴苏留学活动得以再次开启。至90年代，虽历经前苏联解体的波折，但中国留俄教育依然保持快速发展趋势。而俄罗斯高等教育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的国际化走向，则为广大中国学子赴俄学习创造了良好条件。^⑤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形成，中俄教育交流合作愈发深入，中国与俄罗斯互办“国家年”、各级教育代表团互访、高校展览会、校际合作等活动均成为中国人认识俄罗斯教育的窗口，加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全宗十一②，案卷号630。

② 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1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98-199页。

③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1917-1919）》（一），台北：精华印书馆，1960年，第164-165页。

④ 关于中华旅俄联合会的具体情况，详见李玉贞：“十月革命前后的旅俄华人组织及其活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年第5期。

⑤ 参见张男星、杨冬云：“论俄罗斯教育的国际化”，《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1期；杜岩岩、张男星：“博洛尼亚进程与中俄教育交流合作的空间”，《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1期。

上留学市场与中介机构的逐渐成熟完善,这些都为中国民众近距离了解俄罗斯教育提供了渠道。尤其是高校展览会的召开,让中国学生可以与俄罗斯高校直接建立联系,这就为他们留学俄国提供了便利。因此,留学俄罗斯的中国学生人数总体而言呈上升趋势。短短几年间,留俄学生数量较之以往已累计增长了近 10 倍。^①当然,在为新世纪中国留俄教育的飞速发展而欢欣鼓舞之时我们也应看到,在中俄关系日益密切的今天,两国间的留学教育乃至教育交流仍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据有学者统计,在国外高校的中国学生中,俄罗斯的中国留学生仅占 2.4%,而在美国和日本高校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几乎是在俄罗斯的 10 倍。^②显而易见,这与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态势并不相符。

当前,全球化时代的留学教育不仅是一个国家培养人才的主要手段,更是密切国家关系、促进国际交往的重要渠道。对于中国与俄罗斯而言,作为同是世界大国的邻邦,“两国人民、两国青年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都肩负责任,需要我们用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深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中俄关系”^③。这就要求中俄两国更加重视留学教育在加深彼此关系、增强沟通与协作等方面的独特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清末民初中国人留学俄国的演进历程较为简单,但其产生的根源与发展的过程却深刻揭示了中俄国家关系与留学教育之间的紧密关系,彰显出两国关系对留学教育的决定性作用与留学教育对国家关系所具有的重大影响。这不但有助于我们从更高层面充分认识当代中俄教育交流尤其是留学教育的本质与效用,从而进一步推动两国间留学教育的发展、提升留学教育的质量以及拓宽留学教育的研究视野,亦可为促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不断向前迈进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

综上所述,清末民初中国人留学俄国的活动,是中俄教育交流史乃至国家关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既赓续清康熙年间产生的两国教育交流活动,又为后续中国人赴俄留学做好了部分准备。虽在民初时期留俄活动受其

① 《中国国际教育信息年鉴》编委会编:《中国国际教育信息年鉴》(2008-2009),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8年,第18页。

② 单春艳:“俄罗斯高校中国留学生现状述评”,《世界教育信息》,2008年第1期,第83页。

③ 李克强:“顺应世界发展大势 深化中俄战略合作——在莫斯科大学的演讲”(2012年4月28日),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04-30/3856613.shtml>

时两国关系的影响而几近中断，但终不绝如缕，得以延续。大批留俄学生或致力于外交、侨务、教育、译介等工作，或积极从事共产主义革命活动，不仅促进了中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沟通交流，也为此后风起云涌的20世纪20年代留苏热潮奠定了基础。正如汤因比在《图说世界历史》中所言，人类全新生活方式的核心乃在于不同文化或文明的根本特性的交流融合。^①据此而论，清末民初中国人留学俄国的活动确实发挥了开辟近代中俄文化教育交流新渠道的独特功效，在促进两个国家、两大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特殊作用，其历史价值应给予充分肯定。

【Abstract】 The activities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 Russia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ere the most distinctive chapter in the one-hundred-year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subject to it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other factors, promot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there have been more and more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 Russia. Gradually there were various official-financed and self-financed students dispatched by China's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Russia. Meanwhile, the related management system for overseas students were also established and perfected correspondingly. The overseas activities not only pioneered Chinese students' overseas studies in Russia, cultivating a number of talents in diplomacy and foreign languages, but also opened up new channels for modern educational and even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the follow-up Chinese' overseas activ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

【Key Words】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Overseas Education, Studies in Russia

【Аннотация】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по обучению китайцев в России в конце династии Цин---начале периода Китай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одну из самых самобытных глав столетней истории обучения китайцев за

① 许苏民：《比较文化研究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61页。

границей. С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19-го века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и внутренней обстановки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а также иных факторов, благодаря усилиям цин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обучение китайцев в России стало переживать подъём. На обучение в Россию направлялись студенты, финансируемые центральными и местными органами, а также студенты, находящиеся на само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ая систем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обучением за границей также формировалась и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лась. Данны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по направлению студентов на обучение за границу не только проложили путь китайским студентам для обуч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взрастили таланты, хорошо владеющие русским языком, понимающие русскую дипломатию, но и открыли новые каналы для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и даже культурных обменов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а также заложили фундамент для последующих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о обучению китайцев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Конец династии Цин — начало периода китай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обучение за границей, обуч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责任编辑 封 帅)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3 年第 1 期

(总第 179 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冯绍雷

出版：《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排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 公开发行 ·

定价：20.00 元